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尼克松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子 总统下台

1974年8月8日上午9时差2分。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脸色阴沉，步伐缓慢地走了进来，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同往日相比，尼克松的表情稍微有一些异样，举手投足也显得有些僵硬。熟悉尼克松的助手们感觉到，尼克松的内心正翻卷着汹涌的波涛。

9点正，技师们最后一次调整灯光和检查音响效果。

9点过45秒，对准尼克松办公桌的那架摄影机的红灯亮了起来——尼克松对美国 and 全世界讲话的时刻到了。

尼克松一开头就说：“没有打完仗就离开战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我决定继续战斗下去，由于缺少国会对我的支持，国家大事就会陷于瘫痪。”

接着，就到了尼克松必须说的一句有生以来最难出口的话。他直盯着摄影机说：

“因此，我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

在演说中，尼克松引用了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描写“斗场上的武士”中的一段话：

“他的面孔沾满了尘土、汗水和鲜血，他英勇地奋斗，他一次又一次地犯错误和出毛病，因为不犯错误和缺点的事是没有的，可是他真正是在努力做那件事，他知道什么叫做热情奔放，什么叫做忠心耿耿，他把自己献给了可贵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知道最终取得有重大成就的胜利，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他失败，至少他也知道他是失败得很英勇的。”

显然，他是以此来暗示他自己。

在讲演的过程中，尼克松一直低头看着一页一页的讲稿，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在看稿子。讲稿早已牢记在他心中。最后，尼克松说：“在这个职位上服务，就会有一种非常亲切的、与每一个美国人亲如兄弟的感觉。在离开这个职位时，我向上帝祈祷：愿上帝永远降福于你。”

这时，尼克松的双眼已噙满了泪水。

8月9日上午9时许。

华盛顿白宫东厅。

身着海军陆战队白色制服的总统军事顾问杰克·布伦布依旧如往日一般神气，以宏亮的声音宣布道：“女士们，先生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到！”

军乐队奏起了“向总统致敬”的乐曲，其中夹杂着观众们的热烈掌声。记者们拼命地挤着，想抢占最佳位置。

尼克松总统走出来了，额上早已沁满了汗水。虽然这是他在摄像机前的老毛病，但今天的汗水更多。

第一夫人帕特身穿白色连衣裙，戴着一对漂亮的珍珠耳环。细心的观众很快就发现，总统夫人没有请理发师做头发，而且脸上还扑了厚厚的一层粉。此时的她，也许感到十分难堪，瘦弱的身躯在灯光下似乎显得不堪负重，紧闭的双唇，使人想到她的心头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斗争。

在尼克松的右边，站着小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然后是长女特里西娅及其丈夫爱德华·考克斯。

在空军一号飞机的驾驶舱里，飞行员拉尔夫·艾伯塔奇上校已做好了起

飞前的一切准备。

10点17分，尼克松夫妇登上飞机，艾伯特奇注意到总是提着一个黑色提包的准尉没有像以往一样出现在尼克松的身边。那个黑色提包被称为“足球”，只要总统按下核按钮，全世界将爆发一场恐怖的核战争。

艾伯特奇轻拉操纵杆，银灰色与天蓝色相间的总统座机便腾空而起，直刺蓝天。

中午正12时，空军一号正飞越密苏里上空。尼克松明白，这架飞机从此刻起，已不再属于他。

电视屏幕上，闪现出福特正在宣誓就任总统。

尼克松坐在软椅上，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只听福特以颤抖的声音在向全国电视观众讲话：“同胞们，我们国家的这场漫长的恶梦终于结束了。”

“结束了？”尼克松喃喃地自言自语，他想起圣克门蒂的海滩，想起了加利福尼亚。他就是那儿的穷小子，来到华盛顿，在美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如今，他又要回到加利福尼亚的老家。

圣克门蒂越来越近了，尼克松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尼克松传

第一章 加州的穷小子

1913年1月9日。

一场空前的寒潮袭击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朔风卷着鹅毛大雪，从裂开的苍穹往下倾泻着。距洛杉矶大约五十余公里的约巴林达镇，早已是银妆素裹。

天还没有黑，若在往日，这个居住着两百多户人家的小镇，此刻早已充满孩童们的欢声笑语。然而今天，镇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连狗吠声都没有。只有柑桔树枝似乎不堪积雪的重压，发出“吱、吱、吱”的喘息声。

“哇！……”一声婴儿的长哭，打破了小镇的寂静。理查德·尼克松出世了。

在一座非常简陋的房屋里，尼克松的父亲、电车司机弗朗西斯·安东尼·尼克松激动地抱着刚刚出生的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好儿子，你会成为大人物的！”

他的夫人汉纳脸上充满着笑意，望着父子俩，柔柔地道：“取个什么名呢？”

“他哥哥叫哈罗德，他就叫理查德·尼克松吧！”弗朗西斯虽是小人物，但他却早想好了，自己的儿子统统以早期英国国王的名字来命名，但他决没有想到怀中的二小子日后会成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的父亲弗朗西斯1878年12月3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农庄里，在他的一生中，人们都叫他弗兰克。

倘若家庭情况稍稍好一点的话，弗兰克也许和其他孩子一样，能够由小学而中学，直至大学毕业，家庭历史或许会因此改写。然而，弗兰克刚刚读完小学六年级，家庭已无财力继续供他读书，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去工作。弗兰克为此抱憾终身。

弗兰克不是肯轻易向命运低头的人。从学校出来以后，他不断地向命运挑战。他拉过牛车，当过木匠，经营过土豆农场，在科罗拉多剪过羊毛，安装过早期的手摇电话机。但这一切，都没有使弗兰克感到满意。弗兰克这种坚毅的性格也传给了儿子尼克松。

1907年，弗兰克定居于约巴林达镇，并在行驶于洛杉矶和惠蒂尔之间的太平洋有轨电车公司谋到一个电车司机的工作。

1908年，当弗兰克28岁时，他觉得应该结束乏味的单身汉生活了。也许是爱神看穿了弗兰克的心意，在情人节的一次社交集会上，给他送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汉纳·米尔豪斯。这位姑娘日后成为尼克松的母亲。

汉纳当时才23岁，正就读于惠蒂尔学院语言学系，主修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遇到弗兰克时，刚读完大学二年级。

汉纳的家庭背景与弗兰克迥然不同。汉纳于1885年3月7日生于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爱尔兰教友会教徒的家庭。在汉纳12岁时，迁居到加利福尼亚教友会的新的居住点惠蒂尔。在这儿，汉纳的父亲办了一家苗圃，栽培了一个桔园。

对弗兰克狂热追求汉纳并求婚，汉纳的父母采取了保留态度。汉纳很喜欢弗兰克容易发怒也容易欢笑的脾气，两人很快地坠入爱河。四个月後，他们结婚了。

汉纳的选择在时人的眼中，很难说是对还是错。爱情，在很多时候是说

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很神圣的情感。

历史证明，汉纳与弗兰克的选择没有错，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俩终身相爱，还因为他们俩的结合，诞生了一个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弗兰克娶了汉纳以后，当然不知道，由于他们爱的结果，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加利福尼亚人担任的总统会降临在他们的家庭。在新婚蜜月里，弗兰克所想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努力地工作，改变自己的贫穷，使妻子过得好一些。

弗兰克对自本世纪初便严格控制美国人生活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机器极为反感。由于他认为美孚石油公司托拉斯破坏了美国的前景，所以当他决定在蕙蒂尔开设一个加油站时，没有按常规选择美孚石油公司，而是选择了知名度远远不如美孚的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来供应汽油。

随着加油站生意的日益繁荣，弗兰克又开设了一个杂货店。

弗兰克的生活改善起来，汉纳接着为他生了五个儿子：

长子哈罗德，生于1909年；次子理查德，生于1913年；唐纳德生于1914年；阿瑟生于1918年；爱德华生于1930年。

理查德·尼克松无疑是弗兰克夫妇最喜爱的儿子，尤其是理查德坚韧的性格最为父亲所赏识。这种性格，理查德·尼克松刚刚三岁时，就表现出来。

有一天，汉纳抱着还在吃奶的唐纳德，驾着轻便马车往家中奔去，尼克松由邻居的一个女孩抱着，坐在车后。拐弯的时候，由于车速太快，尼克松被摔在地上。邻居的女孩被这意外事件吓得尖叫起来，汉纳慌忙勒住马时，尼克松已经爬了起来，毫不理会顺着额头直往下流的鲜血，跟着马车跑了过来。

弗兰克晚上回家时，见尼克松额上贴着纱布，得知儿子一声没哭时，点着头说：“真是一个好小子！”

理查德·尼克松六岁开始在约巴林达的小学里读一年级。由于他聪颖好学，母亲又早已在家里教他读过一些书，所以他很快就跳过了二年级，进入三年级。

小小的尼克松不仅好学，也十分懂事。家中开设的杂货铺，除了卖日用杂货外，还设立了一个小柜台，专门出售汉纳自制的馅饼和蛋糕。尤其是她制作的蛋白蛋糕，极受人们的欢迎，常常供不应求。往往天刚黎明时，汉纳已经冒着侵人的寒气，站在厨房门外，用一只木制的大匙子使劲地搅和着蛋糊。她认为，只有在露天的新鲜空气中把料调制好，然后送进烘箱，这样才能做出最好的蛋糕来。每当这时候，尼克松总会不顾母亲的劝阻，早早地起床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在做完家庭作业和家务劳动后，尼克松常常坐在壁炉边或厨房的桌子边，沉浸于一本书或一本杂志中，周围的一切仿佛已不存在了。

尼克松的父亲弗兰克没读多少书，却忘不了给儿子订不少的杂志。《洛杉矶时报》、《星期六晚邮报》、《妇女杂志》是尼克松必读的杂志。《全国地理月刊》则是尼克松最喜爱的一种杂志，每当去他姨妈家时，理查德总忘不了借一本回来。

父亲弗兰克也很注意培养孩子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家中的杂货店，实际上是一家“夫妻店”，没有雇用伙计。一切杂活，譬如盘货，订货，往货架上上货，招待顾客以及记帐，还有店铺每晚的整理和打扫、消毒等，都是

一家人干。

尼克松稍大的时候，便包揽了采购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工作，利润归尼克松所得。尼克松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5点钟到达洛杉矶第七街菜市场，挑选最好的水果和蔬菜，施展滔滔不绝的口才，与农民和批发商讨价还价，以便买到尽可能便宜的货，然后赶回杂货铺，把货物洗净，分级送进店铺陈列好，到8点钟再会上学。这样的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但令人充实、愉快，锻炼了尼克松。

父亲弗兰克是一个喜欢争辩的人，不论是同自己的儿子还是同杂货铺的顾客，几乎可以因任何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这种感情的爆发并非对什么人过不去，而是因为他愿意把辩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尼克松虽然对个人之间的争吵抱着一种厌恶的情绪，但他后来进入大学辩论队里的时候，父亲弗兰克却对儿子的辩才感到骄傲。他经常用车子把尼克松送到辩论会场去，然后坐在会场后面专心致志地听着，一刻也不愿耽搁。回家的路上，他会指出儿子的不足，对每一节辩论进行详尽的分析，尼克松为此感动不已，受益匪浅。

弗兰克对政治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他不是因为穷没有读几天书的话，说不定会去竞选美国总统。

那时还没有发明电视机，无线电还处于初期阶段，聊天是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大多数人的聊天内容都不过是一些花边新闻或日常琐事、历史故事等等，弗兰克家的聊天却是以政治问题为中心。

父亲尽管热心政治，但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是不可能有什么建树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次子理查德·尼克松身上。

在弗兰克看来，尼克松的成功意味着他一直为之工作和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并具有决心，什么目标都能达到。在尼克松当上众议员的年代里，尼克松把每日出版的“国会记录”寄回家去，弗兰克总是从头看到底，决不漏过任何一小段，哪怕是角落里的一小短句！其实就是尼克松自己，也决没有这样仔细地读过。

当尼克松竞选副总统时，父亲弗兰克给他过去几年中曾阅读过的一家报纸写了一封直截了当的信，建议该报支持尼克松。他在信中说：“这个孩子是我抚养长大的五个孩子之一，我认为他们都是美国的最好的孩子。如果你们愿意帮他一把，那我一定说《俄亥俄州报》仍在做点有用的工作。”

相反更相亲，这个原理可以非常恰当地用在汉纳与她的丈夫弗兰克的关系上。弗兰克本是一个相当坚定的卫理公会教徒，为了爱情，为了能和汉纳结合在一起，皈依了教友会。两人彼此十分相爱，为了孩子不惜做出任何重大的牺牲。然而两人的气质、性格却极为不同。

与父亲弗兰克极为外向的性格相反，母亲汉纳特别喜爱独处，把对家庭、对别人的温暖和爱深深地埋在心底，从不愿人了解她内心的感情和情绪，这一点，也深深地感染了尼克松。

尼克松一家人进餐时，是必须做祷告的。如果遇上有客人等等特殊情况，汉纳会把每一个孩子叫出来背诵一段《圣经》，然后默默地祷告。汉纳本人完全听从马太福音的训谕，一定要关起门来做祷告。所以每晚就寝前，总要独自一人到一间密室做祷告。

当理查德·尼克松进入政界后，每当遭到报纸攻击或尼克松要作出困难的决定或准备演说时，汉纳常常会说，“我会想到你的。”这是她那从容的教友会教徒的说话方式，意思是“我将为你祷告。”

理查德·尼克松多多少少承袭了他母亲喜欢独处的性格。在他刚读小学的时候，常常在客厅的钢琴前边一坐几个小时，试图弹出一首曲调来。为此，弗兰克夫妇决定把他送到简姨妈家去住上半年，跟随身为钢琴演奏家和教师的姨妈学钢琴。

理查德·尼克松还是有一定的音乐天赋，50年后，当他从总统宝座上跌下来时，却还记得儿时学过的琴谱。

尼克松这时的宏大志愿是多变的。在整个小学期间，每当深夜他被从一公里外隆隆驶过的火车汽笛声惊醒时，他的愿望是当一个火车司机；当他觉得弹钢琴也许是一种比写文章和讲演更有效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时，他又想能够指挥一个交响乐队和在大教堂里演奏钢琴。他甚至认为创作伟大的乐曲，是一个人能为自己提出的最大愿望之一。

12岁时，父母来到林赛，把尼克松领回蕙蒂尔家中。

尼克松回到家中不久，他最小的弟弟阿瑟因为患脑炎死去。

·尼克松非常喜欢这个小弟弟，一连几个星期，没有一天不为阿瑟的死而痛哭。也第一次懂得了死是怎么回事和它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阿瑟的死，给弗兰克一家带来巨大的哀痛，长子哈罗德的病和死，则不仅带来精神的巨大创伤，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学校一放假，尼克松就去找零星活儿干。他当过游泳池的看门人，也曾在鸡鸭店里帮忙拔鸡毛和做油炸鸡，还帮过流动游艺团招揽观众。

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尼克松都没有丧失奋斗的信心。在他13岁生日时，外祖母送给他一幅嵌在镜框里的林肯像。像的下面，录着朗费罗的《生活诗篇》中的几行诗：

“伟大的一生常提醒我们，
要使自己一生崇高庄严，
在去世时，
在时间的沙滩上，
留下我们的足迹。”

尼克松把这幅画像挂在他的床头，直到他当了美国总统，仍是他最喜爱的东西之一。

尼克松日后政治上的成功，无疑与他父母的影响分不开。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对父母都同样的热爱，但方式却完全不同，正如他们两人在性格上也完全不同一样。我父亲是个爱吵架的好斗的人，他具有敏捷而范围广泛的朴素才智。他那刻苦学习、勤勉工作、不问成败的战斗精神，使我对他怀着无限崇敬。我母亲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无私的，她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是安详的内心安静，和永不感到失望的决心。”

尼克松无疑是一位勤奋的学生，中学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三。同时，他也是一个极有演讲口才的学生。初中和高中时，他都在宪法演讲比赛中获胜，并且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哈佛俱乐部发给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的奖金，当时还有可能获得去耶鲁大学读书的奖学金。

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加上哈罗德患病所花去的大量费用，家中无力支付去耶鲁大学学习的旅费和昂贵的生活费。尼克松已别无选择，只能到本地的蕙蒂尔学院读书。

在这里，尼克松的思想受到了触动。

保罗·史密斯博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讲师，主讲英美文明、美国宪法、国际关系和法律等课程。尼克松从他那儿理解到，历史不仅是过去事件的编年纪录，还可以成为分析和批判的工具。

教英语的艾伯特·厄普顿则极力反对偶像崇拜，他不承认有什么神圣的东西。这种直率的反传统思想给了尼克松极大的启发。

赫谢尔·科芬博士主讲“基督教复兴的哲学”，这门课程的第二名称是“我能信仰什么？”

新的思想、新的知识让年轻的尼克松思考起来，当时他写了一篇作文，清楚地表明他大学时期的信仰、疑问和惶惑。

信仰上的惶惑并没有妨碍尼克松在学院内为自己日后的从政打基础，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日后他将登上权力的顶峰。而登上权力顶峰的道路，就在足下。

学习，决不是尼克松大学四年中唯一的或者是最重要的部分。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周开始，尼克松就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

蕙蒂尔学院由于规模小，没有什么联谊会组织。只有一个叫做富兰克林社的社交俱乐部。其成员在校园里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尼克松和其他许多学生被排斥在外，自然心中愤愤不平。

恰在这时，从科罗拉多学院转来了一个学生，名叫迪安·特里格斯，他在科罗拉多学院是参加了联谊会的。他认为在蕙蒂尔只有这样一个俱乐部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于是，迪安与尼克松一起去找到英语老师厄普顿，另外创办了一个学生团体。这个团体叫做“方正社”，尼克松成为方正社的第一任主席。

方正社吸收的会员大都是运动员和半工半读的学生，富兰克林社则是以发展社交活动为目的。从学校年鉴的照片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两个社的成员区别开来。富兰克林社的会员都穿夜礼服，而方正社的会员则都穿着敞着领口的衬衫。

尼克松为方正社制订了社章，谱写了社歌，提出将为好精力、好体格、好头脑、好心肠奋斗终身。方正社的箴言是“根绝丑恶”，标记是一只公猪头。

方正社成立后的一系列活动，充分显示了尼克松的组织、领导才能。尼克松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锻炼了自己的才干。

尼克松最喜欢参加学院的辩论活动。为了战胜对方，对某一个问题的辩论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准备，这样也就有助于防止把问题看得太死，并生动地教育人要尽量理解对方的观点。这种辩论训练，使尼克松逐步习惯于不用底稿发言。在读四年级时，尼克松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各大学间举办的即席演讲竞赛会的优胜奖。

在读三年级时，尼克松参加了竞选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活动。尼克松是方正社的候选人，对手是富兰克林社的迪克·汤姆森。

尼克松选择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赞成允许在校园内举行舞会”作为竞选的基础。论点是实用主义的：不论谁是否赞成跳舞，反正大部分同学都常常跳舞。那么，与其让学生到校园外面一些第二流的舞厅去，不如在校园里举行舞会，这还可以对他们进行监督。

校方本来是不允许学生跳舞的，但尼克松的主张受到同学们的广泛拥

护，因此在竞选中获胜。尼克松接着便履行诺言，最终与校方达成妥协，由校方租下附近的蕙蒂尔俱乐部，那里面就有一间漂亮的舞厅。在那一年，尼克松成功地举行了八次舞会，尽管尼克松不会跳舞，常常把舞伴的新鞋踩坏。然而，女生们仍然喜欢与他跳舞。当尼克松搂着舞伴绕舞池旋转起来的时候，踩着舞伴脚的尴尬随着优美的旋律而随风飘散了。

不言而喻，在大学中的这些活动，对尼克松日后的政治生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体育活动，尼克松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他认为，体育运动一方面会减轻工作和学习上的重负，另一个方面，体育活动能够激发人们强烈的竞争精神。

读一年级时，尼克松曾是学校波特林斯篮球队的队员，很不幸，那一年他们队没有胜的记录，每场必败，而且还给尼克松留下终身的纪念——一颗门牙被碰断，不得不安上磁制的假牙。

足球在美国并不普遍，尼克松从中学时代起就十分喜爱足球，尽管他是一个十分蹩脚的队员，常常在一场已经决定了胜负的最后几分钟才有上场表现的机会。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足球的喜欢。他喜爱的是那种强烈的竞争精神以及队员间的配合和友谊。

正是在足球的绿茵场上，他得以认识了足球教练华莱士·纽曼。

尼克松认为，除了他父亲以外，纽曼是他所熟悉的人中，他最钦佩、同时也跟他学到最多东西的一个人。

纽曼是一个印第安人，身材高大，面部轮廓分明，一身古铜色的皮肤，给人一种十分有力的感觉。他教导队员并鼓舞他们，只要艰苦训练，长时间练习，就能击败任何对手。他不能容忍那种认为只要球打得好，输赢并不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球要踢得干净利索，但输和赢可是有很大的差别。他常说，“只要你能找出一个输了不生气的人来给我看看，那我也可以找出一个准输无疑的人给你瞧瞧。”

要恰当地评价纽曼对尼克松的影响是困难的。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纽曼的影响时说：“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的精神和一种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一个人如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这种不屈不挠的竞争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必不可缺的。

年轻的尼克松思想逐渐成熟，蕙蒂尔学院这块天地太小了，他想走出去，见识新天地。

在蕙蒂尔学院最后一年，这位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已经在考虑毕业后如何才能挤进上流社会的圈子。

上帝给他的每一个公民的机会都是公平的。一天，尼克松经过校园的布告栏时，眼睛突然一亮，他被一张通告吸引住了。通告上说，蕙蒂尔学院有25个人可以获得250美元的奖学金到北卡罗来纳州杜勒姆新成立的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

法学院，意味着毕业后可以当律师，可以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尼克松自然不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同学们时，从他们冷淡的表情可以看出，这已不是新闻了，他们知道的比尼克松还要多。他们告

诉尼克松，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那奖学金并不好拿，在第一学年获得奖学金的 25 名学生中，到第二年便只有 12 名能继续享受了。

尼克松沉默了，他明白这是一次挑战，他不能失败。

1934 年 9 月，尼克松赢得并接受了这笔奖学金，抵达了杜勒姆。

杜克大学的规模和美丽让尼克松大吃一惊，高高的塔尖，壮观的城楼，彩色的玻璃，掩映在葱郁的树林和美丽的花园之中。更让尼克松吃惊的是所在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的会员，他明白，他已经走上了一条快速竞争的轨道。

为了在学习上名列前茅，懂得更多的有意义的法律知识，尼克松每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法学院图书馆学习。但他仍然不满足，担心自己学不好法律，曾向一位名叫比尔·阿德尔森的高年级学生倾诉了自己的担忧。比尔安慰他说：“你不必担心，你具备学法律的条件——铁屁股。”

尼克松的刻苦努力，在杜克大学三年里始终保持住了为获得奖学金所必需的优良成绩，而且还被选为律师公会的主席。

在杜克大学最后一年发生的一件事，几乎改变了尼克松的一生。

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来杜克大学招募特工，尼克松报了名，并被请去谈了一次话。但却从此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直到尼克松当了副总统，与联邦调查局头目埃德加·胡佛偶尔谈起时，胡佛回去查阅过档案后，才告诉尼克松，当年他加入联邦调查局的申请早已获得批准。但正好在他们准备寄出通知时，他们所要求的下一年的经费被削减了，此事便耽搁下来，不了了之。如果当时尼克松当真去了，也许就不是美国总统，而一直是一名特工了。

从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尼克松成绩名列全班第三，并被提名为声望极高的全国法科优等生联谊会——初级律师会——会员。

尼克松怀着美好的希望回到了蕙蒂尔。为了取得开业当律师的资格，不得不去参加加利福尼亚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而且要考全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法，而尼克松根本就没有在大学学过。

考试结束后，尼克松及其家人焦急地等待着结果，度日如年。听人说，录取的人将收到装在普通信封里的一张简单通知，未被录取的人则将收到装在一只大信封里的为申请下次考试所必需的全部文件。

在等候考试结果的几个星期里，尼克松一家每天都热切地检查着信箱。

终于有一天早晨，尼克松见他母亲流着眼泪从信箱那边回来了，她手中拿着他们盼望已久的信。那是一只大信封，沉甸甸的，显然装满了文件。尼克松明白了，自己没有通过考试。

尼克松接过信封，心头就似压上了一块石头，但他不愿母亲看到自己的烦恼，因此他走进浴室，把门关上后才打开信封。

出乎意料，信里却是通知他已经取得了律师资格，并附着许多有关准备宣誓的安排和其他技术问题的指示。

尼克松走向厨房，一家人还在为他伤心，他却得意洋洋地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很快，尼克松就在蕙蒂尔最老的温格特比尤利律师事务所谋到了一个职位。

尼克松最初参与处理的不过是许多青年律师一般都会遇到的有关财产和离婚的案件。尼克松还没有结婚，对此他感到极不舒服和不安，尤其是离婚

当事人在他面前争论床帏之间的事时，使他感到窘迫与不安。他常常设法促使他们和解，但极少获得成功。

对律师这个职业，尼克松是很喜欢的。但他的最终目的，是想以此作为进入政界的跳板。一年以后，这个事务所成为温格特—比尤利—尼克松律师事务所，人们开始称他为尼克松先生。

为了给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多拉一些生意，也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尼克松开始广泛地参加社团活动，还参加当地业余剧团的演出活动。在这里，他遇上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帕特里夏·瑞安。

第二章 一见钟情

1938年的一天，蕙蒂尔的圣马塞厄斯教堂的主日学校里，当地的业余剧团准备在这里试演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和乔治·考夫曼的剧本《黑色的城堡》。这是一出神秘的传奇戏。根据剧本的要求，剧中人物达夫妮·马丁是一个高高的、黝黑的、忧郁的、芳龄20的美人，衣着潇洒飘逸，永远是一副愤世嫉俗的神情。扮演者是蕙蒂尔中学的教员帕特里夏·瑞安。

理查德·尼克松则扮演一个24岁的稍稍有些大学生气息的小伙子，即富渴求欲又腼腆羞怯。

尼克松自以为认识蕙蒂尔地方的每一个人。但是今天晚上，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美丽而活泼的红头发姑娘。尼克松再没心思背他的台词了。那纤细的身材，优美的曲线，以及使人目眩神迷的瀑布一般的秀发，把他的眼睛紧紧地吸引住了，再也不愿挪开。

好不容易等到演出结束，尼克松迫不及待地找到一个朋友替他们互相介绍一下。后来尼克松提出用车送她回家。途中，尼克松问帕特是否肯同他出去玩一次。帕特有些戒备地说：“我很忙，恐怕没有时间。”

已被帕特深深地迷住了的尼克松，这位平时不好冲动的男子汉已不能自拔，很鲁莽地说：“你不要那么说，因为有一天，我会和你结婚的！”

帕特对此感到十分突兀，使劲地盯了他一眼。不知为什么，她对这位有着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深褐色的眼珠十分有神的小伙子没有一点愠怒，只觉得小伙子好像是在逗她。

几个月后，尼克松已经成为当地青年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20—30俱乐部的主席、蕙蒂尔学院校友会主席、杜克大学加利福尼亚校友会主席、奥兰治县城市联合会主席，并经选举成为蕙蒂尔学校评议会最年轻的成员。镇上有几个共和党领袖还建议他竞选州议员。

尼克松与帕特已十分熟悉了，他知道帕特的经历与自己十分相近。

帕特1912年3月16日午夜时分生于内华达州伊利市的一个矿山小市镇，受洗礼时被命名为西尔马·凯瑟琳·瑞安。一岁，迁居到加利福尼亚州阿蒂西亚附近离洛杉矶西南大约30余公里的一个小牧场。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兄弟。

瑞安的父親是純愛爾蘭血統，便決定把瑞安的生日定在3月17日，因為這一天是愛爾蘭的保護神聖·帕特里克的誕辰。後來人們便叫她帕特了。

帕特13歲時，母親死於癌症，她不得不代替母親，為父親和兄弟們做飯和料理家務。當她中學畢業時，父親又去世了。帕特只得放棄了進大學的計劃，到一家銀行做半天出納員工作，半天到富勤頓初等學院去聽課。

是年夏天，她得知她熟悉的一對老年夫婦打算搬到紐約去，想找個人替他們開車作這一長途旅行，便自告奮勇地去送他們到紐約。繁華的紐約很快就把她迷住了，使她放棄了即刻返家的計劃，決定留下來。她先給人當秘書，後來又在塞頓醫院學會了X光使用技術，這所醫院是由慈善團體的修女開辦的。她住在醫院旁邊的房子里，修女們外出採購東西，她就為她們駕車。

帕特從來沒有放棄重返學校的願望。兩年後，她回到洛杉磯，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註冊入學。

為了維持生計，她每周花40小時協助一位教授做點研究工作以取得一些報酬，她也干過百貨店里的售貨員，有時還受雇在電影的群眾場面中當臨時演員。1937年，她終於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以優等成績獲得理學學士學位，

来到蕙蒂尔，在中学当了一名教授商业课的教师，月薪 190 美元。

帕特对演剧很有兴趣，并因此而与尼克松相遇。当《黑色的城堡》一剧排演完时，帕特与尼克松已十分亲切熟悉了。

他们经常约会，常常一起到阿蒂西亚附近新建立的室内溜冰场溜冰，在附近的海滨游泳，或者是到洛杉矶附近的山上滑雪。遇到周末，两人还驾车到好莱坞的大电影院去看电影，有时候，两人还到蕙蒂尔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观看足球。

随着了解的加深，帕特已开始被尼克松迷住了。她认为尼克松“英俊在于强悍，尤其是音色特别好，还没有在别的小伙子那里听到过这么好的声音”，“他有股子冲劲，哪儿都去，在他眼里，什么都是机会。他完全相信生活一定会美好，至于出现的和碰上的众多问题，就算不能全部解决，至少也能使情况有些变化。”

《黑色的城堡》公演之后，帕特的演技受到舆论的好评。当地的《蕙蒂尔评论报》赞扬她“把达夫妮喜怒无常的浮躁性格演活了。瞧她一阵风似的冲进房间，又一阵风似的冲出房间，粉脸含怒、半愠半恼，演技确有独到之处。”帕特见到这篇评论后，有些担心尼克松的父母会误认为她也是同她所扮演的达夫妮一样的性格。

几周之后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帕特随尼克松去拜见他的双亲。汉纳·尼克松很热情地用咖啡和草莓松饼来款待她。凭直觉，帕特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尽管帕特从心里喜欢尼克松，但她心里还没有成家的准备，何况尼克松还只是她众多的追求者中的一个。

有时候尼克松追求得太紧，她就婉转地叫着尼克松的爱称“迪克”，向他表示自己恐怕不能以同等的爱来回报他，甚至半开玩笑半提醒地说：“迪克，你知道我天生有四海为家的性格，是个吉卜赛种，不能守在你身边的哟！”

但这样的表态，对尼克松这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性格不起丝毫作用，在随后给帕特的一封情书中，尼克松开头就称“云游小姐”，并十分幽默地写道：

“谨奉上矢车菊一枚，以供吉普赛人盆养，也因为该花色泽与帕特小姐双眸相同之故。”

对尼克松的紧追不舍，帕特开始回避，她还不愿意轻易地把自己的终身交给这个热情得有些过分的小伙子。

对于尼克松的约会，帕特已不是有邀必到了，甚至有一次帕特还让自己的女友玛格丽特代替自己赴约。

帕特这些小花样，自然瞒不过尼克松，他明白这不过是帕特的一种矜持罢了，是对自己耐心的一种考验。

当帕特以工作太忙为借口推辞约会时，尼克松便主动找上门来，坐在帕特身边，帮她改学生的作业。

有一次，她远远地望见尼克松又来了，慌忙把门关上，装作是不在家。

尼克松来时吃了闭门羹，却并不灰心，他便给她写条子，表达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有一次他在条子上写了因为她拒绝邀请，他只能孤独地去散步的情景。

尼克松的追求，让帕特心烦意乱。有一天晚上，当尼克松又出其不意来会帕特的时候，帕特鼓起勇气，委婉地表示两人应该结束这种一厢情愿的罗

曼史。

尼克松见她说得非常郑重，不像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她的心里话。顿时如掉进了严冬的冰窖，心冰透了，一句话也不说。但他却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情，好像是了结了一份无足轻重的帐单一般，转身走了。

帕特原以为尼克松会悲痛欲绝，没料到竟然如此。她竭力忍着即将滚出眼眶的泪水，凝视着尼克松远去的背影。

“这件事完了。”帕特在心里对自己说。

出乎意料，过了几天，尼克松给帕特又来了封情真意切的信。亲爱的帕特里夏：

你那次客客气气送我出来，我使了性子，请你千万要原谅我。想必你也看出来了，我是故意装出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那是男孩子的牛脾气。

……让我把该说的都说清楚好吗？我多么珍惜同你一起开车外出、一起聊天的时光，请你答应继续保持我们的关系，别担心什么“他不能自拔了，那我该怎么脱身才好呢”这类问题。我说这些，全无嘲讽之意。请你听我把我对你的看法说完。

你知道我也生活在一个一厢情愿的世界里，尤其在这一次的恋爱问题上。有时我真怕自己连什么是认真，什么是不认真都分不清楚了。但是我能诚恳地对你说，帕特里夏是个好姑娘，我无比地喜欢她。纵然她因为不愿意我伤心是迄今连个求婚的机会都不给我，纵然她常常不愿直言相告而多少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我永远记得的却是她既具有爱尔兰的优良血统，又具有（日耳曼）严肃冷静的头脑。

你的迪克

帕特不能够拒绝尼克松，同意与尼克松继续见面，但不许他再提婚恋嫁娶的问题。

两人的来往并没有受此影响，尼克松除了与帕特频繁往来外，还给她写了不少情意缠绵的信。当期末将至、夏日将临的时候，尼克松送给帕特一只座钟，并附了一张条子。条子中说：

虽然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你却青春长驻，因为帕特小姐的内心是不会老的。

帕特收到了这件礼物，又看了这张条子，很感动，眼睛都潮湿了，很快给尼克松回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

我太喜欢这只钟了，我给它起了个新的名字叫里克先生。有了这只钟，守着它的时间我会严肃一点的，当然还是要委婉含蓄，也就是说，你的帮助我需要，尽管我没答应什么，你想起来多少可以高兴些了……

盼望见到你的帕特

这封信没有任何许诺，但尼克松已明白其中的深意。想到自己长久的追求也许不久就会有结果，不由得高兴地坐到钢琴边弹了一首欢快的乐曲。

1939年1月9日，尼克松在律师事务所里也收到了帕特给他的生日礼物，也是一只座钟，尽管帕特因为工作忙，没有亲临祝贺，尼克松心里仍感到暖洋洋的。他用公文纸写了一张附条，开玩笑地说：“当我50岁时，如果你允许的话，还可提前，将支付给你40亿美元。”这张附条随同致谢信一同到了帕特的手上。

在这一年里，帕特担任着学校业余文娱委员会的教职工顾问职务，总想多跑几家舞厅舞场看看，为学校的舞会物色几个有水平的乐队，再说她自己

也喜欢跳舞。

而尼克松早已扫除了舞盲，在舞池中能够潇洒自如地应付各种舞步。还有什么能比搂着帕特里夏·瑞安小姐跳狐步和探戈更幸福的呢！而帕特也感到尼克松搂着自己腰的手是那么的有力，有时她会感到一种幸福的眩晕。

春去秋来，帕特的生活已经和理查德·尼克松融为了一体。每到周日，两人总爱驾车去海滨，蔚蓝的海洋，暖洋洋的沙滩，一望无际让人忘记尘世的喧嚣，以及生活、工作上的烦心。他们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手捧书本坐在太阳伞底下，似乎世上只有他们两人存在。

到1939年8月，帕特同自己的女友玛格丽特、弗吉尼亚三人驱车出游，她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单感觉。尼克松的影子总是在眼前晃来晃去，她多么希望尼克松在自己的身边。每到一站，她也不怕女友笑话，首先就迫不及待地去邮局打听有没有自己的信件，同时又迫不及待地给尼克松去信。帕特明白，自己已经真正地爱上了尼克松。

1940年2月，尼克松与帕特相逢两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尼克松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给帕特写了一封热得发烫的情书：

当我眺望窗外，看着从云层中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在过去两年里你对我是多么的重要……你也许还不清楚，以前当你说他有一天能开车带你出去时，他有多么激动，而今天你再说愿意跟着他去任何地方时，他还是像以前的激动。

你想到过没有，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向窗外你住的地方了望，向你送去最真挚的爱情、钦佩、敬仰和最美好的祝愿？

一任风起雨落，或者就像现在这样阳光被云遮盖，他初衷依旧，永不变心。对他来说，其实对天下任何人来说，都没有比与你——我亲爱的心上人相爱更美好的事了。

爱你的迪克

又过了一个月，尼克松知道和帕特的这段罗曼史已经结下了果实，应该是收获的时候了。圣克利门蒂海滩，已是日落时分，尼克松驾车带着帕特又来到这里。他们站在岸边，凝视着海天相接的边际。太阳的余晖已经退尽，苍茫的暮色中，两个相爱的人影合在了一起。

尼克松与帕特深情地对望着，海浪轻轻地吻着沙滩。这儿，布满了他们爱的足迹，大海可以作证。

尼克松郑重地向帕特求婚。“帕特，请你嫁给我。”尼克松握住了帕特柔嫩的小手。

虽然早已等待尼克松的这句话，帕特的身子仍然为之一颤。自己的一生就要与这位年轻的律师紧密地联在一起，帕特沉默了一会。尽管沉默的时间很短，尼克松的心却剧烈地跳动，仿佛度过了一个世纪，他很担心帕特会像以前对他的请求一样说个“不”字。

帕特感觉到尼克松的掌心很烫，那一双深情的眸子中间闪过一丝忧郁。不能再犹豫了。“迪克，我答应你，让我们永结同心。”说完，闭上眼睛，激动地扑在尼克松怀里。

一股巨大的幸福的热浪向尼克松涌来，他把帕特抱了起来，重新回到车上，他要立即带帕特去见自己的父母，让他们得知这个好消息，分享自己的愉快。

当两个年轻人闯进卧室时，老两口早已睡熟了。但当他们得知这个好消

息时，十分欣喜地说：“好了，我们家里终于添了一个叫做‘帕特里夏’的姑娘。”

原来弗兰克夫妇连生五个男孩，每次都盼着能是一个女孩，连名字都起好了，恰巧也叫帕特里夏，今天，这个愿望总算由儿子尼克松来实现了。

到了4月，尼克松便陪未婚妻去洛杉矶的首饰店买订婚戒指。

尼克松一心想给未婚妻买钻石，帕特心里却想要一只宽条的金镯子。结果后来选中了一只镶了两块小宝石的订婚钻戒和与之配套的小粒金刚钻婚礼镯子，看起来光彩夺目，用去了324美元2角5分。

5月1日，帕特按事先说定的在家中等尼克松给她送戒指来。可是一直到中午，既没见戒指，也没见人来。帕特很不快地独自回到学校。

帕特一边批改着学生的卷子，一边盼着未婚夫送来戒指，享受未婚夫亲自给她戴上的美妙时刻。由于心不在焉，竟改错了几张卷子，这是从没有过的事。

直到下午，尼克松家铺子里的伙计汤姆·苏尔基才提着一只五月花花篮来，他把篮子放在桌子上，说是尼克松让送来的。

帕特往篮子里望了一眼，只见鲜花丛中，端端正正地放着订婚戒指。戒指依然闪着熠熠的光芒，但帕特心里很不高兴，尼克松为什么不来？让伙计送来，像什么话？帕特瞪了戒指半晌，赌气地随手一推，把篮子推到了一旁。

在隔壁教室里上课的艾丽斯·科克恰在此时走了进来。见到五月花篮，禁不住往里瞧。这一看，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地叫了起来：“哟，好漂亮的订婚戒指，来，现在就把它戴上，现在就戴。”说着，也不管帕特是否高兴，拿起戒指就往帕特的手指上套。其实，她连帕特是同谁订婚都不知道。

事后，尼克松解释说那天恰巧碰上一件极为棘手的案子，实在脱不开身，只得从权。为了消除帕特心中的不快和疑虑，尼克松还一本正经地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最亲爱的：

从我一开始认识你，我就以为你必定会成为伟大的女性，因为你具有出类拔萃的品质。而现在，我亲爱的，我要同你一起去实现你的未来。我多次同你说过的，生活在一起会使我们两人都成熟起来，因此，我们一定会实现我们的理想。你对我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也许你不会相信，总有一天我要报答你给予我的帮助。

共同携手前进，达到我们的目的是我俩的本分，而且我们要说到做到。

亲爱的，不管天长地久，世事多变，我永远同你在一起，爱你之心与时同增，而且一定让你在心灵上、在生活中感受到我对你的爱。

看了这封信，帕特心中最后一点阴云也随风而去，他们决定在6月21日举行婚礼。

由于尼克松一般的社会关系太多，为了避免张扬，他们决定只举行一次小小的家宴来庆祝他们的婚礼。

新房选定在河畔的教会旅舍，这是他俩以前常来的地方。

旅舍布置得十分典雅，透过比利时艺术的细木门窗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意大利风格的壁画，而房间的布置又具有浓郁的东方艺术的特征。尼克松包下了最小、最省钱的“总统套间”来度过他的新婚之夜。

“总统套间”的得名，是因为在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经在这里下榻，后来另外两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休伯特·胡佛都来此屋

住过。

也许冥冥之中命运之神自有安排，20多年后，尼克松当真做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举行婚礼的当天，尼克松的弟弟唐纳德把新娘从蕙蒂尔接到河畔新房。

新娘的打扮是极为漂亮的。她穿着法国蓝花边套眼，上身款色新颖，一排水晶纽扣，下身则是窄腰宽摆的三角衣裙，头上戴一顶大小挺合适的帽子，帽子的一侧缀着一簇与衣服同色的玫瑰，与上衣肩旁新郎奉献的一朵花瓣怒放的白色初兰相映成趣。

帕特本来就十分漂亮，经这一打扮，更如仙女临凡，仪态万方。

婚礼还没开始，尼克松迫不及待地想欣赏一番自己的新娘，从大厅的过道里一下子就冲到了帕特的面前。急得帕特的哥哥内瓦大叫：“喂，迪克，拜堂之前，不准你看新娘！”

尼克松也惊叹帕特的美艳，高兴得哈哈大笑，说：“知道，我闭着眼睛呢！”

下午3点30分，婚礼由教友派的牧师，也是蕙蒂尔学院的校长主持。婚宴则在西班牙式艺术长廊里举行。

最有特色的则是尼克松铺子制作的多层婚礼大蛋糕，顶层上是出谷铃兰和一对新人的造型，新郎一身洁白的燕尾服，新娘则是面纱覆面。

这次婚礼，差不多花光了两人的积蓄。他们把余下的钱合在一起，买了一些罐头食品，去墨西哥度两周蜜月。

等他们上路后，才发现朋友们同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罐头上的商标全都撕去，每餐饭都成了猜谜游戏，开着什么罐头就吃什么。

这次蜜月旅行，他们玩得很开心，当他们动身回蕙蒂尔时，已身无一文了。

回到蕙蒂尔后，尼克松仍去律师事务所工作，帕特仍回去教书。婚后一年的生活，犹如一首田园诗，美丽而又新鲜。两人都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1941年底，尼克松经由杜克大学教授戴维·卡弗斯的推荐，准备到华盛顿物价管理局工作，年薪只有3200美元，正好是他们夫妇俩上一年收入的二分之一。

薪金是微不足道的，帕特考虑到蕙蒂尔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没有多少发展前途，而华盛顿是全国的首府，天地自然要广阔得多。

直到1942年1月9日，尼克松夫妇才到达华盛顿，今天正好是尼克松29岁生日。由于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华盛顿已是处于战争状态的首都了。由于人多房少，费了很大的力，尼克松才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找到一套很小的公寓房子，迅速安顿下来。

在物价局工作的8个月，尼克松说不上特别愉快，但他由此知道了政府官僚是怎样进行工作的。他感到虽然有一些职业的政府工作人员诚诚恳恳，一心为公，很有才能，但也有一些人却一心只想到自己的权力，而且喜欢仗势随便摆布别人，特别是那些私营部门人员。在这里的经历，对尼克松日后政治生涯中所制订的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

1942年8月，尼克松加入了海军现役，并被送往罗得岛匡塞特角的海军军官学校受训。

这次分别虽然很短暂，但两人仍然感到分离的痛苦，每天都给对方去信，

诉说自己的刻骨思念。

训练期间，尼克松获得两天休假，便迫不及待地在新约与帕特相聚。回到军校后，他在给帕特的信中说：

这个周末过得太愉快了！回来之后，我对着玻璃窗望着自己的影子，想我有多走运，娶了你。我自己不是罗密欧，却得到了天仙似的你。你我在一起时，每分钟我都觉得得意……。

但若据此说尼克松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那就错了。在他的心目中，报效国家仍是第一位的。两个月的军训结束后，已是海军中尉的尼克松奉命前往在阿华州四周一滴水都没有的奥坦瓦海军航空站。而尼克松心里却希望被派往南太平洋或北大西洋的一个作战舰队上去。失望之余，只好自我安慰：熟悉一下中西部地区的风貌。

仿佛上天特别眷顾尼克松似的，有一天，他在公告栏上看见一张通知，说凡是年龄在 29 岁以下的军官都可以申请去海上服役。尼克松立即提出申请。帕特虽然担心丈夫的安全，但她仍然乐于送郎上战场。

派出海外的命令很快就下达了，没有说明具体地点，只是让尼克松去旧金山报到。于是，尼克松夫妇回到蕙蒂尔和家人告别。

离别是痛苦的。特别是尼克松的母亲为他的安全忧虑。

尼克松无法安慰他们，在他看来，当自己的祖国正受到攻击时，不能躲在一边。至于教友会的和平主义问题，那只有在和一个文明的、有感情的敌人作战时才起作用。在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面前，和平主义不仅不能制止暴力，反而只能为野蛮的敌人帮忙，削弱自己的士气。

这次聚会十分短暂，由于弗兰克夫妇心情沉重，在送尼克松与帕特到车站的路上，一直沉默无言。

前来送行的其他亲朋好友心情也不好受。当他们在车站的哈维饭店吃早餐时，尼克松为了使大家愉快一些，谈起一些轻松的话题。但没得到大家的响应。尤其是尼克松的母亲汉纳，疾病夺去了她两个儿子的生命，如今，她又要送爱子上战场。保卫国家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她没有理由阻止。这顿早餐她实在难以下咽。她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但眼睛里仍然噙满了泪水。

火车即将进站的广播响了，尼克松如释重负，悲痛的气氛太沉重了，几乎令人窒息。

尼克松夫妇站在踏脚板上即将登上火车的时候，回过头来再最后望了他们一眼。

晨风中，汉纳似乎一下苍老了许多，不停地向他们挥手。坚强的弗兰克却忍不住痛哭起来。大家心头都明白，战场上什么意外的事都可能发生，这一别，也许是永别。

1943 年 6 月，尼克松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亚的南太平洋战斗空运指挥部，负责为 C—47 型运输机在岛与岛之间飞行时准备货运清单和制订飞行计划。这些运输机运进补给，运走伤员。尼克松和他的战友们则把装补给的箱子和一些重大物件卸下来，然后小心地将担架上的重伤员抬上飞机。

初次与爱妻远别，尼克松心里总像缺了点什么。总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帕特诉说，夫妻间那种浓烈的情感并没因为远离而冷淡，反而更浓郁了，两人每日互寄一封信。有次战地繁忙，有两天尼克松没收到来信，晚上连觉都睡不好，第三天却一下收到帕特的三封信。

帕特在回答尼克松的疑问时说：

亲爱的巧克力：

接到你的信立刻作复，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不会弄错，否则信件经常容易搞混了。我是每天发一封，你怎么一下子收到三封，谁知怎么搞的？

以后为了避免出现差错，他们都认真地在信中写明日期，在信封上编了序号。

像许多被分派到前线去的人一样，尼克松也希望能到真正进行战斗的地方去。

经过尼克松的努力，1944年1月，他被派到布干维尔岛。在那里不久，日军便发动了一次猛烈的进攻，在他们六个人共同使用的钢筋水泥掩体周围，被日军轰炸机炸出了35个弹坑，居住的帐篷被完全摧毁。

不过，这样的轰炸只是偶尔为之，大多数日子还是比较平静，美国战斗机与轰炸机的驾驶员倒经常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光临布干维尔，尼克松感到有责任好好地招待他们。

由于是战争，食品是比较紧缺的，尼克松便尽力给他们搞到少量的肉酱与啤酒。当时岛上的战友们互取译名，尼克松的译名则叫尼克·尼克松。每当尼克松收到一批新运到的供应品时，就摆开了“尼克汉堡包小吃摊”，向飞行员免费供应汉堡包和一瓶澳大利亚啤酒。此后不久，所罗门群岛的战争从瓜达尔卡纳尔发展到布干维尔时，尼克松在后方地区再也坐不住了，他请求并获准到南战运部支援攻占格林岛的一个分遣队去任指挥官。然而，尼克松渴望战斗的意愿又落了空。当他们乘坐的PB4Y型水上飞机在海湾降落时，日军早已撤退。唯一的危险仅仅是有可能遇到几个掉队的敌人的冷枪和经常会遇到的大蜈蚣。

海军修建队人员则立即开始修建一个简易机场。机场还没竣工，尼克松就目睹了一场惨剧。

那天，一架飞越拉色尔时受重创的陆军B—29轰炸机在机场强行着陆，当时海军修建队的一些设备还放在机场上，但已来不及搬走。已经是黄昏时刻，轰炸机终于着陆了，机场上的人们欢呼起来。就在这时，飞机的头部直撞在了一辆推土机上，立即发生了猛烈的爆炸。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天空，到处是烧焦了的尸体。当飞行员的尸体从已不成形的飞机残骸中抬出来时，人们还能看到他烧焦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

还好，这样的事件在格林岛上只发生了这么一次，大多数时间是比较悠闲的。尼克松的汉堡包摊子又在格林岛出现了。很多飞行员在这儿解了馋，有一位飞行员还专门给《生活画报》写信，表达自己对尼克松的感激之情。

汉堡包摊子的聚餐情况，尼克松也在信中向帕特作些介绍。

从华盛顿到格林岛，隔着无数的山和水，隔着大洋，却隔不断尼克松与帕特的刻骨思恋。他们在信中互诉衷肠，重表爱意。在信中，尼克松还专门提出：“请你每次别忘记写‘我爱你’，因为我总是先找这句话。……你是我唯一的心上人，从一开始就是。……你12号星期日的那封信上有唇膏的印子，真叫我受不了——多可惜！你清楚，凡你用的化妆品我全喜欢，没有闻着不舒服的，都是既香又甜，就像你一样。”

帕特的思恋也毫不逊色，她在信中写道：“有个朋友来过夜，因为大家都累了，我就一个人去长沙发上躺下，好让她睡得舒服些。我感到冷，就把你的大衣盖上了。钻在里面好暖和啊！就连这件大衣也像你一样亲。”

为了稍稍解除尼克松的相思之苦，帕特特别去家专门照人物像的摄影室照了张看上去皮肤滋润、轮廓明朗的青年妇女肖像尼克松寄去。

尼克松从信中取出照片，只见帕特一头金红色的头发比过去更漂亮了，正对他妩媚地笑着，禁不住激动地把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然后一溜烟跑回宿舍，得意地把帕特的照片给战友们传看。

为了缩短两地的相思，帕特给尼克松还邮去了一些礼物，也给他寄去一直想读的马克思的《资本论》。

尽管这样，战时环境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单调生活的压力，促使尼克松去寻求刺激和消遣。赌钱，则是当时令人无法抗拒的消遣，打扑克赌钱，不仅给人娱乐，还能有所收益，当然得看你是否赌运。

尼克松的赌运很不错，加之他有较高的打牌技巧。有一天晚上，尼克松竟然拿到一手极好的牌——方块同花大顺，下扣一张 A。拿到这手牌的机会大约只有六十五万分之一，他得意极了，表面上却沉得住气，不动声色，结果赢了不少的钱。

对南太平洋大多数的士兵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一次寂寞的战争，战斗常常是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进行。除了用赌博来消遣以外，尼克松只得翻来覆去地读着带在身边的那本旧《圣经》，真正盼望的东西仍是帕特的信。

尼克松在海上服役期间，帕特在旧金山的物价管理局谋了份差使，年薪是 2000 美元，后来增加到 3200 美元。帕特为了积钱，生活是很清苦的，每天上下班挤公共汽车，自己缝制衣服，很少外出游玩。而尼克松打扑克竟轻松地赢了 1000 美元。

1944 年 7 月，尼克松奉调回国，乘坐一架从瓜达卡纳尔飞往夏威夷的运输机，半夜时分，飞机停在威克岛加油。

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尼克松下机蹒跚时，第一次看到了美军的战地公墓。

一排又一排的白色十字架，在机场跑道的灯光映照下，反射出凄冷的光芒，一直伸向黑暗的远方。

天气并不凉爽，尼克松却感到一丝寒意。他想起了所有那些还在为着这些不友好的和常常是荒无人烟的小岛而战斗的人们。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或日本人会觉得值得为这些小块土地打一仗，甚至为之牺牲生命。但他也明白，这些地方是把战争带到日本本土去必须使用的跳板，所以，美军必须攻占它，而敌人也必须保住它。

尼克松一边等着飞机加油，一边为战争的终归无益和它造成的可怕牺牲的现实而感慨万千。

飞机起飞了，尼克松斜靠在座椅上。为了驱除威克岛带来的战争阴影，他的思绪飞向了旧金山，飞向了帕特。

终于抵达了圣迭戈，尼克松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帕特。帕特得知尼克松已抵达圣迭戈，声音激动得发颤，呼着尼克松的爱称：“迪克，哦，亲爱的，我马上就来。”

当帕特乘机从旧金山赶来的时候，尼克松已在机场门口等着她了。

帕特一眼就看到了自己日思夜盼的丈夫，今天终于平平安安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不由满脸含笑，张开双臂，没命地向丈夫奔去。

两人在机场门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幸福激动的泪水从双颊无声地流下来……。

第三章 步入政坛

尼克松回国后，仍在海军设在旧金山附近的阿拉梅达航空站工作。一年多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尼克松已是海军少校了。

战争已经结束，何去何从，尼克松夫妇还没考虑好，但退役与不再回到原来的小城镇是早已决定了的。

恰在这时，尼克松家的老朋友、美洲银行惠蒂尔分行经理赫尔曼·佩里给尼克松来了一封信。信写得非常简单，却给尼克松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通向白宫的道路就从这里在尼克松的足下延伸。

亲爱的迪克：

我写给你这个便条，只是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参加 1946 年共和党众议员的竞选。

杰里·沃勒斯大概将参加竞选——按登记的选民看，双方旗鼓相当。共和党的力量正在增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以航空信赐复。

你的忠实的

赫·佩里

又及：你是否在加利福尼亚进行选民登记的。

在信中，佩里还附上了惠蒂尔老家地区报上的一则启事。启事上说：

凡是本地区的年轻居民，如是退役军人则更好，受过良好教育，无任何政治纠葛而又胸有报国雄心、建国良策，都可以申请报名，再由 100 位热心于推荐的当地居民研究，但他们对候选人不作任何保证。

这里说的 100 位居民，既有生意人、律师，也有家庭主妇，归属于候选人研究委员会的基层组织“百人委员会”，准备物色更好的候选人，把加利福尼亚州现任众议员、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杰里·沃勒斯换下来。

还在战前，佩里就曾和尼克松讨论过尼克松以后可以竞选州议员的事，何况他是尼克松母亲大学时的同学，是看着尼克松长大的，完全了解尼克松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尼克松和帕特商量是否去参加竞选。

帕特对不利的方面考虑得较多，一个海军现役军官，远离惠蒂尔老家近 5000 公里，一回故地就要获得共和党的提名，还要一举击败一位五任众议员，简直难以想象，何况经济方面也比较困难，帕特又怀孕在身。但帕特却不愿在政治上拉丈夫的后腿。

尼克松觉得帕特的话也有道理。如果真要去谋求众议员候选人的提名，那就得花费全部时间，全力以赴。但至少要在 6 月初选以前得有办法维持生计，并弄到进行竞选活动必需的经费。如果赢得了提名，当然可以依靠党的组织提供竞选费用，但家庭开支仍得自己设法。粗算一下，两人的薪金加上一万美元的存款，本打算买房用，而现在却要花在充其量不过是一项政治冒险的竞选活动上去。夫妇俩一时犹豫不决。

直到两天后，一个可以作为众议员家庭返回华盛顿的诱人的前景促使他们下定了决心。

巴尔的摩午夜 12 点，正是收费最便宜的时刻，尼克松给佩里打了一个决定一生转折点的电话，通知他自己准备参加竞选。

第二天早上，尼克松在给佩里的信中说：“我强烈地感到，杰里·沃勒斯是可以击败的，而且我欢迎有这个机会来试一试。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开

明的纲领来，进行一场战斗性的、有朝气的竞选活动，必能符合人们长期寻求改革的愿望，从而取沃勒斯的特殊牌号的新政理想主义而代之。我在华盛顿同那些官僚主义者短暂的接触和我在海军中三年来的经历，使我已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华盛顿的情况是多么混乱一团。”

1945年11月2日，身着海军制服的尼克松同其他5个候选人一道出现在“百人委员会”面前，他们被要求每一个人作一次演说，说明自己竞选的理由。

发言的先后由抽签决定，尼克松抽签轮到最后一个发言。

由于前面5个人的发言把时间拖得太长，委员们已感到十分疲倦和不耐烦。尼克松敏锐地感到，简短的演说将和动听的言辞一样受到人们的赞赏。

这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发言，空泛的议论是不能引起选民的兴趣的。尼克松选择的是当时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阐述了自己对有关美国制度性质的两种相互抵触的观点的看法。演说词是这样的：

新政所提倡的观点是，由政府来控制 and 调节我们的生活。另一种观点是提倡个人自由和人的积极性所能产生的一切东西。

我赞同后一种观点。我相信回国来的复员军人，是不会对领取失业救济或政府的施舍感到满意的，因为我曾在散兵坑内，同他们中的许多人谈过话。他们希望在一个私人企业中找到一个受人尊重的工作，在那里他们可以依靠自己所生产的东西受到人的重视，或者他们希望有机会来开创他们自己的事业。

如果委员会选定了我，我决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开明的纲领，准备进行一场战斗性的、有朝气的竞选活动，那样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强烈地感到，目前的执政者是可以击败的。

尼克松回到了巴尔的摩，焦急地等待着“百人委员会”的裁定。

11月29日午夜两点钟，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罗伊·戴给尼克松打来了电话：“迪克，你已经被提名了！”据统计，尼克松得了63票，与他最接近的竞争者是波莫纳的一个家具店老板，仅有12票。

得到这个好消息，尼克松夫妇兴奋得难以入眠，两人一直谈到天亮。通向白宫的漫长道路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从第二天开始，尼克松一面等待着海军退伍的通知，一面突击学习政治和公众事务课程。每天晚上一回到家里，就极其认真地阅读有关国会和竞选活动的各种书报杂志。不仅如此，尼克松还进行一些公关活动，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乔·马丁写信，说自己可能成为第12选区被提名的共和党候选人。随后又去国会大厦拜访了马丁。同时，尼克松也去拜访一些共和党议员，听听他们对自己对手沃勒斯的评价。通过共和党竞选委员会，尼克松获得了沃勒斯的全部投票记录，并花几天时间完全熟悉了这些记录。

到1946年1月份回到惠蒂尔时，尼克松已经对沃勒斯了如指掌了，可怜的沃勒斯对尼克松却还知之甚少。仅就这一点来说，在竞选的第一个回合，沃勒斯就已打了败仗。

回到惠蒂尔，尼克松与他的竞选顾问就一致决定，首先要让整个选区的人都认识尼克松。

认识的途径是通过举行一系列的家庭集会，一些共和党的支持者利用自己的家，热烈欢迎那些愿意意见尼克松的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不论人数多少。

于是，在大家喝茶或喝咖啡时，尼克松简单地讲几句话，然后回答一些

问题。就这样，通过家庭集会，尼克松同几百个投票人见了面，更重要的是，尼克松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投票人真正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尼克松所在的第 12 选区，位于洛杉矶市东南方向，与市区还紧密相连，主要是一些富豪户的居住区，是共和党保守派比较集中的地方。尼克松十分清楚，要想击败沃勒斯，自己的政策主张就必须和他们达成一致，获得他们的全力支持。

在美国，资产阶级在政策主张方面，一般可划分为自由派与保守派。对于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两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达到目的、手段上，两派则有些区别。保守派较之自由派更为粗暴、露骨，对内、对外均如此。

代表加利福尼亚第 12 选区出任联邦国会众议员的是民王党人杰里·沃勒斯。因为美国共和党党旗的图案是一只大象，民主党党旗上的图案是一头驴。所以当时人们把尼克松与沃勒斯的竞争称为“驴象之争”。

沃勒斯出身于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门望族，一个百万富翁的家庭。青年时代受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曾经标榜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后来支持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成为一个民主党自由派。1936 年在加利福尼亚第 12 选区当选为众议员，以后又 4 次连选连任。对于名不见经传的尼克松，沃勒斯并没放在眼里。

尼克松却极其认真地把沃勒斯作为竞选大敌看待。他回到惠蒂尔镇后，即在市中心区租了一间办公室，借了一些桌、椅和一台打字机，开始进行竞选的宣传活动。

首先是搭成一个竞选运动的班子，主要顾问是“百人委员会”主席罗伊·戴和曾经策划过许多成功的竞选的默里·乔蒂纳律师。

在竞选活动开始之前，帕特于 1946 年 2 月 21 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特里西娅。

帕特不愧是尼克松的好内助。生下特里西娅仅仅才三周，便忙着为竞选奔跑。不是忙着出访选民，给尼克松争取选票，就是在办公室打印通讯稿，邮寄小册子和散发其它宣传品。

忙中出错，精明的尼克松夫妇仍然上了一次当。

有一天，尼克松夫妇刚印完宣传品，准备出去散发时，忽然涌来了大批“志愿人员”，热情地表示愿意帮忙向选民散发这些宣传品。尼克松正缺人手，闻言喜之不尽，说了不少感谢的话。

此后一连几天，他们从尼克松夫妇手中一捆又一捆地把这些宣传品取走。乔蒂纳律师获知此事后，觉得有些蹊跷，连忙进行调查。

事实证明，这些人把尼克松卖了，尼克松却还帮他们数钱。乔蒂纳对尼克松说：“迪克，你上了一种最古老的政治圈套的当。那些所谓志愿人员都是沃勒斯的支持者，他们一直在销毁你的宣传这也难怪，尼克松夫妇这时搞政治还是新手，以前连如何进行竞选都不知道。然而，新手也有新手的长处。他们准备得比别人充分，也不会斤斤计较。当竞选完毕的时候，尼克松的手心竟然长出了茧子，这是同成千上万选民握手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尼克松在竞选活动中的努力与艰辛。”

初选是 6 月 4 日，理查德·尼克松正式获得共和党的提名票，民主党则提名杰里·沃勒斯。

当时加利福尼亚法律允许候选人在初选中跨党竞选，也就是说一个候选人可以参加两党的竞选。但实际投票结果显示，两人都只获得本党的提名，

总票数沃勒斯比尼克松多 7500 票。这个结果，使尼克松认识到，如要在 11 月份的大选中击败沃勒斯，还要经过更加艰苦的努力。但另一个迹象——即沃勒斯的这次初选是自 1936 年以来得票最少的一次，表明他的声望在下降，支持者在减少。这多少给尼克松带来了些许安慰。罗伊·戴也鼓励他说：“我们所需的只是必胜的信心，这样，我们就能在 11 月击败他。”

尼克松之所以没有失去信心，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内形势对他十分有利。

1946 年，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战争所造成的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和短缺使人民已感到厌倦，在那战后突然出现的繁荣时期中，他们开始对写在新政立法中的那么多由政府施加的控制和干预，表现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尼克松所在的选区和全国其它许多选区一样，从前线回来的复员军人无法找到他们能买得起或租得起的住房，许多复员军人根本找不到住的地方。

在这一时期，美国工人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更加剧了消费品的短缺，物价飞涨。沃勒斯后来在他的自传《一个众议员的自白》中写道：“1946 年竞选活动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基本态度上的差异。谁要想夺去一个在职者的席位，只需指出一切搞得很糟的事情，以及战争期间出现的一切麻烦及其后果就行了。这些东西有许多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切身体会到的。”

当时 12 选区的一些肉店在橱窗上就挂着这样一块牌子：“今天为什么没有肉？去问你的众议员吧。”

社会普遍不满的现象，被共和党利用来打击已当政十余年的民主党，尼克松的竞选策略也是这样。

尼克松抓住沃勒斯的这个弱点，在竞选宣传广告中问道：“你对目前情况感到满意吗？你能买到你所需要的肉、新车子、电冰箱和衣服吗？投尼克松一票，就是为改革投一票。”“答应给你们的那些新住房在哪里？投尼克松一票，就是为改革投入一票。”

共和党在全国的竞选口号则极具煽动性。“受够了吗？”选民当然将给予一个响亮的回答：“受够了！”

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就是努力把美国社会现存的种种矛盾，都归结到民主党人身上去。全国要怪杜鲁门总统，在加利福尼亚第 12 选区，则要怪沃勒斯。

在竞选演说中，学生时代培养起来的演说才能帮了尼克松的大忙。每天 6 至 7 次的演说，尼克松都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讲演的话题也逐次更换，以免选民们听得厌烦。他的表现，使大家相信他对情况的把握是多么心中有数，是一位竞选的行家，也就增添了自己的声望。

但对于能否击败沃勒斯，尼克松以及他的竞选班子并不乐观。乔蒂纳认为必须出奇制胜，他对尼克松献策说：“迪克，你在竞选中已落后了，当你落后时，你不能求稳。你必须不惜冒最大的危险进行竞选。你必须要求同沃勒斯进行更多的辩论。”

沃勒斯接受了尼克松的挑战。但他没有想到，他已经落入了尼克松的圈套之中。

1946 年，美国的资产阶级开始关心苏联的战后意图，并相应地为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感到忧虑，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迫切需要制造反苏反共的政治气氛。加利福尼亚第 12 选区基本上是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地盘。尼克松敏锐地感

到，在这个地区举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把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同沃勒斯联系在一起，一定可以狠狠地打击竞选对手，自己也可以以反共斗士的面目出现，争取到更多的选票。

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是 1944 年大选时，由支持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有组织的劳工为了更好进行党派斗争建立起来的。它的姊妹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则是为了让非工会会员参加而建立起来的。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在他去世前，一直担任这两个组织的主席。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也在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担任工作。这两个组织都物色候选人，然后向他们所支持的人提供经费和竞选工作人员。尽管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员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很多人都认为已有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

沃勒斯曾经在 1944 年得到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1946 年春，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洛杉矶分会发行的通报指出，不管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采取什么行动，该组织准备支持沃勒斯。共产党主办的《人民世界报》1946 年 5 月 31 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五大组织”支持的候选人》的文章。这五大劳工和进步联盟是由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铁路兄弟会、进步党劳联，以及好来坞艺术、科学与专业人员独立公民委员会所组成。文章报道了五大组织会见候选人的情况，沃勒斯即排在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名单中的第一名。

尼克松巧妙地把沃勒斯同产联，继而同美国共产党，同苏联联在一起，在与沃勒斯面对面的辩论中，打出了这张王牌。

尼克松的演说极有煽动性。他说：“我国有一些担任高级官职的人想要通过对美国的自由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来摧毁我国的宪法原则，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做非美分子的后盾，鼓励对我国人民的生活实行日益广泛的联邦管制。”尼克松进而点明沃勒斯就是这样的人，他“一贯支持对美国的自由企业实行社会主义化”。证据就是他在联邦国会众议院投票，支持煤气配给制，支持肉类配给制，支持粮食配给制。最后，尼克松以煽动性的语言结束了发言：“不要再受骗了！杰里·沃勒斯五次竞选，都受到激进派的支持。他本人曾是一个登记注册的社会主义者。他始终支持激进派的观点。在所有涉及俄国的问题上，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都是照顾俄国利益、反对美国的利益的。沃勒斯也受到产联的支持。要记住：沃勒斯是一个新社会主义者，他在国会的投票记录比民主党更加倾向社会主义，更加倾向共产主义。……自由是我国宪法的精髓，民主党新政派的治国哲学将强迫全国人民过军营似的生活，剥夺我国人民的自由。”

沃勒斯被刺痛了。他忽然感到，尼克松是一个可怕的竞争敌手，以前自己的确太大意了，没有想到这个杂货店老板的儿子竟能对自己的政治生涯造成如此大的威胁。然而为时已晚，他只能处于被动的防守地位，拼命地为自己辩护，却找不出击败尼克松的办法来。

1946 年 11 月 6 日，尼克松与帕特彻夜不眠。经历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紧张竞选活动，终于有了结果。33 岁的海军少校尼克松，以 65586 票，击败了 49994 票的现任众议员沃勒斯而当选，赢得了这场毫无希望的胜利。尼克松自己就在回忆录中说：“1946 年 11 月 6 日那天帕特和我所感到的那种高兴，在我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1946 年 12 月，尼克松把才 10 个月的长女特里西娅留给父母照看，自己

则带着爱妻帕特驾车横越美国近 5000 公里的路程，从惠蒂尔直奔华盛顿。

汽车里面装满了厨房家什、餐具、家用杂物以及大小衣箱，初看就似逃难的移民，谁能想到竟是国会议员夫妇呢？

1947 年 2 月 18 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为第八十届国会新成员举行招待会，尼克松与帕特第一次看到了白宫的内部景象，心头不由想到，什么时候自己才能作为白宫的新主人，也举行这样一个招待会呢！

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心头在想着总统宝座的时候，还得忙着寻找一个安乐窝。当时华盛顿的房荒非常严重，尼克松夫妇直到 3 月份才在弗吉尼亚街费尔法克斯公园附近的新兴住宅区找到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这儿离白宫较远，去国会上班得开 20 分钟的汽车。这一住，竟长达四年。

这期间，尼克松被分配到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去，而不是他所希望的威信素著的司法委员会。

一般来说，大多数新众议员只参加一个委员会，因为尼克松曾是一个律师，所以共和党的新议长乔·马丁又让他参加了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恣意迫害共产党人和其它民主、进步人士的机构。

在此之前，尼克松对共产党的态度并不是那么关心，但对共产主义仍有他的看法。据尼克松回忆录称，1946 年 3 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的关于铁幕的著名演说对他有极大的影响。

丘吉尔在这篇演说中说：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约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了。中欧和东欧的古国的都城全都在这条界线的那一边。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我只能称之为苏联势力范围的范围之内，而且它们全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不仅受到苏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的高压，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正不断增强的控制。

参加非美活动委员会后，尼克松对共产党极端关注起来，并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支持传讯共产党人。他说：“作为众议院的成员，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地保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但是我们务必记住，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本身并不给人以宣扬推翻政府的权利。因为这个政府是保护个人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

尼克松鲜明的反共立场，得到垄断资本集团的赞赏，到 1947 年，又派他去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特别立法小组工作，目的就是要制定一个迫害共产党人的法律。

首先，立法小组就共产党哲学和实践的性质问题进行了一些范围广泛的听证会。当时大多数反共分子认为，制止共产党活动的最好办法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尼克松则反对这样做。在他看来，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实际效果只能是迫使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核心分子转入地下。如果让共产党进行公开的合法活动，则谁是共产党一目了然，反而便于进行限制。

尼克松为此与众议员尤尔·蒙特联名提出了非美活动委员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反共法案——《蒙特—尼克松法案》，它规定所有的美国共产党员必须向政府履行登记手续，禁止共产党员在联邦政府机构担任任何职务，不准给共产党员颁发出国护照。经查明为共产党外围组织所散发的一切印刷品和广播文稿，必须说明材料来源。并且规定成立一个“颠覆活动管制委员会”，

对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和美国人民的其它进步活动进行管制。

这个法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尼克松被任命为这一法案的辩论会主持人，并在会上发言说：

“在共产党问题上存在着过多的不负责任的谈论和混乱的思想。由于这个法案的成立，美国国会今后将明确规定什么才是美国的共产主义颠覆活动……它将一劳永逸地防止把那些碰巧也宣扬了共产党所支持的某些政策的组织，统统被不负责任地指责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1948年5月19日，众议院以319票对58票通过了这个法案，但在院治集团内部发生分歧，这个法案在国会参议院搁置起来。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参、众两院又把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合并到由参议员麦卡伦、众议员伍德联名提出的另一部反共法案中，予以通过。这就是美国另一个闻名于世的反共法律——《麦卡伦—伍德法》。

其实，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问题还未成为争论的问题，在1948年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百分之四十的答问者认为美国共产党并没有构成威胁，百分之四十五的答问者也只认为构成潜在的威胁。

尼克松成为坚定的反共分子，与他1947年夏参加赫脱委员会的欧洲之行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委员会是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克里斯琴·赫脱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共19人，参与审定马歇尔援外计划，并为此而出访欧洲。

当时的欧洲，正在饥饿和混乱的边缘挣扎着，到处都是战争的废墟。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在美国统治阶级看来，如果不复兴欧洲大陆的经济，不进行粮食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欧洲将陷于无政府状态，陷于革命，最终陷于共产主义。

尼克松在访问中，不顾美国使馆人员的劝阻，坚持要同被访问的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见面。主要是想弄清他们是怎样思考的，还想估量一下他们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回国后更好地对付美国共产党。

在意大利，尼克松专门去拜访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朱塞佩·D·维多里奥。

会见是在朱塞佩的办公室进行的。

宽大的玻璃窗，挂着鲜红的窗帘，墙壁也被刷成一片红。在朱塞佩的上装翻领上佩戴着一枚小小的红旗徽章。

尼克松与朱塞佩略微客套一番后，径直问道：“你赞成政府对意大利工会采取什么政策呢？”

“赞成工人不受政府的控制，而且有罢工的权利。”朱塞佩的回答很干脆。

“听你的回答，似乎很赞成我们美国的那种政府，那里的工人此刻就正在罢工；而不赞成俄国的那种政府，那里的工人是受国家控制的，过去20年中，他们就没有举行过一次罢工。”尼克松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朱塞佩冷冷地看了尼克松一眼，“先生，你和我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在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里，工人必须进行罢工才能从资本主义反动派和雇主那里获得他们的权利。而在俄国，没有资本主义反动派和雇主，因此罢工的权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尼克松道：“我们永远欢迎别人对我们的政策进行批评，但我可否问一下，你曾否详尽地批评过苏联的政策？”

朱塞佩又冷冷地看了尼克松一眼说：“先生和我又一次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美国外交政策必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其理由是，它是受资本家、反动派和雇主所支配的。在俄国，没有资本家、反动派和雇主，因此俄国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因此，它不会受到批评。”

朱塞佩的话让尼克松深思。因为他所遇到的英国、法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与朱塞佩的讲话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连用语也相同。因此，在尼克松看来，“全世界的共产党都不忠于他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国家，而是忠于俄国。”

从欧洲回国后，尼克松认为他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懂得了共产党在欧洲胜利的原因。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第一，共产党领导人信仰坚定，精力充沛，他们懂得他们要追求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愿意为它艰苦奋斗。在这次访问之后，我决不会由于共产党领导人满嘴关于党派路线的欺人之谈，或者由于他们往往态度粗鲁，便错误地认为他们全都是些没有什么才能的不讲道理的家伙。

第二，我看到战后欧洲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完全懂得民族主义的力量，而且现在正尽力使它为自己所用。例如，我们在罗马时，城里到处张贴着共产党为即将来临的市政选举所作的宣传画。这些画既没有锤子镰刀和其他任何共产党的象征，也并不宣扬某种未来工人国家将带来的喜悦。相反，上面画的却是 19 世纪爱国主义者加里波迪的巨大英雄形象。

第三，我看到欧洲共产主义怎样源源不断地接受苏联钱财。与他们主张民主的对手不同，欧洲的各个共产党得到莫斯科的大量津贴。

第四，我看到民主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要么是没有领导，要么更坏，领导层中的许多人干脆向共产主义投降了。我第一次懂得，坚强的领导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而且我已看到在缺少这种领导或者这种领导遭到失败时，会产生多么可悲的后果。仅仅从我在很短时间内看到的这些，我已完全懂得，共产党唯一尊重的——和愿意认真对待的——东西只是至少可以和他们相对敌的，并有决心予以使用的力量。在的里雅斯特，我用铅笔作了如下笔记，这话在今天，也和 30 年前一样，是完全正确的：“同俄国人打交道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如果没有决心干到底，便决不要虚声恫吓，因为他们任何时候都会要试试你的力量的。”

显然，这些话充满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客的偏见。

尼克松对政治的狂热迷恋，使帕特逐渐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和无奈。结婚初期的情爱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已如逝水，不可再寻。尼克松或许已感觉到自己当上众议员以后，关心政治的时候极多，关心妻子的时间太少。为了表达心里的歉意，外出时也常常给帕特买些礼品。从欧洲回国时，尼克松买了一套每块都镶着花边，做工十分精致的亚麻垫巾，希望能得到妻子的赞赏。

帕特是十分节俭持家的人，一见垫巾如此精巧的工艺，就知道一定不会便宜，便不高兴地道：“迪克，你买这干什么？……”

话刚出口，便觉后悔，因为尼克松的脸色一下阴沉下来。

帕特毕竟理解尼克松，并深深地爱着他。此后常常为这次失言而弥补。在款待客人时，常使用这套垫巾，还常常当着尼克松的面，以得意的神情对孩子们说：“这些都是你们的爸爸那次随赫脱委员会出差带回来的。”

在帕特看来，尼克松是志在干大事，成大器，自己是他的妻子，自然是

责无旁贷地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侍奉年老体弱的公爹和公婆，照顾好孩子，让尼克松有充裕的时间去从事他所热心的政治。

1943年7月4日，正是美国的独立节，尼克松的第二个女儿朱莉出世了。

这是尼克松十分忙碌的夏季。

尼克松一面要忙于再次竞选，又要为共和党入主白宫奔走，还要忙着他的反共事业——处理希斯共产党案件。

亏了帕特做他的家庭后盾，尼克松才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希斯案件中去。

希斯是一位在纽约和华盛顿非常受人尊敬的社会知名人士。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等生，先后担任过最高法院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的秘书和国务卿的助手。在美、苏、英三国政府首脑会议期间，曾经担任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在联合国各创始国为制订联合国宪章而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期间，担任过会议的秘书长，被公认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后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中他是美国代表团的顾问。1947年，他离开国务院，担任了具有国际声誉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

这样一个社会名流之所以受到追查，是因为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30年代曾是共产党员、现任《时代》杂志高级编辑惠特克·钱伯斯时，钱伯斯告密说希斯曾经与他在一个共产党小组。1938年钱伯斯退出共产党时，希斯含着眼泪拒绝和钱伯斯一起退出共产党。

钱伯斯的告密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人们并没有把钱伯斯的话十分当真。

8月5日上午，希斯前来和尼克松会面，断然否认了钱伯斯的指控。

希斯态度十分安详，没有一丝慌乱，面对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讯问，坚定地说：

“我是自己请求到这儿来以便毫无保留地否认前天一个叫惠特克·钱伯斯的人在这个委员会上所作有关我的一切说法的。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曾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不，过去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共产党的信条。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我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遵循过共产党的路线。”

对于钱伯斯这个人，希斯表示他从来不曾认识这个人。

当希斯的发言结束时，人们拥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并对他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伤害表示同情。

在同一天上午，杜鲁门总统也批评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希斯的指控说，“对某些人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伤，严重削弱了联邦雇佣人员的士气，并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杜鲁门总统还重申了他以前的命令，所有的政府行政机构都不得向国会委员会提供有关政府雇员的忠诚材料。

很明显，杜鲁门是反对对希斯进行调查的。

听众与新闻界也完全相信希斯有力的证词，非美活动委员会事先又没核对钱伯斯证词的内容是否真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委员们感到有些恐慌，谁也不愿意在大选之前遭到总统和新闻界的攻击，因为那将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尼克松却不慌乱。在开始任何重要的行动之前，尼克松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已经极其敏锐地感到，凭自己在国会的资历，在政治上的肤浅根底，要打破常规迅速地爬上政治高位的话，必须做出不寻常的，在全国有重大影

响的大事来。希斯案件已给自己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

他仔细地梳理了一下希斯的证词。

希斯拼命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却从未简简单单地说过他不认识钱伯斯，而是附加上一些修饰。“就我所知，我从来没见过他。”

尼克松对坚持调查的利弊作了推断。

就当时的现实而言，传讯钱伯斯和希斯的证词，已经使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批评委员的人也决不会因为放弃追查希斯而停止攻击。如果把此案进行到底，即使失败了，损失也增加不了什么，倘若成功了，却有极大的好处。

从追查的角室来看，以前的许多案子总是要去证明某人是否真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希斯断然否认他与钱伯斯相识，使案子本身的解决就变得十分简单了，只要证明希斯与钱伯斯相识就可以定希斯的伪证罪。

尼克松和委员们决定再次对钱伯斯的证词进行核实。

8月7日，一个宁静的星期六上午。

曼哈顿弗到广场。

这是联邦法院一间废弃不用的屋子，除了非美活动委员们以外，没有人知道这儿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讯问。

尼克松面前摆好了记事簿，上面列着一个人对一个朋友一般都会知道的琐碎事情。

“钱伯斯先生，你说过希斯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吗？我们有没有听错？”尼克松十分礼貌地问道。

“没有。希斯的确是一个共产党员。”钱伯斯十分肯定地说。

“你说你和希斯同在一个共产党小组，会不会那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学习会？”

“那绝对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学习会。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渗透到政府中去。”

这场讯问进行了两三个小时，钱伯斯向尼克松叙述了有关希斯的详尽的私人情况，以及他和希斯之间的交往，希斯的爱好。尼克松特别记住了希斯是一个鸟类业余研究爱好者，曾经为看到一只稀有品种的啮鸟而兴奋不已的情节。

讯问结束后，尼克松为寻求万无一失起见，按捺住内心的喜悦，特别问钱伯斯是否愿意接受一次测谎器检验。

“当然，我十分愿意。”钱伯斯毫不犹豫地答道。

“你有那么大的把握吗？”尼克松还有些不放心地追问道。

“我说的全是真话。”钱伯斯十分镇静地回答说。

尼克松还是没有完全放心。在这次讯问后不久，尽管已经确信希斯的证词是撒谎，但为了把一些细节问题搞得更清楚一些，他又赶到马里兰州威斯特敏斯特钱伯斯的农场去访问钱伯斯。在这儿，尼克松又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况。

回到华盛顿后，尼克松又拜访了研究共产党活动的专家查尔斯·克斯顿，向他请教。

尼克松的谨慎小心自有他的道理。

1948年是美国总统竞选年，希斯案件对当政的民主党人杜鲁门总统显然

是不利的。这也是共和党控制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为何如此卖力地不顾杜鲁门总统的反对而追查希斯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希斯案件也是一把双刃剑。

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杜威的外交政策总顾问则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并有希望在杜威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正是杜勒斯曾经推荐希斯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

希斯案件虽然可以伤害杜鲁门，但同时也会伤及杜威。

尼克松虽然是一个极端反共分子，但他不得不从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小心行事。

考虑再三，尼克松于8月11日打电话给杜勒斯，提醒他就这个案件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之前，务必看一下钱伯斯的证词。

当天下午，尼克松便赶到纽约罗斯福饭店的杜威竞选活动总部与杜勒斯见面。

杜勒斯也是一个坚决反共的家伙，看完钱伯斯的证词，经过利害权衡之后认为，钱伯斯肯定是认识希斯的，应当尽早让两人公开对质，使这个案件不日公开化。

尼克松得到共和党首脑集团的认可，心中方才松了口气，下决心要把希斯案件追查到底。并答应杜勒斯，随时让他们了解希斯案件的进展情况。

尽管由于杜鲁门总统的行政命令，美国中央情报局没能给尼克松追查希斯案件的直接帮助，但仍然默许一个稍低职位的情报人员给尼克松很多方便。

8月16日，尼克松把希斯叫来进行一次秘密讯问。

这次讯问，希斯又被尼克松和其他委员们抓住了把柄。

当时，这场讯问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希斯都巧妙地周旋过去，但在进行一般看来极不重要的对话时，希斯说他喜欢打网球，还是一个业余鸟类研究者。

听到这里，尼克松心中暗喜，装做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见到过啮鸟吗？”

希斯的兴趣一下就来了，“我看见过的，就在这里的波托马克河上。”

“我也在阿林顿见到过一点。”尼克松顺着胡诌。

“这种鸟一头黄毛，极为漂亮，很少见的，它们在那里的沼泽地做窝。”说起啮鸟，希斯的话滔滔不绝，直看到尼克松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时，方才后悔地止住了话头。

讯问结束时，尼克松对希斯说将在8月25日安排他与钱伯斯公开对质。

为了能给希斯一个突然袭击，第二天，也就是8月17日下午5时35分，就突然安排希斯与钱伯斯对质。

地点是在纽约提督饭店1400号房间。

当希斯看到钱伯斯这个可耻的叛徒时，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火来。在尼克松的讯问下，不得不承认与钱伯斯相识。但对钱伯斯当面说他是共产党员时，希斯再次加以否认。他的声音因发怒而颤抖：

“现在请把我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我愿意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在没有这个委员会在场的时候重述一遍他的这些话，那我就将告你无故诽谤罪。我向你挑战，要求你这样子，并且希望你他妈的马上就干。”

对于希斯的挑战，钱伯斯于8月25日在“与报界会见”的电视节目中应战了。

有人问道：“你是否愿意在这里再次控诉阿尔查·希斯是个共产党员？”

钱伯斯并不为自己的叛变感到可耻，回答说：“阿尔查·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员，而且也许现在仍然是个共产党员。”

三个星期后，希斯以毁谤罪名控告钱伯斯。

希斯太轻视钱伯斯了，也太轻视尼克松要把他搞臭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的决心。他以为钱伯斯如果掌握有任何证据的话，早就拿出来了，既然拿不出证据，对希斯的指控就不能成立。

老奸巨猾的钱伯斯早已成竹在胸。

狡兔三窟。钱伯斯在10年前准备退出共产党的时候，就把希斯交给他的65页国务院的打印文件和4页阿尔查·希斯的手写便笺保存下来，以防自己受到惩罚时有护身符。此时，是用得着这些文件的时候了，他把文件交了出来。

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立即从华盛顿赶来，封存了文件并让法院发出了命令，与此有关的人必须严守秘密，否则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钱伯斯很得意地回到了他的农场，在他看来，希斯很快就会被起诉。

两个星期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

12月1日，华盛顿《每日新闻》发表了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短讯。这则短讯不仅让钱伯斯大吃一惊，正准备陪妻子帕特去游玩加勒比海的尼克松也吃惊不小。

短讯中说司法部正考虑放弃对希斯的诉讼。另一篇报道说，据谣传，正在考虑对钱伯斯提出伪证控告。因为钱伯斯作证时说他没有参加过间谍活动，而这些文件本身表明钱伯斯与间谍活动有关。

尼克松不得不对妻子表示歉意，立即与委员会的另一个成员斯特里普林赶到钱伯斯的农场去。

尼克松明白，司法部这样作，显然是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指示。

杜鲁门之所以要阻止这个案件的进行，并非是他不反共，而是因为希斯案件的审理，对他竞选连任总统不利。

当杜鲁门得知钱伯斯交出的文件内容时，狂怒地在他椭圆形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大骂“希斯这个狗杂种——他竟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对于尼克松等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追查行动，杜鲁门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利用希斯案件搞政治斗争，为共和党在竞选中获胜推波助澜。尼克松则是想借此为自己爬上政治高位获得垫脚石。

当杜鲁门的总统宝座已经稳固后，杜鲁门方才批准由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进行全面调查，当然，这是后话了。

再说尼克松和斯特里普林赶到钱伯斯的农场后，向钱伯斯了解那些文件的内容。

钱伯斯对他们说：“很对不起，尼克松先生，法院命令不许透露内容，我现在只能说，这些证据是一颗真正的炸弹。”

尼克松有些沮丧，但还没死心，试探地问道，“钱伯斯先生，依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是否只能等司法部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呢？”

“不，我没那么蠢，”钱伯斯笑着说，“我的律师还保存着一份影印本，而且还有一点，我并没有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万一他们想扣压这颗炸弹的话，我还有另一颗呢。”

尼克松完全放下心来。“你保存好这第二颗炸弹，除了委员会外，不要把它交给任何人。”

尼克松回到华盛顿，权衡了各种因素之后，有了必胜的信心，便要斯特里普林向钱伯斯发出传票，立即调来他所保存的所有材料。

吩咐完之后，尼克松伸了伸懒腰，觉得有必要履行自己早就许下的诺言，陪帕特去加勒比海度假。

12月3日，尼克松与帕特所乘的轮船从纽约启航。帕特像孩子过节一般地高兴，他们将要在海上旅游两周，尽情享受加勒比海的美好风光，回味当初热恋时的温馨与浪漫。

尼克松从华盛顿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解脱出来，自然轻松了许多。但他在陪着帕特调侃的时候，脑子里却仍在思考着希斯案件，不知斯特里普林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第二天晚上，尼克松就在轮船上收到了斯特里普林的电报：

第二颗炸弹于星期五上午一时调来。案情大白，情况惊人。报界及其它地方都已为之震动。似需立即行动。能否立即返回？

这一夜尼克松没有睡好，帕特见他翻来覆去，情知这次海上旅游照此下去将兴趣索然，还不如一起回到华盛顿算了。

第二天一早，尼克松又收到委员会安德鲁斯的电报：

文件内容非同小可。与希斯有关似已成定局。与其他人的牵连已不可避免。此一结果如不能恢复某些成员的信心，亦将能恢复委员会所需之信心。纽约陪审团星期三开会……能否星期二抢在陪审团开会前一天到达？倘不能，则星期三上午举行听证会。自由派朋友不再喜欢我了，连你也一样。但事实总归是事实，何况它是炸弹。经鉴定，三个文件上有希斯笔迹。尚未得到他将这些文件交给钱伯斯的证据。但非常重要。斯特里普林说他能证明是谁将这些文件交与钱伯斯的。

收到这封电报后，尼克松再也呆不下去了，立即向斯特里普林发报，要他为自己回华盛顿作出安排。

第二天早晨，海岸警卫队派出一架水上飞机，把尼克松从船上送到迈阿密。在迈阿密机场，尼克松即将登上回华盛顿的班机时，有记者问尼克松对“南瓜文件”有什么意见要说，尼克松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以“无可奉告”搪塞过去。

原来非美活动委员会向钱伯斯发出传票的当天，钱伯斯恰在华盛顿。

当两个调查员同他一起返回他的农场时，夜幕已笼罩着大地。

钱伯斯并不带他们去居室，却把他们领到一块很大的南瓜地里。

天气很冷，南瓜上覆盖着厚厚一层霜。钱伯斯冲着满脸狐疑之色的调查员笑了笑，伸手在其中一个南瓜柄上一抓，南瓜就露出了一个小口。当钱伯斯从中取出三个很小的金属微型胶卷筒时，随行的调查员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简直就是间谍影片里面的镜头嘛！

钱伯斯看着他们惊呆了的样子，很平静地解释道：“我担心我不在家时，还会有什么别的传票和搜查令来，所以，我把这些东西藏在这里。好了，现在我交给你们，就放心了。”

钱伯斯看来十分明白非美活动委员会与杜鲁门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因此作了周密的防范。

“南瓜”微型胶卷被冲出来后，原来是数百页的文件照片，从官场琐事到绝密的大使级电文，应有尽有，都是钱伯斯退出共产党之前不久希斯交给他的。

“南瓜文件”的发现，对希斯是致命的打击。以前许多替希斯辩护的人都不敢再坚持原来的立场，杜鲁门也被弄得十分尴尬。尼克松的政治影响迅速增大。

由于诉讼时效条例的限制，不可能以“南瓜文件”作为间谍罪对希斯起诉。因此，大陪审团便以希斯的两条伪证罪提出控告。

第一条是，希斯作证时撒谎说，他曾非法拍摄国务院的秘密文件并将它交给钱伯斯；

第二条是，他作证时撒谎说，从1937年1月1日以后，他一直没有见到过钱伯斯。

希斯最终被判5年徒刑。

希斯案件判决后不久，尼克松收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头目胡佛的电报，对他大加赞赏。电报说：

阿尔查·希斯的定罪全部应归于你的耐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国政府中存在的叛国逆流终于以人人信服的方式被揭露出来。

的确，希斯案件使尼克松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众议员成为在华盛顿被人纷纷议论的人物，并闻名于美国，成了垄断资产阶级十分需要和赞赏的“反共斗士”。

希斯案件使尼克松深思：我们怎样才能像共产党那样把一种献身精神灌输给像希斯那样的人，把献身于自由思想的精神灌输给有才华的美国青年呢？

第四章 渡过危机

1948年的总统竞选，杜鲁门出乎大多数共和党人的预料，击败了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杜威，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连任总统。

杜威的失败，使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参、众两院席位低于民主党，尼克松也就成了一个少数党的普通众议员。这对于一心想迅速上爬的尼克松是不小的打击。

但尼克松在政治上有强烈的竞争精神与冒险精神。这种政治上的冒险并不等于政治上的莽撞，是深入地分析了利弊得失后的冒险。

杜威的失败，使尼克松痛感到不能再耐心地等待着熬资历或者坐等共和党在众议院提拔自己。因此，尼克松决定参与1950年中期选举参议员席位的角逐。

1950年的中期选举。联邦国会的全体众议员和参议员中三分之一的任满者都面临着改选和去留问题。

代表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有两名，其中一名是民主党人谢里登·唐尼，任期在这一年满期，尼克松决心取而代之。

好莱坞著名影星、众议员、民主党人海纶·加哈根·道格拉斯夫人也决心获得这一席位。

在美国，参议员的地位比众议员的地位更高，任期为六年，不像众议员二年一选。同时，参议院拥有一些众议院所不具备的权力，如对联邦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吏的认可权、对联邦政府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权等。此外，参议院议员人数每州只有两名，比众议员少得多，因而显露实角的机会也就多得多，更便于政治上的上升。

尼克松打算竞选参议员，受到他许多政界朋友和顾问的反对，认为无异于是政治上的自杀。因为唐尼还是得到许多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赞赏的现职参议员，要想击败他显然是很不容易的。何况尼克松的资历毕竟还太浅。

然而他们却忘了尼克松在希斯一案中捞取到的许多政治资本，这是许多议员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尼克松总是善于抓住机会的，既然处心积虑地追查希斯案件而冒险获得的机会，又岂能轻易地失之交臂？

1949年8月11日，尼克松写信给他的朋友和政治顾问弗兰克·乔根森，告诉他自己对竞选参议员一事的情况分析：

赞成和反对我竞选参议员的来信我已收到一大堆了。其中持反对意见的，似乎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担心我会失掉众议院席位。但是，如我前信所说，我的结论是，虽然我承认成功希望甚小，但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虽冒险也完全值得一试。当然，条件是在初选中我们不会遇到无比坚强的反对力量。正如我和这儿的几位朋友说过的，除非共和党1950年在参众两院取得重大进展，那当然意味着共和党在全国普遍得势，我深深怀疑我们能否重新掌权。确实，如果我们在众议院只不过是一个能说话但不起作用的少数派，那末，我认为，就任众议员不会有多大作为。

另一方面，如果得势的转机已到，那我就颇有赢得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席位的可能。如果转机未到，那重新获得众议院位也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胜利而已。

这封信写后不久，尼克松又得到《洛杉矶时报》、《旧金山纪事报》、《奥克兰论坛报》保证支持他的许诺，这不仅表明这些报纸将为他的竞选作舆论上的宣传和鼓动，实际上也保证了尼克松在共和党的初选中，不会受到

任何反对。

尼克松在政治上的狂热劲头又被煽动起来了。1949年11月3日，尼克松在对他的支持者宣布他将参加参议员席位的角逐时，除对当政的民主党进行指责外，明确表示，“我们只有一条取胜的途径，那就是，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激烈的、无情的、拼命的竞选，并且把这个运动直接推进到加利福尼亚的每一个县、每一个城镇、每一个选区和每一个家庭去。”

此后，尼克松与夫人帕特再次投入艰苦而又火热的竞选活动中去。

他们重新回到加利福尼亚，弄到了一辆旧旅行车，在车的两面钉上“选尼克松为参议员”的大牌子，车顶上安着高音喇叭，每到一处，便先放流行音乐，以此招徕听众。

最初，听众寥寥无几，且多是闲来无事的人。尼克松倒也不在乎，只要有人，哪怕连10个人都不到，也不嫌麻烦，都要大讲一通。那模样，很像中国大街小巷中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

这样的演讲，一天大约要进行10到12次，令人困乏到极点。

尼克松也真有眼力，找到了帕特这样十分称心的生活和政治伴侣。

为了使自己在观众面前保持一副亲切可爱的模样，为丈夫拉选票，帕特便利用车上仅有的一点空闲，卷卷头发，着意打扮，以适应不同的场合。

一天的竞选活动完毕回到惠蒂尔老家时，尼克松与夫人的骨头就似散架一般，瘫在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

当尼克松正进行着艰苦竞选的时候，他的竞选对手谢里登·唐尼参议员在民主党内反对派的压力下宣布退出竞选。这给尼克松减轻了很大的思想压力。

尼克松的竞选对手现在变成了民主党人、《洛杉矶日报》的发行人、大富翁曼彻斯特·博迪与道格拉斯夫人。他们尽管都属于民主党，但谁也不肯让谁，互相攻击。这种相互间的攻击，比起共和党人对尼克松的攻击自然有力得多。

而退出竞选的参议员唐尼对道格拉斯夫人的无情攻击更使尼克松获益匪浅。

5月22日，道格拉斯夫人被来自同一民主党阵营的唐尼从背后狠狠戳了一刀。唐尼公开抨击说：“我认为，道格拉斯太太缺乏一个美国参议员所必须具备的起码的能力和资格……我看不出她会愿意实行也没有能力，埋头去做艰苦而乏味的工作，以便准备制订立法方案和使方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在当时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舞台上，反苏反共的气焰极为嚣张，反共分子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表演。如要把一个人从政治上搞倒，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说他亲苏亲共。

唐尼似乎觉得抨击道格拉斯夫人还不够份量，接着又以道格拉斯夫人在国会的投票记录来攻击她说：“道格拉斯太太为使苏联暴君感到快慰，投票反对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她在总统最需要他支持和正应充分得到她的信任的关键时刻，反对总统。”

道格拉斯夫人既要应付本党内竞选对手的挑战，又要对付竞选劲敌尼克松，处于内外夹攻的艰难境地。

尼克松却比她好过多了，首先共和党内没有竞选对手，其次还得到民主党内部一部分人的支持，何况他还是全国闻名的反共分子。就连当时的民主党众议员、60年代当了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也私下跑到尼克松的办公室，交给

他一千美元的政治捐款说：“迪克，我知道你在进行一场非常艰苦的竞选，我的父亲愿意帮助你。”

1950年11月7日，尼克松终于以68万票的多数票当选，从众议员变成了参议员，在通向总统宝座的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1951年5月。

法国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美国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办公室。

参议员尼克松随着上将的副官走了进来。

艾森豪威尔打算参加1952年的总统竞选。对这位年轻参议员的才华，以及他的反共精神，将军早有所闻。

当看到尼克松时，艾森豪威尔从桌旁站起来表示欢迎。并示意尼克松坐下。

艾森豪威尔很随便地和尼克松谈起欧洲的复兴与发展前景，称赞尼克松在“希斯案件”中“干得很漂亮”。使尼克松很快地消除了拘谨，并深深为艾森豪威尔的风度和个人魅力所倾倒。尽管艾森豪威尔避口不谈美国总统选举，但当尼克松与这位二战英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告别的时候，尼克松已下定决心帮助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

不过，尼克松没有想到，一年以后，他会幸运地成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搭档。

艾森豪威尔得到尼克松的支持，在总统竞选中的地位也就更稳固了。

艾森豪威尔在共和党内的挑战者是美国第27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儿子、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因为他在共和党的资格较老，从1939年起就当参议员，所以人们都称他“共和党先生”。

塔夫脱是共和党内的“保守派”，是一个极端反共的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得到共和党内的提名，在1952年初来找尼克松，要求尼克松支持他。

尼克松了解塔夫脱，他在国会和共和党内有許多热心支持者，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尼克松要想在政治上发展，是决不能够触怒他们的。

塔夫脱说话相当坦率，他对尼克松说：“我并不认为我该这样做，不过，如果你感到我担任候选人和你的观点一致的话，我是很愿意得到你的支持的，这一点我不希望引起任何误解。”

尼克松权衡再三，这样的事是不能敷衍推诿，那样事后会更糟，便十分委婉而又坦率地对他说：“我十分尊敬你在参议院的领导地位，就国内事务而言，你是领导这个国家的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我不得不对你表示十分抱歉，就我个人认为，对下届总统而言，国际事务更加重要，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我向你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会在党代表大会上参与‘制止塔夫脱’的运动。”

塔夫脱虽然感到失望，但也赞赏尼克松的坦率。

此后不久的1952年5月8日，共和党的前任旗手、艾森豪威尔的主要支持者、纽约州州长杜威，在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纽约州共和党年度筹款聚餐会，特别邀请尼克松去作半小时演讲。

尼克松为此花了半天时间准备讲话提纲，他不愿意拿着稿子念，那会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这次演讲极为成功，无线电波迅速把它传遍四面八方。当尼克松演讲完毕坐在杜威身边时，杜威禁不住抓住他的手，很热情地说：“讲得实在太好了。答应我：不要自满，永远保持你的这种热情，有一天你会当上总统的。”

这种恭维在政界中是很平常的事，尼克松并没把它当作某种暗示来认真对待。

直到几个星期后，尼克松又应邀到华盛顿五月饭店的一套房间与艾森豪威尔的核心顾问班子会面。核心人物是赫伯特·布劳内尔律师、卢修斯·克莱将军和杜威的主要筹款人哈罗德·塔尔博特。

这次会面，只是广泛地讨论国内外政策，显然是对尼克松进行一次考察，称称他的份量，并没格外暗示什么。但尼克松已有察觉，新闻界也就这次会而猜测艾森豪威尔有可能选择尼克松为他的竞选伙伴。

尽管这只是一种猜测，尼克松仍觉得有必要了解外界对自己担任副总统候选人的看法，只是这种咨询必须因人而异。

按照美国当时的传统，副总统大多是为了照顾党内老资格人士或为平衡竞选名单而提出的地方政客，是一个礼仪性的人物，例如在总统忙不过来时，替代总统去出席一些典礼，招待一下客人。唯一的重要职能是当参议院对某项表决的赞成、反对票数相等时，才可以投一张打破平衡的票。以及在总统死亡或丧失工作能力时接替他的职务。因此，一般人都认为副总统一职是政治上的死胡同。罗斯福总统把担任副总统比作“当修女”，杜鲁门总统则把这个职位的作用比作母牛的第五个乳头。

面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转折关头，尼克松内心是十分矛盾的。担任副总统自然是一种荣耀，但也许会因此而失去日后担当总统的希望。

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尼克松与帕特请罗斯福总统的女儿艾丽斯·朗沃思一起吃晚饭。艾丽斯受她父亲的影响，政治嗅觉极为敏锐。当尼克松征询她的意见时，艾丽斯十分坦率地说：“父亲常对我说，当副总统是世界上最乏味的差使。不过，要是艾森豪威尔得到提名，总得有人和他联袂竞选，而且这个人必须能够让党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党内的保守派放心，决不致让他一人把所有的人都推到地狱里去，而这件事由你来做是再合适也没有尼克松听出她话中的意思，笑着说：“现在还只是外界的一种猜测，依我看可能性极小，我也没有认真考虑。”

“其实，你应该仔细考虑考虑，免得事到临头措手不及！如果你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的事业着想，也许留在参议院，不去当副总统对你更好一些。何必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的空名？可是，从党的利益出发，如果你真有此机会，我想你是应该接受的。”

艾丽斯走了以后，尼克松与帕特讨论了一下获得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结论是：太小。

1952年7月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

这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季。

尼克松与夫人帕特的心比天气还要热。

在会上，尼克松将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帕特则是无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崇拜者之一。当艾森豪威尔将要在记者招待会上与代表们见面的消息传出来时，帕特竟不顾酷暑的热浪，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见到艾森豪威尔。当副官看到尼克松夫人时，特意提醒说“这是参议员迪克·尼克松的妻子。”

艾森豪威尔特意走近帕特，热情地看着她。帕特发觉将军的双眼“溜溜圆、淡幽幽的蓝色，有股催人欲醉的魅力”。

这次见面，帕特终身难忘。但她也决没有想到，艾森豪威尔一家和他们一家日后会结下不解之缘。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被广泛认为是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包括加利福尼亚参议员比尔·诺兰，明尼苏达众议员沃尔特·周以德、科罗拉多州州长丹·桑顿和尼克松。大会提名前两天，《芝加哥每日新闻》头版通栏大标题“奈特预测：共和党候选人名单：艾克（指艾森豪威尔，作者注）和尼克松。”奈特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发行人兼主编，在新闻界有较高的威望。他的预测，更升高了新闻界的热度。

尼克松还是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特意吩咐手下人去买了六份报纸，说：“我们也许再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标题了，我要把它保存下来，让我的孙子们看看。”

当天下午，《芝加哥新闻报》的记者专门到尼克松夫妇下榻的“纽约人饭店”采访了帕特。

帕特对丈夫竞选副总统一职，并不热心。因为她认为尼克松成为副总统的可能性很小。两个孩子都还小，大的6岁，小的4岁，把她们撇下再会到处游说竞选，辛苦不必说了，对孩子于心不忍。

尼克松回到饭店时已近午夜，天气已凉快下来，但尼克松的心情还很激动。如果自己真的如报上的预测那样，去竞选副总统又有什么不好呢！

帕特还没有睡，显然还在等待他。

当尼克松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帕特的时候，帕特沉默了。

1946年与1950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两次竞选活动的艰辛还历历在目，如今又要去进行一次长时间的、全国性的竞选活动，其中的艰辛不免让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对年幼的两个女儿，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夫人的坚固防线前，具有雄辩口才的尼克松黔驴技穷了。这时已是凌晨4点，尼克松叫醒还在梦乡的助手乔蒂纳律师，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

乔蒂纳来到尼克松夫妇的卧室，一眼就看出帕特持否定态度。

尼克松夫妇把他们讨论的问题全部告诉了乔蒂纳，征求他的意见。

乔蒂纳先后帮助尼克松竞选众议员、参议员成功后，已完全获得尼克松夫妇的信任。

乔蒂纳十分坦率地说：“现在已到了一个你要么往上爬，要么退出的时刻。我认为只要获得提名，就应该竭力去竞选。即使竞选副总统失败，你还是可以保留参议员席位。如果你当上副总统后觉得没有意思，还可以干完一任就不干了。想想吧，迪克，任何一个像你这样年轻的人在当上副总统后退出政治舞台是肯定不会吃什么亏的。”

乔蒂纳走后，帕特和尼克松又讨论了一会儿他说的话，最后帕特表示：“我想再来一次竞选活动我也能对付下来。”

尼克松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妻子揽在怀里，热吻了好一会儿。此时已是凌晨5点多，两人尽管十分疲乏，却已无睡意了。

天亮不久，尼克松就赶去开会。下午1时50分，艾森豪威尔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击败了塔夫脱，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为了让候选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由谁担当他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大会暂时休会。

尼克松感到十分疲倦，想抓紧时间休息，晚上还是开会，艾森豪威尔和他的竞选伙伴将在当晚大会上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倘若自己获得提名，今晚若没有饱满的精神，那怎么办？

天气太热，房间又没有空调。尼克松只穿着一条裤衩躺在床上，依然感觉热得难受。

乔蒂纳推门进来，声音因为内心的激动有些发颤。他告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布劳内尔刚才打电话告诉他，艾森豪威尔已接受了一张可供挑选的竞选伙伴的最后名单，上面有尼克松的名字。

尼克松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也很激动，但不愿在乔蒂纳面前表露出来。

“这仍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默里。”尼克松说。

尼克松刚要睡去，床头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尼克松拿起听筒，听出是布劳内尔的声音，声音听起来很远，好像是在与另一个人说什么。

尼克松赶紧把听筒紧紧地贴住耳朵，生怕漏掉了一个字。

只听布劳内尔回答另一个人说：“是的，将军，我们已经一致同意，就是迪克·尼克松。”

接着，布劳内尔对尼克松说：“迪克，我们选中了你。”

长久以来的猜测和期待，一下变成了现实。巨大的喜悦涌上尼克松的心头，他一下怔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布劳内尔继续说道：“将军想知道你是否马上能到布莱克斯通饭店他的套间来看他，当然，那是假定你愿意的话。”

尼克松终于回过神来，“我立刻就来见将军。”

睡意已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尼克松胡乱地穿上衣服，赶到大厅。

神通广大的乔蒂纳早已给他准备好一辆高级轿车和一辆警察局的护送摩托车。

当尼克松向艾森豪威尔的总部飞驰而去的时候，帕特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当时帕特与乔蒂纳夫人正在斯托克广场吃过时的中午饭，一边吃，一边看一部电影。突然，餐厅的大屏幕上电影画面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一则公告，宣布艾森豪威尔提名尼克松为他的竞选搭档。

帕特吃惊地张大了嘴，正咬着的火腿三明治也掉落到地上。

乔蒂纳夫人大喊起来：“喔，帕特，这一下你可名留青史了！”

喜悦的泪水已模糊了帕特的双眼，几年来丈夫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已足以抵消所受的艰辛。她的脚似乎一下轻快了许多，高跟鞋也不再碍事了，以从没有过的速度，向大会会场奔去。

当尼克松到达艾森豪威尔的总部时，艾森豪威尔走上前来握住了他的手。略为交谈几句后，又把尼克松带进了他的一间大居室，把尼克松介绍给艾森豪威尔夫人。这时的交谈十分轻松而又随便。

当艾森豪威尔夫人离去之后，艾森豪威尔收敛了笑容，变得非常严肃和正经。他对尼克松说，他将要使他的竞选成为争取实现他所信仰的以及他认为美国所代表的一切东西的一场十字军运动。

艾森豪威尔问尼克松道：“你愿意和我一起参加这样一场竞选吗？”

尼克松回答说：“当然，我感到自豪和幸福。”

“我很高兴你来和我一起干，迪克。我想我们能够取胜，我们能够为国家做点该做的事。”说到这里，艾森豪威尔用手拍了拍他的前额。“哎，我还没有从陆军退役呢！”

当艾森豪威尔的秘书拿着他签字的给陆军部长的信走了以后，他和尼克松的谈话已转到上任后的计划，以及尼克松最关心的副总统的职责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迪克，我不想让副总统只是个摆摆样子的人物。我要他成为我们工作班子中的一员，并且，万一我发生什么意外，我要让他能够顺利地接替总统职务。”艾森豪威尔笑着说，“当然，我们首先要赢得这场选举。”

艾森豪威尔是职业军人出身，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他的这番话决不是开的空头支票。尼克松做了他的副总统以后，倍受重用。在1955年、1956年、1957年艾森豪威尔三次卧病期间，三次代行总统职权，彻底改变了副总统在人们头脑中只是“闲职”的印象。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的尼克松听了这番话，自然很感动。但政治上已十分成熟的尼克松也十分清楚，艾森豪威尔选中他，并非是因为他与艾森豪威尔有什么较深的私交，而是选中他有利于赢得这场总统选举。

1952年的美国，由于国内的贪污腐败，国际上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与在欧洲的失利，杜鲁门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成了“烂摊子”。美国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只有“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才能够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艾森豪威尔也有自知之明，他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但要在竞选中应付复杂的党派斗争，却感力不从心，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应付。

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后盾是美国东部开明派权势集团，为了使共和党团结一致支持他，需要一个出身中西部或西部的稳健的保守派作为桥梁，以便与因塔夫脱的失败而感到极为失望的一般共和党组织沟通关系。

仅仅上述条件还是不够的，美国资产阶级垄断集团杜撰的共产主义威胁也是竞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人还必须是一个全力进行竞选并善于竞选的伙伴。

尼克松是以希斯案件闻名全国的“反共斗士”，杰出的竞选演说家，又来自加利福尼亚这个在战役后迅速崛起的大州，其力量和影响不可小视。显然，尼克松是很好的竞选伙伴。

下午6时30分，大会没有人对尼克松提名表示异议，于是鼓掌通过，这表明尼克松为共和党内各派力量所认可。

当大会主持人、众议员乔·马丁请尼克松参议员从加利福尼亚代表团席区上主席台时，帕特抑制不住内心激动，从贵宾席上站起来，挤过人群，走到尼克松身边，兴奋地抱住丈夫吻了一下。

有些摄影记者没有来得及拍下这激动人心的画面，坚持要帕特再表演一下。帕特微笑着接受了记者们的要求，又吻了丈夫一下，然后一同走上主席台。

此时，帕特只感到激动，忘了即将到来的长时间的艰苦竞选活动了。

面对许多共和党代表和电视摄像机，尼克松比帕特要冷静得多。他知道自己在竞选中的主要任务是要帮助消除塔夫脱的支持者和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之间的矛盾。许多塔夫脱的追随者对他们的失败感到痛心因而想对竞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如果真的发生这种局面，那么，对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将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

尼克松已经想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说词。由于事前缺乏准备，电视摄像机前的尼克松，穿的依然是平常穿的那套皱巴巴的灰衣服。他在演说中表示，要进行一场“战斗性的竞选活动，以使一个具有战斗意志的候选人当选”，并将为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而努力。

引起大会轰动的则是下面这段话：

“现在请容许我对一位我认为非常伟大的人物讲几句话。我在政治界是

比较年轻的……但我确信，我对从事立法活动的人的能力是有所了解的。我似乎感觉到，在过去两年中，过去四年中，出现的最大的悲剧之一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参议员、美国有史以来真正伟大的立法领袖之一，在今天竟没有担任多数党政策委员会主席，而当了少数党政策委员会主席。现在我要说，明年1月份以后，参议员勃·塔夫脱肯定将担任多数党政策委员主席。”

尼克松这番对塔夫脱大加赞扬的话，不仅让艾森豪威尔的部分顾问感到意外和不满，就是因塔夫脱的选举失败而沮丧的支持者们也没有想到，心里对尼克松更添好感，整个代表大会都为塔夫脱欢呼起来。

尼克松的演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塔夫脱的支持者们因此而渲泄了自己心中的怨气，尼克松在共和党内的地位也得以进一步提高和巩固。

第二天晚上，尼克松不失时机地去塔夫脱下榻处拜访。塔夫脱因竞选失败而灰心丧气，对尼克松能来看他感到很高兴。临别时，塔夫脱向尼克松保证，他愿意为艾森豪威尔的当选出力。

竞选的历程漫长而艰辛，尼克松与妻子帕特决心继续走下去。

当艾森豪威尔乘坐的“友邻们向前看”号专列开往中西部竞选的时候，尼克松也于9月17日乘坐“尼克松专列”离开惠蒂尔附近的波莫纳站，驰上了竞选的旅程。

在离开车站的时候，尼克松发表演讲，严厉地批评杜鲁门政府的腐败，说艾森豪威尔会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末了，尼克松还保证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把艾森豪威尔的改革运动的信息送到全国每个角落去。

天有不测风云，这次讲话过去刚刚20小时，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把尼克松卷上了半天空，差点葬送了他的政治前途。

9月18日，《纽约邮报》的晨报头版，一行大大的标题：“秘密的尼克松基金！”震撼了无数选民的心。另一版上的标题：“大富翁的秘密托管基金使尼克松过着远远超出他薪金收入的豪华生活”则使选民感到上当受骗后的愤怒。

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伊利诺斯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更是不会放过把政敌搞臭的机会，很快就把“基金问题”变成了全国性的话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切尔要求把尼克松的名字的从竞选名单中除去。

最初，尼克松还沉得住气，认为这不过是民主党发起的典型的党派性攻击，以干扰他对杜鲁门政府的抨击。他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基金的来龙去脉。认为自己站得住脚，没什么可担心的。

尼克松刚当上参议员时，他的竞选顾问们认为从政治前途考虑，尼克松应尽可能多花些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州各处走走，发表谈话，直接或通过书信和选民保持接触。但是，华盛顿离加利福尼亚州太远，这笔开支很大，尼克松的收入是不够开支的。按照尼克松顾问乔蒂纳的说法，是尼克松参议员六年任期中的一个“持久的竞选运动”。

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时的财务主任达纳·史密斯则建议公开募捐一点基金，每人捐款的最高额度不超过500美元，并全部交由别人代为掌管，那就不会产生什么有人花钱买好或者个人从中捞一把的问题了。

1950年度，史密斯向二三百个曾为竞选捐款的人发出一封关于设立基金及其用途的信，数星期以后，史密斯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发了这封信。结果有76人捐献，平均每人240美元。

这笔基金存在的两年中，所有的收支部由史密斯经手，并全用支票付款，全部用于邮资、旅行和其它政治活动方面，纯属私人用途的一分钱都没有用过。

其实，像尼克松拥有的这类竞选基金，在美国政界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因此，尼克松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艾森豪威尔得知“基金问题”后，感到意外和十分不安。他不知道基金问题的真相，又不能保持沉默。在与顾问们商量之后，发表了一项简短的声明：

我一直非常推崇和赞赏参议员尼克松具有美国人所有的信心和决心，把共产党的同情者逐出了受公众信任的岗位。

最近出现了在道德问题上对他的指责。

我相信迪克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肯定他会如实地正大光明地把全部事实向美国人民明白交待的。

一旦在我们能有机会通电话时，我打算尽早和他谈谈。

艾森豪威尔并不急于表态，只是交给联络人一个便条，建议尼克松把手头所有的文件证明都公布出去，以洗清自己。

尼克松也感到竞选演说越来越难进行，只要专列停下开始竞选演说，尼克松就会遭到许多人的诘问，结果演说变成了激烈的争论。

然而这些并没有对尼克松的竞选信心产生实质性影响。

对尼克松产生巨大震动的是《华盛顿邮报》和《先驱论坛报》的两篇社论，特别是后者。

《先驱论坛报》是美国极有影响的大报，也是美国东部影响最大的共和党报纸，没人敢忽视它在美国政坛的巨大影响。该报在华盛顿办事处的负责人伯特·安德鲁斯目前正在艾森豪威尔的专列上。尼克松不能不考虑到其中的微妙处。

《先驱论坛报》在社论中回避了尼克松是否有罪这个问题，而在结尾中说：“在这种情况下，参议员尼克松的正当做法应是正式提出退出竞选。至于对这个问题如何处理，那就得看艾森豪威尔的无比公正的态度对所有这些事实如何评价了。”

显然，这篇社论即使不代表艾森豪威尔的观点，也代表了他的竞选班子中某些高级顾问的看法。

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立即弄清艾森豪威尔身边的那些人和他本人究竟持何立场，因此决定派人第二天去拜访杜威。

这篇社论无疑给了尼克松沉重一击，当尼克松回到熟睡的夫人身边时，已心灰意冷了。

帕特从梦中醒来，见尼克松心事重重、无精打采的样子，关切地问：“迪克，怎么啦？”

尼克梦苦笑道：“也许我过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艾森豪威尔周围更为客观的那些人，都认为我退出竞选更能使他获胜，我也许应该退出。”

帕特自嫁给尼克松以来，还没见过尼克松这样悲观过。“迪克，你不应该想到退出竞选！如果艾森豪威尔强迫你退出竞选，他也会在竞选中失败。”帕特要重新鼓起丈夫的勇气，“你想想，你如果不在这样一种攻击面前为自己的荣誉而斗争，不仅会毁掉你的政治生命，而且还会毁掉我们的家庭，特

别是女儿们的未来。”

“好吧！我们继续干下去。”尼克松握紧了帕特的手。《先驱论坛报》的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猜疑，人们开始猜测尼克松在候选人名单上究竟还能呆多久。

巨大的压力使尼克松几乎喘不过气来，当他的竞选专列抵达俄勒冈的波特兰时，聚集在尼克松下榻旅馆外面的愤怒人群把尼克松夫妇推来搡去，一些人把小钱币扔进尼克松的汽车，还有一些人则一手拿棍棒，一手摇晃着一个铁盒子，上面写着“给穷鬼尼克松捐几分钱吧！”

使尼克松稍稍感到宽慰的是，艾森豪威尔以前的竞选对手塔夫脱站出来为他辩护。

塔夫脱在回答一个记者问及尼克松基金问题时说：“我不懂为什么一位参议员或众议员不应接受他的家庭成员、朋友或支持者的馈赠，以帮助支持不是由政府支出的费用，甚至是私人的花费。只有捐钱的人要求或得到了立法上的或其它方面的好处，那才应该加以批评。我知道在迪克·尼克松基金问题上，捐款的人并没有此类动机。那些捐献基金的人在立法问题上也许是百分之百地和他所采取的立场相一致罢了。”

佛蒙特参议员乔治·艾肯和前总统赫伯特·胡佛都站出来替尼克松辩护。

艾森豪威尔知道尼克松有大批支持者，如果撤换尼克松，自己的竞选必然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胜负难以预料。然而，尼克松的基金问题如不能解决，对自己的竞选就更为不利。因此，他并不急于表态，而是有目的地放出试探性气球。

在专列上艾森豪威尔举行的一次不供发表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自己进行过一次非正式投票，结果以四十票对两票赞成把尼克松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艾森豪威尔说：“我不管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四十比二。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急于作出决定。什么都还没有决定，和你们的意见相左，这是一个给尼克松洗刷的机会。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和猎犬的牙齿一样清白，我们发动这场改革运动来反对华盛顿正在进行的勾当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信息是清楚的，尼克松需要用证据来说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几天过去了，尼克松依然没有直接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得到任何信息，局势已是十分紧张，对尼克松也越来越不利。帕特为此急出病来，脖子转动不灵，痛苦不堪，不得不卧床休息。

乔蒂纳深入地分析了竞选形势，向尼克松建议说，既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把电视时间分配给副总统候选人，就应该要求占用一部分时间来发表一篇为基金辩护的演说。

当尼克松正在与顾问们讨论发表一次电视讲话可能产生的后果时，杜威从纽约给他打来了电话。

杜威的电话证实了尼克松的怀疑，除了一两个人外，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们都要求尼克松退出竞选，但艾森豪威尔本人还没作出决定。杜威本人仍然支持尼克松，但立场已没有以前那样坚定。

当天夜里，艾森豪威尔终于给尼克松打来了电话。

电话声音很大，屋子里的人都听得见。

“迪克，最近两三天你很不好过吧！我想象得出你的处境很困难。”

“是不大好过。”尼克松声音里有气。

“这种情况出人意外，我很难决定怎么办才好。我考虑了很久，最后的

结论是，该怎么办应由你去决定。你在这个国家毕竟有一大批追随者，如果你退出了却给人留下一个印象，是我逼迫你退出的，那会非常糟糕。另一方面，如果我现在发表声明支持你，其结果很可能是人们谴责我包庇别人做坏事。”说到这里，艾森豪威尔故意停下来，想听听尼克松的反应。

尼克松在没弄清艾森豪威尔的真实意图前决心一声不吭。艾森豪威尔又等了一会儿，见尼克松没吭声，只得继续说道：“我的几个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都认为，我应该找个机会，把我这方面对此事的看法告知全国。我不愿意去谴责一个无辜的人，我认为你应该安排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把所有情况都向全国人民讲清楚。把你所记得的自从你进入政界以来的每件事都说出来。告诉他们你曾经接受过的每一分钱。”

“将军，在这电视节目之后，你认为那就可以发表一项肯定或否定的声明了吗？”

艾森豪威尔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我希望完全不必要发表什么声明，但在节目之后，我们也许可以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

尼克松已完全明白，艾森豪威尔虽是军人出身，政治上却并不天真，自己的名字是否从候选人名单中划去，艾森豪威尔要在仔细评估了全国选民的态度之后才作出决定。

想到自己的命运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尼克松感到有些愤怒。

“将军，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希望你不要考虑我个人的情绪。我知道你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多么为难。如果你认为我留在竞选名单上对你不利，我就马上退出，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担。”说到这里，尼克松加重了语气，“现在已该结束这种拖延的办法了，我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之后，你就应该立即作出决定，不能老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现在最可怕的是拿不定主意。”

尼克松第一次以这样的语气同艾森豪威尔讲话，不禁令他的顾问们大吃一惊。

艾森豪威尔听出了尼克松的不满，心中也很不快，但他仍然坚持说：“在电视节目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等三、四天看看对节目的反应如何。”

谈话结束后，尼克松征求帕特的意见。

帕特的意见很干脆：“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斗争到底。”

尼克松知道自己已没有退路，决定斗争下去。

9月22日，尼克松乘飞机从波特兰赶回洛杉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以及参众两院的竞选委员会已经拨款75000美元，买下了9月23日晚上半小时的电视播出时间。

第二天晚上，尼克松动身前往电视台前一小时，杜威从纽约打来了机密电话。

“迪克吗？”

“是我。”

“艾森豪威尔的高级顾问刚刚开过会，他们要我告诉你，他们的意见，在今天晚上广播结束时，你应该向艾森豪提出引退。你知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我有责任把这个意见转告你。”

尼克松被惊呆了，有一种被出卖、被愚弄的感觉。“艾森豪威尔要我这么办吗？”尼克松竭力使话音显得平稳些。

“我没有同艾森豪威尔谈过话，我也不愿意让你觉得这是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决定。”

一切都明白了。如果这不是代表艾森豪威尔的观点，艾森豪威尔的高级顾问们是不会让杜威给尼克松打来电话的。

艾森豪威尔都靠不住，还靠谁呢？只有靠自己，靠今晚的演讲，靠选民的支持。竞选如同战争，靠的是实力。

沉默了一会，尼克松继续说：“现在把这个意见转告给我已经太迟了一点，我的发言稿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很难把它改过来。”

杜威说：“我倒有个主意，可以使你坚持下去，最后终能成为英雄而不是一只替罪羊。你现在可以宣称你不仅要退出竞选，而且还要退出参议员。然后，在参议院必须举行的特别选举中，你可以重新竞选，并且通过争取史无前例的最大多数票来使自己得到昭雪。”

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建议，尼克松碍于杜威是一向支持自己的老朋友，没有痛斥，只是报以沉默。

杜威似乎明白尼克松并不在乎他的建议，不再多说，转而问：“喂，我该怎么对他们讲你的打算呢？”

尼克松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你就对他们说，我也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想知道的话，最好是听听今晚的广播，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对政治我也还懂一点的。”说完，也不等杜威的回答，就“砰”地放下了听筒。

当尼克松把杜威的意见告诉顾问们的时候，乔蒂纳与罗杰斯都惊呆了。

“你肯定不打算照他们的意见办吧，你会吗？”乔蒂纳问。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尼克松挥了挥手，“你们俩让我独自想一想。”

几分钟后，该到电视台去了，顾问们都跑到过道上，默默地表示支持。帕特紧紧地挽住丈夫的手，一同向前走去，作最后的战斗。

电视演播室由埃尔·卡皮坦剧院的舞台改装而成，里面摆着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和一只嵌在墙里的书架。

离播讲只有3分钟了，忽然间尼克松感到空前的绝望：“帕特，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能闯过这一关。”

听着丈夫发颤的声音，帕特拉起他的手，十分平静他说：“迪克，毫无疑问，你一定能闯过去。”

帕特一直把丈夫送到电视摄像机面前。眼神里充满了鼓励和期待。

“我的美国同胞们，”尼克松开始说，“今晚，我既作为一个副总统候选人，也作为一个诚实和正直但受到怀疑的人，到这里来跟大家讲几句话。”

尼克松的演说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列举有关基金的事实和个人的经济情况。第二部分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进行抨击，第三部分则赞扬艾森豪威尔，第四部分要求听众向在华盛顿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寄信或发电报，表示他们认为尼克松是否应该留在竞选名单上。

尼克松不愧是演讲的天才，几句开场白一过，在摄影灯光的照射下，在帕特温柔而又充满鼓励的目光注视下，恢复了必胜的信心，完全不用笔记，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仿佛这不是一场决定政治命运的战斗，而是对帕特诉说心中的深情。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罗杰斯在摄像机旁向他举起双手，示意还有10分钟，后来又举起一只手，示意只剩5分钟了，最后只竖起3个指头。尼克松那时已和演讲混为一体了，完全没有看到罗杰斯向他表示的“10秒”、“5

秒”“结束”的信号。摄像机已经关闭，尼克松仍在讲话，站在桌子前面，双臂伸向摄像机，似乎想拥抱观众。

尼克松的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电视台的电话总机一直忙个不停，成千上万个支持尼克松的电话打了进来，在尼克松下榻的饭店，收到了几千份电报。

在克利夫兰，艾森豪威尔的夫人玛米看完演讲后，不禁啜泣起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几个人眼中已噙满了泪水。

在下面大厅听广播喇叭的听众开始叫喊：“我们要尼克松！我们要尼克松！”

艾森豪威尔也松了一口气，转身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阿瑟·萨默菲尔德高兴他说：“好哇，阿瑟，今晚你花了75000美元确实值呀！”

几分钟后，艾森豪威尔来到下面大厅去对情绪激动的群众说：“我这个人，在投入战斗时，宁愿有一个勇敢而诚实的人在我身边，也不要满满一大车态度模棱两可的人。我见过不少处于逆境勇敢战斗的人，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人像今天晚上尼克松参议员这样如此出色地通过了这场考验。”

当天晚上，艾森豪威尔给尼克松发了一份电报：

你的讲话真是了不起。从技术上说，这决定不必由我来作，但你和我都知道，当前实际情况需要发表一项使公众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声明，我个人的决定将以个人得出的结论为根据。如果你能立即飞来看我，我将极为感谢。明天我将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我个人对你的极为深厚的全部爱慕之情丝毫没有减退。

显然，艾森豪威尔心里已决定尼克松将和他一道去赢得这场竞选。但这封电报竟淹没在当晚的几千封电报之中，尼克松并没有及时看到，反而只听到一家通讯社的新闻简报引用艾森豪威尔的一句话：“一篇演说是不够的。”

这句话离尼克松的期望甚远，极大的失望涌上心头。

尼克松已不能掩饰心中的愤怒，问乔蒂纳：“他还能要求我作什么呢？我已尽了力，如果这还不够，那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退出竞选了。”

尼克松气极了，真想独自一人跑到野外去大哭一场。该做的都做了，尼克松再也不愿去见艾森豪威尔，他不愿向人乞求，这副总统不当也罢。

他把秘书罗斯·玛丽·伍兹叫进来，口授了辞呈，立即发给艾森豪威尔。

伍兹见他正在盛怒之下，不好说什么，遵命把电稿用打字机打出来之后，并不发出去，却交给了乔蒂纳，希望乔蒂纳能够阻止尼克松的鲁莽决定。

乔蒂纳几把就扯碎了电稿。对尼克松说：“迪克，这事不必急着办，先搁一搁，然后再作打算。”

尼克松余怒未息，安德鲁斯从克利夫兰打来电话，向尼克松的成功演说表示祝贺。

当他得知尼克松的不快和不愿到惠林见艾森豪威尔时，不禁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担忧起来，便很诚恳地劝尼克松说：“迪克，你不必担心见到艾森豪威尔时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篇广播演讲已经对事情作出了决定。艾森豪威尔和别人一样，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你必须记住他是谁。他是领导盟国军队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将军。他是极有威望的候选人，即将赢得这场竞选。他将是美国的总统，他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头头。他将作出决定，而且将会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他有权按他自己的方式作出决定，你一定得到惠林来见他，给他一个可以这样做的机会。”

听了安德鲁斯的话，尼克松渐渐冷静下来，觉得还是应当去见艾森豪威尔。

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以特有的理性来战胜自己情绪化的行为。

事实证明，尼克松最终改变了主意是英明的。

当尼克松的飞机刚刚在惠林机场停稳，尼克松正替夫人帕特穿上大衣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已从舷梯上登机迎接尼克松来了。

艾森豪威尔带着他特有的魅人的笑容向尼克松伸出手来时，尼克松只觉得这许多日子所受的痛苦已烟消云散了。

“将军，你不必到机场来的。”尼克松很感动地说。

“为什么不？”艾森豪威尔微笑着，“你是我的人呀！”

尼克松感到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已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尽管天气很冷，但他的心中已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在驰向会场的路上，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都闭口不提刚刚经历过的危机。车窗外，浓浓的夜雾已笼罩着惠林。他不知道，今晚会是一个什么场面在等待着他。艾森豪威尔却胸有成竹，他要给年轻的竞选伙伴一个惊喜，给他恢复名誉。

汽车抵达会场时，艾森豪威尔让人把车篷放了下来，等候许久的群众立即看到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紧紧坐在一起，向他们挥手致意。

艾森豪威尔登台讲话，他说：“参议员、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先生是一个勇敢的、可敬可畏的人，经历了一场极不公平的纯出恶意的攻击。”他挥了挥手，让欢呼的群众安静下来。

“今晚，我将请尼克松先生给大家讲几句话。在他讲话之前，我先要给大家读两封电报。”艾森豪威尔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拿出两份电报来。

尼克松奇怪刚才在车里时为什么没先拿出来给他看，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听艾森豪威尔念道：

亲爱的将军，我深信，关于这次对理查德的攻击的全部真相，一定会很快水落石出的，到那时，我肯定你准会正确地作出决定，绝对信任他的正直和诚实。这里是一个比任何人都更长久地了解理查德的人向你致以最好的祝愿。他的母亲。

呵，是母亲，是母亲的电报，尼克松反应过来，他的眼睛潮湿了。

世界上唯有母爱，才是最无私、最长久的。

艾森豪威尔已在读第二封电报。这封电报是萨默菲尔德发来的。电报中说，在可以联系上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138 名委员中，107 名委员一致拥护尼克松继续参加竞选，电报最后说：“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能够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向一个伟大的美国人表示这激动人心的敬意，我感到极为快慰；这个美国人曾毫无畏惧地走进绝望之谷，最后完整无损，昂首挺胸走了出来。这一点又无可怀疑了——美国珍爱迪克·尼克松。”

艾森豪威尔已不需要再说什么，这已鲜明地表示了他的态度。

尼克松走上台时，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的欢呼声。

尼克松已激动得说不出说来，好久，他才说道：“我希望你们知道，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感到最伟大的时刻。”

演说完毕后，尼克松望见众议员比尔·诺兰在向他挤来。

尼克松走到他的身边时，他紧紧地抓住尼克松的手，微笑着说：“你真

了不起，祝贺你！”

不知为什么，尼克松的眼眶里涌满了泪水，终于渡过了这场危机，能不高兴吗？

基金危机差点让尼克松的政治前途毁于一旦，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尼克松，使他的政治嗅觉更加敏锐，政治经验更加丰富。他知道，在大选胜利之前，反对党一定还会利用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谋杀。

就在会后，文森豪威尔找尼克松单独谈话，因为他听到另外几桩关于尼克松经济问题的谣言，需要澄清一下。

“将军，这正像打仗一样。”尼克松说，“我们的敌人要输了，他们对我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但遭到了痛击。这使他们得花点时间重新集结力量，等到他们卷土重来时，他们就会要拼死一战了，他们将会把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家伙全向我们砸过来，包括厨房里的水池子。还会有其它的罪名，但决没有一桩能站得住脚的。我们现在必须尽一切力量避免的一件事是决不能让他们的任何一次攻击得逞。他们传播出任何一个谣言，我们就得尽快地把它消除掉。”

尼克松的预感没有欺骗他，新闻界不断地制造尼克松经济问题的谣言，但经过基金危机之后，尼克松已不需费什么脑筋就轻而易举地击败进攻，反而在尼克松的心中埋下了厌恶报界的种子。

当总统选举即将结束的时候，尼克松夫妇已筋疲力尽地旅行了74000余公里，访问了214个城市，发表了92次演说。在竞选的最末两周，夫妇俩已累得手足麻木，似乎没有知觉了。

1952年11月4日，对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来说，是他们最清闲的一天，也是最长的一天。这一天，美国进行大选。

该做的都做了，这一天，千百万人将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却无能为力。尼克松与夫人帕特甚至跑到海边与水兵们打了一会儿橄榄球。

投票结果，艾森豪威尔—尼克松以多得六百五十万票得胜，击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

这次大选，尼克松尽管经历了痛苦的折磨，但也获得了副总统的宝座，同时，也得到了关于政治和友谊的重要教训。这就是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

“在政治上，只要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或给他们点什么好处，大多数人便都是你的朋友。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政治和生活的其它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但选举的公开竞争性质，也许使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露骨罢了。但是，在我似乎要退出竞选时竟有那么多人转眼之间翻脸不认人，他们带给我的惊愕和失望，却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

第五章 竞选天才

1953年1月20日，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冬日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照射下来，暖烘烘的。这一天，尼克松宣誓就任副总统。

从表面上看，当上副总统与当参议员并没有多少差别：上班仍在参议员办公大楼，办公室虽是新房间，面积同以前还是一样。工作班子人数仍与以前一样，11名。当然，多了一辆公家配备的黑色凯迪拉克大轿车和司机。

一般的看法，尼克松这个副总统仍然只是个闲职，除了每天同参议员们高谈阔论外，就是翻翻报纸，关注一下总统的健康状况。

但是，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后，面临着朝鲜战争的失败，东方巨人——中国正在崛起，法国在越南也陷入了困境。在东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坚如磐石。在国内，如何收拾杜鲁门政府的烂摊子，恢复公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以及如何协调资产阶级各大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都使艾森豪威尔大伤脑筋。

尼克松已注定不能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副总统。

亚洲和远东是被杜鲁门政府严重忽略的两个重要地区，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或副总统去访问过这个地区。朝鲜战争的失败，使美国统治集团认识到必须重视亚洲地区。

1953年10月5日，尼克松与夫人帕特率领代表团登上了空军四引擎的星座号飞机。

这个代表团很小，只有秘书长菲尔·沃特斯、行政助理小克里斯·赫脱、秘书罗斯·伍兹以及一位海军医生和一位处理礼宾事宜的陆军副官。此外，就只有两名特工人员陪伴尼克松夫妇了。

当飞机爬上高空，机翼下的美利坚合众国渐渐远去的时候，尼克松想到此行的任务：如何消除因朝鲜战争失败而引起的盟友对美国政策的疑虑，如何拉拢采取中立政策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弄清这些亚洲国家对共产党中国这个新崛起的巨人抱什么样的态度，以便美国制定有效遏制中国的政策。

至少从表面上看，得让亚洲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知道，这是美国领导人的一次亲善访问。因此，在起飞之前，尼克松就已要求国务院在安排他的日程时，指示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尽可能少地安排社交活动，尽可能多地让他见到各种类型的人——学生、工人、企业家、在职和不在职的政界人士、军人和农民。当大使馆回答说这不符合外交惯例时，尼克松坚持说，如果不这样，他就自己安排。

使馆的人员不明白，尼克松的真正目的，是要借亲善访问进行他的反共反华的宣传。

新西兰、澳大利亚的热烈欢迎，使尼克松十分惬意。印度尼西亚统治者令人目眩的奢华和人民的贫困这样鲜明的对照让尼克松吃惊。

当时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赶走了荷兰殖民统治者，刚刚获得独立。对尼克松的到来，苏加诺在自己的宫殿设宴款待。

在一千支烛光的照耀下，金制的餐具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湖面铺满了白色的莲花，晚风送来乐师们优美的乐曲。觥筹交错之间，尼克松不失时机地进行反共宣传。

其实，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还十分弱小，苏加诺对尼克松的宣传并不以为意。对苏加诺的铁腕统治，尼克松自有他的看法：

“苏加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深刻地感觉到他具有磁石般的使人民依附

于他的控制力。他领导他们赶走了可恶的荷兰统治者而取得独立，他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和激起他们的自豪感的口号‘自由’。但是，作为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苏加诺却已变成了政治上的光采和腐蚀性的虚荣的混合物。他为自己的性活动能力感到非常自豪，这件事已成为无数谣言和传闻的主题——其中有许多可能是他自己传出去的。不管怎样，他的宫殿里到处都是些我曾看见过的最优美的女人。他是一个杰出的革命领袖，但对在获得独立之后如何来建设这个国家他却一窍不通。他能够非常成功地摧毁旧制度，却不能集中他的注意力来建立一个可行的新制度以代替旧制度。”

也许是尼克松感觉到自己的口才在反华反共的宣传上没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当他的专机飞临红河上空时，他的情绪突然有些激动起来。

从机窗俯视，夕阳的余辉把大地染得一片金黄，蜿蜒的红河一泻千里。法国在河内的殖民统治已摇摇欲坠，共产党将在越南取得胜利，深深的忧虑爬上了心头……。

法国殖民统治者扶植起来的一个傀儡省长在河内为尼克松举行了欢迎宴会。

酒还没下肚，浓郁的酒香已使尼克松的血液沸腾起来了。

“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国家所受到的威胁，虽然它已采取内战的形式，却仍旧是从外界获得力量的。

因此，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反对越盟的斗争，其重要性已远远超出越南的国界之外了。在这个染遍了越南人、法国人和与法国有关的人民的鲜血的战场上，他们所保卫的不仅是越南人的自由和民族生存，同时也保卫着柬埔寨人、老挝人，以及他们的西方的、南方的、东方的邻居的自由和民族生存……

我们知道你们完全和我们一样决心要抗拒侵略。正如我们过去的行动所证明那样，我们已经决定，决不让你们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去进行战斗。”

尼克松似乎忘了，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的签字墨迹尚未干涸，艾森豪威尔不可能又马上对越南的局势横加干预。但政治上的敏锐性，使尼克松感到，如果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失败而撤出的话，这些国家必将获得独立，那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必将大大不利。

第二天，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尼克松已乘坐上法国军用运输机向前线的一个法军指挥部飞去。

隆隆的大炮声使尼克松意识到，战争就在身边，他穿上迷彩服，戴上头盔，在法国指挥官的陪同下，来到炮兵阵地。

这是一些越南士兵，受法国殖民者的控制，与胡志明领导的人民军队作战。法国军官对他们显然不屑一顾。

尼克松比起法国军官来，显然高明得多。廉价的赞扬可以换来他们为殖民者的统治和反共而充当炮灰，何乐而不为呢？

尼克松到越南士兵的帐篷去看望他们，并说：“你们是战斗在保卫自由的最前线，美国人民支持你们的事业并向你们的英雄行为致敬。”

当晚，尼克松在参加法国驻越南总督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强调说要在越南战胜共产主义，越南人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十几年后，尼克松在越南战争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此是后话不提。

星座号飞机把河内远远地抛在后面，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的尼克松痛切地感到，法国将会在越南失败。造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尼克松心里在骂

法国人真愚蠢，为什么不充分训练越南人，让他们自己去和同胞作战，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呢！尼克松意识到，“法国的失败，还在于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信仰——或一套机构可以用来抵制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号召。但有一点尼克松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正义的战争最终是不可战胜的。美国在朝鲜的失败，不是已说明了这一点吗？

飞机在汉城机场着陆，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尼克松乘车去美国大使馆。

街道两旁，站着挥舞纸剪的南朝鲜与美国国旗欢迎的人群，凛冽的寒风中，孩子们只穿着十分单薄的棉衣，冻得发抖，这是一座荒凉和贫困的城市，是朝鲜战争的直接后果。

尼克松想到明天将要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见面，执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给她的一项重要任务：递交一封亲笔信。

这是一封要求李承晚必须作出保证，不能在朝鲜重新燃起战火的敦促信，尼克松必须要让李承晚充分明白美国政府这一不可改变的立场。

这并非是尼克松乐意做的事。

想到朝鲜战争期间，自己还在参议院发表演说，要在朝鲜坚持作战，直到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并要出动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对中国本土的军事基地进行轰炸，对中国沿海实行封锁。如今自己却要李承晚保证不再挑起战火，尼克松不禁苦笑。

美国驻汉城大使埃利斯·布里格斯知道尼克松是强硬的主战派，但反对这场侵略战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艾森豪威尔当初的竞选诺言。作为副总统，尼克松即使心里不赞成政府的停战决定，也不能在表面反对。作为一个驻南朝鲜的大使，布里格斯深知李承晚对美国还极有用处。

布里格斯对尼克松道：“副总统先生，我希望你在这里不要完全解除他的武装和挫掉他的锐气。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在世界的这一地区的一个伟大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的绝大多数朋友都是只能共安乐的一类人物。”

第二天，尼克松见到了李承晚。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头，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打着深蓝色的领带。当他迈着轻快的步子，有力地握住尼克松的手的时候，尼克松真不敢相信他已是78岁的老人了。

尼克松与他略事寒暄后，便说有些事情想和他单独谈谈。

李承晚点点头，其他人知趣地退了出去。

他极为慎重地接过艾森豪威尔的信，似乎要掂掂它的份量。

当他看完信后，方知是那么的沉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把信平摊在膝上，再次注视着它，想从字里行间找出值得安慰的地方。然而没有，他的眼睛模糊了，眼眶里涌满了泪水。

李承晚开始讲话了，语调平缓而冷静。他谈到了对日本的态度，谈到太平洋和亚洲的未来，也谈到了美国对南朝鲜的经济援助。

尼克松十分注意地听，却没听到谈那封信，仿佛根本不存在那回事。

“总统先生，”当李承晚谈话告一段落时，尼克松赶紧插话进去，“请允许我十分坦率地说，当前的形势迫切地要求你充分了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立场，同意总统在信中所提出的要求。”

“我也要坦率地对你说，”李承晚回答，“我对我国从美国所接受的援

助以及艾森豪威尔对待我的私人关系深表感谢。由于此种情谊，我不愿意做任何与美国政策不相协调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必须想到朝鲜，我作为朝鲜人民领袖的职责是实现我国的统一，可能时，用和平手段，必要时，使用武力。”

说到这里，李承晚似乎感到自己过于激动，停了一下，把膝上那封信握在手里，平静一下情绪，继续说：“我了解为什么美国急于实现和平，这个目标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另一方面，使朝鲜形成分裂的和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既毁掉朝鲜又毁掉美国的战争，对这种和平，我不能同意。”

李承晚向尼克松俯下身子，“我向你保证，不管什么时候，在我采取单方面行动之前，我一定先通知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完，李承晚狡黠地笑了。

尼克松感觉到李承晚的笑里隐藏着某些不可捉摸的东西，但来不及细想，只是从他的话里来看，很难称得上是艾森豪威尔所要求得到的保证。

尼克松十分明白，如果没有让李承晚理解美国决不会支持他可能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去统一他的国家，那自己就没有完成这次重要使命。因此，尼克松十分严重而又坚定地告诉李承晚说：“总统先生，你必须完全了解，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同艾森豪威尔达成一致协议，你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尼克松在国内的党派斗争和国际外交斗争中，政治嗅觉是极为敏锐的，但在与李承晚的交往中，却没发现李承晚其实是美国政府的忠实代理人，政治上确有高明之处。

尼克松对南朝鲜的访问，很多报纸已作透露，说李承晚已答应艾森豪威尔，不会单独采取行动。

对此，李承晚在第二天与一个记者谈话时断然加以否认说：“我希望我能通过副总统尼克松去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正确的政策是结束朝鲜目前的这种状态。”这使尼克松忧心忡忡。

直到尼克松去与李承晚告别时，两人重新单独在一起，李承晚才向尼克松亮出自己的底牌：

“当共产党肯定美国控制着李承晚的时候，你们将失去你们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们也就失去了一切希望。共产党对于我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的恐惧永远对他们是一种制约力量。我们，你和我，现在都非常坦率，所以你必须知道，共产党认为美国极其需要和平，而且你们将竭尽全力要求得到它。有时候，我在想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说到我这方面，他们可不认为情况也是那样，因此我相信你们这样完全消除他们在这方面的疑虑是错误的。明天你在东京时，我就会把我回艾森豪威尔的信送到。我真希望你能把这封信亲自交给艾森豪威尔，看完后就把它销毁掉。”

说完，李承晚把这段话的底稿交给尼克松时，又在末尾亲笔加上两句话：“报上有那么多的报道说李承晚答应不单独采取行动。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不符合我们的宣传方针。”

当把尼克松送到办公室门口时，李承晚握住尼克松的手说：“有关朝鲜单独采取行动问题我所作的一切声明都是为帮助美国。我心里明白，朝鲜不可能单独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和美国一起行动。我们懂得，一起行动，我们将可以得到一切，不一起行动，就会失掉一切。”

直到这里，尼克松的心里才觉得充满了阳光，一颗悬起的心总算放下来。这次来朝鲜，不会有辱使命了。

李承晚政治上的老奸巨猾，令尼克松终生难忘。

离开朝鲜后，尼克松接着还访问了日本、印度、菲律宾、缅甸、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于12月4日回到华盛顿。

这次穿梭访问，尼克松深深地感到，欧洲在亚洲历时三个世纪之久的殖民主义统治已濒于灭亡，人民要求独立解放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阻挡。因此，当欧洲殖民帝国瓦解之后，美国应当采取行动，及时填补真空。不然，苏联和中国肯定会采取行动。

尤其是中国，赫然耸立在亚洲地平线上的一个巨人，尼克松感到这是一个可怕的、莫测高深的主要对手，它的影响已遍及整个亚洲地区了。

以反共著称的尼克松心中当然不好受，为了遏制中国，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就说：“既然亚洲的这场大战是在共产主义和自由国家之间进行，我们便不能忽视强大的共产主义宣传。我认为彻底破除共产党的号召力的最好办法是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让一些没有明确表态的观察家看到，民主国家的代表既不害怕共产党人，也决非没有能力在任何问题上与他们进行辩论。”

亚洲之行，尼克松捞了不少的政治资本。

此后不久，当越南奠边府又一次成为法国的“滑铁卢”之战时，美国统治集团的目光又为印度支那所吸引。

还在1952年，杜鲁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一份关于东南亚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艾森豪威尔后来称之为“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的理论：“丢失任何一个国家可能导致这一组国家中的其它国家相当迅速地向共产主义投降或与之结盟。”这个地区的丰富自然资源——橡胶和锡，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并断言法国为打败胡志明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作的努力“对自由世界不仅在远东，而且在东方和欧洲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在1954年2月，艾森豪威尔派了两百名陆军机械士到法国军队和越南军队中去当技术顾问。到了3月，奠边府便被人民军队所包围。

最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山鹰行动”计划，准备用3颗小型战术原子弹摧毁人民军阵地为守军解围，艾森豪威尔担心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不同意。

到了3月底，艾森豪威尔召开了一次国会领袖会议。尼克松建议立即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在会上说，如果奠边府的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他将让蒋介石的军队在海南岛登陆，或者派出强大的舰队封锁中国沿海。

但是，艾森豪威尔并不敢让美国明目张胆地独自卷入越南战争，他和他的国务卿杜勒斯都想拼凑一个以美、法、英三国为主的西方盟国统一行动的计划。

尼克松极力怂恿美国政府应当直接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雷德福海军上将将与国务卿杜勒斯则飞到英国与法国进行游说，不能够放弃越南。

以反共闻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却比尼克松、杜勒斯之流的主战派明智多了，毕竟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的英国刚刚在印度遭到了失败。

丘吉尔对来访的雷德福上将直率地说：“英国人民不愿为了自己去打一场拯救印度的战争，又怎么愿意为了法国去打一场拯救印度支那的战争呢？”

当尼克松得知丘吉尔的态度后，不禁感到沮丧，美国人民也不会赞成卷入越南战争的。

至于法国，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表明他们已毫无斗志，准备撤出越南。

还在1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在回答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苏兹贝格询问法国如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时说：“除了从印度支那撤兵或者继续维持目前局势之外，我还看不出有别的路可走。要实现军事解决，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作出新的努力。但是法国不想作那种努力。”

可以说，法国在越南的败局已定，奠边府的解放已指日可待。此时，尼克松的倔强性格又一次显现出来。

4月初，国务卿杜勒斯眼见策划盟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联合行动的图谋已成泡影、便心灰意冷地去加拿大度假，艾森豪威尔去佐治亚洲度假，便委派尼克松代表他参加4月16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

尼克松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

会上，有记者问：“副总统先生，你是否认为，如果法国决定撤退的话，我们应该派美国军队去印度支那？你是否认为这是挽救印度支那免被共产党接管的唯一途径？”

面对如此重大的政策问题，事前又并没有与艾森豪威尔商量过，尼克松却没有回避，反而趁此机会抛出了试探国内朝野对于涉越南局势的气球。

“记者先生，我不相信你所提出的推测或假定将会发生。不过，如果派美国军队是唯一可以阻止共产党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支那进一步扩张的办法，我相信，政府的行政部门将不得不采取这种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的立场，面对这个问题，并采取这一行动，而我个人也将会支持这个决定。”

第二天，尼克松的讲话成了美国的头条新闻，朝野一片哗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多数将领也反对美国直接干预越南局势。艾森豪威尔只得公开表示对于越南局势，“美国没有站得住的理由进行干预。”

5月7日，奠边府回到了越南人民手中，美国政府只得灰溜溜地把两百名美军机械士撤回国内。

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奠边府陷落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以及其他政要们，如释重负地出了口长气，他们该以全副精力对付1954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了。

对于这场选举，艾森豪威尔不感兴趣，尼克松更不感兴趣。因为尼克松感到自己干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干好了，功劳归艾森豪威尔，干坏了，罪过得由自己承担。然而，既然是副总统，尼克松已没有退路，除非脱离政治。

共和党在参议院仅以一票的席位领先，是民主党最显然的进攻目标，同时，民主党也想重新控制众议院。

这时的共和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派别极多。民主党的史蒂文森——尼克松的政敌就攻击说，“他们被矛盾冲突、冷淡厌烦和麦卡锡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乱哄哄的行动简直像窜进肉铺的瞎狗。”

句中所提到的麦卡锡是共和党人、美国参议员，在1950年期间，领导所谓“抵制共产党渗透美国政府机构的活动”，运用非法手段进行调查与审讯，并指责民主党是“叛国党”，制造了大量冤案。不仅激起美国人民的愤怒，也触怒了统治集团，终被参议院予以谴责。由于麦卡锡问题，共和党的支持率明显下降。

当艾森豪威尔上午工作，下午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尼克松自9月15日至11月2日的七个星期内，已飞行了近42000公里，访问了30个州的95个城

市，代表 186 名众议员、参议员和州长候选人进行竞选。

尽管竞选如此劳累，尼克松却并没受到命运的奖赏，选举的结果令人沮丧：共和党在众议院丢掉十六个席位、参议院丢掉两个席位，民主党再次控制了参众两院。

这次选举，尼克松感到自己成了民主党攻击的靶子。《华盛顿邮报》把尼克松画成是阴间里栖息的动物来加以讽刺，一些民主党人则把尼克松描绘成蛊惑家、骗子。尼克松深切地感到与艾森豪威尔搭档的悲哀：二战英雄光环笼罩着的艾森豪威尔，依旧保持着全民总统的姿态，超脱于竞选之外，谁会愚蠢地去攻击他呢？

在飞回华盛顿的途中，尼克松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卷稿子，递给坐在身边的乔蒂纳：“默里，这是我最后的竞选演说稿，你也许把它当作纪念品保存起来，这是最后一份，因为从此之后我决不再搞这类活动了。”

其实，尼克松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政治，已成了他的生命。说不搞竞选，也只是发两句牢骚而已，他的终极目标是当美国总统，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955 年 9 月 24 日，华盛顿。

骄阳似火，整个华盛顿就似一个人炉，烤得人难受极了。已是下午 5 时，尼克松一边喝着水，一边翻着《明星晚报》。

头版的一条通讯吸引了他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得了轻度消化不良症。这是艾森豪威尔常患的普通病。值得大惊小怪么！

尼克松摇了摇头，把报纸翻到了体育版。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

“迪克，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总统得了冠心病。”

“已肯定了吗？”尼克松有些吃惊。

“我们已完全肯定，只是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迪克，我们想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随时和你联系上。”

尼克松放下听筒，默默地坐了好几分钟，一动不动。但他的脑子却迅速地转了几个弯，做为一个副总统，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些什么？

尼克松首先打电话把代理司法部长比尔·罗杰斯叫来。两人还没谈上几句，大批的新闻记者都跑来了。

尼克松并不知道更多的消息，倘若被记者揪住话中不妥之处，可不是闹着玩的，尼克松已吃够了记者的苦头。因此，他与罗杰斯商定不能让记者知道他在这儿。

罗杰斯理解尼克松的苦衷，笑着说：“我打电话让妻子开车来接我们，你就到我那儿委屈一夜吧！”

罗杰斯妻子把车停在尼克松屋后的一条小街上，一点也不惹人注意。尼克松与罗杰斯从后门悄悄地溜了出去，钻进汽车。

在罗杰斯家里，尼克松挂通了丹佛的电话，得知艾森豪威尔的病被正式诊断为“轻度”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痊愈的可能性很大。

在这一瞬间，尼克松已找准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位置。

在罗杰斯家里，与很多内阁成员通话之后，决定作为一个团结的班子继续管理国家事务，直到艾森豪威尔病愈重返工作岗位。

当天夜里，尼克松失眠了。他不能不盘算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艾森豪威尔的病不外三种可能：几个星期后就痊愈并重新工作。那么，

在此期间，新闻界正瞪大眼睛看着，尼克松就绝不能愚蠢地去干有可能被说成是为己谋私的事。

第二个可能，艾森豪威尔病故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毫无疑问，尼克松将依法继任总统。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是最好的一种结果。那么，尼克松事先的行动就更不能出纰漏。

第三种可能，也是最可能出现的局面，艾森豪威尔不能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恢复工作，那么，尼克松将接任某些他负责的工作，担当起事实上的总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就更不能去干让别人认为是凯觐总统权力的工作。

不过，让尼克松担心的是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对尼克松的权力是一个挑战。华盛顿已经在谣传亚当斯返回白宫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想不到一回到这儿突然发觉你自己就是总统了。”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尼克松仍继续在国会大厦的原办公室办公，而不是去白宫办公，尽管按道理是应该去白宫的。如果有事需和内阁成员相商，尼克松总是分别去找他们，而不是叫他们到自己的办公室来。

当主持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尼克松十分谨慎地坐在总统席对面的副总统座位上，避免给人以僭越的印象。

48天后，艾森豪威尔从丹佛飞回华盛顿，尼克松终于从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因为他在艾森豪威尔生病期间的谨慎从事，从而获得不少的赞誉。

这年的圣诞节，尼克松与家人过得十分快乐。当两个女儿在尼克松夫妇面前跳起芭蕾舞的时候，尼克松暂时忘记了政治竞技场上的角斗，坐到了钢琴旁边。随着十指在钢琴上的滑动，尼克松以深沉的男低音领着家人唱起了圣诞颂歌。

这是尼克松步入政界以来少有的与家人共同欢娱的圣诞节。新年一过，尼克松又要投入政治舞台上的角逐。不过，这场角逐，尼克松没有想到的是，依然那么令人难受。

1956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四年一届的总统任期到了。艾森豪威尔若想连任总统，必须重新竞选。

尼克松可不愿永远只作副总统。如果艾森豪威尔不参加竞选的话，尼克松认为自己很有把握获得下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不过，若是艾森豪威尔宣布参加竞选，尼克松就只能放弃这个打算，最好的结果仍然是做他的搭档。

1956年2月29日，艾森豪威尔打消了数月来人们众说纷纭的猜疑，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竞选连任。

共和党的头面人物自然是欢呼一遍，因为当时艾森豪威尔在国内还有极高的威信，在竞选中击败民主党候选人还是较有把握的。

谁是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呢？记者们首先便提到了尼克松。

“总统先生，既然你作了肯定的答复，你是否再要副总统尼克松先生当你的竞选伙伴？”记者们迫不及待地发问。

记者的反应之快，令艾森豪威尔吃惊。对这个问题，他还没有考虑好。但他却必须作出回答。

“事实上，尽管我对尼克松先生极为钦佩，我也不会提出副总统职位问题，理由是：我相信，根据传统，在总统候选人被提名以前是不会提名副总统的，所以我们还是等着瞧共和党代表大会提名谁，到那时再谈这个问题更合适一些。”

艾森豪威尔的这个问答，不仅记者不满意，尼克松心中更不愉快。但尼

克松心中明白，尽管自己忠心耿耿，为艾森豪威尔干了不少的事，但他在没有弄清选择尼克松作竞选伙伴是否对自己获胜有利的时候，是不会作出决定的。

尼克松想起年前艾森豪威尔曾建议自己接受一个内阁位置，比如任国防部长，这样可以取得一些对当总统来说极为重要的行政经验，而那是当副总统所无法取得的。进入1956年后，艾森豪威尔又重复了同样的建议。

想到这些，尼克松仿佛打翻了五味瓶，心里很不是滋味，时光似乎又倒流回到基金危机的时刻。

此后不久，尼克松心头的伤疤又被《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揭开，并撒上一把盐。这篇报道说艾森豪威尔曾要尼克松担任一项内阁职位而被拒绝。在大选前夕，这篇报道无疑是说尼克松已从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抹去。这么敏感的问题如果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同意，是不可能透露出去的。那么，这很可能是艾森豪威尔要尼克松退出竞选的暗示。

3月7日，艾森豪威尔举行了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他在回答记者关于《新闻周刊》的那篇报道的问题时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说“我唯一请他做的是要他订出他自己的行动计划，并要他告诉我，他愿意做些什么。”

会后，尼克松感到十分愤怒，立即在一张便条上写了不再做1956年副总统候选人的声明，把它交给了共和党参议院竞选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维克·约翰斯顿。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莱恩·霍尔、约翰斯顿与国会联络官杰里·珀森斯知道尼克松在共和党有大批的追随者，倘若他宣布退出竞选，共和党在竞选中将马上分裂成两派，对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极为不利。

当他们一起来劝尼克松收回成命时，尼克松嚷道：“谁都知道，政治上副总统根本不可能订出他自己的行动计划，如果总统不要我和他一同竞选，我却硬不肯放弃，那我他妈的多不识相呀！要不要我，全在他决定。我现在只能假定，如果他那样说，那就是他要用那么一种方式表明，他要另找别人。”

尼克松越说越激动，约翰斯顿他们还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便极力解释这不是艾森豪威尔的意思。经过好一阵劝解，尼克松才平静下来，答应在几个星期内不发表任何声明。

这几个星期的等待，对于尼克松来说，是十分难熬的。

也许艾森豪威尔已经意识到，如果把尼克松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扔掉的话，也就会扔掉许多票。因此，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表示自己很高兴与尼克松“一起列入一个候选人名单”。

尼克松认为自己出击的机会到了，便于4月26日的下午，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

“总统先生，”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对面坐下后，就很直率地说，“在你的领导下继续当副总统，对我将是莫大的光荣。但我所以迟迟没有说明，唯一的理由是，我不愿让你感到在你不愿意我参加的情况下，我硬要在选票上挤上我的名字。”

艾森豪威尔笑了，他明白与尼克松在竞选搭档上的危机已经过去。他拿起了听筒找新闻秘书哈格蒂。

“吉姆，迪克刚才对我说他愿意继续参加竞选，你为什么不马上请他出去让他本人当面跟记者谈谈。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此后，艾森豪威尔身边的人如裁军问题顾问史塔生、总统助理亚当斯曾

经打算把尼克松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抹掉，但都似浮在水面的泡沫，很快地破灭了。

8月22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尼克松以1323票对1票的绝对优势，获得再度提名。

9月18日，尼克松与夫人帕特又重整行装，走上风尘仆仆的竞选征途。竞选期间不大多出面的艾森豪威尔亲自到机场送行。

尼克松又一次成为政敌的攻击目标。

《新闻周刊》报道8月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说：

从在芝加哥敲木槌宣布开会到最后狂欢的呼叫声震动屋瓦以至消失，尼克松自始至终是攻击的对象。发言人念到他的名字时个个嗤之以鼻，似乎像个什么难以出口的脏字眼。他被攻击为“副刽子手”、“白宫豢养的侏儒”、“下流货”……民主党在攻击尼克松时，实际是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要把这样一个人送进白宫吗？记住，如果你们再次选举艾森豪威尔，艾克一死他就要成为总统了。”

对于竞选与演说，尼克松好像永远不知疲倦，尼克松与帕特包了一架飞机，三次横贯全国的竞选活动，除星期天外，每天至少举行一次甚至两次记者招待会。

11月6日的大选日之夜，计票的结果，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赢得了57%的选票，总算对尼克松夫妇的辛苦竞选有了回报。但在国会两院的议员选举中，共和党成了少数。艾森豪威尔成了美国108年来第一个在国会两院里一个院也不为他的党所控制的总统。

第六章 初露峥嵘

第二任副总统职位让尼克松风光一阵后又归于平静。直到 1958 年 4 月，尼克松出访南美，又成了国际注目的人物，也差点为此丧命而引发一场国际危机。

这次访问，包括除了巴西与智利以外的所有南美国家。不去巴西是因为尼克松已在 1956 年代表艾森豪威尔出席过巴西总统库比契克的就职典礼，而智利总统则即将来美进行国事访问。

尼克松知道，南美人民十分痛恨美国垄断集团对南美国家的政治渗透与经济掠夺，此行未必愉快，但他却拗不过艾森豪威尔与国务卿杜勒斯。

从访问的第一站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开始，尼克松就遭到反美示威群众的斥责。但真正令尼克松夫妇感到后怕的是在秘鲁与委内瑞拉的遭遇。

当尼克松夫妇在秘鲁一下飞机，就感受到强烈的敌意。

按照访问日程，第二天应该访问秘鲁历史悠久而且十分著名的圣马科斯大学。然而，当尼克松在秘鲁总统努埃尔·普拉多的陪同下用毕午餐时，才发现下榻的利马饭店门前，已经聚集了很多示威的群众，不断向他们发出口哨声和嘘叫声。

圣马科斯大学校长和当地的警察局长知道学生与群众的激愤情绪，害怕出事，都表示希望尼克松取消这次访问，美国驻秘鲁的大部分使馆官员也认为还是取消为好，不必去冒发生严重影响美国与秘鲁关系的事件的危险。

尼克松当然知道不应该去冒这个风险。但如此一来，国内外的人会怎么看待他呢？会认为尼克松在关键时刻是懦夫，这一点对于他在政界的奋斗十分不利。

“我不应当来承担取消访问的责任。”尼克松默默地想了一会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访问可以取消，但必须是校长或警察局长发表声明请求我这样做。

校长与警察局长怕遭到人们的指责，拒绝了尼克松的要求。尼克松只得转而征求秘鲁政府几位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每个人都主张取消访问，但不愿承担取消访问的责任。

尼克松的行政助理比尔·基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迪克，我建议去访问利马的天主教大学而不要去访问圣马科斯大学，因为天主教大学的学生比较有责任心也较守纪律，并且该校校长说过欢迎我们前往访问。”

尼克松点点头，觉得这个办法似乎不错。便转身征求美国驻秘鲁大使特德·艾基利斯的意见。

特德沉思了很久，最后才回答：“我认为，就我个人来说，你应作出不去的决定。但就美国来说，我得认为你不去将在整个西半球产生某些很不利的公开反应。”

这一夜，尼克松都在思考去还是不去。利马饭店外的示威群众越来越多。“打倒美帝国主义”、“尼克松滚回去！”的口号此起彼伏，清清楚楚地传进了尼克松的耳朵。

直到第二天早上，尼克松依然没有作出决定。但他知道此行危险，便让帕特留在饭店，自己则率随从去向秘鲁的解放者何塞·德·圣马丁铜像献花圈。

仪式是放好花圈后静默 30 秒钟。但尼克松却整整站了两分钟。旁人都以为他太虔诚，却不知他心中正激烈地斗争着：去圣马科斯大学还是去天主教

大学？这是上车就必须告诉司机的。

尼克松最后决定去冒一次险，转身走到警卫人员杰克·舍伍德身旁说：“去圣马科斯。”

到达圣马科斯大学大门不远的地方时，车窗外成千上万的示威群众高叫着“尼克松滚回去！”、“绞死尼克松！”的口号。

舍伍德很担心尼克松的安全，尼克松见有很多秘鲁警察在维持秩序，全世界都在看着他，自己决不能示弱。

尼克松整了整衣服，也不要任何使馆官员和警察充当随从，只带着译员弗农·沃尔特斯上校和杰克·舍伍德向大门走去。

大门口已被示威者组成的人墙挡住，他们不断地呼叫着反美反尼克松的口号。

尼克松在竞选中练出来的脸皮已经很厚了，对这些口号，只当作没有听见，快要接近大门时，尼克松站住了，舍伍德则十分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

尼克松高声说：“我要跟你们说话，你们为什么那样害怕真理？”

沃尔特斯照样高声翻译，但他们的话都被淹没在反美的口号声中。

尼克松还在不顾一切地叫喊，突然一块石子向尼克松飞来。舍伍德急忙上去遮挡。尼克松虽免去了皮肉之苦，舍伍德的一颗门牙却给打掉了。

紧接着，石块纷纷地飞向尼克松，犹如暴风骤雨。如果没有秘鲁警察拼命挡住示威群众，尼克松当时也许会被砸成肉泥。

尼克松知道除了离开已没有其它办法了。但他还没死心，便令驱车直奔天主教大学。

在天主教大学的礼堂，尼克松作了近半小时的讲演，然后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正在这时，舍伍德在尼克松耳边悄悄地说：“最好赶快离开这儿，圣马科斯那帮人正朝这儿赶来。”

尼克松知道厉害，随即赶回饭店。当到达饭店附近时，示威群众早就严阵以待。

尼克松怕惊动了他们，便令停车，与警卫悄悄地走过去。离饭店大门大约还有十多米时，示威群众已认出了他们，顿时人群骚动起来，口哨声、尖叫声、愤怒的咒骂声响成一片，直向尼克松涌来。此刻的尼克松再也顾不得副总统的矜持，撒开双腿就跑。

要进大门时，又一个示威者拦住了尼克松。尼克松以为他是要呼口号，或者咒骂自己，谁知他张口就向尼克松啐口水。刹时间，一股巨大的怒火燃烧在胸膛，自己若不是来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真想不顾一切后果向面前的这张脸猛揍一拳。

尼克松强压住怒火，闪身钻进了饭店。帕特已经跑下楼来，上前搂住了丈夫，眼眶里已噙满了泪水，哽咽着说：“迪克，我真担心你，那些家伙的目光不仅流露出仇恨，那种发狂的样子，真使我害怕。”

此后对委内瑞拉的访问，帕特终于亲身感受到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一瞬间的恐怖感觉，遭受到被人啐口水的屈辱待遇。

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华盛顿特工处长的一份电报令尼克松十分不安：“中央情报局通知华盛顿特工处，已收到要在委内瑞拉谋害副总统的传闻。”

尼克松想，如果能由委内瑞拉政府取消这次访问就好了。于是，尼克松电告美国驻委内瑞拉的大使，要他告诉委内瑞拉政府，如果想取消尼克松的

访问，尼克松会加以谅解。

但是，委内瑞拉政府似乎未能理解尼克松的暗示，或许不愿承担取消访问的责任，反而向尼克松通报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下。

5月13日早上，尼克松乘坐的飞机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郊外的迈克提阿机场降落。

还没下飞机，尼克松就听到了示威群众的怒吼声。但他们都被警察隔离在机场跑道两侧的栏杆后面，有的则站在机场大楼了望台的楼顶上。机场上除了官方欢迎队伍外，并无其他人。

当尼克松与帕特走出机舱出现在舷梯顶端时，仪仗队鸣礼炮19响，并高奏委内瑞拉国歌与美国国歌。然而，尼克松已开始担心起来，因为群众的呼喊声已淹没了乐曲声。

委内瑞拉的保安头子似乎看出了尼克松内心的担忧，当尼克松与他握手时，对尼克松说：“副总统先生，你放心，他们不过是一群毛孩子，干不出什么坏事来的。”

尼克松见他说得那么肯定，稍稍宽了心。

在欢迎的乐曲声中，帕特挽着尼克松，踏着红地毯走向机场大楼。其余的人则跟在他们的后面。

就在他们要走进大门的时候，乐队指挥突然指挥乐队再次奏起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得停下来立正。

刹那间，似乎下了一场雨，起初尼克松尚未在意，当他看到帕特鲜红色的上衣由于溅满了口水而变成暗红色的时候，才明白是了望台上的人群向正好在下面的他们吐口水，还有黄色的浓痰。

好不容易盼到国歌奏完，尼克松夫妇以及随从们才被从口水中解救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当他们穿过机场大楼走向车队时，示威群众又拉住了他们继续啐他们。一位年轻姑娘隔着路障把口水啐到了帕特身上。

这是一位满脸仇恨的姑娘，眼中似乎要冒出火来。帕特生平第一次被无数的人啐了无数的口水，心中委屈得要命。但自己作为美国的第二夫人，应该表现得雍容大度，不然，那些新闻记者又有攻击的目标了。她微笑着把手伸过去，友好地拍了拍姑娘的肩膀。姑娘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了一下，扭过头呜呜地哭起来。

警卫人员总算为他们驱开了示威群众。尼克松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坐第一辆车，舍伍德紧紧地坐在尼克松身边。

望着尼克松满身的口水，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十分尴尬，歉疚地替尼克松擦掉衣服上的口水。

委内瑞拉政府没能阻止住示威群众，尼克松十分愤怒，对外交部长狠狠地说：“用不着擦，等我换下这套衣服，我就把它烧掉。”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解释说：“委内瑞拉人民长时期以来没有自由，所以他们现在倾向于更强烈地表现表现自己，也许做过了头。在我们新政府里，我们不想做任何能被理解为压制自由的事。”

他的解释显然不能令尼克松满意。“倘使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和才智来控制像在机场的那伙暴徒，用不了多久委内瑞拉就谁都不会有自由可言了。”

说着话时，汽车已进入首都加拉加斯。

市内的情况更是令人胆颤心惊。委内瑞拉政府安排尼克松首先去民族伟

人祠献花圈。当汽车开到离目的地还有四条横马路的时候，司机突然发现，从人行道到街中心的交通安全岛已经被一连串的车辆筑起了路障，迎面又有一长串汽车驶来，司机不得不停下车来。

此时，接二连三的石块向车子砸来，从街头巷尾突然出现的好几百人，直向尼克松他们奔来。委内瑞拉的摩托护卫队不知后面的情况，早开到前面去了。而保护尼克松他们的就只剩下 12 名警卫人员了。

“啪”地一声，一块石子击中了尼克松乘坐的汽车玻璃，碎片弹中了外交部长的眼睛，殷红的鲜血顺着蒙住眼的手往下流，疼得他不住地呻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又一个示威者提着一根铁棒奔了过来。“砰”，铁棒砸在车窗上，玻璃溅到了尼克松的脸上。那人狠狠地瞪了尼克松一眼，丢掉了铁棒。

汽车开始动起来，尼克松长舒一口气，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尼克松很快发现情形不对，刚开始宽慰的心又沉了下去。因为汽车开始左右晃动，尼克松突然想到新闻报道中暴徒们掀翻汽车，再用汽油点燃的场面。这一瞬间，不止尼克松，汽车上的司机、特工舍伍德、外交部长、译员沃尔特斯上校都觉得这下完了，要被示威者干掉了。尼克松想到了帕特，从后座窗望去，才知示威者竟然没有理会她坐的车。

舍伍德忍受不住了，掏出了手枪说：“让我干掉几个狗娘养的。”

尼克松慌忙叫住他道：“别开枪，只要枪声一响，人群就会发狂，那时大家都完蛋。”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记者的汽车从拥挤的人群中开了出去，驶入反方向车道，挡住了迎面来车。尼克松座车司机不敢怠慢，狠踩油门，飞也似地冲了过去。警察摩托车护卫队又出现了，并发出讯号要尼克松的司机开车跟在后面。

外交部长这时才告诉尼克松安排的访问日程。

但尼克松已被吓坏了，吩咐司机直接把车开往美国大使馆。直到汽车进入使馆大门，尼克松才感到大大地松了口气。

当尼克松与帕特沐浴更衣后，听到传来的消息说，有几千名示威者在伟人祠广场等着他们，准备在他们献花圈时扔土制手榴弹。

尽管这并没有成为事实，尼克松也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

当天晚上，尼克松与帕特在房间用餐的时候，美国大使鲁博特姆敲门进来报告：“由于刚从华盛顿收到一则新闻报道，出现了一次新的危机。艾森豪威尔派遣了两个空降步兵连和两连海军陆战队去加勒比海地区。如果委内瑞拉政府提出了援助要求的话，他们将进入委内瑞拉，平息暴乱。”

原来当天下午发生骚动后，加拉加斯和华盛顿之间的通讯中断了一段时间，国务院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说当地的治安体制已彻底瓦解，反美暴徒如脱缰野马，尼克松正遭到袭击。艾森豪威尔于是作出了准备武装干涉的决定。委内瑞拉的电台则把这项决定看成是全面入侵的信号。

尼克松马上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份电报。美国政府随之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委内瑞拉当局已控制住局势，我们认为无需外界援助等等。

尼克松已再无兴趣访问，只想早日离开委内瑞拉。

经过这场骚乱和美国的武装威胁，委内瑞拉军政府成员总想对尼克松有所补偿，央求他参加为他举行的午宴后再走，并保证宴会一结束就把他安全送到机场。

尼克松觉得不好再拒绝，尽管对他们的安全保证不放心，但尼克松很快就明白担忧是不必要的。

临近午宴时间了，委内瑞拉军政府开来了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为尼克松的轿车前后保驾。轿车左右则是十二辆装满士兵的大卡车护卫。那阵势哪里是赴宴，完全是去打仗。

午宴结束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坐在尼克松身边，亲自陪同去机场。轿车里面，堆满了半自动枪、平枪、催泪霰弹筒等武器。前往机场的路上，除了武装巡逻的士兵外，空无一人。

机场也空无一人，当飞离加拉加斯时，尼克松暗自为活着回到美国感到庆幸。

这次事件，尼克松尽管受了惊吓，但他却因祸得福，政治声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1959年，正是美苏冷战的高峰时期。苏联的导弹不仅使西德、法国、英国感到害怕，即使美国，也为此感到恐惧。

这年的7月，尼克松将要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的开幕典礼。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对手，尼克松不敢掉以轻心，而且对这次访问作了前所未有的认真准备。为此，尼克松要国务院与中央情报局专门作苏联领导人的情况简介，尽可能熟悉可能会面的苏联领导人的背景。

对于苏联的第一号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尼克松没有见过。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后，尼克松曾称呼他为“布达佩斯的刽子手”。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眼里，赫鲁晓夫讲话文法混乱，穿着过时，风度不雅，而且酗酒，态度生硬，连给斯大林擦靴子都不配。

但尼克松认为他们的观察太肤浅了，他想起了一些西方记者叙述过的赫鲁晓夫在两次外交宴会上讲的故事。

赫鲁晓夫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次，一所监狱里关了几个人，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一个是卑贱的小个子犹太人——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名叫皮尼亚的小矮个儿。他们决定选出一个头头来分发食品、茶叶和烟草。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任何人掌权的，于是便轻蔑地提议选卑贱的皮尼亚当头头，大家照办了。不久，他们决定挖一条通到监狱院墙外面的地道，可以越狱。但是，他们知道狱警必定会向第一个逃跑的人开枪。所以，看来没有人愿带这个头。突然，那个卑贱的小个子犹太人皮尼亚挺直身子，说道：‘同志们，你们用民主程序选了我当你们的领导，因此我应该第一个去。’”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不管一个人出身多么低微，只要选到某个岗位上，他就会成为无愧于他的职位的人物。”讲完后，赫鲁晓夫又补充一句说：“那个小个子皮尼亚就是我。”

的确，赫鲁晓夫放过猪，打过工，出身卑微。做了苏联领导人后，举止粗鲁，而且常常发表轻率失当的声明，讲起话来无所顾忌，言过其实。因此，许多西方外交官看不起他。

然而，尼克松却不这样看。

如果说尼克松对南美的访问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那么，面临1960年的大选，访问苏联更是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的大好时机。此时尼克松的心里，还有一个不愿为人所知的秘密：竞选总统。因此，在访苏过程中，尼克松的政

治表演对选票有很大的影响。

涉及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时，尼克松是丝毫也不愿意马虎的。他向见过赫鲁晓夫或与他谈过话的为数不多的西方人士请教，问他们赫鲁晓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估计自己能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些什么。

这些人为尼克松分析赫鲁晓夫时说，他会注意你的一举一动，是否流露出好战的神气，他会抓住你身上任何示弱和姑息的迹象，来为他所用。这些人建议尼克松应该尽量不挑衅，使赫鲁晓夫思想上绝不怀疑我们是真心真意献身于和平的。

7月24日，也就是尼克松动身去莫斯科前两天，尼克松去沃尔特·里德医院拜望国务卿杜勒斯。

杜勒斯已是癌症晚期，说话有气无力，十分痛苦。尼克松到来的时候，杜勒斯裹着一件红色格子绒浴衣，佝偻着身子坐在轮椅上。

见他那么虚弱，尼克松心里有些不忍，但杜勒斯的外交天才，令尼克松十分佩服，出访苏联，不能不征询一下他的意思。

“要是想让赫鲁晓夫理解我们的意图，什么是最重要的？”尼克松问。

考虑了一会，杜勒斯打起精神回答道：“用不着去说服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善意，他知道我们并非侵略者，我们没有威胁苏联的安全。他了解我们。但需要让他知道我们也了解他。当他说他主张和平竞赛时，他确实是指他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之间的竞赛，但这只是在我们的世界内进行，不在他们的世界内进行。必须使他明白，他不能两者兼得。向他指出过去的记录，关于克里姆林宫在全世界的活动，我们有具体的证据。应该告诉他，除非停止此类活动，否则，他那缓和紧张局势与和平共处的呼吁，只能是一套骗人的空话。”

杜勒斯不愧是冷战的行家，也不愧是尼克松的知心朋友，两人的反共立场非常一致，他的这段话已注定尼克松的这番访问，不会是一场愉快的旅行，而是针锋相对的一场辩论。

尼克松动身去莫斯科时，对赫鲁晓夫可能提出有关美苏关系的问题，已准备了一百多个以上，可以随时就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7月22日，尼克松在友谊机场登上了艾森豪威尔的新的空军波音707喷气飞机，飞往莫斯科。

代表团成员、艾森豪威尔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称这次旅行是“希望、神秘、可怕”俱全。所谓希望，是因为这是美国副总统一级代表团对苏联的首次访问；神秘是他们对苏联的生活所知甚少，更不了解“铁幕”后面的领导人物；可怕是因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他的权势洋洋得意，毫不理睬西方关于裁军与缓和的建议，堂而皇之地继续大量储存导弹，建造潜水艇，进行核武器试验，说不准谈崩了他会毫无顾忌地利用火箭发动一场核战争。

尼克松心里也犯嘀咕，因为就在前几天，国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艾森豪威尔根据这个决议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美国人“研究受苏联统治的国家的困难境况，再次承担义务，支持那些被奴役国家的正当愿望。”

决议和声明的确不是时候，也是不恰当的，赫鲁晓夫自然会把它理解为蓄意的敌对行动。

一些新闻记者却对这次访问抱乐观的态度。《纽约时报》的记者就说，“帕特·尼克松的三英寸高的高跟鞋敲响过世界各地的大地，这次在苏联决

不会遇上任何困难。”

当尼克松的专机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时，尼克松立即就感受到了莫斯科的冷漠。

机场上没有欢迎的人群，也没有军乐，更不用说奏美、苏两国国歌了，只有美国与苏联的国旗在夏日的阳光下懒洋洋地飘扬。副总理弗洛尔·科兹洛夫表情严肃地宣读了冗长的欢迎词。一切都是冷淡而节制的，但却合乎礼仪，无可挑剔。

当天晚上，尼克松与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在大使官邸的一间保密室长谈。这是一间由美国特工人员日夜警卫，排除一切窃听装置的屋子，驻每一个国家的美国使馆都有。

汤普森告诉尼克松，在他抵达莫斯科的一个半小时之前，赫鲁晓夫才从波兰访问归来，发表了一篇猛烈谴责“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的讲话。机场的冷淡也许只是他们表示不满的第一个迹象。

尼克松明白，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已经不可避免。

第二天上午 10 时，尼克松来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举行第一次会谈。

尼克松进门的时候，赫鲁晓夫正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仔细端详苏联几个月前发射到月球的卫星模型。

得知尼克松来到办公室时，他才把模型放回原处，向尼克松走来，表示欢迎。

尼克松第一眼的印象，觉得赫鲁晓夫比人们所介绍的要稍矮一些，大腹便便，粗短的双腿，走起路来有些凌乱。

当赫鲁晓夫握住尼克松的手时，尼克松感到十分有力。圆圆的脸上，一双锐利的小眼睛扫来扫去，使人感到有些不自在。但他对尼克松的谈话十分亲切、和蔼，并称赞尼克松 1958 年 11 月 7 日在伦敦市政厅的演说。那篇演说的结尾，尼克松是这样说的：“我们应少谈共产主义的威胁，多谈给人们以自由；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击败共产主义而是让富足战胜匮乏，让健康战胜疾病以及让自由战胜暴政。”

赫鲁晓夫与尼克松闲聊一阵之后，挥手让记者与摄影师退出去。等赫鲁晓夫再度转过脸时，已布满了乌云，紧接着就是电闪雷鸣。

赫鲁晓夫对美国“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不时用拳头敲打着桌子，质问尼克松：“第二步是否就是战争？在此之前，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国会决不会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但目前的情况似乎表明，虽说参议员麦卡锡已经死去，但他的阴魂不散。为此，苏联不得不时刻准备着。”

尼克松向赫鲁晓夫竭力解释那个决议只是表达美国的看法，而不是号召采取行动。但尼克松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明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无力说服对方。

尼克松试图换一个问题，但没有成功。最后，尼克松说：“在白宫，每当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可是看来还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有一句话可以中断讨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我们都快把这匹马给鞭死了，让我们换一匹吧！’或许你我现在也该这么做了。”

译员翻译这句话时，赫鲁晓夫一直不动声色，但他仍然不肯罢休。

“我同意总统说的不要把一匹马打得太狠，但我还是不理解你们的国会干吗要在这么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种决议。这使我想起俄国农

民的一句谚语‘不要在茅房吃饭’。”说到这里，愤怒已使赫鲁晓夫的脸涨得通红，不由大声地嚷了几句。

尼克松猜出这几句一定是很粗鲁的话。赫鲁晓夫的译员奥列格·特鲁扬诺夫斯基的脸红了，有些尴尬地望了望懂俄语的美国大使汤普森，汤普森已咧着嘴笑起来。过了几秒钟，奥列格还是译出了这些话：“这个决议臭极了，就像刚拉下的马粪一样臭，没有比这更难闻的了。”

在译员翻译这几句话时，赫鲁晓夫的小眼睛紧紧地盯住尼克松。尼克松决定以牙还牙，揭他的老底。尼克松想起一个简介材料中说赫鲁晓夫小时放过猪，还想起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事情：大家都用马粪作肥料，但是有一次邻居用了一担猪粪，结果弄得臭气熏天。

尼克松也盯着赫鲁晓夫，以交谈的口气说：“恐怕主席先生搞错了，还有一种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译员把这句话翻译出来后，赫鲁晓夫刹那间怒不可遏，几乎要拍桌而起。但最后却控制住了自己，脸上堆下笑容：“这个你说对了，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换一个问题谈谈。不过，我必须警告你，你在这儿访问期间，还会听到关于这一决议的议论。”

接下来的讨论要轻松多了。尼克松仍然感到这次为访苏所作的空前的准备工作，实在算不上充分。因为赫鲁晓夫是一个根本无法预料的人物。礼节、礼仪和活动过程，他都不当一回事，随时可以改变。

下午，赫鲁晓夫陪同尼克松去美国展览会参观。他们见到的第一件展品是座电视台的模型。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问他们要不要试一下一种新式彩色电视录制装备，把他们互致问候的场面录下来，在整个展览会期间向所有的参观者播放。

尼克松还没有反应过来，赫鲁晓夫已登上讲台，对着摄影机，问尼克松：“美国建国多少年了？300年？”

尼克松不懂他要干什么，老实地回答：“180年。”

“哈哈，这么说，美国存在180年了，而这就是它达到的水平。”说着，他用手向整个展览厅挥了一大圈，“我们只不过建国42年，再过7年，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同等水平。”听众为他的话所鼓舞，纷纷鼓起掌来。他更兴奋地说：“当我们赶上你们，从你们身旁走过的时候，我们会向你们挥手的。”说完，他一边转过身来，一边挥手向想象中的美国告别。

尼克松没有料到赫鲁晓夫会如此精明地利用美国先进的电视技术装备为自己的宣传服务，而且语言生动，动作表情十分丰富。心头也暗自叹服。

赫鲁晓夫赢了第一回合，十分得意。他指着站在人群前面一个结实的俄国工人问尼克松：“难道这个人像奴隶劳工？有这样精神的人，我们会失败吗？”

尼克松不甘示弱，也指着一个美国工人说：“有像他这样的人，我们是强大的！但这些人，苏联人与美国人，可以一起为和平很好地工作，正像他们为建造这座展览馆而一起工作一样。如果你打算赶上我们的这场竞赛，要为我们两国人民和其它各国人民造福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自由交流思想。你不用害怕思想交流嘛，毕竟你也不是样样都懂嘛。”

赫鲁晓夫听出尼克松话中有话，怒吼道：“如果我不是样样都懂，那你对共产主义，除了害怕它之外，也一窍不通。”

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争论最激烈的一次是在一套厨房模型前，这里的对话

经记者的渲染后，成为全世界纷纷议论的一次厨房辩论。

辩论的场面极不调和，一个是表情激动的 65 岁的苏联首脑，一个是神情认真的 46 岁的美国副总统。

辩论的起因是讨论洗衣机的质量。赫鲁晓夫说一件洗衣机样品自然要比一般洗衣机的质量高。

尼克松说：“谈谈我们的洗衣机的相对优点岂不是比谈我们的火箭的相对威力更好？这难道不是你们所希望的那种竞赛吗？”

赫鲁晓夫很生气地用大姆指戳着尼克松的胸口嚷道：“是的，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竞赛。但是，你们的将军们说，非同我们比赛一下火箭不可嘛。他们说那些火箭可以摧毁我们。我们也可以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你们知道什么是俄罗斯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

尼克松觉得赫鲁晓夫是在虚声恫吓，便回击说：“我觉得，你们是强大的，我们也是强大的，谁都不应使用武力逼人太甚，让别人感到像是收到了最后通牒似的。”尼克松边说边用手指戳着赫鲁晓夫的胸膛来加重自己的语气，“在今天这个时代，讨论谁更强大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爆发战争，我们两国谁也当不了赢家。”尼克松停顿了一下，似乎是想看看赫鲁晓夫的反应。赫鲁晓夫莫测高深地笑了一下，让尼克松继续说下去。“我希望总理理解我们讲话的全部含义，若是把我们这两个强国中的任何一个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不听从摆布就得一战，舍此别无选择，那就是在玩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把戏。”

“这话听来就是威胁，”赫鲁晓夫嚷了起来，“我们也是巨人，你想威胁我们，我们将以威胁回答威胁。”

尼克松见赫鲁晓夫显出感情失去控制的样子。很冷静地回答：“我们在这方面决不会进行威胁。”

赫鲁晓夫继续指责道：“你刚才讲什么‘含义’，想用间接方法来威胁我。我们手上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我们的手段比你们的强。”

尼克松说：“我们很了解苏联的力量。但是，在核时代微小的差别无关紧要。”

争论到最后，赫鲁晓夫觉得再争论下去没有什么实际好处，便说：“我们想和一切国家和睦友好，尤其是和美国。”

在这场争论激烈进行的时候，尼克松注意到有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到把厨房同过道隔开的栏杆旁，聚精会神地听他们的争论。当赫鲁晓夫大声说“我们也是巨人”的时候，他使劲地点了点头。过后，尼克松才知道此人名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到 1972 年重新见面时，两人都已是超级大国的首脑了。

激烈的争论结束之后，赫鲁晓夫又变成了一个友好快活的主人，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尼克松夫妇及其代表团成员，还有美国大使汤普森夫妇。

席间，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频频祝酒，似乎厨房辩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痛饮伏特加之后，赫鲁晓夫要尼克松同他们一样，把美丽的水晶酒杯扔进壁炉，发出劈里啪啦一阵脆响。

第二天晚上，尼克松在美国大使馆设宴招待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其余官员。令尼克松夫妇大吃一惊的是他们都带着夫人。因为在尼克松的印象中，苏联政府官员的夫人是不参加这类正式外交活动的。但帕特心中却很感动，因为她在昨天的宴会上曾说了想会会各位夫人的话，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由于要增添座位，晚宴稍迟了一些。但气氛倒比较融洽，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为尼克松描述俄罗斯乡村的美丽风光。

尼克松正琢磨赫鲁晓夫说这些话的用意时，赫鲁晓夫突然建议尼克松夫妇去他的郊外别墅过夜，这样第二天就可以在那儿呆上一整天，同时，他将与尼克松在那儿举行列入日程的会谈。赫鲁晓夫随即与尼克松告别。

半小时后，尼克松一行已乘坐高级轿车飞驰在通向赫鲁晓夫夏季别墅的道路上。

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四周静悄悄的，大路上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其它的汽车。尼克松又一次想起赫鲁晓夫这个人。

赫鲁晓夫在个人关系中，无疑是十分豁达的，在使用和蔼与魅力作武器时，显得热情奔放。但在实质性问题寸步不让。政治家应该奉行铁的法则，个人关系好，未必能使国家关系改善。

汽车行驶了大约三四十公里后，穿过一片森林停住了。尼克松从沉思中抬起头来，前面灯火辉煌，别墅到了。

这座别墅，十月革命前是沙皇的避暑行宫，几乎和白宫一样大。十月革命后，成了斯大林的别墅，后来又到了赫鲁晓夫手里。

别墅的周围，是十分美丽的草坪和花园，一侧是一片森林，森林中有一条大理石铺就的台阶，直通莫斯科河畔。

赫鲁晓夫早已派人在别墅大门恭迎尼克松的到来。

第二天早晨，尼克松接到苏方通知，请他在访问结束前在苏联电视台向苏联人民讲演半小时。但赫鲁晓夫什么时候来与他会谈却不得而知。尼克松便利用这段时间来准备讲演稿，帕特则沿着莫斯科河岸缓坡边上的林间小径散步。

小鸟在林间歌唱，到处都开满了鲜花，晨风吹过，香气袭人，令人舒服极了。陪同她散步的舍伍德告诉帕特，树上和小树丛里都设有监听设备，这使帕特的游兴大减。

快中午的时候，赫鲁晓夫和夫人驱车而来。他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绣花衬衫，浑身充满着活力，热情地邀请尼克松夫妇在屋前照像，然后对尼克松说：“现在我们到莫斯科河上兜上一圈，你就可以看看奴隶们是怎样生活的。”

尼克松见他的眼中又闪过一丝不快，急忙以攻为守地答应道：“哦，是的，那些被奴役的。”

他们到达河边时，早有一艘豪华的游艇在等候着。当他们沿着蜿蜒的莫斯科河逆流而上时，赫鲁晓夫成了热情的导游，耐心地给他们讲述两岸的变迁。不熟悉内情的人，决不会想到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赫鲁晓夫。

天气很热，游艇不时被一批又一批的游泳者围住，他们向赫鲁晓夫欢呼，争着与尼克松握手，显得自信而又热情。

赫鲁晓夫瞟了尼克松一眼，问这些游泳者：“你们感到像是被奴役的人民吗？”

“不，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游泳者异口同声地回答。

最初，尼克松觉得很有趣，不久就发现这些都是布置好了的。便笑着问赫鲁晓夫：“你从不放过进行宣传的任何机会吗？”

“不，不，我没有宣传，我说的是实话。”赫鲁晓夫很平静他说。

在河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风，是该吃午饭的时候了。

午餐是在树林里进行的。一条长桌上摆满各式各样的俄罗斯美味和软硬

饮料。也许是因为饭后要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嗜酒的赫鲁晓夫对香气袭人的伏特加和葡萄酒仅仅浅尝了两口。仅仅这一点，尼克松就明白了赫鲁晓夫的暴躁脾气是受他的支配而不是支配他，酗酒也是为了掩饰而不会让酒妨碍正事。

午餐时的谈话愉快而轻松，赫鲁晓夫显示了他的幽默感。

在上第一道菜时，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同坐在赫鲁晓夫身边的帕特隔着桌子用英语交谈起来。赫鲁晓夫笑着打断了米高扬的话：“哈哈，你想扮演罗米欧么？可惜你年龄太大了，这个角色对你不合适。听着，你这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佬，尼克松夫人现在属于我了。你就老老实实地呆在你位子上。”说着，他用手指在帕特与米高扬之间的桌布上划了一条线：“这是一道铁幕，不许你跨过来。”

尼克松则与赫鲁晓夫的夫人愉快地交谈着。尼克松认为她不仅漂亮，而且热情、高雅，谈起古典音乐、芭蕾舞、法国与俄国文学来十分在行，这和赫鲁晓夫经常很粗鲁的举止形成鲜明对照。

第一道菜中有一种西伯利亚名菜，是用西伯利亚运来的冻白鱼制作的：切得很薄，蘸上了盐、胡椒和大蒜等调味品生吃。赫鲁晓夫要了大份，笑着劝尼克松也要了一大份。

“这是斯大林喜欢吃的菜，”赫鲁晓夫一边大口地吃，一边说，“他说吃这种鱼能使他脊梁骨更硬。”

当服务员收走盘子准备上第二道菜时，尼克松以为和赫鲁晓夫可以先行告退，以便进行严肃的会谈。但赫鲁晓夫却没有要走的意思，而是突然转变了话题。

赫鲁晓夫先是吹嘘苏联导弹的威力和精确度，举出有关这些导弹的投掷量和射程的统计数字，接着又压低声音，仿佛要告诉尼克松什么军事秘密似的：“导弹这玩意儿，意外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比如说，大约一两个月前，我们有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机件失灵，偏离了轨道，朝阿拉斯加飞去。当时我十分担忧，尽管这枚导弹没有核弹头，如果坠落到阿拉斯加，一定会引起一场‘大惊小怪’，幸好落在了海洋上。”

赫鲁晓夫随意而谈，好像是在拉家常。但尼克松知道他又是在恐吓，却不便反击。便问道：“既然苏联在导弹生产方面如此先进，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制造轰炸机呢？”

赫鲁晓夫答道：“我们差不多已经停止了轰炸机的生产，因为导弹的精确度高得多，而且不会受到人的失误或情绪影响。人往往会因为感情的突然变化而不能把炸弹投到预定的目标，对于导弹则不必担心会有这种情况。”

接着，赫鲁晓夫又说世界各国的海军太可怜了，除了潜艇以外，他们的军舰简直就是导弹的“呆靶子”，将来一旦发生战争，就只能为鲨鱼提供饲料。

赫鲁晓夫的谈兴上来了，似乎是信口开河，并不注意分寸。尼克松想多听听赫鲁晓夫说些什么，顺势问道：“那么你们打算造多少潜艇呢？”

“当然是能造多少就造多少。”赫鲁晓夫说。

米高扬迅速地瞥了他一眼，示意他说话要小心一些，并补充道：“主席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防卫需要多少就造多少。”

尼克松问到苏联发展水下发射导弹用的固体燃料情况时，赫鲁晓夫假装糊涂地说：“嗯，这是个技术问题，我说不上来。”

这时的气氛已有些紧张，帕特及时地插了进来，笑着对赫鲁晓夫说：“主席先生，我觉得很惊奇，居然也有你不知道的问题。我还以为政府由你一个人当家的情况下，你必须什么都知道，一切都牢牢掌握在你手里。”

米高扬替赫鲁晓夫解了围。“就是赫鲁晓夫主席也没有那么多手去做他必须做的一切，所以我们才在这里帮助他。”

尼克松认为应该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了，不然，他会把自己的礼貌看作是软弱。“主席先生，你夸耀你们的军事实力，这就使国际紧张局势无法得到缓和，也无法谈判持久的协议。”

赫鲁晓夫笑着点头，说：“好，我们少谈这些。但我只是说明这么一个事实，我们在火箭技术方面占有优势，导弹是无法防御的。你知道，英国正流行着一个悲观主义者与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笑话。悲观主义者说，只要六颗原子弹就能把英国消灭，乐观主义者说，得要九颗或十颗。”说完，赫鲁晓夫大笑起来。

尼克松改变了话题，说：“全世界之所以那么害怕战争，大部分原因是苏联领导人的好战讲话。我希望你不要以为你们在莫斯科召开 51 国共产党会议，我们连对这些代表来干什么以及得到了什么指示都会一点不知道。最近你就在波兰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宣布支持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

尼克松忘了，在全世界到处伸手干涉别国内政、以武力威胁直至入侵别国的正是美国政府自己。

“我们不赞成对个人搞恐怖行动，”赫鲁晓夫直言不讳地答道，“不过，我们支持其它国家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资产阶级不和平地交出政权，那么，也许就真的必须使用暴力了。”

“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被奴役的，应当去解放他们的罗？”尼克松问。

“‘被奴役’这个词太含糊，一点不‘科学’，倘若苏联支持一场真正的国内革命，那不算干涉内政。”赫鲁晓夫有些生气地说。

尼克松想起自己在委内瑞拉的狼狈境况，也有些生气地问：“苏联报纸和电台为什么公开赞扬委内瑞拉对我及我的夫人搞恐怖活动呢？这是否属实？苏联报纸曾对想把我们在哪儿干掉的案民表示同情。”

赫鲁晓夫怔了片刻，然后探过身子，用充满感情的声音说：“我们有这样一句谚语：‘你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亲’，所以，我愿意回答你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是那边义愤填膺的人民的目標。他们的行动并非针对你个人，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了的政策。”

“我同意你有权利发表你自己的看法和同情这些暴力行为，”尼克松说，“但我要指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苏联还要同这种革命舆论和同情搞在一起，那很可能有失去控制的严重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像艾森豪威尔和你这样坚强的人应该会晤的道理。但这种会谈必须在互证的基础上进行。主席先生，你是我所见过的代表你们观点的最有力的发言人之一。但你的发言只有一个命题：你说美国总是错的，苏联则从来没有不对过。和平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

赫鲁晓夫知道尼克松并无什么实权，也明白他是一个顽固的反苏反共分子，却没料到 he 敢顶撞自己，不禁有些发怒。但赫鲁晓夫明白在这个话题下再争论没有什么意义，便转而大谈柏林和德国问题。这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尼克松根本插不上嘴。

大概是气消了，赫鲁晓夫终于平静下来，尼克松想知道赫鲁晓夫的立场中有没有谈判的余地，便说：“假如坐在你对面的我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副总统，难道你的立场也那么僵硬，对总统的意见连听都不愿听？”

赫鲁晓夫已没有兴趣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只是简单地表示，不论是否举行首脑会议，他是决不会同意西柏林占领政权永久化的。他还语气不善地进一步暗示，如不按照他的条件去做，超级大国之间将发生对抗。

尼克松也毫不示弱地说：“主席先生，你不能指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参加首脑会议只是去在苏联的建议上签个字。”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不错，我也不能只是为了去对美国的建议表示同意而参加首脑会议，那样，我还不如去打野鸭子。”说到这里，赫鲁晓夫站起身来，表示午宴已经结束。

尼克松看看表，才发觉这顿午餐竟然耗去了5个小时！

离开苏联前夕，尼克松被允许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向苏联人民发表了一次讲话。

尼克松的演说稿是汤普森和苏联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讲授威廉·Y·埃利奥特帮忙起草的。他在讲话中说：

“我以为共处的概念是完全不合适而又消极的。共处意味着世界必须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在他们之间隔着一堵仇恨和恐惧之墙。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同的民族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这个世界里，一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能自由交往。……赫鲁晓夫主席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即我们孙子一辈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我表示，我们并不反对他说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我们只反对他力图促使它发生……我们更喜欢我们的制度。但我们这种信念最本质的东西是，我们现在不想，将来也不想把我们的制度强加于人。我们认为你们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有权利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最适宜于你们具体情况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当尼克松说谎的时候，脸是不会红的。

8月5日，尼克松夫妇一行回到了华盛顿。

通过这次访问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尼克松得出了自己对赫鲁晓夫的评价：

此人精力过人，坚信自己的原则，耐力极强。像一个体格强壮而缺乏技巧的拳击手，他牢牢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准备打击对方，也等着对方的打击，决没有丝毫懈怠。他左躲右闪，努力寻觅我防御中的弱点，以便猛击一拳，左右开弓，或者来个上勾拳——只要能得分，能使我放松警惕或者能使我中计以便把我打倒就行。第一招不灵，他就试用第二招，再不行，就用第三招、第四招。如果我把他逼到一个角落，他就会改变话题，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或者沿着场地的绳圈溜出来。他善于在拳击中争取主动，决不让我确定辩论的题目，而且常常把我提出的问题作对他有利的曲解。

这次苏联之行，尼克松的声望提高了。但赫鲁晓夫随后的访美，十分巧妙地对尼克松进行了反击，不仅抵消了尼克松因访苏而捞取的政治资本，而且让美国新闻界明白了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很不好相处。这个策略十分奏效。美国的报刊纷纷报道“赫鲁晓夫实在不喜欢尼克松”。国务卿赫脱的夫人克里斯琴·赫脱就对尼克松说，她的一些朋友曾说，他们可能投肯尼迪的票，因为肯尼迪能够同赫鲁晓夫“相处”，而尼克松却不能。

第七章 重操律师旧业

1960年，又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尼克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动，也更紧张。

这一年的竞选，根据美国1952年2月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关于总统只连任一届的规定，艾森豪威尔宣布不再竞选总统。

这是尼克松盼望已久的竞选，也是他第一次挑选别人来作他的竞选搭档，而不再是别人挑选他作搭档。

7月中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决定约翰·肯尼迪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则挑选了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作自己的搭档。

7月下旬，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则挑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犬伯特·洛哥为自己的竞选伙伴。

尼克松十分清楚这次竞选将是十分艰难的。肯尼迪家族的财富，估计有近4亿美元，美国北部自由派集团势力极大，加之约翰逊在美国南部有很大的影响力。自己在北部及南部处于绝对的劣势。共和党已经执政八年，内外政策上的失败将给民主党许多攻击的口实。同时，与虚弱的共和党不同，民主党人一贯能够咽下分歧的痛苦，在关键时刻团结在党所提名的人周围。

尼克松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主要有两个弱点：一个是表面上的，即他是天主教徒；另一个则是实质上的，即他缺乏经验。宗教问题在多方面起作用。但是，存在原教旨主义的反天主教偏见的地区，都集中在尼克松必胜无疑的几个州，即使在这些州，很多天主教徒必然投肯尼迪的票。

尼克松的最大本钱是现职副总统，协助艾森豪威尔处理过很多重要国事，经过加拉加斯事件与访苏之后，成为美国人民所熟悉的政治人物，有较多的经验。

凭借着经验，尼克松信心十足地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宣布：“今晚，我向你们宣布，并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到11月8日，我个人愿意把这场竞选运动开展到全国50个州的每一个州。”

8月17日，尼克松开始了他的竞选旅行，第一站是北卡罗来纳州。然而出师不利，尼克松在上车时不小心把膝盖碰伤了。最初他并不在意，但随后不久开始发炎，不能活动，被迫中断竞选演说，住了两周医院。

住医院是痛苦的，但让尼克松更为痛苦的是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竞选活动远远地落在了肯尼迪的后面。

出院后，尼克松就拼命地进行竞选旅行。仅仅两周时间，就走遍了25个州，行程25000公里。只要看一天的日程就知道是多么的紧张。第一天还刚刚见亮，尼克松就从巴尔的摩飞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席一个群众大会。又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飞往达拉斯，在车队簇拥下前往群众大会，再从达拉斯到旧金山出席在机场上举行的集会和闹市区的联合广场召开的大会。上床时已是凌晨两点了。

9月26日晚上，尼克松与肯尼迪进行第一次电视辩论，地点是芝加哥。

生病住院与紧张的竞选旅行，使尼克松的体重减轻了十磅，身体疲惫不堪。他的衣领显然大了一号，穿起来不那么合体，脸上黑中透青，给人一种十足的病态。

肯尼迪则显得十分精神，在辩论中采取明显的攻势。尼克松则以守为攻，对肯尼迪给以迎头痛击。但尼克松没有料到，艾森豪威尔的一次疏忽，竟让

民主党人抓住了，并对尼克松自诩经验丰富来了个釜底抽薪。

原来在一个月以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艾森豪威尔：尼克松作为副总统曾提出过哪些高见时，艾森豪威尔本来的意思是“请在下星期的记者招待会上来问我这个问题。”但艾森豪威尔却回答成，“如果你能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许想得出来。”

在电视辩论会上，肯尼迪的竞选顾问策划由新闻记者向尼克松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深深地刺了尼克松一下。几千万电视观众从中得到的暗示是：艾森豪威尔也不怎么热情支持尼克松当候选人。

第一次辩论，尼克松打了败仗。

第二次辩论于10月7日在华盛顿举行。

为了改变第一次辩论给人不好的外表印象，尼克松在头一两天就每日享受四顿营养丰富的牛奶和冰淇淋饮料，这样上电视就显得容光焕发。同时，尼克松还让化妆师化了妆。

这次辩论，尼克松也采取了翻肯尼迪老底的攻击办法。

1950年5月，苏军击落了一架入侵的美国U-2型间谍飞机，肯尼迪曾发表一项声明，建议艾森豪威尔应向赫鲁晓夫道歉。尼克松在辩论中说，美国总统决不因采取保卫美国安全的行动而向人道歉。同时，尼克松对肯尼迪反对援助盘踞在金门、马祖等近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的言论也进行了抨击。

这次辩论后，《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尼克松“显然赢了第二回合”。

第三次辩论在10月13日进行，肯尼迪在纽约电视台露面，尼克松则在洛杉矶电视台露面。

这次辩论会，尼克松自始至终采取攻势，揪住他与肯尼迪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的分歧不放。

尼克松还在做众议员时，就指责杜鲁门政府“丢掉了中国”。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凭借金门、马祖等前哨据点对我国大陆进行的种种骚扰和破坏活动，开始炮轰金门。为此，尼克松在波士顿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必须“保卫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和马祖，使之不受共产党中国的进犯”。这里“所牵涉到的不仅仅是金门和马祖，而是自由世界在整个亚洲的地位。”同时，“现在台湾海峡掀起的危机中，美国如果表现得像纸老虎，那将犯最大不过的错误。”

这次辩论，尼克松说“肯尼迪在战争威胁之下愿意把这些岛屿拱手送给共产党人，这等于在讹诈前面屈膝投降。”

尼克松之所以揪住这个问题不放，是因为美国政府在战后很注意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其势力范围，这也符合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如果肯尼迪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坚持与尼克松唱对台戏的立场，势必会失去很多选票。

肯尼迪知道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便让自己的高级外交顾问·打电话给国务卿赫脱，说肯尼迪不愿让共产党有美国不会团结一致对外的印象，因而打算修改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以表明他不是和政府唱对台戏。

尼克松则趁机攻击肯尼迪的态度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他在国家大事的处理上缺乏经验。

第二次、第三次辩论，尼克松都占了上风。10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四次辩论，颇有戏剧色彩。尼克松被迫角色反串，攻击起他自己的一向主张。

这场辩论是对外政策的辩论，核心是古巴问题。

1959年1月1日，费德尔·卡斯持罗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已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建立了人民的国家。对于卡斯持罗的政治态度，最初美国政府还不甚清楚。4月19日，尼克松在国会大厦总统办公室单独会见了卡斯持罗。

古巴的解放，使卡斯持罗成为影响整个拉丁美洲事态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因此，尼克松代表美国政府向卡斯持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妄图使古巴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

但是，古巴顶住了美国的压力，这次会见不欢而散。于是，尼克松与杜勒斯认为卡斯持罗是共产党，开始采取步骤对古巴的内政横加干涉。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组织和训练古巴的流亡人士以及雇佣军，企图推翻新生的古巴政府。但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尼克松是决策者之一。

这场辩论的头一天，报纸上就以大字标题渲染：“肯尼迪主张美国干预古巴，呼吁援助古巴叛军。”

其实，援助古巴逃亡者的计划早已绝密地执行。肯尼迪曾经收到中央情报局一份政府对古巴政策的简报，却不知道其中内幕。

尼克松也预料到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但是，为了保护成千上万名执行这一计划人的安全，尼克松又不能透露政府已经这么做了，只能采取与肯尼迪相反的立场。攻击肯尼迪主张公开干涉古巴。

尼克松言不由衷的表演，使拥护他的人感到震惊和失望，却得到所有不明真相和不应支持他的人的支持。这场辩论，肯尼迪以对付卡斯持罗和共产主义比尼克松更强硬而获得更多的支持。

四场辩论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尼克松与肯尼迪之比为百分之四十九对百分之五十一，略微落后。

最后两个星期，尼克松更是拼命地冲刺，还增加了电视谈话的时间，谈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并接触尽可能多的选民。在这关键的时刻，尼克松的竞选经费快要用完，只买得起一次长时间的电视广播节目时间。

肯尼迪家族的巨富使肯尼迪在竞选中花起钱来毫无后顾之忧，他也不必像尼克松那样奔波劳累。

竞选活动结束的时候，尼克松已经遍访50州，行程104000公里，作了180次演讲，发表了无数次即席谈话，该做的都做了。

即使是夫人帕特，在大选日前三天也度日如年，在72小时中总共睡了几个钟头。

投票结束后，就只等结果了。帕特带着两个女儿去做头发，尼克松则像囚徒等待判决一般，苦熬漫长的下午。因为投票结果要等到下午6点左右东部投票站关门之后才知道。

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尼克松带着警卫舍伍德和洛杉矶警察局的司机沿着太平洋海岸公路驱车南行，以此来打发时间。

当天晚上，尼克松一家都没睡觉，焦急地等待选举结果。

美国东部时间凌晨两点，选举的最后结果出来了。肯尼迪得票三千四百二十二万一千张，尼克松得票三千四百一十一万八千张。肯尼迪仅以十一万三千张票数领先，这也是自1888年哈里森—克利夫兰竞选总统以来双方得票最为接近的一次。

尼克松呆呆地坐在房间里，大女儿特里西娅与帕特忍不住哭了。尼克松也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早上，传闻芝加哥与得克萨斯发生了大规模舞弊事件。尼克松的

顾问认为事情有了转机，建议尼克松不要发表认输的声明，而要申请重新计票。

听到这个消息，尼克松静静地思考了好几分钟。

重新计算选票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这期间，肯尼迪当选的合法性便成了问题。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便会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于美国的对外关系将起破坏性的影响。倘若重新计票的结果仍是肯尼迪获胜，自己以后就别想再在政界混了，政治生命就彻底完蛋。考虑到这些，尼克松决定向肯尼迪发出承认竞选失败的电报。

1961年1月6日，副总统兼参议院主席理查德·尼克松主持了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正式为选票记数。自1861年的约翰·C·布里金列奇副总统宣布自己落选以来，一百年刚刚过去，尼克松成为第二个宣布自己落选的副总统，不禁十分伤感。1月20日，是尼克松14年政治生涯的结束日，他将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而已。

中午12时半，肯尼迪的总统就职典礼结束后，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离开了白宫。

尼克松实在是不甘心，当天晚上，他一个人又独自来到白宫，走上了俯视国会西边草坪的阳台。

天上没有月亮，灰蒙蒙的天空，缀着繁星点点。星光下，华盛顿纪念碑轮廓分明，远处的林肯纪念堂灯光闪烁，映照着山丘上的皑皑白雪。泪水无声地挂满了尼克松的双颊。

14年前，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众议员来到这里。为了做这里的主人，多少心计多少汗水都付之东流了么？

不，我还要回到这里！

当尼克松走出白宫的时候，心里已暗自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尼克松携夫人飞往巴哈马群岛的伊留特拉岛去轻松几天。但这次竞选失败的阴影还缠绕着他。他不能不仔细地思考失败的原因。

尼克松与新闻界的关系一向不怎么融洽，这是他致命的弱点。

不论在哪个社会，作为舆论工具的电视、报纸，对社会公众都有极大的影响力量。正是舆论工具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在竞选活动中可以听到什么和看到什么。肯尼迪以各种手段让众多的记者为他的竞选服务。从肯尼迪开始全力投入选举之日起直到选举日前夕，就有四、五十名全国性记者始终跟随在肯尼迪左右。到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周，他们已不再是一般的记者团了，而成了肯尼迪的朋友和崇拜者。每当通宵达旦乘坐竞选汽车或搭机彻夜飞行时，他们便哼起自己编写的挖苦尼克松和共和党的歌曲，和肯尼迪的竞选班子一起组成合唱队。确实，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所达到的惊人程度，是美国新闻史上最可耻的篇章之一。

尽管尼克松是个玩政治的行家，竞选组织效率也很高，忠心耿耿、财力雄厚，手段也很多。但与肯尼迪的竞选班子比起来，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除了尼克松所拥有的以外，最重要的是有无限的财源，上亿的美金铺就了肯尼迪通向白宫之路。

肯尼迪竞选班子有一批最无情的政治活动家，为了达到目的，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多少政客都甘拜下风，尼克松只有自叹弗如了。

总之，肯尼迪一家的权力、金钱和他们操纵的新闻工具，让尼克松吃了苦头。尼克松暗暗发誓：今后如果在政治权术上还比不过他们或别的什么

人，就决不再参加竞选。

从巴哈马群岛回到华盛顿不久，尼克松觉得为了帕特和女儿们，决定找个收入不错的工作，当然，还得与政治沾得上边。

当洛杉矶的亚当斯—杜基—黑兹尔坦律师事务所来信邀请尼克松入伙的时候，尼克松把家眷留在了华盛顿，自己独自一人去洛杉矶，重操律师旧业。

从副总统的高位一下猛跌到一般律师的地位，反差毕竟太大了，尼克松一时有些适应不了。觉得所做的每一件事，如跟以前相比，都是索然无味和无足轻重的。但随着时间的消逝，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现实，逐渐适应现实。

但在他的骨子里，仍然时时刻刻关注着国内外的政治大事，而且想方设法当上了共和党名义上的领袖。总之，不能从公开的政治视野中消逝。

尼克松登台表演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961年4月15日，古巴流亡分子在美国空军的掩护下，入侵古巴，登陆地点是在猪湾。在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下，入侵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美国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最初，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完全否认美国与这次入侵有何牵连，后来因为证据确凿，美国政府无法抵赖，肯尼迪不得不承认美国发动了这场入侵。

美国的国际信誉在这场入侵中遭到了双重打击。尼克松律师又活跃起来，他在共和党内积极地活动，又在国会大厦与共和党的领袖们进行商谈，认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事关垄断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不能再坚持党派偏见，而应该一致支持肯尼迪。

4月20日下午，尼克松应邀来到白宫总统办公室。

尼克松坐在靠壁炉的小沙发椅上后，肯尼迪才说：“我已跟古巴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开了次会。与会者之中的有些人在这次行动中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兄弟和朋友。看到他们悲惨的表情，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了。”

入侵古巴的计划还在尼克松当副总统时就作出了决定。尼克松心里责怪肯尼迪把事情搞砸了，但此时却不好说什么，只问了一下这些流亡分子的士气。

肯尼迪说：“昨晚，他们对我们可真恼火极啦。但今天他们已平静多了。信不信由你，我们只要说一句话，支持他们，他们还会准备再去打一仗的。”

说到这里，肯尼迪破口大骂起来：“我查问过那些婊子养的——所有那些军事专家和中央情报局人员——都向我保证，计划一定会成功。”

发泄一通之后，肯尼迪望着尼克松问道：“现在你认为应该在古巴干点什么？”

尼克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干它一场。我们有好几种借口可用：为保护居住在古巴的美国公民，护卫我们在关塔那摩的基地。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卡斯特罗和共产主义撵出古巴。”

肯尼迪显然不愿冒同苏联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摇着头否决了尼克松的这个好战建议。

尼克松又进一步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他说：“我是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古巴的。赫鲁晓夫将在同一时间里在好几个地方进行试探。只要我们一示弱，他就会制造一次危机来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应该同时在古巴和老挝采取一些行动，包括必要时使用美国的空军。”

肯尼迪对尼克松的冒险想法不敢赞同，他要尼克松来的目的不过是表示

他对尼克松很看重，安抚一下尼克松政治上失意的不快心情，避免尼克松再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抨击。

其实，尼克松并不是要存心与肯尼迪过不去，他真正担心是人们把他当作一般律师看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淡忘他。如果这样，他东山再起的计划岂不要落空？

5月5日，尼克松飞往芝加哥为经理人员俱乐部作了一次讲演，这次讲演，再次显示了尼克松反共、好斗和冒险的一贯风格。

他说：“我最大的顾虑是，肯尼迪在古巴碰了钉子后，可能会打不起精神来对付老挝、越南或柏林等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了。所以，我们在古巴失败的最坏后果，不是那使许多观察家纠缠不休的威信暂时低落的问题，而是这次失败可能使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因怕再冒失败的风险，不敢在将来采取果断的措施。那么，我们应该从入侵古巴中学到什么教训呢？至少有一条，就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大规模地牵涉到美国的威信，我们就必须心甘情愿地投入足够的力量，使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即使我们所有的情报估计都证明错的也在所不计，直话直说，除非我们准备把事情办到底，否则我们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开头办任何事。”

这次演说，尼克松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他成了美国重新瞩目的对象，成为一个“忠诚的反对党”的领袖。平民生活在他心中投下的阴影一扫而光，阳光又洒满了他的心间。

也许是上天注定，尼克松不可能过平静的平民生活。1962年又是一个选举年，尼克松的很多朋友以及支持他的垄断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都劝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

艾森豪威尔极力主张尼克松1962年竞选州长，1964年才好再度竞选总统。艾森豪威尔特地邀请尼克松去作了一次长谈。

艾森豪威尔给尼克松分析了利害关系，很诚恳地说：“我的经验是，当一个人受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委托，要他承担一项工作时，他一定得干，否则就会冒日后失去他们支持的风险。假若你不参加竞选，而那个共和党候选人又落选了，你将为受到责备，你作为全国政治领袖的前途也就此完蛋。”

尼克松在是否竞选州长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因为肯尼迪政府必然会全力反对，不能让尼克松当上州长而获得新的政治生命，从而在1964年大选时重新与肯尼迪争夺总统宝座。同时，尼克松觉得如果竞选州长的话，即使成功，对竞选总统都不会有多大的实质意义。因为加利福尼亚的问题十分复杂，又跟全国和国际的新闻通讯中心在地域上相隔十分遥远，尼克松的全部精力都只能放在加利福尼亚州，在国内外问题上，很难继续发表什么建设性意见。那么，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尼克松的声望与政治地位都会下降，对竞选总统极为不利。

对于尼克松在州长竞选上的摇摆不定，共和党全国领袖莱恩霍尔很着急，很快从华盛顿赶到洛杉矶，直言不讳地对尼克松说：“要嘛你参加竞选，要嘛你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完蛋了事。在1962年你将看到，洛克菲勒在纽约州竞选，另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还有一个在密执安州。谁还会记得你迪克·尼克松呢？只有你现在竞选州长成功，你才能在1964年获胜。”

尼克松的心被说动了。但是尼克松夫人帕特对他参加州长竞选却表示坚决反对。

许多女人为了想当名流，出人头地，愿意付出她们所有的代价。这么多年来，帕特跟随尼克松经历了太多的荣辱毁誉。她既要满足丈夫担任全国性公职的要求，同时又想要两个女儿有一个正常而又温馨的家。然而熊掌与鱼不可兼得。

对于竞选州长，帕特直觉地感到，从表面上看，从民意测验来看，尼克松能够击败现任州长帕特·布朗。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登记表明，赞成民主党人的人要多一倍，而且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内部派系斗争尖锐，尼克松虽有可能获得党内提名，却决不可能获得本党的全部选票。

尼克松打算参加竞选的决定，只得到小女儿朱莉的支持。帕特与大女儿特里西娅则表示反对。

本来就处于摇摆不定的尼克松遭到夫人的反对后，心情沉重地回到楼上书屋里去默默思过。当他准备写宣布不参加竞选的声明时，帕特走了进来，坐在台灯照不到的墙角沙发上。

十几年的夫妻了，帕特十分明白丈夫离不开政治舞台，政治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她宁愿牺牲自己来随从丈夫。

“迪克，我又思考了一阵，我比以往更加相信，你如果参加这次竞选，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帕特竭力控制自己失望的情绪，很平静他说，“但是，假如你权衡了一切而仍决定参加，我将支持你的决定。我会一如既往地和你一起参加竞选活动。”

尼克松指着书桌上的纸簿说：“我正在起草宣布我不参加竞选的提纲呢。”

“不！”帕特坚定他说，“你该按照你认为正确的去做。如果你认为你这样做是正确的，那末你一定要这么干。”

尼克松心里有些激动，静坐在书桌旁，一动也不动。帕特到丈夫的身边，把手轻轻地搭在他肩上，默默地吻了丈夫的脸颊，然后走了出去。

1961年9月27日，尼克松在洛杉矶希尔顿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将不当1964年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而将参加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

然而，很多人都不相信尼克松不再于1964年竞选总统，大多赞同观任州长帕特·布朗说“尼克松只把这个州的州职务看作是实现当总统宏愿的垫脚石”的观点。

尼克松的竞选总部设在洛杉矶威尔希大街上。竞选组织的许多成员如竞选运动经理鲍勃·霍尔德曼、财务主任莫里斯·斯坦斯、新闻秘书赫布·克莱因、工作人员乔蒂纳、鲍勃·芬奇、约翰·埃里希曼等，日后都成了尼克松政府的重要人物，在这次竞选中也十分卖力，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竞选经验。

1962年6月5日的初选，尼克松的得票领先于布朗。由于共和党内的派系斗争，以及许多选民十分怀疑尼克松出任州长的真实意图，尽管尼克松在竞选期间反复声明自己并不把出任州长看作是竞选总统的垫脚石，最终结果仍然是不妙的。到了12月，民意测验显示布朗已稍微领先，尼克松准备再作最后的努力。

不巧的是，这个时候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10月22日晚，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电视演说中宣称：苏联已把中程核导弹运进了古巴。并宣布美国海军立即封锁古巴，对苏联进出古巴的船只强行检查。要求苏联立即拆除并撤走导弹。可以说，美国当时已处于核战争的边缘！

在选举来临前的几天，古巴导弹危机的新闻报道压倒了其它一切新闻，尼克松最后的努力付之东流。即使在选举的时候，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使用极为卑鄙的手段来减少布朗的投票人数也没有作用。

这件事尼克松事后是知道的，但他也会装糊涂，只要能斗倒布朗，有什么手段不可以？事情是这样的：布朗的竞选班子为了方便通知人们进行闪电式的投票，特别安装了几十部电话机。

一天晚上，布朗的竞选班子打算用电话通知数千名已经登记的民主党人前去投票，默里·乔蒂纳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破坏他们的这个计划。想方设法地从一电话公司的职员那里寻到了布朗的全部电话号码和技术操作说明。那时候，如果有人拨一个电话号码之后不把话筒挂上，那么，被拨通号码的那台对方电话就别想再往外打电话了。

尼克松所信任的人便拿着一卷卷五分或一角的硬币疯狂地开着车到一个个公用电话间，塞进硬币，拨通布朗人员所有的电话号码。当布朗的竞选工作人员拿起话筒说话时，那个拨电话号码的人立即就把话筒悬挂在公用电话间，然后又飞速地跳进汽车来到另一个电话间。

但这一切，都不能挽回尼克松的失败。

在选举的那天，尼克松情绪很不好。上午很早就离家到了希尔顿饭店。他明白，竞选州长的失败也许意味着他将从社会公众生活中消失。他很坚强，但这样巨大的打击他也难以承受，精神几乎崩溃。

一醉解千愁，尼克松开始喝酒，他等不到投票的最后结果就醉倒了。许多等候采访尼克松的记者被他的竞选班子挡在门外。

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过，尼克松才醒来，知道自己以十九万七千票之差败于布朗。

赫布·克莱因为了转移记者们的视线，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读尼克松承认失败的声明。

记者们却坚持要与尼克松见面，克莱因没有办法，只得来请示尼克松。

长期郁闷在尼克松心头的愤怒、沮丧、失望和疲劳一涌而出，不禁破口大骂：“操他妈的，我不见他们，我没有必要去见他们，我就是不见。赫布，你把我对布朗表示认输的发言给他们读一遍。假若他们想知道我在哪儿，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已回家，和家里人在一起。”

赫布·克莱因走出去之后，霍尔德曼立即吩咐集合几辆汽车从旁门把尼克松接出饭店。

然而，当霍尔德曼等几个人簇拥着尼克松经过大厅快步走向汽车时，尼克松向那间敞着大门的新闻发布室瞥了一眼，看到了克莱因、新闻记者和挨挨挤挤的电视摄影机。

尼克松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家，他要对这些讨厌的记者发泄自己的不满。霍尔德曼等人还没反应过来，尼克松突然转身跨进了新闻发布室，登上了讲台。

克莱因正要说话，忽然看到了尼克松，不由一愣，很快恢复了常态。当尼克松接过话筒时，克莱因向观众介绍了几句。

尼克松耷拉着脑袋，全身颤抖，双眼通红，但他的话却和过去一样有力：

“早安，各位先生。既然克莱因先生已发表过了声明，既然报界所有人士又都因为我失败了而兴高采烈，那么我就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吧！”尼克松发现记者们对他的语调中露出的愤怒感到有些吃惊，互相交换着眼色。

尼克松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讲下去：

“我注意到你们之中有几位看来有点恼火，请稍安勿躁。我对报界的观感从未真正尽情吐露过，现在，我想畅谈一下。恐怕不能说今后任何一个美国政界人物会有这种态度。在我16年的竞选岁月里，从来没有为了一个记者的报道，向发行人、编辑抱怨过。我认为，记者有权写他想写的东西。假若一个记者认为某人该胜而另一人不该胜，不管在电视上也行，在电台或其它地方也行，他应该这样说。我要对记者们说，我希望你们应该像你们审查我那样，也详详细细地审查审查我的对手。在我向报界告别之时，我所能讲的是，自希斯案件以来的16年中，你们也够高兴了，因为你们一直有机会攻击我。我想，我被你们攻击得够呛，但我也没少骂你们。我现在就要和各位先生分手了。你们可以去写，你们也可以任意解释。那是你们的权利。”

说到这里，尼克松更加激昂，通红的眼睛里透出对记者的轻蔑。“你们再也不能提弄、逗耍尼克松了。因为，各位先生，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这将是我有幸得到机会能与各位斗斗智的一次招待会。我始终是尊重各位的。我有时跟各位意见相左，但我和某些人不同，我从不停止订阅一份报纸，我今后也决不会这样做。”

尼克松最后说：“我深信了解我的对手在讲些什么是很必要的。我希望今天所讲的话，至少会叫电视台、电台和报界首先认识到，他们负有报道所有新闻的重大责任；其次认识到，他们既有权利也负有责任当他们反对一个候选人时，他们可以跟这位候选人过不去，但也需认识到，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至少总还得单独派个记者跟随竞选运动，以便报道那个候选人随时随他讲了些什么话，才对。”

尼克松讲完话后即拂袖而去。

记者们没有想到尼克松竟敢如此地奚落他们，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哑口无言。就连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也大为震惊：难道尼克松真的不想在政界混了么。

尼克松回到家里时，两个女儿双眼含泪，站在门廊里迎接父亲。帕特只说了声“喔，迪克”，就语不成声，两行情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尼克松见妻子与女儿这样，内心更是痛苦。他神色惨然地拨开众人，一语不发地独自跑回后院。而帕特也忍不住跑回屋里，趴在床上痛哭了一场。

第二天，报纸开始刊登对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评论。几乎所有报界人士都认为这场所谓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尼克松政治上的一次大失败，包括他的竞选班子的大部分成员也持这种看法。

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在文章里说，“这是尼克松最后一次的大喊大叫。……尼克松作了一场持续十五分钟的、漫无节制、语无伦次的终幕独白，恐怕这在美国政治史上还是举世无双的。他不顾一切地乱说一阵，叫他手下的人都看得发了呆。”

11月16日《时代周刊》则干脆宣称：“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他（尼克松）的政治事业已于上周告终。”

选举结束后的第五天，美国广播公司主办了一场称之为“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的特别节目。主持人霍华德·K·史密斯十分尖刻他说：“提到理查德·尼克松时，大家一再使用过去式，似乎都忘了，这不过是政治讣告，而不是他这个人的讣告。”

这次失败，帕特与两个女儿感到加利福尼亚再没有使人感兴趣的东西，

只会引起她们痛苦而又屈辱的回忆。

1963年夏天，尼克松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离开洛杉矶，移居纽约，加盟华尔街的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并改组为尼克松—马奇—罗斯—格思里—亚历山大事务所。

纽约是尼克松的主要政治敌手纳尔逊·洛克菲勒掌握全部政治权力的州。移居纽约，至少表明尼克松已完全放弃在1964年竞选总统的任何念头。就连帕特也深切地感到，丈夫是要永远离开政治舞台了。

由于尼克松的政治名望，尼克松—马奇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十分兴旺。

随着1964年的大选临近，尼克松又接到全国各地许多朋友的来信，要求他参加总统竞选。

竞选州长的失败，让尼克松冷静了许多，他经过深入的分析，觉得这次竞选，肯尼迪是不可战胜的，如果自己贸然去参加竞选，无疑会再次失败，那时就真正永远翻不了身。自己的唯一上策是韬光养晦，拉拢人心，待时而动。

尼克松的律师事务所恰巧在洛克菲勒的楼下。9月3日下午，尼克松应洛克菲勒之邀去参加鸡尾酒会。

鸡尾酒会不过是个幌子，洛克菲勒是要求尼克松支持他当总统候选人，并提出了政治交易的条件：如果尼克松现在支持他，那末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出现僵局时，洛克菲勒就支持尼克松当总统候选人。

尼克松对洛克菲勒提出的交易未置可否，但强调自己将支持得到提名的人，而自己不参加竞选。

此后不久的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视察时，被一个自称是“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主席”，名叫奥斯瓦德的美国青年刺杀。当时尼克松因为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关系，刚从达拉斯飞回纽约。肯尼迪的遇刺，令他非常震惊。当天晚上，他就给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去信表示哀悼。

肯尼迪死后，约翰逊继任总统。成为196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而共和党内的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密执安州州长乔治·罗姆尼都先后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失败。而巴里·戈德华特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尼克松为了弥合共和党内的分裂，更为了自己的东山再起而创造条件，在戈德华特发表其接受提名演说之前作了一次讲演。

尼克松十分成功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政治上半死不活，共和党内各派别都不对他设防。他只是一个纽约律师和高级政治家而已。

尼克松不顾得罪党内任何一派，他的讲演既十分得体，又八面玲珑，在政治上为自己赢了一分。

尼克松在讲演中说：“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我们有些是戈德华特派的共和党人，洛克菲勒派的共和党人，斯克兰顿派的共和党人，洛奇派的共和党人。现在，大会召开了，决定已经作出，我们就都是努力争取巴里·戈德华特当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了……”

尼克松的讲演取得了党内各派系皆大改善的预定效果。当他讲完话后，人们长时间地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天夜里，尼克松很激动，他的一些老部下如霍尔德曼、鲍勃·芬奇、埃利希曼等都来和尼克松一起聊天，缅怀往事，祝贺他又要东山再起。

夜已根深了，但尼克松却开怀畅饮，醉眼朦胧中，在座的一位年轻漂亮

的姑娘令他心猿意马，禁不住做出一些十分轻佻的动作。

部下们知道他醉了，却怕惹他生气，不敢替姑娘解围，最终还是姑娘自己挣脱了尼克松的搂抱，羞愧地离开了。

酒醒后，尼克松也很后悔自己的失态。他知道，酗酒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将使自己丢掉重返政治舞台的任何机会。此后，在饮酒的时候，尼克松便十分克制，再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次演说之后，尼克松整整花去五个星期去为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以及共和党内其他一些参议员与众议员候选人的竞选游说。

这次竞选的游说活动，尼克松在 36 个州露面 150 次以上。尽管很辛苦，但尼克松却因为自己无竞选风险而感到轻松。

11 月 4 日是选举日的第二天，尼克松很早起身去检查众议院与参议院竞选的最后结果。令尼克松不安的是，共和党在众议院丧失三十七席，参议院丧失二席，各州议会丧失了五百席以上。不用说，约翰逊以压倒优势击败了戈德华特，继任总统。

除了约翰逊之外，尼克松在这次竞选中也是一个大赢家，他成功地在全国又树立起个人的信誉，在共和党内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为通向总统宝座铺下坚固的基石。

第八章 东山再起

1964年的竞选，共和党遭到空前的失败，党内极度混乱，分崩离析。一股悲观的情绪笼罩着共和党人。

尼克松律师却从中看到了希望。

1965年1月9日，是尼克松的52岁生日。

回顾自己的两次失败，给自己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但真正的痛苦并不在于失败本身，而是离开政治生活。虽然尼克松曾一度想彻底退出政界，但他最终认识到，除了政治生活以外，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类型的生活。

如果脱离政治生活，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律师，用不了多久，至多两年，尼克松将在精神上死去，继而肉体也将消亡。

52岁了，能干什么呢？

尼克松想起了温斯顿·邱吉尔。

1929年，温斯顿·邱吉尔55岁，失去了下议院领袖职位，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当时已把他一笔勾销，不把他当作是一个政治领导人物了。但邱吉尔没有勾销自己。十几年后，邱吉尔卷土重来，成为英国首相，成功地抵抗了希特勒的侵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也就在这一天，尼克松写下了他的“1965年的新年决心”：

1. 制订出宏大的目标。
2. 制订每天的休息时间。
3. 要有短暂的假期。
4. 了解自己的一切弱点。
5. 更好地利用时间。
6. 开始写书。
7. 每天打打高尔夫球或进行别种日常锻炼。
8. 就带有挑战性的国内外问题写文章和发表演说。

制订好应当遵守的原则后，尼克松陷入了沉思。

要想再度竞选总统，应从哪儿着手呢？

尼克松觉得最重要的莫过于把共和党重新团结起来，争取1966年中期选举的胜利。在共和党重新取得胜利之前，企图搞任何总统竞选的活动都是极不明智的。

尼克松认为：在组织得到恢复，使提名的人感到提名确值一试之前，自己作任何承诺都是愚蠢的。但假如自己有意于竞选，而不开始订出计划，又不利用在1964年竞选中所建立的信誉，那也是同样愚蠢的。

但是，要想把分崩离析的共和党团结起来，首先要防止党内左翼或右翼的领袖接管全党，其次要鼓起全体党员的信心，让他们觉得还很有前程。无论是谁来干这项工作，谁就会在1968年的总统提名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那时共和党内几乎没有人想得这么深，这么远。即使想到了，也不敢来搞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尼克松当仁不让地负起了这个责任，而且打算在竞选中尽力帮助共和党候选人，即使是自己的政敌洛克菲勒、罗姆尼和里根。在尼克松看来，他们的胜利将使共和党的基础得到扩大，自己也有机会从共和党的强大中受益无穷。

为了使重新问鼎白宫得到成功，尼克松详细、深入地分析了自己1968

年争取提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最主要的不利因素有三个：

其一，两度竞选失败，以及那场“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全国公众面前，尼克松不仅是一个输家，而且还是一个输不起的人。

其二，尼克松没有担任政府的任何公职，仅仅是一个律师，缺乏竞选必须的政治基金。尽管尼克松《六次危机》一书可以获得可观的版税，但对于庞大的竞选经费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其三，没有政治基地。纽约是洛克菲勒的地盘，尼克松在纽约的共和党圈子里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的根基在加利福尼亚，但如今在加利福尼亚，已没有共和党的机器为他工作。

有利的因素其实不多：

其一，尼克松多年来在共和党园地里的苦心经营，并将继续经营，大多数共和党基层组织对他抱有好感。

其二，无论报界是否喜欢尼克松，但尼克松本人极具新闻价值，只要他一举行记者招待会，听众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而尼克松旅行所到之处，当地电视台总要对他的讲话和露面进行报道。这在无形之中扩大了尼克松的影响。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尼克松对自己的坚强信念以及丰富的政治经验。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尼克松决定踏踏实实地好好干。从1965年初到1966年竞选开始的这段时间，尼克松一边当律师，一边在全国各地为共和党候选人摇旗呐喊，发表演说。总计行程20余万公里，到过40个州，向四百多批人讲过话，还为共和党筹集了4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

到1966年秋天竞选开始时，尼克松的讲演日程安排得更为紧张。为此，尼克松想法筹到一笔款子，包租了一架飞机，在各地穿梭访问。

当时，约翰逊政府由于国内外矛盾的尖锐而日益不得人心，尤其是越南战争，激起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尼克松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抨击约翰逊内外政策的机会。

约翰逊担任总统后，冥思苦想地寻找一个新奇的政治口号来团结人民，作为奋斗目标，他觉得英国政治思想家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著《伟大的社会》书名很有新意，便使用它来作为施政的口号。1964年5月22日，约翰逊总统在对密执安州大学的毕业班学生讲演时说：“在你们的时代里，我们不仅有机会走向富裕的社会和强大的社会，还能攀登‘伟大的社会’的高峰。”其后，约翰逊对这个计划作了充实和具体化。主要是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增加就业机会、社会保险和救济，增加教育、卫生投资，开发落后地区。

这个计划使比较多的穷人得到了社会救济，失业率也有所下降。

但是，“伟大的社会”计划许多都是空喊口号，向选民作了许多事实上做不到的许诺。在尼克松看来，“伟大的社会”让约翰逊跌进了无法自拔的陷阱，“它没有鼓励人们靠努力工作去实现这些目标，恰恰相反，当人们由于没有作出努力而未能马上实现目标时，他们倒显得既不耐烦，又怨气冲天。”

同时，约翰逊政府又扩大侵越战争，引起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青年人不愿到越南当炮灰，纷纷逃避兵役，黑人受歧视，生活贫困，仍处于社会最底层。因此，工人运动、反战运动、黑人运动此起彼

伏，约翰逊政府穷于应付。

所有这些，给了尼克松很好的攻击口实。

对于越南战争，尼克松与肯尼迪的分歧不在于该不该打，而在于该如何打的问题。

尼克松认为约翰逊政府执行的是“最缓慢地把空中和地面战争逐步升级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结果是“让共产党确信，美国缺乏在越南取胜的意志，并且可以通过向我们国内战线和我们在世界上的盟邦进行宣传的办法，把美国拖垮。”

尼克松不满意约翰逊在越南战争中束手束脚，不敢放开大干，认为应该扩大海军和空军的轰炸，“把战争打到北越去”，即使冒把红色中国卷进来的风险，也要使用海空力量封闭来自老挝和北越外界的干涉。

尼克松在一次讲演中就说：“不错，是会有风险的，但如果观望等候，风险就会更大。只要我们展望未来并认识到，如果南越失陷了，东南亚失陷了，太平洋变成了红色的海洋，那我们就会面临一场对我们大大不利的世界大战，这个道理就显得很明白了。”

1966年10月25日，约翰逊与南越傀儡头目阮文绍以及澳大利亚、南朝鲜、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的领导人在马尼拉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有条件撤军。

当时的尼克松正在竞选途中，很快搞到这份公报，经过大半夜分析。尼克松把自己的捉刀手、《环球—民主报》的青年社论作家帕特·布坎南与私人秘书罗斯·伍兹叫来，口述自己的想法，让布坎南按此写成初稿，于10月29日送到《纽约时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尼克松攻击马尼拉会议已把一种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主动葬送掉了。

对于尼克松无休无止的挑战，约翰逊相当愤怒。在11月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要求约翰逊就尼克松的文章发表意见时，约翰逊大揭尼克松的老底。

“我不想就马尼拉的一次外交政策会议同像尼克松先生那类老搞竞选运动的人展开什么辩论。他的任务就是每隔两年在10月份这个期间故意找他的国家和政府的岔子。如果你们回顾一下他过去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并没有说错。当他在政府担任官职时，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周围发生过什么问题。”说到这里，约翰逊故意停顿了一下，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接着又说：

“你们记得艾森豪威尔曾说过，如果你们能给他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他才能想得起来尼克松替他出过什么主意。”

看到记者们在拼命地记笔记，约翰逊有些得意，但他的怨气还没有发泄完。

“此后，他在加利福尼亚暂时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你们看到了那边的人是怎样对待他的。接着他横跨全国到了纽约。然后他又回到旧金山在一旁等待着，希望戈德华特一摔跤他就可以候补上。可是戈德华特并没有摔跤。现在他却跳出来议论那次会议，而他显然对这次会议既没有很好研究又不了解情况。”

接着，约翰逊为马尼拉公报的内容进行了辩护，最后说：“我们不说在这里有意把它搞乱，而且也不该把它同国内的竞选运动扯在一起。企图这样做，只会使人们失去选票而不是获得选票。我们不能因为想把水搅浑而叫人

们去送死。当侵略、渗透和暴力都停止了，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把占领军留驻越南。尼克松先生为了捞到一两个选区而不惜留下那种印象，这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

约翰逊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但他没有料到，他的这番发泄，反而帮了尼克松的大忙。使尼克松又成了全国瞩目的中心。

艾森豪威尔针对约翰逊提到的“给我一星期”的事，专门发表了一项声明，称赞尼克松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有见识、最有能力和最为勤勉的副总统之一。”

在选举日的前夕，共和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把全国广播公司分配给它的半小时电视时间让给尼克松使用。

尼克松决心好好地利用这次极难得的讲演机会，这也是他自1960年角逐总统职位失败以来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露面的唯一机会。

这次讲演无疑是十分成功的。

他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想必已从介绍辞中得悉，我在上星期受到了美国总统对付其政敌的前所未有的、极端野蛮的人身攻击。我要作出答复，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这种攻击危及了一项伟大的原则。这就是有权表示不同意见的原则，有权表示异议的原则。那就是说，有权对任何一个政府官员表示不同意见，即使这个官员是美国总统。”

对约翰逊的攻击，尼克松点到为止，转而对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大加吹捧，为他们拉选票。临到末了，才又重新对约翰逊进行攻击。

这次讲演，尼克松成功地扩大了自己在共和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在共和党内的政治地位。

两天后，中期选举结果超出人们预料，共和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净增47个席位，参议院净增3个席位，此外还增加了8个州长职位和540个州议会席位。

这次胜利，使尼克松重新获得了全国性的发言人和富有战斗精神的竞选活动者的信誉，更重要的是，尼克松的名字与共和党的胜利连在了一起，为他1968年卷土重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可以说，尼克松心中的欢愉，超过了那些在竞选中获胜的所有国会议员们。

这次竞选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把“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冲淡了许多。不言而喻，自1960年以来的两次重大失败，给了锋芒毕露的尼克松以难以忘怀的教训，也使他成了一个老练的、资深的共和党政治家。

对于1968年的总统竞选，尼克松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不忙于投入竞技场，而是准备在政治上原地踏步，静候时机。为了麻痹政治对手，尼克松还拒绝了他的竞选班子要他公开争取当总统候选人的建议，甚至在电视节目中宣布自己将“至少休假六个月不过问政治，不打算发表任何政治演说，至于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

尼克松也果真携妻挈妇去比斯坎岛度过了一次轻松愉快的假期。

感恩节的前一天，尼克松的政治顾问，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联邦预算局长的莫里·斯坦斯与彼得·弗拉尼根来找尼克松。

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里根的支持者正准备把戈德华特的保守派运动重新搞起来。而戈德华特也有可能再度出山，洛克菲勒则在一旁虎视眈眈，谁

若跌了跤，他就接上来。每一个有希望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人，都想把党的领袖和党的工作者拉到他那一边去。如果尼克松不对支持他的人讲清暂时不宣布自己准备参加角逐总统职位的理由，那么，这些人就很可能被政治对手拉过去。

斯坦斯与弗拉尼根对尼克松说，他们想组织一个拥护尼克松当总统的俱乐部，先开始进行一些初步的、调门较低的组织 and 筹款工作。

尼克松很赞同他们的分析，首先得把组织工作搞起来。为此，1967年1月7日至8日，尼克松把他的老朋友和最亲密的顾问鲍勃·芬奇（此人原在副总统尼克松手下工作多年，里根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时，他被选为副州长）、鲍勃·霍尔德曼、私人秘书罗斯、玛丽、伍兹、《纽约先驱论坛报》首席社论撰稿人小雷蒙特·卡·普赖斯（尼克松的主要谋士和讲稿的捉刀人）、私人助理德怀特·查平·尼克松、在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约翰·米切尔（此人对搞政治极有天赋，广泛地与州政府、地方政府打过交道，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广大的政治联系网）、默里·乔蒂纳、埃利希曼等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计划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尼克松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打算跟我最老的朋友和最亲密的顾问再忸怩作态了，我要你们为制订明年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计划开始行动起来。”

尼克松的顾问们认为停止六个月的政活动是一次冒险，很有可能因此丧失许多赢得总统提名的机会。

尼克松向他们解释说：“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尽管我静躺在那里，我却要你们豁出性命把事情办好。我们要胜利，就得比其他候选人更卖劲干，把工作做得更好。”

会后，尼克松即着手成立一个私人的政治班子，为尼克松投入竞选作好准备。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尼克松决定出国作一次环球旅行，目的是了解世界的最新形势，增加自己在外交方面的知识，以便在竞选总统时派上用场。同时也给选民一个“国际政治家”的形象。

这次旅行，尼克松先后访问了欧洲、苏联、亚洲、非洲和中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在这次访问中，尼克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在罗马尼亚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书记见面时说，“越南战争停止之后，可以逐步采取措施使我们（美国）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起来”。

当尼克松访问亚洲时，许多国家领导人，包括过去激烈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作任何改变的人，都告诫尼克松，如果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还打算在亚洲建立持久和平并使亚洲的自由国家生存下去的话，那么，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已经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尼克松对此已有了深刻的体会。当他去拜访蒋介石时，蒋介石希望美国能支持他反攻大陆。并说大陆上的中国人对他们的领导已感失望，随时会向另一股力量靠拢。如果他反攻大陆成功，红色中国原子弹的威胁会从此告终，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会从此告终，中苏重温旧好的可能性也会从此告终。尼克松认为蒋介石的这些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访问结束后，尼克松于6月24日回到纽约，7月即在一次讲演中谈到自

己所主张的对外政策。其实也是在 1968 年总统竞选中争论的中心问题。

在 1967 年 10 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发表《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除了强调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意义之外，还谈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长期以来顽固反共、坚持对中国实行孤立政策的尼克松，其对华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也为尼克松任总统后，派遣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埋下了伏笔。

在谈到对华政策时，尼克松说：

“有些人主张，承认亚洲大陆的很大部分，甚至延伸到大陆以外的岛国，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另一些人要求用先发制人的战争把这威胁一笔勾销。很清楚，这两种方针对美国或对美国的亚洲盟国都是不能接受的。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和欧洲强国，甚至包括苏联在内，结成反华同盟。除了因苏联参加而产生的明显问题之外，这种方针势必含有欧洲对抗亚洲，白人对抗非白人的成份，从而可能在其余非白人的世界中，尤其在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当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变得如此强大，使它们不再成为诱使中国进行侵略的目标，这时才能说服北京的领导人应该把他们的精力从对外转向对内。只有到了那时，才能够和大陆中国开始对话。”

1967 年下半年，尼克松到大部分共和党人当州长的州去拜访了州长和党的领导人。尼克松向他们透露了自己正在考虑参加初选，目的是要他们在表态支持谁的时候，先看看尼克松在初选中的表现。

其实，共和党在南方各州的政治领袖心里，宁愿支持里根，而不是尼克松。但是，如果尼克松改变了“输家”的形象而有可能获胜，他们也转而会支持尼克松。

对自己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尼克松有着充分的信心。因为在 1967 年进行的每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尼克松总是共和党提名中第一个被挑上的。在 10 月，探索总统竞选气候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第一次表明尼克松已跑在了约翰逊的前面。

到了年底，尼克松明白是应该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了。但是两次失败的阴影在尼克松的心中还没最后消除，他害怕再次失败。

圣诞节那天，尼克松特地征求两个女儿的意见。小女儿朱莉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同时又是她的同学、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孙儿戴维的女友，她对父亲说：“你为了国家就必须这样干。”

大女儿特里西娅是大学四年级学生，对父亲更为理解。她说：“爸爸，你如果不参加竞选，你的生活真太空虚了。”

尼克松又想起自己的母亲在去世前说的话，“理查德，你可别放弃希望，不要让别人说，你这辈子完了。”

尼克松的迟疑不决是短暂的。政治对于他而言，并不只是一种可选择的职业，而是他的生命。因此，到了 1968 年 1 月 9 日，尼克松 55 岁生日那天，决定参加总统职位的角逐。

1968 年 2 月 2 日下午，尼克松在新罕布什州曼彻斯特的假日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了竞选总统的活动。

越南战争问题是这次初选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国内的反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尼克松意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鼓吹战争了。在他的每一次竞选演说中，都有那么一段保证：“新领导将在太平洋地区结束战争，赢得和平。”

接下来在美国各个州的初选，尼克松取得初步的胜利。在共和党全国代

表大会快要召开前的7月18日，在尼克松的要求下，艾森豪威尔在病榻上发表了认可尼克松为总统候选人的声明。

这篇声明直截了当，十分有力。艾森豪威尔在声明中说：

“争论如此激烈，时代如此动荡，以致我决定打破我个人的先例，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发表对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认可声明。……”

我支持提名理查德·尼克松为我党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的候选人。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我赞赏他在我任总统期间对美国作出的卓越贡献，更重要的是，因为我钦佩他的个人品格：才智出众，机敏泼辣，果断有力，热情饱满，尤其是他的忠贞不渝。我觉得如果能在1969年1月把迪克·尼克松选入白宫，那对美国的安全、繁荣和国力以及世界和平事业都是最为有利的。”

艾森豪威尔的声明帮了尼克松的大忙，成功地遏止住了尼克松在共和党内的竞选对手洛克菲勒和里根的进攻。

当时洛克菲勒凭借巨大的财力，雇了一家民意测验公司，花了近千万美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庞大的广告宣传竞选活动，企图以此影响舆论，使共和党投票人相信他将战胜尼克松而取得胜利。

随着共和党代表大会在迈阿密海滩召开时间的临近，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也正在疯狂地为他战斗。

因为代表大会将在8月1日召开，设在纽约与华盛顿的尼克松竞选办公室也迁到了迈阿密的希尔顿旅馆。

负责代表接待工作的是埃德·摩根，原是一位律师。他的手下有30多名志愿工作人员，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弄到了一套房子作为接待办公室。当他们打听到某位代表的旅行计划时，就提前作好准备，殷勤接待，以此赢得他投票支持尼克松。如圣保罗的大亨、共和党代表埃德·戈帕赫夫妇刚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时，这些工作人员手舞“欢迎戈帕赫夫妇！迈阿密热爱尼克松的代表们”的标语，向他们欢呼。埃德租来的铜管礼乐队也吹奏起欢迎的曲子。接着，一辆装有尼克松彩饰的免费汽车很快把他们送到早已准备的旅馆，然后又陪同他们去浏览市容。

但戈帕赫夫妇绝对没有想到，这些欢迎队伍同时也准备好了另外一幅标语：“滚，滚，戈帕赫夫妇！”如果戈帕赫夫妇不支持尼克松的话，这幅标语一定会在他们面前晃动的，当然也不可能还有免费汽车与旅馆。

为了引诱迈阿密的共和党人来为尼克松竞选活动帮忙，竞选工作人员就以发给大会门票作诱饵，以致于落后一步的洛克菲勒和里根的竞选活动组织者很难找到人来帮忙。

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总管霍尔德曼极为重视新闻在总统竞选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电视。他在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对政治竞选活动来说，就其竞选技术和战略而言，走出黑暗时代，进入人们肉眼之外可以看到的新的华丽世界的时刻已经到来。”因此，他建议尼克松在竞选中采用电视的新途径。

为此，霍尔德曼和顾问小组的其他成员，专门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来观看尼克松在过去几年里各种各样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被拍摄下的旧电视新闻剪辑。目的是要看看尼克松与这种新闻工具配合得如何，然后定出究竟哪种拍摄方式最为见效。

经过对每一个镜头的分析，他们发现，场面越自然，尼克松应付得越好。

因此，他们建议尼克松广泛利用问题解答会的形式，不仅在记者招待会以及有学生们参加的公开提问会要用，而且在出钱买下的政治节目中也要用。

与此配套的措施是要想方设法吸引电视网的注意。

经过霍尔德曼的精心布置，竞选活动的工作人员租借大象来表演节目，还组织踩高跷和耍杂技的艺人以及大批年轻漂亮的姑娘，鼓动大家投尼克松一票，成功地吸引了电视制片人的注意。

为了获得黑人代表选票，竞选班子特意把著名的黑人篮球运动员威尔特·张伯伦请来，安置在希尔顿旅馆，为尼克松接待采访和抛头露面。因为他身材特别高大，在代表大会中特别引人注目，以此来象征黑人支持尼克松，但竞选班子也为威尔特花了不少钱，仅仅他的服饰用品就用去近万美元。

但这些钱并没白花。

8月7日晚上，在经历了许多幕前幕后的竞选活动和政治交易之后，尼克松以少数多票击败了他在共和党内的政治对手洛克菲勒与里根，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

虽然取得了向总统职位挑战的资格，尼克松一点也不敢松劲，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将面临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与独立党总统候选人华莱士的决战。

汉弗莱原是明尼苏达州参议员，约翰逊就任总统后，汉弗莱就往副总统。对这次大选，约翰逊觉得自己竞选连任总统成功的希望不是很大，因此宣布自己不接受民主党提名，也不参加竞选，但他在幕后支持汉弗莱。因此，汉弗莱是尼克松的劲敌。

阿拉巴马的乔治·华莱士州长则通过第三党——独立党获得提名。但他的势力难以与尼克松、汉弗莱正敌，对尼克松不构成直接威胁。然而，华莱士在美国最南部地区极有影响，他的参选，会使尼克松少得不少的选票。

另一方面，投华莱士的选票大部分属于民主党人，因此，在南部地区，如南、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田纳西、弗吉尼亚、肯塔基等尼克松的战略基地，尼克松竞选班子的策略是尽量压低华莱士的得票数。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向可能投华莱士选票的选民提出一个非常有效的口号：华莱士反正赢不了，不要浪费你们的选票。

9月30日，汉弗莱在盐胡城发表了一次全国电视讲话，辩解自己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与约翰逊没有牵连，并许诺说，一旦他当选总统，第一件大事便是结束越南战争，取得体面的和平。

这次讲话后，汉弗莱的拥护者逐渐增多，在竞选演说中刁难他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美国历届总统选举中所使用的肮脏手段却层出不穷。

每当尼克松开始演说的时候，场里都有一些闹事分子大喊大叫一些粗俗不堪的下流口号，目的是不让别人听到尼克松说些什么。如果还不奏效，他们便会开始扔石头和臭鸡蛋，企图把尼克松轰下台去。倘若尼克松还不识相，麦克风 and 照明设备的电缆便会被偷偷爬到讲台下面的人割断。

不用说，这些都是尼克松政敌的手下组织人来干的。为此，尼克松十分恼怒，与负责竞选旅行的总管埃利希曼进行了无数的谈话来商讨对策。

尼克松的解决办法是直截了当的。他让埃利希曼去请求保安部门的帮助，狠揍那些当众诘难者，或者建立一个召之即来的打手队来对付那些诘难者，撕毁他们的标语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埃利希曼担心这样做很可能被指控为制止“合法的反对者”而吃官司，

因此大多数时间是去请求当地警察来突然袭击那些高声尖叫和唱歌的捣乱者。当然，有时候要付一笔钱。

对这场竞选，尼克松志在必得，因此，他要求他的竞选工作人员像对待一次全面战争那样，全身心投入这次竞选活动。

他的竞选班子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默里·乔蒂纳是尼克松竞选活动的老顾问了。在对女人的问题上，他不像尼克松那样严谨，洁身自好。他的身边，总是伴着一个年轻貌美的金发女郎。但尼克松仍很欣赏他，他对尼克松也很忠实，卖力。

为了掌握汉弗莱的竞选活动秘密，乔蒂纳雇佣了一个从外貌和行动上都很像记者的人打入汉弗莱的竞选活动内部，混在汉弗莱竞选旅行团乘坐的飞机上，以“查理曼的朋友”为代号，每天把汉弗莱的竞选人员，汉弗莱以及他夫人情况，内部工作问题和私下议论报告给乔蒂纳，为尼克松的竞选决策提供参考。

1968年1月31日，离选举日很近了。尼克松与汉弗莱的竞选已进入白热化搏斗阶段。在这一天，尼克松夫妇与他们的竞选伙伴——马里兰州长斯皮罗·阿格纽夫妇将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公园同时登上讲台，出席一个有电视实况转播的十分重要的群众集选择阿格纽作为竞选伙伴，尼克松作了认真的权衡和考虑。

阿格纽来自美国南部地区，代表南部地区集团的利益，他将部分抵消华莱士的影响，为尼克松带来南部地区不少的选票。

这次群众集会地点是在洛克菲勒的地盘上，而纽约州是尼克松能否获胜的关键州之一。因此，尼克松下令买下了这次集会的电视节目的播映时间，并出钱做广告来吸引广大电视观众收看这一实况转播。

为了确保电视观众在荧屏上只看到极大的热情，没有反对者，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先遣人员埃德·摩根想出了一个极好的办法。

埃德印发了十倍于会场座位的入场券，参加集会的人必须凭票入场。

为了既保证新闻报道尼克松对十分拥挤的群众集体发表讲话的场面，又要保证不让反对者出现在屏幕上，埃德租用了大量的公共汽车，从市郊把尼克松的支持者送到会场上来，并把这些可靠者的座位安排在电视摄影机和讲台之间。紧靠着讲台前面的二十排座位则专门让大学和高中中支持尼克松的青年代表团、身穿制服的尼克松支持者以及尼克松竞选班子成员坐。

至于其他来参加集会的人，则必须通过由埃德的人把守的用绳索拉开的唯一通道进入麦迪逊广场公园。

如果发现身上带着喊话筒，或有不友好的标记，甚至仅仅是有捣乱嫌疑的人，就指定他从右边的门进去，而被认为是友好的人则从左门进去。

从右边的门进去的人，实际上是被引入了走向外面大街的通道。如果这个人重新回到了入口处来表示抱怨，埃德的人一边向他表示歉意，一边检查他的入场券，并把他带到附近大楼的办公室去，然后告诉他入场券有问题。并请他在接待室耐心等待一会儿，有关人员会来帮助他解决问题。

直到公园里已挤满了人，埃德便通知办公室关闭入场口。接着便有人来通知还老老实实集在接待室等待解决问题的人，他们的入场券没有问题，可以回到公园里面去。但是，防火部门的人告诉他们，公园的座位已满，无法再接纳他们。

由于埃德的巧妙办法，在尼克松与阿格纽发表演说时，会场上仅仅出现

了两个反对尼克松的标语牌，而且还是在会场灯光很暗的角落里出现的。有效地避免了捣乱与诤难。

电视观众在荧屏上看到的只是拥挤的场面，以及对尼克松雷鸣般的欢呼声。

由于竞选班子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大地提高了尼克松的竞选效率。但是，尼克松心中仍然没有把握。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如果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票的支持，总统选举就由众议院裁定。但众议院却是由民主党控制着的，尼克松是没有希望进入白宫的。汉弗莱却有希望。

所以，在与汉弗莱的竞选中，尼克松处于不利的境地，他必须使自己过半数选举人票。而汉弗莱只要使得尼克松与华莱士都不过半数选举人票就行了。

在大选前两个星期，尼克松每天从事竞选活动的时间长达近 20 小时。

10 月 31 日，也就是尼克松在麦迪逊广场公园发表演说的那天下午，约翰逊美国政府与北越的巴黎会谈有了突破，他已决定对北越实行全面停炸。

这个消息并不令尼克松感到震惊，虽然这无异于在尼克松的竞选活动中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因为尼克松的竞选保证就是停止越南战争。既然约翰逊政府已经下决心停战了，那么，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现在的总统候选人汉弗莱在竞选中的地位就更有利了。最重要的是，停炸的决定动摇了尼克松最有效的竞选口号“民主党领导无方，不能赢得持久和平”的根基。

还在 9 月中旬，米切尔就与洛克菲勒的对外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联系上了。因为基辛格在 1967 年当过约翰逊总统的秘密信使，通过法国作中间人，把约翰逊的停炸建议传递给北越人。

10 月 12 日，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又得到了基辛格的秘密报告，说政府在 10 月 23 日之前很可能会有所行动，建议尼克松应当避免对汉弗莱有损和平前景的言论发表意见。

10 月 22 日，尼克松从约翰逊最核心的圈子里得到可靠情报。情报中说：总统正全力以赴地要与北越达成交易，可以这样说，他几乎反常地迫切寻找下令停炸的借口，看来他准备接受任何一种安排正制订周密的计划帮助汉弗莱利用所发生的一切。白宫工作人员与汉弗莱联系密切。已为林登·约翰逊制订了计划，一旦协议达成即可尽快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目标是尽一切可能在 11 月 5 日以前全部就绪。

白宫人员仍以为这一招可使汉弗莱赢得选举，所追求的正是这个目标。

看完这份情报，令尼克松十分吃惊。当即下令要米切尔向基辛格核实一下情况。并派人与约翰逊当面对质这个传闻。结果，基辛格表示他从未听到过这个计划，约翰逊也矢口否认，但尼克松手下的间谍活动极有成效，接着又传来已与北越达成协议的消息，而且很快就要公布。

尼克松意识到，约翰逊的这种作法，已不单纯是政策问题，而且主要是来挖自己墙脚的宫派政治，利用越南战争来帮汉弗莱的忙。

从 1960 年的总统竞选失败及后来竞选州长失败以来，尼克松已受够了人们的白眼，人们都把他看作是政治生命已经死亡的人，名门望族更瞧不起他，林登·约翰逊甚至嘲笑他是一个“长期竞选者”，这些都深深地刺伤了尼克松的自尊心。

如今距总统宝座仅咫尺之隔，尼克松决不愿功亏一篑，让人们又来耻笑

他。

但尼克松并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他知道不管自己怎样干，约翰逊都掌握着优势。但在一般情况下，约翰逊是不会故意出面支持汉弗莱的。因此，尼克松所要做的，就是阻止约翰逊全力以赴地用他所掌握的大权来为汉弗莱撑腰卖劲。

为此，尼克松于 10 月 26 日发表了一项措辞十分讲究的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

在过去的三十六小时内，据我所知，在白宫或某些地方，匆匆忙忙召开了一连串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人们告诉我说，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正在全力以赴地要在最近的将来达成停炸可能还有停火的协议，我得悉这些报告是确有其事的。

有人还对我讲过这股突发的拼劲是约翰逊总统为了挽救汉弗莱先生的候选人地位而作的孤注一掷。关于这一点我并不信以为真。

在竞选中，我从未发现总统在越南问题上和主要的总统职位竞争者的交往中有什么不公正或不坦率的地方。

在我跟他所作的每次谈话中，他都明确表示他决不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玩弄政治手腕。

在约翰逊发表全面停炸北越的声明之后，大批犹豫不决的选民转向汉弗莱，尼克松又一次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幸亏南越伪总统阮文治在这关键时刻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他的政府不参加约翰逊提议的那种谈判，无意之中帮了尼克松的大忙。

在阮文治声明的当天，也就是 11 月 2 日，离 11 月 5 日大选不到三天，尼克松在得克萨斯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抨击约翰逊政府干了一次没有计划的很糟的外交行动，使和平的前景变得并不光明。

到 11 月 4 日，尼克松从各种消息看出，他与汉弗莱的竞争极为激烈，彼此差距极小。他想起 1960 年，他正是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中失败的，从而不得不忍受好几年的屈辱。他觉得应该在选举的前夕，尽一切可能做一些对选票有影响的事。为此，尼克松不顾他的顾问们的反对，在这一天花钱买下了连续四小时的电视节目时间，进行最后的竞选演说。

第二天晚上，尼克松一家与他的竞选班子在纽约沃尔多夫大厦里度过了难熬的夜晚。

下午六时，美国东部和中西部投票全部结束，直到晚上 8 点 45 分才报告第一批有实际意义的结果。大体上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一比百分之三十六领先，到晚上十点过，汉弗莱与尼克松在全国的统计数字持平。

此后，两人的数字交替上升，子夜时分，汉弗莱在选票总票方面领先了六十万张。尼克松的心悬了起来。

经过激烈的拉锯战，直到凌晨三点，尼克松终于长舒一口气，根据总票数，自己已经赢得了总统职位。

米切尔与霍尔德曼让尼克松去打个盹。已经 22 个小时未合眼的尼克松，尽管两眼通红，但他却睡不着，不到半小时，又爬了起来。毕竟还没有正式宣布，尼克松心里难以踏实。

11 月 6 日早上 8 时 30，美国广播公司宣布尼克松赢得了这场选举。

尼克松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走到妻子和女儿们的套间来报告好消息。

漫漫长夜总算熬到了尽头，帕特似乎还不相信巨大的幸福已经降临，激

动地问：“迪克，我们果真完全有把握了吗？”

“绝对有把握，选票都计上来了。到了这时，他们想再搞点鬼名堂是不行啦！”说到这里，尼克松猛地拖起了妻子，旋转起来，帕特的双眼涌出欢乐的泪水。

11点30分，汉弗莱在电视上正式宣传认输。尼克松仅仅以百分之四十三点三比百分之四十二点六战胜汉弗莱。加上华莱士所得的百分之十三点五，刚刚超过半数百分之六点八。

当尼克松来到沃尔多夫—阿斯里亚饭店的舞厅时，很得意地对几百名守候了通宵的支持者说：

“八年前我因相差无几的票数被人击败，今年我以相差不多的票数打了胜仗。我要说——打胜仗可比被人击败畅快得多！”

第九章 入主白宫

1969年1月20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时值严冬，寒风凛冽。在连接联邦国会大厦与白宫大院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两旁，早已挤满了等候参观总统就职典礼的群众以及准备抗议美国政府继续进行越南战争和尼克松上台执政的群众游行示威队伍。此外就是从北卡罗来纳州布雷格堡营地紧急调来华盛顿的美国陆军空降第82师的部分官兵和警察，随时准备镇压示威群众以保护总统车队顺利通过。

快到12点的时候，几辆黑色的凯迪拉克高级轿车驶进了国会大厦。

从第一辆总统防弹轿车上走下来一位50开外的人，他中等偏高身材，高高的前额下面，两道浓眉紧贴一双有神的大眼，长长的脸型正中，缀着略钩的大鼻子。

久候的人群立刻就认出了，他就是新当选的总统尼克松。尼克松穿着一件晨礼服，即将卸任的约翰逊总统、汉弗莱副总统跟在他的后面。

国会大厦东门外台阶上已搭好了典礼台，上面坐满了政府、国会内外的显赫人物。典礼台前排正中位置摆着一座讲坛。前面面对观众的一方装饰着一枚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印章的复制件。正中是一只双翅展开的鹰的图案，它的左爪执箭，右爪握橄榄枝，周围环绕着代表美国建国后逐步扩张形成的版图——代表50个州的50颗星。

图案的寓意再明白不过了，尼克松想到自己就将扮演一手舞箭，一手伸出橄榄枝的美国总统角色，似乎有些不相信。

8年了！总统竞选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操纵、发布和透露新闻，绞尽脑汁的竞选演说，和政治捐款者、记者、公众，还有幕僚、政客等等的无数次交锋，尼克松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登上了总统宝座。

无数的摄影灯亮了起来，尼克松看到他向来比较讨厌的新闻记者频频把镜头对着他，掀下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美国三大电视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拍摄着。他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做梦，不由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得意地露出了笑容。

典礼开始了，军乐队高奏美国国歌《星条旗》，牧师致祈祷词，呼吁上帝保佑美国，保佑尼克松总统。

紧接着，副总统阿格纽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弗雷特·德克森主持下，首先举行了副总统的宣誓仪式。

轮到尼克松夫妇了，他们和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一起走到讲坛前。

帕特仍然捧着尼克松1953年、1957年宣誓就任副总统时用过的两本家传《圣经》，尼克松让她翻到伊赛亚书二章四节：“他们将把剑锻制成犁，把长矛锻制成修树勾剪。各族不再向他族举起刀剑，他们都不再学习征战。”

尼克松左手托着《圣经》，右手举起，在沃伦法官的带领下，逐字宣读美国宪法规定的美国总统就职时的一句誓词：“我将忠实履行美国总统的权力，并将尽最大努力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

宣誓结束后，尼克松温情地把夫人帕特扶到第一排荣誉席前就坐，然后深深地向夫人鞠了一躬。此时，轰隆隆的礼炮响了21下。

几乎是在同时，在竞选中以极少票数之差失败的汉弗莱副总统，看到尼克松的得意劲头，心中无限酸楚，他强忍着泪水，板着脸，一言不发地坐在

那里。而汉弗莱夫人却没有丈夫那样强的自制力，在离开典礼台时当众哭了起来。

但这并不影响尼克松兴致勃勃的情绪，只是当他在防弹玻璃罩后面发表就职演说时，一丝阴影爬上心头。

一个新总统要在防弹罩后面发表就职演说，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尼克松十分明白他面临约翰逊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因此，他的就职演说必须要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既要使选民抱有希望，又不能有具体承诺，毕竟这与竞选时大开空头支票以捞取选票不同。

为了准备这篇演说稿，尼克松差不多翻阅了他以前的36位总统的所有就职演说，字斟句酌，然后对美国著名的三支笔杆子威廉·萨菲尔、帕特里克·布坎南和香蒙德·普赖斯口授要点，数易其稿而成。

面对国内强烈的反战情绪和垄断资本不同利益集团的明争暗斗，尼克松开门见山地点出了这篇演说的主题：和平。

他的语调低沉而坚定：“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它宝贵和独特的转瞬即逝的时刻，但是有些时刻则突出地成为开端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确定的方针会决定几十年或几百年的面貌。现在就能成为这样的时刻。”

短短开场白，就成功地抓住了千百万电视观众的心。接着，他讲出了自己的伟大抱负：“由于世界人民希望和平，世界的领袖们害怕战争，现在这个时代第一次成为有利于和平的时代。……历史所能授予的最大荣誉，是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这种荣誉，现在正在向美国招手——这就是出力把世界最终引出动乱的深渊而登上人类自文明伊始以来所梦寐以求的和平之高峰的机会。”

谈到国内问题时，尼克松的语调缓慢而沉重：“我们陷入了战争，需要和平。我们陷入了分裂，需要团结。”

在谈到国际问题时，以喜欢谈论战争和冷战斗士、顽固反华反共、反苏而著称于世的尼克松，却以扮演世界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出现。他说：“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

接着，尼克松发誓将把“我在任的时间，把我的精力和全部智慧，贡献给国际和平事业。”“让我们定下这样的目标：在那些不知道什么叫和平的地方，使和平成为受人欢迎的东西；在那些和平不巩固的地方，使和平巩固起来；在那些和平只是暂时存在的地方，使和平成为永久的东西。”

最后，尼克松说：“我们经历了美国精神的漫漫长夜。但是，当我们瞅见朦胧初露的曙光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诅咒尚未完全消失的黑暗，让我们促进光明的到来。”

就职演说结束后，约翰逊与尼克松在《向元首欢呼》的乐曲声中离开典礼台。

前总统约翰逊似乎是如释重负，也带着一种失落与屈辱感，乘直升机直飞安德鲁空军基地，在那里最后一次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飞往他的故乡得克萨斯。

尼克松总统则坐了总统专车，前往白宫上任。这种专车装备着透明防弹玻璃顶篷，可以随时启开，让总统得以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欢迎的人群致意。而官方的摄影师们趁机录下这种场面，供总统以后竞选连任使用。但今天，特工人员已经知道有反战群众大示威，早把顶篷关上了。

当尼克松的车队刚刚驶上宾夕法尼亚大道第12街的时候，透过车窗玻

璃，尼克松瞧见大批的示威群众高高地挥舞着抗议标语牌在“欢迎”他。他们中有些人穿着模仿尼克松总统的服装，戴着白粉涂抹的面具，把尼克松扮成了一个十分滑稽的小丑，有的则高喊：“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必胜！”“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是百万富翁的政权！”等口号。

两面的警察则拼命地把往前涌的示威群众往后推。接着，警察与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一时间，棍棒、石块、啤酒瓶和类似爆竹的东西从空中像雨点一般地向总统专车飞来，有一些砸中了车身的侧面弹回街上。

随车保卫总统安全的特工人员命令司机加大油门在大道上疾驰，直到接近白宫，才有真正欢迎尼克松的人群。专车打开了顶篷，尼克松夫妇才放心地站起来，向欢迎的人群致意。

白宫大院在望了。

这是一座占地 18.3 英亩的建筑物，由外表呈白色的主楼和先后追加的东、西两翼楼组成，在它的周围，环绕着葱郁的花卉林木与绿茵茵的大片草坪，外围由一道铁栅栏团团围住。它的主楼三、四层，是总统夫妇及其亲属的生活区，房间的风格随主人的更替而变化。它的两翼是办公区，东翼是接待区，宫内共有 132 个房间，几万件名贵艺术品陈列其中，把一间间厅、室打扮得富丽堂皇。

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在西侧一楼，还在就职典礼前，新任的第一夫人帕特己以典型的加利福尼亚色彩把它装扮一新。地上铺的是由蓝色和金色组成的色彩浓艳的地毯，角上摆着金光闪闪的沙发，配以金色的窗帘，显得温暖而严肃。

办公室旁边是内阁会议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盖的东翼楼，则是总统班子和第一夫人办公的地方。

经过二十几年的辛苦经营，尼克松就要成为白宫大院的新主人。随之而来的是令人艳羡的总统待遇和权力。

美国总统的年薪刚刚从 10 万美元提高到 20 万美元，扣除所得税与附加税后，还剩下 8.7 万美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仅仅侍候总统夫妇的勤杂人员，包括厨师、医生等等，就达数十名，他们的工资，都由国库开支。

此外，总统有专用车队，包括特别的林肯牌和凯迪拉克牌防弹轿车以及 20 辆水星牌黑色轿车，由政府提供，军人驾驶。

总统的专用飞机由政府 and 空军提供，包括三架波音 707 客机，一群洛克希德的喷气卫星飞机，以及若干架直升机。总统座机“空军一号”，由一架波音 707 改装而成，还有一架专门运送总统的装甲防弹轿车的货运飞机。

总统还有专用游艇，由海军提供并维护。

总统别墅——乌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的戴维营，由海军陆战队管理。

白宫大院内的健身房、室内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理发室等等，其管理、维修费用，都由政府开支。

根据当时的估算，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每年约需 1.55 亿美元以上。

总统夫妇享受这样的待遇而不用自掏腰包。

真正让尼克松动心的还是总统的权力。

美国联邦一级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间，按美国宪法规定实行分权制，但联邦政府行政机关则实行高度集中制。

总统既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统不对国会负责，而是对选民负责。但在实际上，总统当选后，选民根本无权过问总统的政策。政府各部部长、联邦法院法官均由总统提名，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方式任命。各部部长的罢免权在总统，国会无权过问，就是对号称三权分立的另外两权——立法与司法，总统也有相当大的权力。

国会通过的所有法案，相当一部分是由总统提出来的，而且必须经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总统不同意，可以予以否决，或者乘国会休会时搁置不理，使之过期成为废案。根据宪法，国会两院如能凑够 2/3 的多数票，可以对总统的否决进行否决而使法案不经总统签署而生效。但总统在国会里可以影响左右一批议员，要拼凑出 2/3 的票来对总统的否决进行否决，往往十分困难。

尼克松重新走进了白宫，焕然一新的加利福尼亚色彩使他感到骄傲。他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个担任美国总统的加利福尼亚人。尽管他出身微贱，是美国东部垄断资本集团瞧不起的杂货店老板的儿子。但如今，他的背后已有新兴的美国西部、南部垄断资本集团替他撑腰。他将可以利用总统权力一展鸿图，尤其是外交。

对刚刚搭起的白宫班子与内阁，尼克松是十分满意的。

比尔·罗杰斯是尼克松的老朋友，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曾任司法部长，向以国际外交为己任的尼克松已经决定由白宫指导对外政策而不是国务院，只有罗杰斯才能与尼克松在敏感的内外政策问题上共事，担负起管理国务院的重任。因此，罗杰斯做了国务卿。

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做了国防部长。尼克松的竞选得力干将约翰·米切尔做了司法部长。

但真正对尼克松拥有巨大影响力和拥有巨大权力的却是他的白宫班子，尤其是被人们称之为“条顿族的三条汉子”、“柏林墙”、“国王的侍从”。这就是自 1960 年以来就追随尼克松，并为他的竞选摇旗呐喊的加利福尼亚老乡鲍勃·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前者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他的责任是检看文件，然后把材料送尼克松决定。但他同时担当了椭圆形办公室把门人的任务，谁能见总统，谁不能见总统，都由他决定，无形中有了巨大的权力，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妒忌与不满。埃利希曼则担当了尼克松的国内事务首席顾问，主管白宫国内事务委员会，即使是内阁阁员们的意见，埃利希曼也是很难听进的。

对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的任命，人们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即使在尼克松最倒霉的日子里，也没动摇过对尼克松的忠诚。

真正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尼克松重用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博士，一个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一个十足的洛克菲勒集团的人，还在 50 年代中期，基辛格就开始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办的一系列对外政策研究工作的主持人。

在洛克菲勒与尼克松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时，基辛格使出了浑身解数投入到竞选运动中去。往往是上午同洛克菲勒研讨对外政策，下午赶到哈佛大学给研究生讲授同样的题目，晚上又搭乘末班飞机从波士顿赶回纽约，给洛克菲勒出谋划策。

而洛克菲勒却是尼克松政治上的死敌。

还在 1960 年尼克松初次竞选总统时，纳尔逊·洛克菲勒就跳出来捣蛋，

对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肯尼迪与民主党人无情地利用了这些问题，从而以较少的票数之差击败了尼克松，让他倒了八年的霉。

到了1968年，尼克松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洛克菲勒又变本加厉地施展出老一套手法。就是在共和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前的几个星期，又是这个洛克菲勒一直施加压力，到全国各地向共和党代表游说，说尼克松是个过时人物，一张必输的牌，一个可能赢得党内提名但在大选中必败的人，完全像八年前一样。

问题并不止此，尼克松对洛克菲勒的怨恨远远超过一般的政敌。洛克菲勒家族比别的家族更能代表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中的共和党名流，这些显贵对出身微贱的尼克松的态度始终有点蔑视。

当尼克松刚从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来纽约寻找工作，但在进不了任何一家较好的商号的时候，首先给他白眼的就是这些人。

1962年，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竞选州长失败后来到纽约，想建立新的生活，东海岸的显贵们故意对他十分冷落，把他当作昔日的累赘，而今又是不足挂齿的人物。

尼克松对这帮人算是看透了，他们所仗恃的不过是祖传家产、预科学校的经历以及歌剧院的长期包厢票。如今时来运转，尼克松终于胜利了，轮到他来冷落他们了。因此，在尼克松挑选阁员时，他决定以牙还牙，决不挑选生于富豪之家的人。

对于基辛格，尼克松倒是情有独钟。

还在竞选期间，尼克松手下的几个竞选干将就以金钱为诱饵，企图把他从洛克菲勒手下拉过来。当时基辛格对此愤慨万分，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

洛克菲勒被尼克松击败之后，基辛格伤心地哭了，十分轻蔑地骂尼克松：“这家伙根本没有资格统治美国。”

但尼克松并不在意基辛格反对他，依然让手下人去找基辛格，并征询他对越南问题的看法。对这些要求，基辛格开始半推半就，立场已有了变化。

基辛格在哈佛学界的许多朋友都强烈地反对尼克松，认为尼克松是美国政治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人物。他们不同意所谓“新的尼克松”的说法，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品质卑劣的投机政客，是个一味哗众取宠、玩弄反共把戏的走私贩子；认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历史上以前受玷污的时期——麦卡锡主义的卷土重来。最严重的是，他们把尼克松看作是造成美国分裂的越南问题上的一名鹰派。

尼克松却十分明白，他的政府需要一些知识分子在里面，尤其是基辛格。基辛格于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给他以很深的印象。这正是尼克松用得着的外交人才。虽然基辛格忠于洛克菲勒，但尼克松有的是权势，他能向基辛格提供无法抗拒的东西，他可以满足基辛格对行动、权势、核心地位的欲望。只要能把基辛格从洛克菲勒那样的人手下拉过来，就是十分得意的事情。

历史证明了尼克松常常做出令政治分析家们吃惊的意外之举。

1968年11月22日，那天是星期五，尼克松赢得总统还不到一个月。基辛格正在纽约市原始艺术博物馆四楼上洛克菲勒的小公寓里同洛克菲勒州长以及他的几位顾问进行例行的午餐约会。席间讨论到外面盛传洛克菲勒将被邀出任尼克松内阁成员，洛克菲勒应不应该接受的问题。

意见是分歧的。有的顾问认为，洛克菲勒当一个大州州长，控制着一个政党组织和人事任选权，影响会来得更大一些。另一些人则认为，间接的影响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州长很难首尾一贯地、全面地控制国家的政策，他要是打算这样去做又可能会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重揭过去的疮疤。洛克菲勒倾向于第一个意见，他的理由是，他感到很难居人之下，特别是对尼克松这样的人。

基辛格认为，如果被给与这样的机会，洛克菲勒应该参加内阁；如果能当国防部长，他会感到十分愉快。同时他也认为，尼克松几乎可以肯定会贯彻他公开宣布过的意图：当他自己的国务卿。而且，国务院不能提供洛克菲勒的个性所需要的独立性。而作为国防部长，他却能够满足他数十年来对国家安全的兴趣。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例子来看，国防部长能够在外交政策的制订上起重大的作用。

大家随心所欲地讨论着这种种考虑，突然，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从总统当选人办公室打来的，打电话的人是替尼克松安排约会的秘书德怀特·查平。他打断了洛克菲勒的战略会议，出乎大家意外地邀请基辛格，而不是洛克菲勒，去见他的上司。这件事尖锐地反映了洛克菲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令人泄气的经历。参加午餐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电话的目的可能是建议基辛格担任新政府中的重要职位。

基辛格应查平电话之约，于11月25日星期一上午10时来到尼克松的临时总部，那是在皮埃尔饭店的三十九楼。这位哈佛教授决没有预料到这次谈话会改变他的一生。当时他仅仅认为当选总统可能要他谈谈对于总统面临的政策问题有些什么看法。几个整齐利落的年轻人还在接待厅中校验保卫用的录相装置。其中一个最整齐利落、最年轻的小伙子德怀特·查平走上前来和他打招呼，彬彬有礼地把他领到大厅尽头处的大起居间里，说总统当选人马上就来。那时基辛格并不知道，尼克松会腴腆得那样令人难受。会见陌生人使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害怕，特别是如果对方处于能够拒绝或者反驳他的地位。正如他在这样的约见之前所习惯做的那样，尼克松这时多半是在隔壁房间里镇定神经，重温一遍他要讲的话，这些话毫无疑问是随手写在一本黄色拍纸簿上的，至于这本簿子，他是从来不给来客看到的。

尼克松终于走进房来了，装出轻松自在的样子，然而却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紧张不安。他坐在一张沙发上，背对着俯瞰第五条大街的窗子。让基辛格坐在他对面的一张安乐椅上。他的神态腴腆，缺乏自信，他的动作含意模糊，和他所说的话没有关系，好像推动他的言语和手势的是两种不同的动机似的。他的语声低沉而温和，他一面谈话，一面喝咖啡，一杯一杯的咖啡不等他要便送进来。

他的话题是组织新政府这项任务。他说，组织问题繁重得很，他对国务院没有什么信心，国务院的人员不效忠于他。在他当副总统的时候，外事机构瞧不起他，他一下台，立刻就对他不予理睬。他决心要从白宫掌管外交政策。他认为，约翰逊政府忽视了军方，军方的决策程序没有给总统提供真正的选择理由。他觉得决不能让中央情报局插手政策的制订。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名牌大学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往往以客观分析为幌子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在政治上一直是反对他的。尼克松请基辛格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基辛格回答说，他不应该用外事机构过去对一位总统候选人或者甚至对

一位副总统的表现来判断他们将来对一位总统会采取的态度。无论如何，一位有主见的总统总是能够控制对外政策的。关于中央情报局，基辛格了解得太少，提不出什么看法。但表示同意他的看法，需要有一种比较正式的制订政策的程序，约翰逊政府的决定往往是在非正式的会议上作出的，时常也在饭桌上作出决定，就是有名的“星期二午餐”，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也不要他们去继续贯彻。因此，很难确切知道究竟作出了什么决定。每一个有关的机构，即使是本意再好不过，也总是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先人之见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会议所得出的往往是模棱两可的结果。当然，很有可能出大错和误解。很少有机会去考虑理性探讨、连续行动或细微的差别。在基辛格看来，必须建立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结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那种繁文缛节应该避免，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决策过程往往具有各独立部门之间缔结一个特别条约的性质。但是，某种新的连贯性和精确性是必不可少的。

尼克松扼要说明了他对外交政策的一些看法。他的见解和知识与基辛格以前对他的看法全然不同，这使基辛格大为惊讶。他问基辛格他在外交上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基辛格回答说，压倒一切的问题在于，要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从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惊惶失措的历史性剧烈摇摆中解脱出来，从那种认为作出决定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癖性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政策必须和国家利益的某些基本原则连在一起，这些原则凌驾于任何一届政府之上，尽管总统易人，这些原则却要保持不变。

谈到这里，谈话变得不那么明确了。尼克松很怕被人拒绝，所以在他提出什么建议时，话说得令人捉摸不定，很难猜透他的真意，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表示什么具体的事情。在尼克松来说，说话就像打台球一样，重要的不是它的开初的冲力，而是后续击撞。然而在和他的第一次会见中，基辛格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位当选总统的话，没有别的办法。当尼克松问基辛格是否在原则上准备参加他的政府，担任某种策划工作时，基辛格回答说，如果洛克菲勒州长应邀出任内阁中的一个职位，我将乐于充当他的工作人员。总统当选人没有对基辛格的前途进一步发表意见，而是建议基辛格把他对最有效的政府结构的看法写成一个备忘录。

实际上，任命洛克菲勒的可能性本来极小，如果说还有一点可能的话，显然也因为基辛格的这句答复而消失了。理查德·尼克松无意让基辛格作为洛克菲勒的下属参加他的政府，他更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让基辛格必须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进行选择。

尼克松按了一下电钮，表示谈话行将结束。一个服饰整洁、蓄小平头、模样精明的人进来了，这就是即将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鲍勃·霍尔德曼。尼克松吩咐霍尔德曼，安装一条直接通到哈佛大学基辛格的办公室的电话线，以便当选总统以后继续和基辛格谈话。这样的安排好像意味着纽约与哈佛之间没有正常电话联系似的。霍尔德曼把这个古怪要求写在小黄本上，但他后来并没有照办。

当基辛格离开总统当选人的时候，他并不确切知道尼克松期望于他的是什么。从这次谈话中，基辛格还看不清楚，尼克松所要他做的究竟是提些意见，还是承担义务，如果是后者的话，对什么承担义务。在基辛格走出来的时候，霍尔德曼要他到尼克松房间隔壁，他的房间里去坐坐。霍尔德曼平平淡淡地解释说，他的主要职责是，防止不通过正常途径办事的情况。他必须保证，任何备忘录都要由有关白宫人员签署了意见才到达总统手里，总统和

任何人的谈话都必须有一个白宫工作人员在场，以保证实施。他还指出，他要把高级白宫工作人员的“总统特别助理”头衔改为“总统助理”，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特别”是什么意思。霍尔德曼把他要说的这些话说完之后，并没有让基辛格发表意见，就很有礼貌地说再见。

第二天，查平又打电话到哈佛，邀请基辛格于11月27日到皮埃尔饭店见总统。

尼克松在总统套间正式提出聘请基辛格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故意沉吟了一会，要求当选总统给他一周的考虑时间。

尼克松看穿了他的心理，爽快地答应道：“好，就一个星期吧！”

这事谈完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接着便就新总统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正午到了，又谈到偏午。尼克松是很少吃中饭的，基辛格是很少不吃中饭的，但这回两人却都不曾想到这顿饭，接连谈了差不多四个钟头。他们谈到了越南问题。当选总统想要把苏联拉进来共同解决这场战争。基辛格对这场战争引起的国内不团结表示忧虑。他们还谈到中国、三角外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核均势等问题。基辛格认为，主要由于华盛顿忙于印度支那问题，忽略西欧的时间太长了。尼克松分析了苏联在中东的意图，并说，他打算派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威廉·斯克兰顿到那里去了解情况。基辛格认为美国内政和外交的重点都应该重新安排。两人都觉得谈得很合辙儿，十分满意。

这时，基辛格成为皮埃尔饭店的一位常客了，尽管尼克松的助手们对他还莫测高深。他的著作未必是他们床头的读物。“不过如此而已。”总统的忠实发言人、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搞宣传出身的罗纳德·齐格勒日后这样描述基辛格给他的最初印象。约翰·埃利希曼也有同感，此人从前在西雅图市一个区里当律师，后来成了白宫内圈的一个关键人物，也在1973年4月30日因水门事件而栽了筋斗。他承认说，“我本来以为此公很了不起，我从来没有看过亨利写的东西，因此我不很了解他有多大本事。我听说他很有才华，大概很爱发脾气，很难与人共事，我们同他在一起可能会闹别扭。”

此后的一两天内，基辛格忙于打定主意接受尼克松明确请他担任的那个称心的职务。这时候，他一下子就把以前对尼克松的许多书生偏见都抛在一边了。从他对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的一次颇能说明问题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尼克松有某种坏名声。我需要使我相信，他这个坏名声是不该有。”

基辛格很相信自己对尼克松的印象，这是很符合基辛格这个人的特点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觉得尼克松的素养要比1956年以来他见过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除了巴里·戈德华特，他都见过）都好。他并不隐讳他对这些候选人的评价，就连那些他称为非常有才华的候选人，在对外政策方面给他的观感也是十分无知的。艾森豪威尔算得上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军人，但却是个平庸的总统。史蒂文森有口才，有风度，但是比较软弱，尤其是在对待俄国人的问题上。对于肯尼迪，基辛格感到有点难下断语。肯尼迪很吸引人，可是同样优柔寡断。在肯尼迪遇刺身死前那段时间里，基辛格认为，如果肯尼迪再任一届总统的话，大概不是创出丰功伟绩，就是闯一场大祸。至于戈德华特，从远处看去，他似乎一味相信军事力量在核时代也是完全得用的，不应受外交手腕的牵

制。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危险观点。约翰逊对全球政治一窍不通，自不待言。汉弗莱（他在几年后透露说，他本也想提名基辛格为他的对外政策顾问）要不是因为同约翰逊的关系玷污了自己的形象，破坏了自己当领导的资格，本来是很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的。洛克菲勒虽然“智力是二流的”，但“对人的直觉了解却是头等的”。然而，他虽能鼓舞他周围的人，却无法赢得竞选总统的胜利。

基辛格把自己的想法向洛克菲勒作了汇报。洛克菲勒很痛快，很干脆，力促基辛格接受邀请。州长说：“我生来凭直觉办事，我觉得这样做对头。我认为这是好事，我赞成。”洛克菲勒并未因为自己败在尼克松下而影响他对基辛格的推荐。他说：“我向来主张基辛格为任何一位总统的人效劳，尽力协助总统。他为肯尼迪做过事，为约翰逊也做过事，我常常鼓励他，要求他把他的才能和点子贡献给任何一个当总统的人。”他停了一下，又说：“我觉得当总统是非常孤独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应该不分党派作出贡献。”

11月29日，即同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基辛格打电话给尼克松的办公室，要求约见当选总统。他从尼克松那里出来，再到尼克松那里去，前后相隔不到48小时。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我已经考虑过了，咱们就一言为定吧，我准备接受。这事我就不再找人谈了。”

12月2日，当选总统终于在皮埃尔饭店举行的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大家介绍了他这位新顾问，但这不能算尼克松透露了什么新东西，而只是证实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尼克松笑容可掬，基辛格更是满面春风。当选总统明确表示，给基辛格的指示是要杜绝那种危机外交的做法，“不要尽是等到出了事情才去应付”。

基辛格显出颇为自信的样子，宣称他打算经常请一些不担任政府职务的外国专家来白宫商讨问题，又说他“同全世界各种观点的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广泛的交游”。

尼克松也说：“我这个人喜欢让各种观点都得到广泛发表的机会。基辛格博士已经或正在建立一种我认为非常令人振奋的新程序，努力使美国总统不要只听到中听的话。而这种投总统所好的做法向来是白宫工作人员爱犯的毛病。”

在任命国务卿以前先任命基辛格，可能会使新闻界和其他方面人士感到奇怪。对此，尼克松解释说：“基辛格博士深刻地认识到，他不应该成为总统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一堵墙。我打算任命一位非常强的国务卿。”

美国知识界的反应总的说来是热烈的。但也有一些人仍然很反感，觉得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普遍受到尊敬的知识分子，竟去投靠一个他们认为是老奸巨滑的政客？较普遍的看法是，新总统选中基辛格，这证明他出手练达，给新总统的记分本上添了一分。过去民主党走遍各大院校搜罗人才，从来也不成为大新闻，可是这个尼克松是共和党，居然也有这种见识！学界有一部分人当初听到在野多年的理查德·尼克松竟即将入主白宫，不禁大为震惊，现在看到他聘用了博学多才的基辛格，才略为安下心来。

由于基辛格同那些“自由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才使得那些死心塌地忠于尼克松的保守分子感到不安。此辈无非是政治打手，唯一的指导原则就是夺取胜利；他们同尼克松是患难之交，经历过残酷的厮杀，忍受过1960年竞选总统和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辛酸败绩，苦熬过一事无成的

60年代中期，好不容易捱到1968年，他们才尝到了胜利的甜头。可是突然在他们中间冒出了这位后来居上、外国血统、异国口音、哈佛出身的亨利，他只是在胜利之后才来投奔尼克松的。基辛格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尼氏白宫的形象。他们不信任他，讨厌他。他们对约翰逊政府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不放心，而这些人正是基辛格现在想拉进他的班子的。

他们对基辛格的怀疑、尼克松是知道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当选总统对自己能把这位教授从哈佛挖出来而感到的得意。对尼克松来说，和基辛格搭上关系可是大有好处。他能出奇制胜，突然任命一个与尼克松素无瓜葛的人出任重要顾问，这一招是政治分析家所意料不到的。他能把一个佼佼盛名的知识分子罗致到自己手下，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还是第一遭。当时为总统起草演说稿的威廉·萨菲尔指出：“要知道，尼克松不总是受知识分子拥护的，这还是说得客气一些呢。他久仰基辛格的大名，那是洛克菲勒王冠上的一块大宝石呀。尼克松懂得，他的政府需要一些知识分子在里边。他有的是权势，借用‘教父’的用语来说，他能向基辛格提供基辛格所无法拒绝的东西，现在他能满足基辛格对行动、权势、核心地位的欲望。而在这之前，他可拿不出什么东西能把基辛格这样的人从洛克菲勒那样的人那里拉过来。这是他颇为得意之笔。”

就任总统后的尼克松，在白宫的第一个晚上只睡了大约四个小时，清晨6点45分就起床了。剃胡子的时候他记起11月份拜访约翰逊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隐蔽的保险柜。当尼克松打开的时候，保险柜乍看好像是空的，随后才发现顶上一格有个薄薄的文件夹，里面是情报部门前一天，即约翰逊担任总统最后一天关于越南形势的报告。

他匆匆翻阅了一下。最后一页上写着最近的伤亡数字。截至1月18日为止的那一个星期，美国人阵亡185人，伤1237人。从1968年1月1日到1969年1月18日，共阵亡14958人，伤95798人。他合上文件夹，放回原处。

尼克松默默地想，未来的总统任期内，如何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呢？

三个字眼在他脑海里久萦不去！

这就是实力、伙伴、谈判！

“经过下一个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第一次说出这样一句话时，苏联反应之快，颇使华盛顿（包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冷不及防。几小时之后，克里姆林宫就向白宫提出了挑战，要求白宫说话要算数。苏联外交部把各国驻莫斯科记者都找了来，举行了难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们在那里听了苏联的两名高级发言人发布消息，而不像往常那样只是听宣传。

新闻司司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国际司司长基里尔·诺维科夫宣布，苏联已准备好就限制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问题“开始认真交换意见”。诺维科夫说：“尼克松政府的代表什么时候愿意坐下来谈判都行，我们是准备好了的。”

华盛顿这个和解的调子和莫斯科那个和解的响应，使许多美国人满怀希望。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冷战政策和铁幕政策，对抗和冲突，花费了不知多少亿美元来发展核技术，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可怕的大规模杀人武器——这一切，使这些美国人忧心忡忡。人们没有忘记，新总统本人就是最早的冷战武士之一，但是他现在讲话的调子似乎在变。还有什么比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

谈更好的办法来开创苏美关系的新“纪元”呢？

如果尼克松同意立即同俄国人谈判，基辛格原可以轻易地取得通常反对他的人的支持。但是，这时无论尼克松还是基辛格，对于接约约翰逊政府那套未经考验的谈判方案就仓促去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主张，都不感兴趣。不管有压力也好，没有压力也好，他们决定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先拖一拖再说。一些参议员、学者以及约翰逊手下的人把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但是，尼克松与基辛格这些新的战略家却不然，他们对这种会谈的看法截然不同。诚然，他们认为限制核武器至关重要，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同苏联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的策略，是以他们称之为“连环套”的思想为基础的。

“连环套”这个思想，是基辛格均势理论的最新运用。他自1954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几乎没有改变过。他在博士论文中以拐弯抹角的笔调写道：“如果一个大国能得到它所想要的一切，那么它就会力求取得绝对安全，即建立一种感觉不到有外国威胁的、一切问题都能像国内问题那样容易得到解决的世界秩序。但是，鉴于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意味着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因此，绝对安全决不可能通过‘合法’的解决办法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征服来实现。”在核时代，这种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征服是不可设想的，除非疯子才想这样做。因此，一项合理的政策所能要求的唯一目标是“相对安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即“稳定秩序的基础是各国的相对安全，因而也就是相对不安全”。

显然，要实现这样一种世界秩序，有赖于在敌对双方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而不能把一方的要求强加于对方。在基辛格看来，苏联始终是这种平衡的潜在破坏者。就人口和核力量来说，苏联是唯一足以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国家——而且在一个正在奋力建立秩序的世界里，苏联一直是动乱势力的祸首。现在应该教育苏联领导人，要他们掌握如何使他们本国的利益同其他各大国的利益保持平衡的手腕。因此，美苏问题同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问题取得进展，都会影响到其他问题。

基辛格对“连环套”的看法是广义的，带有一些哲学色彩；而尼克松则着眼于实际，着眼于具体问题。尼克松就任之前已开始认为，要实现越南的和平和保持中东的安宁，关键都在于俄国人。他觉得克里姆林宫同那两个动乱地区是有着明显联系的。

因此，如果苏联领导人在他们停滞不前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想取得美国的贷款和技术，同美国做生意，如果他们想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削减武器经费使之用于消费品生产，那么，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尼克松所考虑的是某种外交上的以物易物。必须使俄国人相信，遏制而不是扩大局部战争是符合他们本国利益的。这样，苏美就有可能跨入两国关系的一个新阶段，从对抗转向合作。

基辛格的均势思想，加上尼克松一心想拖住莫斯科来解决越南问题的念头，两者结合起来，便使“连环套”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础。莫斯科1月20日提出的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检验这项政策的第一个机会。

基辛格后来解释说：“我想在广阔的战线上采取行动。”他的目标是要达到“恰当的利益均衡”，以诱使莫斯科在解决一系列问题时采取合作态度。他说：“我不想玩弄气象学的把戏。”当时大家都知道他十分讨厌所谓“友

好气氛”之类的提法，这句话突出说明了这一点。基辛格希望同俄国人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具体的、切实的谈判”；而在他看来，每一项谈判都可以用来“防范”对方推翻一揽子的解决办法，同时也可以“防范”突然来一场世界性危机而破坏实现和解的通盘计划。他强调指出：“我们之所以这么坚持‘连环套’，原因就在这里。”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教育国家安全委员会，使之领会他们对国际问题的新精神。

在总统就职的次日，他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总统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驻越美军副司令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紧急战备局局长乔治·林肯；当然，还有基辛格。议题是苏联关于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倡议。会议的讨论情况是绝密的，没有宣布任何决定。当天下午，老资格的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对克里姆林宫这项紧急倡议作了唯一的官方反应，他对记者们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将得到新政府的“优先考虑”。他没有进一步发挥。

两天后，白宫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的是同一批人，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自那以后又过了两天，召集了第三次会议。总统迅速作出了决定。

1月27日，尼克松利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来宣布他对苏联关于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倡议的决定。这次记者招待会在白宫东厅举行，通过电视播送实况。他始终没有用“连环套”这个词，但在他讲话中多处包含了这个意思。基辛格当时在场听着。这时，离白宫不远，在第十六街和L街交叉口那里，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手下的人也都围坐在电视机旁，出神地听着尼克松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涵义。

尼克松一开头是这样说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就职以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我设想大家会有一些问题要提，所以我不想说什么开场白，就直接回答你们的问题吧。”

到第五个问题，才提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个问题。前面的几个问题是：新总统的立法计划，实现越南和平的“打算”，他对改善同北京的关系的悲观看法，以及他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那第五个问题是这样提的：“总统先生，关于对外政策，特别是核武器政策，你能否对我们谈谈你……对同苏联举行导弹问题会谈采取什么态度？”

尼克松回答说：“我是赞成举行战略武器会谈的。这里，问题不仅在于会谈什么时候举行，而且（后来证明，这个“而且”加得极为策略）在于会谈将在什么情况下举行。”

尼克松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有两派：一派主张，不管“政治解决方面有无进展”，都要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另一派则反对“对我国的战略武器作任何削减”，除非先在“政治解决方面取得了进展”。

尼克松不参加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他采取了中间立场。

他强调指出：“我打算采取的方针是，务必使举行战略武器会谈的方式和时机能够（如果能够的话）促使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同时取得进展，例如中东问题，以及一些只要美苏合作便可造福和平的其他重大问题。”

2月17日，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前来白宫作首次拜访。尼克松表示希望同他以及他的政府领导人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系，并说：

“大使先生，你和我都了解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根本性分歧。我们也许能够解决这些分歧，也许不能够。我希望能够解决。但是，你我至少应该确保我们之间不致因为缺少联系而产生不和。”

基辛格建议在他和多勃雷宁之间建立一条秘密渠道。尼克松也认为，多勃雷宁在绝对不声张的私下会谈中可能会更乐于提供一些消息，因此安排他悄悄地出入很少使用的东侧楼大门，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人的会面了。在一段短时间内，他们每周碰头，往往同进午餐。

当多勃雷宁说他的政府希望就限制武器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时，尼克松说：一个方面的进展理应同其他方面的进展联系在一起。

尼克松又说：“历史清楚地表明，武器甚或军备竞赛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不如根本的政治分歧和政治问题导致战争的可能性那样大。因此我认为，当我们开始战略武器谈判的时候，我们义不容辞地应该同时尽一切努力来缓和诸如中东、越南、柏林等剑拔弩张的地方的紧急政治形势。”

多勃雷宁在离去之前交给尼克松一份来自莫斯科的长达七页的正式照会，表示苏联人准备就中东、中欧、越南和武器控制等一系列问题求得进展。尼克松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

第十章 靠拢中国

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2月23日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动身，这是他当总统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那天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天下着雨。人们花了半个小时，从市内赶来给他送行，不停的毛毛细雨浸湿了他们的衣服。内阁成员都在场，还有来自国会过道两侧的国会领袖们。一群摄影记者在铁栏杆后面挤来挤去，想选一个好地方。

那时还是蜜月时期，那是尼克松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他对此非常高兴，就像一个穿过了荒凉沙漠的人到达了一个绿洲一样。他很精明，不会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矛盾：与他的整个政治生活记录相反，人们称赞他具有和解的品质。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今天的称赞，明天就可以变成诽谤。但是现在，他却陶醉于一种很不习惯的赞誉之中。

尼克松和站在机场停机坪上的知名人士简短地、不自然地开了几句玩笑，然后就大踏步走向麦克风去发表他的告别讲话。这篇讲话是典型的尼克松讲话。其中关于外交政策的部分是微妙的、谦虚的。他到欧洲去是为了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尼克松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次访问树立一条原则，那就是在和潜在的敌人谈判之前，一定要先和盟友商量。还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新总统并没有完全被越南问题缠住，同时要让国内的美国人明显地看到，尽管有人反对战争，他们的总统在国外还是受到尊敬甚至热情的接待的。

尤其重要的是，尼克松认为戴高乐总统的合作对于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打算同中国开始建立新关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同越南和中国都有外交关系，巴黎将是和他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的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戴高乐在最近几年变得和美国十分疏远。1966年他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迁离巴黎。美国能否利用巴黎作为我们采取主动外交运行的场所，尼克松认为将取决于能否克服他们之间的疏远以及与戴高乐建立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他的随行人员并没有听到他把这篇演说讲完，就被先遣人员匆匆忙忙弄上了“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每一次总统出访时，都是按这样做的。这种做法有两个理由，它的设计者要在总统一上飞机、机舱门一关上，飞机就立即起飞。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心要做到，在尼克松为了让记者摄影而站在舷梯上向群众挥手告别时，镜头上除了总统以外，别无他人。

在这次出访期间，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都是由约翰·埃科希曼和先遣人员干的——把他们叫做先遣人员，是因为在总统要访问的每一站，他们这少数几个人要在总统到达前几天就先到达，以便安排好总统的每一项活动。

在尼克松身旁工作，如果不装出一副刚毅的样子，是不能得到重用的。开始时，作为权宜之计而摆出这么一副神态，到了后来，久而久之就可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埃利希曼的禀性实际上是很温和的。他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家庭，他很爱他们。他本来是最喜欢制订一个向前看的国内计划的——而且最后，他也被赋与了这个任务。但是他有野心。他首先要人家承认他是白宫的重要人物。正因为这一点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他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可能表现得非常盛气凌人，有时甚至会使人不愉快。他尊敬基辛格，他羡慕基辛格，因为他认为——这一点从他的观点来看并不错——基辛格占有了权力和荣誉的精华部分，而他还得继续忍受由尼克松的老班底和华盛顿权势集团之间的互不信任而产生的社会对他们的排斥。他抓住了几个机会来找基辛格的麻烦，常常采用一种对泄露情况进行调查、旨在表明基辛格的工作人员

不可靠的方式。因此与基辛格常常有摩擦。埃利希曼是鲍勃·霍尔德曼的朋友和竞争对手。随着埃利希曼在白宫活动的实质方面逐渐得势，而霍尔德曼对这一方面又是明显地不感兴趣，他们两人的关系改善了。但是在这次出访中，他们的关系又相当紧张起来，因为霍尔德曼决心要把先遣人员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做到了这一点。在这次出访中，埃利希曼是最后一次担任先遣人员，以后，这个责任就由霍尔德曼的副手德怀特·查平接管过去。

埃利希曼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总统出访，从后勤上说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单单是总统保镖就得超过 50 人。然后还有总统的随身人员、秘书和管行李的人，一组一组的电讯工作者，因为无论总统走到哪里，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必须能够通过电传或者电话，立即同世界上任何地方取得联系。而且，只要总统出访，他就不能不带许多助手和各部门的代表，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跟随总统出访就是一个为人所羡慕的地位象征，即使他们并不参加什么会议，而且几乎很少或者是完全看不到总统。还有随行的新闻记者也常常有 300 多人。总的算起来，一个典型的总统出访班子，大概是在 600 人到 600 人之间。

要在一个日程紧迫的访问中有条不紊地安排这一大帮随行人员的活动，可不是一件小事。单单是报界人员，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必须报道总统的到达和离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记者乘坐的飞机，通常是在“空军一号”之后起飞（这样他们就能够采访离开时的消息），然后在飞行中要超过总统座机，先行着陆（这样他们才能够采访总统到达时的消息）。此外，还有四个到六个的少数报界代表乘坐“空军一号”。记者必须出席所有的重要场合，但同时又得让他们有机会写消息，发消息。

被弄得有点晕头转向的正式成员处在这场奇妙的事业的核心。每个人被发给一个小册子，上面记载着每一项活动和每一个行动，时间规定得几乎一分不差，此外还画了一些图表，说明在举行仪式时什么人要站在什么地方，小册子上还记载了住宿、参加会议以及其他重要事项。奴隶般的服从是唯一可靠的办法，虽然这样做对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对他的神经健全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个先遣班子，由于在竞选运动中的磨炼，正是锋芒毕露达到了自信的顶峰。他们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对总统的义务。在竞选中，每到一个新站，就把头一站的主人抛在后面，所以，考虑这些可有可无的陌生人的情绪，并不属于他们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他们唯一的责任是：保证尼克松一切顺利，保证不让他面临他非常憎恨的意外情况。他们应当给他安排较长的休息时间——新闻公报中称之为“工作人员时间”，尼克松需要利用这个时间来集中精力，准备重要的面对面的会谈。最重要的是，先遣人员认为他们有责任保证，当尼克松在人们眼前出现时，总要给人以最好的印象。他们在这方面有时做到了荒唐的地步。1972 年到渥太华进行国事访问时，一位先遣人员认为，皮埃尔·特鲁多办公室里的黄褐色家具在电视上不会使尼克松上相，因此自作主张，要用蓝色罩布的沙发，来重新装饰加拿大总理的私人办公室。特鲁多的一位僚属起先还不信真有此事，后来气得连话都说不清楚，在最后一分钟，阻止他这样做。

尼克松总统一上了“空军一号”，就埋头去阅读他那一些范围广泛、内容详细的汇报文件。演说稿当然是早就起草好了的。无论用的是什么理由，当总统的总是没有时间起草自己的演说稿的。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演说都出自于同一个来源：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基辛格的监督下准备一个详细提纲，尼克松看过，也许还得作一点修改，然后就交给一个演说起草人撰写。

当他要发表一篇重要演说时，他可能亲自作大量的改写，特别是在开头和结尾，任何政治上的含意他都尤其当心。如果他认为基辛格会同意他在修辞上的改动，基辛格就可能看到最后文本，否则就看不到。在进行一次动作迅速的国外旅行中，不会有时间对演说稿作较大的删改，演说起草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选择谁来起草演说稿，总是决定了演说的调子，而且往往也决定了一篇总统演说的实质。一般人都以为，演说起草人是被动的工具，他们温顺地把总统的政策思想巧妙地写成优美的文字，但是情况正好相反，绝大多数演说起草人，自己就是一些失意的首长，他们想利用他们的特有地位，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清楚地知道，总统的一句话，可能被官僚机构当作一个宪章来使用，所以企图垄断起草演说的最后过程，把他们的努力说成是为了维护总统的灵魂而进行斗争。

尼克松的演说起草班子，是一些具有非常的才能的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每个人的专长细到这样的程度，他要拨什么样的弦，就有什么样的起草人。在这次出访中，主要的演说起草人是比尔·萨菲尔。他时而妙趣横生，机动灵活，对公职方面的关系惊人地敏感，有时能写出一个句子来，用聪明的字首押韵法，来模糊句子的含义。虽然他的文风是如此独特，以致尼克松在想表现他自己的文才的场合很少使用他，但是萨菲尔是最不可能把他自己的实际思想塞到演说中去的演说起草人。雷·普赖斯是演说起草人中资格最老的。他聪明、四平八稳，倾向于自由派。当尼克松要想表达崇高的、多少有点带哲学味道的超党派精神时，就用上他了。帕特里克·布坎南是一个住在白宫的保守派，他深恐有一些人会诱使尼克松偏离他天生的右翼倾向，他相信有一帮知识分子，正在搅混总统哲学的质朴的本质，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即以不同的脸孔对待不同的人是我们的八面玲珑的首长的本性。很少让他来写尼克松的外交政策的演说。

除了一大文件夹的演说稿之外，尼克松还要看基辛格的工作人员和国务院为他写的成本大套的汇报，其中包括一份总的概念性文件。这份文件是解释美国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战略以及这些目标与美国总的外交政策的关系。此外，还有在每个国家的谈话要点，其中讨论可能会提出的问题，还有关于他要会见的领袖的传记材料。为了尊重总统的癖好，谈话要点设法把每一次会见尽可能变成一次按计划进行的会见。它们分成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领导人可能提出来的，以及建议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还提醒要避免哪些敏感的问题。

与任何生人的会见使尼克松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紧张。他害怕突然发生的意外问题，某一个不是意料中的话题，或者是他没有准备应付的论点，而这种论点一经提出，就可能使他显得不像他的自我形象所要求的那样掌握着形势。因此，他坚持要有这样一些汇报文件，极其详尽地设想谈话的可能进程。但是，因为尼克松不愿意承认他需要指导，因此他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纪律，要把这些备忘录的内容都记下来。并且为了表示他记得多么清楚，同时也是为了耍一些他自己非常得意的小花样，他就像滑冰一样，敢于滑到人家告诉他去不得的地方的边缘。有时，他表演一些惊险的镜头，他的顾问们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他却决不会从悬岩上掉下去。

在“空军一号”赴欧途中，总统除了要谙记这些逐点分析外，还忙着读一篇关于戴高乐的长文。这篇文章是参照基辛格写的一本关于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联盟的书《同床异梦》改写的。

尼克松逗留的第一站是布鲁塞尔。尼克松在那里对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所说的话，为这次访问定了调子。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礼节；为了征询意见，不是为了坚持意见；为了协商，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为了倾听和学习，并揭开我所希望的经常交换意见和看法的新篇章。”

从技术上说，访问布鲁塞尔是为了访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但是，比利时方面要来安排这天晚上的活动，所以，汽车把尼克松一行送到了市中心的巍峨的皇宫。博杜安国王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就告退了，剩下总统和比利时首相加斯东·伊斯更斯、外交大臣皮埃尔·阿麦尔、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比利时方面对基辛格的在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的礼宾条例没有接待总统助理的规定。基辛格的出席还打乱了外交官心目中十分重视的人数上的精确对等。因为他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摆脱基辛格，所以，他们在自己方面又加上了首相办公室的一个成员。

访问的所有领导人都把建立和尼克松的密切的个人关系——也许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是在这样做——当作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比利时的部长们也不例外。在那时或以后，无论尼克松在美国可能引起怎样的憎恶，然而在欧洲，同美国总统的友谊被认为是一笔政治上的资产。而且，当尼克松还没有当总统时，会见过他的人对他的看法是好的，特别是他对世界问题的知识。这种对他任外交政策方面的能力的尊敬，在他任职期间与日俱增了。

比利时领袖们关心的是国际关系的缓和。像大多数欧洲领导人一样，他们也认为尼克松有冷战战士的声誉，对他很不放心。他们显然认为，他们需要力陈一下缓和紧张局势的好处。他们说，苏联由于人民希望得到消费品并且害怕中国，是需要缓和的。比利时方面还断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强大的防御力量，是缓和的先决条件。但是，他们也表明，要欧洲增加防务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本质上，他们是要求美国继续大量驻军欧洲。他们还机智地暗示了越南战争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的国内问题。

这种正式的交换意见是尼克松的拿手。他安静地解释了他要实现一个和平新时代的决心；他同意和平，但只能建立在西方实力的基础上。他强调他对大西洋团结的诚意，和他决心在作出重大倡议以前，先向盟国征求意见。

第二站是英国，尼克松受到英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因此，精神焕发。他喜欢古老的仪式。他上台不久，对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感到非常新奇。乘坐“空军一号”在外国的领土上着陆，受到一位国王、后来又是一位首相的欢迎，检阅仪仗队，访问契克斯——所有这些都是他年轻时的美梦的顶点，是身居要职的理想，对于来自加利福尼亚一个小城镇里的一个多少有点愤懑的穷青年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一切使得尼克松表现了一种近乎自发的欢欣。很少看到他这样情不自禁地快活过。虽然这一天的讨论没有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尼克松还是喜欢既不会发生对抗局面、又不纠缠细节的哲学性的对话。尼克松拼命希望听到人家说他干得多么好。就像他后来在其他许多场合所做的一样，一再要基辛格复述他在这一天的各项活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那时他已经上床，就像在神经紧张时偶尔发生的情况一样，他开始说不清楚话了，或者是费了极大的劲才把话说清楚。给他鼓气是容易的。这一天，虽然没有遇到什么棘手的挑战，他的行为举止都表现了他的尊严和才干。

第二天，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的官邸和办公的地方），威尔逊为尼克松

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席间发生的事情显示了尼克松这个人身上鲜为人知的一个方面。在1968年春天，哈罗德·威尔逊犯了一个非常大的判断性的错误，他估计民主党会在选举中取胜，因而任命休伯特·汉弗莱的老朋友、约翰·弗里曼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这可能成为一个近乎灾难性的决定。弗里曼属于工党左翼，曾经当过劳工大臣。他在政府向人民索取保健费问题上曾与政府发生争吵而辞职。其后，他又当过电视记者，当过左翼《新政治家》周刊的主编以及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而颇负声誉。在当《新政治家》主编时，弗里曼曾为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失败而庆贺，他祝贺美国人除掉了“一个毫无原则、只愿意为了迪克·尼克松的事业不惜牺牲任何东西”的人。弗里曼被任命7个月后，尼克松竞选总统获胜了。威尔逊对他这个别扭的任命毫无办法。威尔逊拒绝更换大使，这是他的优点，但尼克松大发脾气。从尼克松政府开始工作之日起，他就发誓不和弗里曼打任何交道。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支持他。艾森豪威尔1月份对尼克松说，弗里曼的任命不仅是对尼克松个人的侮辱，而且是对美国总统的侮辱。但是，要美国宣布一位英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除了在弗里曼的大使任期内尽量给他制造困难和别扭外，尼克松似乎也别无他法。毫无疑问，尼克松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尼克松的先遣人员要求威尔逊从在唐宁街10号为总统举行的宴会客人名单上除掉弗里曼的名字，但遭威尔逊勇敢地拒绝，大家都怀着惶恐的心情去赴晚宴。

但是，尼克松是可以出奇制胜的。在宴会快结束时，他起立祝酒。尼克松看着坐在桌子正对面的弗里曼说：“有些人说，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尼克松。他们想知道是否有一个新的弗里曼。我倒愿意把那些都看作是过去的事情。毕竟他是新的外交官，我是新的政治家，我们都想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世界和平。”

这番话产生了电一般的影响。威尔逊说这个祝酒辞是他在唐宁街10号听到的最优美的祝酒辞。他在他的菜单上给尼克松写了一个条子：“你不能保证一生下来就是一位勋爵。但是，生来就是一位君子却是可能的，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通常沉着冷静的弗里曼，这时都感动得快流下泪来。这样后来就产生了一个证明——惊人成功的驻华盛顿使团。

尼克松和戴高乐一系列会谈，不论从尼克松个人来说或者从实质上说，都是这次旅行的高潮。当“空军一号”座机在奥利机场向终点滑行时，戴高乐站在舷梯旁，没有穿大衣，欢迎尼克松，尽管室外气温刚刚高于零度，但尼克松还是立即脱掉了大衣。握手的时候，戴高乐用英语向尼克松表示欢迎——这在他说来实际是一种破例的亲切姿态。

当天下午他们在爱丽舍宫单独会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苏联。

戴高乐说，对战后的欧洲来讲，最重大的生活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他说，“他们正在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而，我认为他们最后可能选择一种与西方和解的政策。”他觉得，不管俄国人当前对缓和的倾向如何，由于他们对德国军队历来怀有戒心，他们希望缓和的倾向只会增强。

“就西方来说，”戴高乐继续说道，“我们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除非你准备打仗或者把柏林墙推倒，别无其他合意的政策。促进缓和是明智的：如果你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那就只有同对方言归于好。”

“如果俄国人开始采取行动，”尼克松问道，“你认为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以大量常规地面部队来回击苏联人的袭击或袭击的威胁呢？”

“我只能代表法国人回答，”戴高乐说，“我们相信俄国人知道美国人不会容许他们征服欧洲的。我们还相信，如果俄国人向前推进，你们也不会马上就使用核武器，因为这将意味着一种不留余地的努力，把对方所有的人都消灭干净。假如俄国人和美国人都使用战术核武器，欧洲就要毁灭。西欧和联合王国将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所摧毁，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将毁于美国的战术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却不受损害。”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他们谈到了中国。

“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戴高乐说，“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尼克松点头表示同意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國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同意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在法国的最后一天会谈中，美法讨论了越南问题。美国曾经不顾戴高乐的警告，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便深深陷入了越南。因此，会谈一开始尼克松就问道，“总统先生，关于越南问题你看该怎么办？”

他沉吟了好长时间才开口。“总统先生，你希望我干什么呢？”他问道。“是否要我告诉你，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该怎么办？可是我并不处在你的地位！”

戴高乐认为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是进行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谈判，而直接和越南对话是取得进展的最好办法，尼克松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这个信息不久就传给了越南领导人，此后便开始了美越双方在巴黎的长期断断续续的秘密会谈。然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长期会谈没有任何结果。

从1955年起，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在日内瓦和華沙举行过134次会谈，但却没有真正交换过意见。双方交换的是口号，而不是真正的谈判方案。

在最初几个月，充满着各种矛盾的倾向。尼克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含糊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愤怒的孤立”这一词组使人回忆起他1967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但是没有得到反应。中国人没有被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

在就职典礼之后的第二天，新华通讯社指责尼克松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选定的新“代理人”，以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据新华社说，尼克松的低调演说和就职时在华盛顿发生的反对他的示威，表明美帝国主义“已深深陷入危机之中”，面临着“垂死挣扎”。

《人民日报》1月27日发表文章说，美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末日”。文章嘲笑道：“走投无路的尼克松竟说到了未来，……快要进坟墓的人用幻想中的

天堂来安慰自己，这反映了一种接近死亡的阶级的自我陶醉和绝望挣扎。”

在最初的日子里，尼克松确是有些自相矛盾。在就职五天之后，尼克松给基辛格和罗杰斯一封信，对美国驻欧洲一个国家的大使未能阻止那个国家承认北京表示不满。他说，这个大使是个“灾星”；要求他们马上“撤掉他”。在尼克松1月27日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是不是打算同中国改善关系。他在大量叙述了中国的敌对行动之后说：“在即将举行的华沙会谈中，中国将有机会来证明它是否已改变了态度。可是，在他们方面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认为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任何改变。”

这同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苏联、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不扩散核条约时所用的更加和解的语气，也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这次记者招待会前三天，由于发生了一个外交事件，2月6日，中国提出了抗议。2月18日，中国取消了预定2月20日举行的华沙会谈。为了不被中国占上风，尼克松在他3月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中美重新接近的前景进一步浇了冷水。他说：“展望一下前面的道路，我们可能想同中国取得较好的谅解。但是，我们是非常现实的。鉴于中国中断了计划中的范围非常有限的华沙会谈，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对在当前情况下在这方面取得任何突破抱乐观。”

2月1日，尼克松为了一则报道——该报道谈到某个东欧人士对中美可能进行接触感到关切——给基辛格写了个备忘录，说：

在你1月31日的报告中，我注意到来自（东欧）人士的引人感奋的评论。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原文如此）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试探应该私下进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可是，在同你的朋友接触中，务必特别设法使这一点为该……人士所知。我将继续来传播这一想法。”

备忘录的确没有要求基辛格对中国人做任何事情，它只是嘱咐基辛格可以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正在试探对中国的靠拢行动。而且，基辛格不是要向中国的朋友，而是要向东欧人传播这种想法。这样作的目的是要使苏联人感到不安，而且几乎肯定——按照尼克松的设想——会激发他们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

基辛格利用尼克松的备忘录进行一次政策审查。2月5日，基辛格召开了一次各机构间的联席会议研究对华政策，要求有关部门和机构研究下述问题：

- 一、美国同中国和台湾关系的现状；
- 二、中国共产主义对亚洲的威胁和意图的性质；
- 三、美国和其他有关大国对华政策的相互关系；
- 四、改变美国对华态度的方案及其代价和风险。

尼克松从欧洲回国后，在宣布美国的“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时，尼克松概述了与约翰逊政府1967年的“哨兵”反弹道导弹计划的主要理论相同的反华意图。两届政府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即看来取得某种保护以防较小的核国家的意外袭击或蓄意进攻是明智的，而不要企图建立一个防御苏联的庞大民防体系，因为这将会引起武器控制问题和预算问题。尼克松的声明说：“中国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批准这一计划，就会使得在70年代发生中国的核进攻时，或者来自任何其他方面的意外进攻时，把美国遭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中国人看来问题更严重的

是，尼克松进而暗示，在遏制中国方面，苏联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他说：“我可以想象，苏联像我们一样，不愿意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潜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之下。因此，我认为，哪一国也不会赞同放弃这整个计划，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威胁存在期间。”对此荒谬的理论新华社于3月16日谴责这一反弹道导弹决定是美国“同苏修勾结，共同保持对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核威胁、核讹诈”。

这样，一直到1969年3月，中美关系看来实质上冻结在同20年来一样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视状态中。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但还不是一个战略。当这种想法遇到机会的时候，政策就形成了。这个机会发生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珍宝岛的武装冲突。

尼克松打算访问更多的东欧国家，在苏联所控制的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并通过罗马尼亚来打开通向中美和解的道路。

还在1967年，尼克松就曾访问罗马尼亚，那时他还不是总统。

罗马尼亚领导非常尊重地对待他，而其他东欧国家对他的待遇则恰好相反。尼克松是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种国家的。但是他的主要理由是要刺激一下苏联人，当时，他对基辛格说：“等到我们完成这一旅行的时候，他们将会因为担心我们玩中国牌而发狂了。”

6月21日，根据尼克松的指示，基辛格召见了罗马尼亚大使科内尔·博格丹，向他指出，总统正考虑在7月下半月作一次环球旅行。如果总统在8月2日和3日在布加勒斯特停留的话，是否方便？在48小时之内，即6月23日，基辛格得到正式答复：罗马尼亚政府欢迎这个访问——尽管这不得不推迟早已定期的罗马尼亚党代会，这次党代会已邀请苏联领导参加。没有任何比这更能证明罗马尼亚对于单独向华盛顿开放和对于总统访问的重视了。

6月28日作了这个戏剧性的宣布。一位美国总统将第一次访问东欧一个共产党国家。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温和地说，这不是“一个反苏姿态”。总统对于他同罗马尼亚领导人的会见有着“非常愉快的回忆”，他们曾对这位作为私人进行访问的公民给予热烈的接待。“美国对于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东欧国家打交道很感兴趣……我们感觉，对主权国家进行访问之前，没有义务同苏联一道进行审查。”

很多人假定尼克松政府是无可救药地好战和反苏的，这种假定传播得如此之广，以至于访问罗马尼亚马上就被谴责为鲁莽行动。国务院有些人反对访问罗马尼亚（这是通过白宫渠道安排的），认为这是危险的挑衅；他们害怕这会破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谈判。各大报也抱同样观点。罗马尼亚之行被攻击为“捣乱”，说它可能危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没有必要地招惹苏联人的“大错”，它将没有必要地使苏联在东西方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而又没有必要地由美国给一个“残暴的共产党专制”唱赞歌。

苏联人也以一种表明他们懂得这次访问的意义的姿态作出了反应，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原定要参加罗马尼亚的党代会，改期后这个计划取消了。

尼克松在8月2日到达布加勒斯特，受到了“数十万挥舞旗帜的罗马尼亚人的热烈接待，这次欢迎是他这次环球旅行中受到的最盛大、最真诚友好的欢迎”。他参观了一个当地市场和一所民间舞蹈学校，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道参加了一个舞会。《纽约时报》这时才信服了，它在8月5日发表社论高呼，那热烈的欢迎显示了美国在东欧所享有的巨大善意，对于那些对侵略捷克记忆犹新的东欧人来说，总统关于和平、国家主权和和

平共处的论点不是陈词滥调。

尼克松受到如此压倒一切的、盛大的接待，当然一部分是由于政府的鼓励和安排。但是，即使接待是经过组织的，它还是不寻常地显示了罗马尼亚对苏联的独立性。而且要制造一种热情、愉快、富有人情味的公开表露的场面，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很困难的。数十万人仁立在布加勒斯特街道两旁，等待看一眼总统的汽车。他们不仅沿着从飞机场出来的林荫大道，或只在总统下榻的宾馆附近呆着，他们还冒着下个不停的雨，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尼克松在任何地方出现，哪怕只是看他一眼。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欢迎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所作出的热情洋溢的反应，实在是深为感人的。

在与齐奥塞斯库的会谈中，尼克松谈到了中国，表示美国反对苏联企图遏制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并请齐奥塞斯库向中国转达他打算在总统任期内改善美中关系的愿望。

以前，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时，也对叶海亚·汗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已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宣布一次同中国和解的单方面行动。

从罗马尼亚回国后，尼克松让基辛格找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就中苏对抗问题举行一次无拘束的交谈。

谈话在圣克门蒂总统别墅举行。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前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惠廷表示，他不同意华盛顿对中苏边境冲突作出的那种不大在乎的反应。美国情报机关知道，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兵力在1965年是13个“不满员”师；到1969年春天已经增加到25个“满员”师，而且还在增加。然而，政府中占优势的看法认为，苏联在那里集结军队是防御性的。基辛格同许多政府官员一样，觉得中国进攻俄国比俄国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即使最近发生了冲突后，白宫也没有敲起警钟。

与此相反，惠廷却感到震惊，他把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归咎于俄国人。他提出了两个基本论点。第一，他指出，俄国人很可能正在准备对中国的核力量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他们沿中国边境不仅集结了部队，而且部署了导弹、飞机和坦克。不是吗，就在一年前，勃列日涅夫为了向俄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他的“有限主权”论，曾命令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他所谓的布拉格自由化的威胁。如果勃列日涅夫认为毛泽东主义对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霸权是一个威胁，那么，中国那个方兴未艾的核武库就可以看作是加强了这种威胁。的确，在那年夏天，驻在一些国家的苏联外交官已经有所暗示，说俄国可能不久就要摧毁中国的核力量而为人类造福。像“闪电战”这种一提起便令人想到纳粹突袭俄国的字眼，竟也经常使用了。

惠廷的第二个论点是紧接着第一点来的。不管俄国是否真正发动攻击，中国处在苏联“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乌云笼罩下，总是感到受威胁的。中国不能指望苏联采取克制或讲道理的态度。突然之间，中国西面的当年盟国成了比它东面的敌人更大的威胁了。

在惠廷看来，现在正是历史上的大好机会。美国是理解中国所处的困境的，它可以相隔20年以后第一次向太平洋彼岸伸出友谊之手；而中国则在文化大革命之余立足未稳，又惴惴于苏联重兵压境，因而很可能欢迎美国的这

个姿态。一时之间，太平洋大国可能来一个大改组的形势忽然变成了中心问题——对基辛格来说，这个形势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

当时，基辛格对惠廷的分析显然十分重视。几年后他承认，这个分析对于他在中国问题上思路的发展很有影响。别的学者，如多克·巴尼特、埃德温·赖肖尔、杰罗姆·科恩、卢西恩·派伊、亨利·罗索夫斯基、乔治·泰勒、詹姆斯·汤姆森，以及中国问题学者的元老费正清等人，也都起了作用，但以惠廷的影响最大。

这时，基辛格才开始注意到：俄国人进攻中国人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人的可能性。他后来承认，他过去认为中国人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过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他开始了解，中苏争端包括“两个方面”。他领会了中国信息的“微妙之处”：言辞激烈，但行动沉着。他认识到，通过中间人跟中国打交道是“荒谬”的。在许多中国通看来，这个看法毫无新鲜之处，只不过是过去那些令人沮丧的年代里老生常谈的东西；那时候，这些中国通曾设法使政府的高级决策人对中国采取比较现实的看法，可是到头来发现政府却只顾安于那种过时的浅薄的观点。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些，却终于成了发现新中国的当代马哥孛罗。

尼克松自从那年春天以来一直向北京发出信号，可是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但意味深长的是，也没有挨到那种老一套的痛斥。夏去秋来，基辛格先后从罗马尼亚人和巴基斯坦人那里听说，中国人不久可能会有意于恢复华沙会谈。于是他决定设法使中国人加快进度，要让北京看出尼克松是希望同中国对话的。

10月初，基辛格得到总统的许可，打电报给当时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明确指示他要在最近拣一个方便的外交场合，找到最高级的中国外交代表，向他建议恢复华沙会谈。这种做法，即使双方关系再好，也是十分出格的，何况当时中美两国人员在大庭广众之间见面也不答理，这种做法，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不用说，中国人一定会向北京报告这件事的。

这个主意真是“不可思议”到了极点，所以就连斯托塞尔这位堂堂职业外交官第一次接到基辛格这份指示电的时候竟也相应不理。

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尔发出内容一样的指示电，斯托塞尔还是置之不理。这位大使是苏联问题专家，他没有向基辛格询问这件事，也没有要求对这件事加以说明。如此又过了几星期。基辛格虽然早已发现政府工作人员自有其抵制总统指示的巧妙办法，但是直到那时，还不曾有过一个大使敢不理睬白宫打去的两份内容一清二楚的电报。于是基辛格发出第三个电报，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到11月下旬竟还是毫无动静。基辛格火了，再拍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最后，到12月3日，斯托塞尔才被迫执行了这个任务。在一次南斯拉夫人举行的招待会上，机会来了，他在那里认出了中国大使馆代办雷阳。好几次想去接近这位中国使节，却发现雷阳每次都故意转身躲开。最后，这位中国外交官匆匆地向主人轻声道别后，迈步走向门口。斯托塞尔这时只得急忙飞奔下楼去追赶他的对象，这样才能像国务院发言人约翰·金第二天描述的那样，跟这位中国使节“攀谈了几句”。那“几句”说的就是美国敦请中国人进行“认真会谈”。

12月11日，斯托塞尔和雷阳在中国大使馆正式会晤了。他们谈了1小

时 15 分钟。谈话的结果是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会谈。中国人第一次对美国一长串公开的、秘密的信号作出了反应，而且是善意的反应。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评论说：“中国采取这一政策的动机并非有爱于美国，而是有惧于俄国。”中国采取新姿态的直接原因是：在北京举行的中苏边界会谈已在 12 月初陷入绝境，莫斯科又报以破口大骂，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在以战争相威胁。

1970 年 1 月 8 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华沙会谈将在 1 月 20 日恢复。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奉白宫的明确指示，修正了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始。以前从来没有哪个美国发言人用这个正式名称来称呼过 1949 年成立的新中国。麦克洛斯基说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为了保证使信号明白无误地传到太平洋彼岸去。

美中两国外交官按照预定计划于 1 月 20 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会晤。这是两年多来的第一次。会谈的气氛是“实实在在的”。双方都提出了互派记者、学生和科学家的新方案。他们只达成了一项协议——2 月 20 日再度会晤。基辛格对于这个虽然不大但是积极的成果感到高兴。某种渠道总算重新建立起来了。

2 月 18 日，又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次是总统本人发出的。尼克松向国会提出了一个特别报告，题为《70 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充满着中国“伟大而生气勃勃的人民”、“有天赋和有教养的人民”之类的友好话，还强调了“同中国人民的传统友好联系”。中国这部分是由基辛格本人起稿的，改了又改，文中保证美国要“尽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尼克松没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正式名称，用这个正式名称，是那年后来的事。

2 月 20 日，以斯托塞尔为一方和以雷阳为另一方的美中两国外交官，在两个月之内举行了第二次会晤。据基辛格说，中国人一到美国大使馆，就做了一件使主人大大出乎意外的事：他们建议把会谈移到北京举行。他们还暗示，他们欢迎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率领代表团。

关于究竟是谁提出这一不寻常的建议的，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说，是美国方面带了使他们自己也感到意外的建议去参加 2 月 20 日的会晤的，这就是，提出由美国派一位高级官员访问北京。可是，基辛格却说，那时美国并没有提出这种建议。他承认，国务院可能已经在考虑这样做，但并未得到白宫批准，也没有向中国人提出过——至少那个时候不曾提出过。

北京会欢迎美国派官方代表团到那里去，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从中国对苏联的意图越来越有戒心这一点来看，中国向美国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说得通的。然而，北京的措词却故意含糊不清。中国方面并没有明确邀请美国派一位高级人士去访问北京，他们好像是说，美国方面可以随便派什么人去，不论职位高低都行。中国人平日办事是能够做到十分精确的，这次却甚至不说明究竟是否要美国秘密派人去，也没有说明这个人的使命是否仅仅是把华沙的会谈换一个新地方继续举行。不管怎样，美国没有立即接受中国的建议。基辛格拿不准这项建议是否只是为了破坏华盛顿同台湾的关系，还是中国人确是想要进行更认真的讨论。他也不能断定，北京是不是举行会谈的理想地点。

国务院的专家也有他们担心的问题：中国人是否会给予到北京去的美国谈判人员以“外交豁免权”？中国人是否会允许美国人建立跟华盛顿通讯的

“可靠”渠道？日本人和台湾人是否会把这样一次北京之行解释为美国人向中国人磕头？他们当中有些人还不服气地说，到头来，美国人为什么非得像过去的外国朝贡者那样跑到这个“中央王国”去呢？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吗？

基辛格用了一两个月时间，集中研究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政府为了跟中国开始新的对话而作的努力，惊动了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过去他们对总统的罗马尼亚之行感到不安，现在他们对于同中国人突然热乎起来也感到不安。这些专家认为，这种做法一时之间在外交上的好处十分有限，但却可能得罪俄国人，因此而妨害进一步改善苏美关系。他们还指出，如果演这出戏真是为了要利用中苏争端，那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基辛格倾听了他们的意见，最后还是没有采纳，从“大局”出发，跟中国打开关系已是势在必行的了。

华沙中美会谈的第三次会晤原定5月20日举行，内容主要是为了认真交换意见（也许在北京进行）提出一些原则。但是，在两国使节会晤之前24小时，北京声称由于美国在4月30日入侵柬埔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局势”，因此把会晤取消了。

于是，尼克松通过“第三方”的接触，向中国人保证，美军进入柬埔寨，并不表示以往秘密转达的美国政府要退出越南并同北京改善关系的那个愿望有了什么改变。人们认为，中国人直到5月19日，即美国对柬埔寨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差不多三星期之后，才取消5月20日的会晤，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采取新态度的第一个信号，是在10月1日中国国庆节发出的。这一天，在红漆巨柱耸立的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上，站着面带笑容的76岁的毛泽东。紧挨着毛泽东站着的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中期曾跋涉长途前往延安窑洞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他，回来后写出了他的优秀报道《西行漫记》。官方摄影记者把镜头对准这两个老朋友，闪光一亮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毛泽东许可了向华盛顿接近的行动。基辛格不需要翻译也懂得它的含义。

那天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事情。毛泽东说，他“不满意目前的情况”，很不赞成文化革命期间的“讲假话”和“虐待”党员。他还对俄国人表示深切忧虑。他强调说，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论战可能要继续“一万年”。当这位中国领袖谈到美国时，他用了斯诺多年没有听到过的同情的语调。毛泽东说，中国很可能效法美国分散财富和分散责任的做法，暗示中国这个继续革命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可以从美国这个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的国家有所借鉴。

尼克松和基辛格，已从晨报上看到毛泽东和斯诺的合照。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认识到，是迈步前进提出大胆倡议的时候了。

10月初，尼克松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说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尼克松，尼克松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对尼克松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10月24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暗示，美国对于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问

题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美国反对以驱逐‘中华民国’为代价来接纳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换句话说，美国已采纳了“两个中国”方案。这是朝着脱离美国官方原来认为只有台湾可以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的那个观点迈出的一大步。10月26日，访问美国的齐奥塞斯库在白宫草坪上受到热烈而丰富多采的欢迎——有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两国国歌，有内阁成员，还有用大轿车送来白宫参加盛举的中学生。据两国的发言人说，那天下午，两位总统讨论了中国问题。当晚，尼克松在祝酒辞中，指出了罗马尼亚同“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良好关系的独一无二地位。一位美国总统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用语的重要性，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却不然。白宫的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他解释这个用语的涵义。基辛格幽默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台湾问题。罗马尼亚人私下声称，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就尼克松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本来一直是北京的立场，而不是华盛顿的立场。20年来，美国一贯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同华盛顿订有防务条约的“独立”国家。尼克松还表示，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齐奥塞斯库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美国发出的新信号——其中有些是以外交文书的形式发出的——都在几星期之内传到了北京的领导人那里。从11月9日到14日在北京访问的叶海亚，是主要的捎信人。叶海亚在11月13日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访问了中国，他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12月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尼克松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基辛格是美国信件的起草人，也是第一个看中国复信的人。他常常感到俄国和中国的外交文书迥然不同。他后来回忆道，中国人比俄国人“总是文明优雅得多……在风格和行文方面也细致得多”。实际上，华盛顿和北京彼此都在演奏抒情乐曲，双方都愿意避免宣传中使用的那种刺耳的声音和越来越高的调门。

据基辛格说，过了一阵子，这种信件写得“越来越热乎”了。双方一步一步地向着改善关系前进，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有一个美国高级人士访问北京，也许甚至是总统去。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毛泽东。在报道中，斯诺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样一段话：

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据毛泽东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毛泽东将高兴同他谈，尼克松作

为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

斯诺接着说：

毛泽东对我说，是的，他宁愿要尼克松而不要社会民主党和修正主义者来，那种人表面上说的是一回事，但上台后干的却是另一回事。

他接着说，尼克松也许骗人，但也许比另外一些人稍稍好一点。尼克松依靠硬的一手，但他也用软的一手。是的，尼克松可以坐上一架飞机到这儿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将愿意跟他谈谈，就是那样。不管他们会不会吵架，不管尼克松是作为旅行者来还是作为总统来，都行。他相信他们不会吵架……在谈论到尼克松可能访问中国时，主席随口说，美国的总统选举将在 1972 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个使者来，他自己在 1972 年初之前不大可能来北京。

1971 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齐奥塞斯库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尼克松捎一个口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 15 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尼克松 1969 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1970 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尼克松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个口信使尼克松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尼克松尽力使 1971 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尼克松在 2 月 17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在北京，《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尼克松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大门之外，当然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据报道，当时中国令驻在同老挝和北越毗邻的云南省里的 30 个师处于戒备状态。尽管美国保证它在老挝的目标有限并且不威胁到中国，但中国显然还是不放心。

偶尔充当中间人的挪威驻北京大使奥莱·奥尔高，对于中国的戒备状态感到大惑不解。他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说，中国想必不会认为在老挝的军事行动是一种“直接威胁”吧。乔冠华回顾了朝鲜战争的一段往事，那时社鲁门总统口口声声说美国的目标是“有限”的，但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却放手让美军向鸭绿江推进。乔冠华对奥尔高说：“我们相当相信尼克松在老挝的意图是有限的，但很难说某一个将军就一定不会盘算向中国挑衅，或者用猛烈的升级行动来掩盖失败。”

2 月 25 日，尼克松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二个对外政策报告中，用书面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正式称呼。2 月 26 日，基辛格在一次电视播送的答记者问中说道：“尽管战火暂时又燃烧起来了，但那是同脱身的进程分不开的……”基辛格接着重申了尼克松的保证：美国正在退出印度支那。

中国人在历史上看到过许多“蛮夷”来而复去。美国人也不例外。月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教授的话来说，按照中国的标准，“美国是在一夜之间暴发为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它存在的时间也就是从 1945 年开

始战战兢兢地运用强权起，到越南战争中取得了‘大国也无能为力’的教训为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老挝采取军事行动遭到的失败却保证了打开中国的局面。

到 1971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终于确信，美国在亚洲事务中代表一股退潮，而俄国人则代表一种日益增长的威胁。3 月 14 日，周恩来就印度支那和中美关系等问题同一位驻北京的欧洲外交官谈了一夜，内容非常广泛，其中说到，中国已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要跟美国领导人开始进行高级别的对话。另一位中国官员说：“这次打开局面大有前途，将是一件大事。”

两国首都之间的间接通讯几乎马上恢复了。由突然被内战所割裂的巴基斯坦转交的信件，在语调上发生了变化。以前，信件是故意写得含糊不清的，几乎是富有哲学意味的。如今，来信写得明确具体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正因又一次发生反战的抨击浪潮而垂头丧气，看到这种变化是感到高兴的。来往信件越来越表明，突破的形势已迫在眉睫。到 3 月底，基辛格的估计是“百分之七十”。这就是说，美国一位高级人士不久就到中国去这件事，已有“百分之七十的希望”了。

第十一章 神秘的国度

1971年4月，正是华盛顿河滨公园樱花乍放的季节。

这一天是4月6日，北京也是春意盎然。

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办公桌上放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是4月3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天前，毛泽东已经在看过后用笔圈阅，把报告批了下去。秘书已经对外交部与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接近了尾声，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4月6日下午4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毛泽东的眼光落在昨天下午送来的“大参考”上，登载的各国通讯社从日本发出的电讯稿，纷纷报道我们的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嬉皮士科恩交朋友的消息。19岁的格伦·科恩，洛杉矶圣莫尼卡的一个大学生。他说，中国人让他从一个练习馆搭车到锦标赛体育馆去，大轿车上有20多名中国运动员。世界冠军庄则栋对他很友好，他接受了庄送的一件礼物，一件漂亮的中国山水织锦。他甚至同庄照了相。他也拍了一些中国选手练球的、打球的纪录片。这个科恩还讲，如果他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去。他还回赠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给庄则栋，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庄则栋接受了。他说，中国运动员非常友好……

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

毛泽东看着“大参考”，思考着。

他想起尼克松总统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一系列表示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主动行动。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

什么反应？

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第二天上午 10 点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宋中向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转达了正式邀请。

这时正是华盛顿的午夜。

这个消息使尼克松又惊又喜。他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因此，尼克松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中国的邀请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实际上是向美国作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请示华盛顿，美国球队的护照去中国行吗？马上就得到答复：行！

当天晚上，尼克松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他让基辛格就对华新政策作了一个概述，但除国务卿罗杰斯之外，他没有把关于中国的秘密邀请和美国准备怎样答复的事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尼克松根据“只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的原则，决定其他人没有必要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欢迎总统对中国采取主动的做法，阿格纽副总统却加以批评。他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的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的意见被否定了。

4 月 10 日，九位乒乓球运动员、四位乒协人员、两名家属和最后一刻才得到签证的三名记者走过了香港通向中国的罗湖桥。他们是自 1949 年共产党胜利以来进入这个历史古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美国代表团。

这批美国人受到了中国方面经过精心安排但令人十分满意的款待。由于他们是应中国的邀请前来为一项外交行动执行打前战的特殊使命的，所以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4 月 14 日，这天下午两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座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 40 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56 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总理的手直摇。周总理盯着他：“我认得你在 1946 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

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得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搅周总理。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罗。”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受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在同一天，尼克松宣布结束美中之间已存在20年的贸易禁令，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放宽对华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几天以后，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演说时，有人问到最近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事件意义何在。尼克松答道：“我们正在看到一个预定的政策进程开始产生效果。如果编辑们寻求最新的头条新闻，我势必要使他们失望，而新关系的性质本身使这种新闻不可能出现。”最后尼克松讲了一番话，当时的许多听众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人的题外之言，实际上则是直接的暗示。

尼克松说，“那天复活节星期天，我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和朱莉都在——特里西娅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据我了解他们俩今年6月就要结婚——还有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

“谈话讲到旅行的事，当然还谈到蜜月旅行等等。他们问我，你想到哪里去？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旅行？”

“于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我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去。我在职的时候能否做到，我没有把握。我不想预测外交上的这两个问题。谈承认问题，时机还没有成熟。谈改变我们对联合国的政策，时机也还没有成熟。”

这时候，突然有人出来就对华外交工作信口开河，大放厥词，此人就是副总统特德·阿格纽。他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去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半夜以后他在旅馆房间里和一批记者进行了长谈，谈话之间他对记者说，新闻界对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作了赞许的报道，这是帮助中共政府获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他指出，有些记者对于北京居民的满足而丰富的生活发回了几乎是歌颂的描写。

尼克松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叫霍尔曼传话给阿格纽，叫他不要再谈这个题目。

紧接着乒乓外交之后，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整个事情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坐立不安的。只有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才理解周恩来的举动的全部含义，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来往信息。他们知道，某种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事件将通过什么渠道表露出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却是感到捉摸不定。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的，他既有事情变糟的预感，又满怀希望，既抱有为国家着想的崇高目标，又夹杂着一些政治上和个人的考虑。他担心中国会在最后时刻后退；同时，他对已决定了的事情——即在总统出访之前，先派一个下级使节访问北京——另有考虑。他想省掉先派使节这个阶段，以免使节的出使使他自己的中国之行为之失色。尼克松对展现在面前的前景欣喜若狂。但是，也因为老是担心他的事业得不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结局而忐忑不安。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可是，他的焦虑着急的心情有增无减。4月27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的时候，决定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

持缄默已经时间很久了，是不是有可能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

发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4月27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的口信。口信说：

周恩来总理感谢叶海亚总统于1971年1月5日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信息。周恩来总理十分感谢叶海亚总统；如果叶海亚总统能把下列信件的全文转达给尼克松总统，他当不胜感谢：

“由于当时的形势，未能及早回答美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信。

“目前，我们正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联系的情况。但是，如果要使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恢复的话，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全部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直接讨论才能找到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便进行直接会谈讨论。当然，如果美国总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行。至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细节，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全可能通过叶海亚·汗总统的斡旋作出适当安排。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的语气热情，使尼克松用不着担心受屈辱；以前发来的信息的那种高傲的语气已经弃而不用了。建议举行的会谈的题目仍然是台湾问题，但是重要在于撤走美国的军队而不是放弃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中国谋求举行高级会谈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恢复和美国的关系。他们特别向尼克松发出了邀请，不是随随便便口头提出事后可以否认的，而是在正式的信件中提出的。在尼克松看来，周恩来也不想冒险让下级人员在“形式”问题上争论不休。他决定把技术上的安排保留在巴基斯坦渠道内，这就保证了有取舍之权，可以进行高级审议并且可以迅速作出决定。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尼克松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尼克松花了以后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他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尼克松担心中国不满，反对他们派出一个和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尼克松与基辛格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同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尼克松问道。“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尼克松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尼克松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基辛格反对说，他象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尼克松说。

4月29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尼克松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尼克松只好自己问了自己。在回答一个关于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有人会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分——我不知道是什么身分——访问中国。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帮助制订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中国发生新的关系。”

大约在同一个月的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泽东欢迎尼克松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尼克松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尼克松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并提议由基辛格在此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尼克松觉得，倘若行动得过早，由于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全功尽弃。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于严重的国际窘境。

在焦急的等待中又过了两个星期，到5月31日，尼克松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1. 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 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 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 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尼克松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尼克松同客人在蓝厅喝咖啡以后，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5分钟后，基辛格跑着从西侧楼进来了，他交给尼克松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尼克松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8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周恩来总理建议，最好由基辛格博士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选定一个到达中国的日期；他可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至于飞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

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听完了信，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又谈了将近1个小时，谈了对华主动行动——它对美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必须如何灵活处理，以免失去主动。快到半夜他们才注意到时间，基辛格起身告辞。

尼克松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说完，尼克松起身沿着走廊走到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在一顶橱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的矮脚杯。在举杯时尼克松说，“亨利，我们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两天以后，在6月4日下午，基辛格把给北京的回信交给希拉利。在这个信件里尼克松总统表示感谢他们对基辛格去访问所表示的热烈欢迎。“由于时间短，以及基辛格博士需要为他的旅行找个合适的借口，他现在发现在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以前不可能离开华盛顿。因此，尼克松总统建议基辛格博士于7月9日到达中国，于9月11日离开，他将乘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飞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北京。”（后来是按照这个日程到达的。）在信里，尼克松对中国人愿意保守秘密表示感谢，并再一次提出授权基辛格就不久以后发表新闻公报事宜作出决定，“如果有此共同希望的话”。之所以选定7月9日这个周末是因为罗杰斯计划7月份再过些时候到伦敦去；基辛格不能在国务卿正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宣布总统将访问北京。

6月11日，周恩来写了一个简短的回信，同意接受7月9日这个日期。尼克松后来才知道，这对他来说是相当不便和尴尬的，因为北朝鲜总理金日成原定在这几天访问北京。叶海亚·汗当时正为处理东巴基斯坦的问题日夜操劳，本来很不开心，但执行这个使命的精神却使他兴高采烈。6月19日，希拉利带来了叶海亚的一份书面照会：“北京的上次那个信件似乎已最后把事情确定了。请我们的朋友放心，我们一定作好绝对可靠的安排，他在这方面不必有任何顾虑。”

大局已定，剩下的问题是落实到行动上了。第一个问题是使国务卿相信，基辛格确实需要到亚洲各地去进行一次漫长的“了解情况的访问”。这是基辛格作为安全事务顾问自己安排的第一次到国外去访问。至于怎样把基辛格的最后目的地通知罗杰斯，尼克松想了个很好的主意，他把罗杰斯请到圣克利门蒂去，在基辛格出访亚洲的大部分时间都把他留在那里。这样，他就能在最理想或至少控制得最好的环境下把消息透露给他。

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就在基辛格预定要到北京去这个时间，美国政府的全部高级官员似乎都迫不及待地要去漫游台湾。首先，尼克松不得不劝阻副总统阿格纽，请他不要去作等待已久的对蒋介石的访问；而请他周游世界，把重点放在中东和非洲。还有梅尔·莱尔德也打算基辛格正好在北京那几天去视察在台湾的防务设施；他已经作好了计划要到日本和朝鲜去同盟国的国防部长会谈。莱尔德是个组织纪律很强的军人，他没有询问基辛格要求他改变日程的原因，便主动重新安排了他的日程。

而由于要安排这种种公费旅行的事，没有为基辛格出访留下一架总统座机。总统到圣克利门蒂去要用两架飞机；阿格纽又要了一架；还有一架政府要员的座机又给莱尔德要了去。基辛格终于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架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指挥飞机，飞机上装满了电子设备，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那架飞机引擎太旧了，它要求很长的跑道。在起飞的时候，它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它宁可取道陆路到达目的地似的。

正当各种技术性的和官场里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时，发生了一件事，这在基辛格启程去执行任务之前的大大部分时间里，转移了的注意力：那就是公布了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当他们奋斗了好几个月建立起一条通往北京的秘密渠道，又克服了许多障碍和疑心之后，突然公布了七千多页的秘密文件，使政府受到很大震动。当然，这些文件丝毫无损于尼克松的总统地位。尼克松当时感到十分担忧的是，北京可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政府太不稳定，太容易受干扰，太不可靠，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大量地泄露政府机密，必然会引起其他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的政府对我们的可靠性的怀疑，甚至对我们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怀疑。

经过情绪激动的几个星期以后，秘密出访的日期快到了。基辛格选择了他的伙伴：约翰·霍尔德里奇，他是职业外交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中分管东亚问题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斯迈泽，也是职业外交官，在基辛格的工作人员中分管越南问题的专家；温斯顿·洛德，以前曾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现任基辛格的特别助理，主管最敏感的问题，他是基辛格信得过的亲信和密友。

基辛格认为谈判的秘诀是做好过细的准备工作。谈判代表不仅应当知道所谈的问题的技术方面，而且应当知道其中的细微末节。首先，他必须对他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必须研究他的谈判对手的心理和目的，并决定是否和如何把对方的目的和他自己的目的调和一致起来。他必须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因为迟疑不定的印象会招致对方的含糊其词或寸步不让；在谈判桌旁如果还需要经常去查阅文件就有损谈判的权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基辛格和他的伙伴们6月19日到20日跑到比斯坎岛去度周末，以便熟悉介绍情况的文件，这些文件已经重写过许多次——在出发之前还要重写几次。

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研究了将在中国举行的秘密谈判中肯定会遇到的问题，如：美国对台湾的政策问题，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美军撤出印度支那问题，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步调问题，等等。两人共同起草了基辛格准备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还准备了基辛格可以代表总统接受的十种不同的公报草案。厚厚的一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参考材料也搞出来了。

6月10日，白宫公布了按照总统4月14日的决定从对华贸易出口管制项目单上撤销管制的项目单子。齐格勒所发布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正在使种类繁多的非战略货物从此以后可以向中国出口；20年来，也是第一次许可中国商品向美国进口。这项公报指出，在对华关系上，我们“以后会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本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以来对中国所施加的单方面的限制现在已经大部分解除了。发信号的时期正在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谈判了。

7月1日那天黎明时分，基辛格的同伴们终于乘一架拥挤不堪、坐上去

很不舒服的飞机动身去作一生中重要不过的一次旅行。

基辛格先后访问了西贡、曼谷、新德里，每天六个活动，日复一日，始终守口如瓶，记者们的兴趣大大下降。当他于7月8日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时，跟前只剩下三个记者，没有谁再注意他了。

而现代外交史上最著名的遁身剧就要开演了。

首先公布一张行程表，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只停留48小时，从7月8日到10日，到达之后基辛格就声称肚痛，请大使馆诊所给他治病。他要装得越痛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会在晚宴席上邀他到位于纳蒂亚加利山上的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他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暗中往北京一行。但这样做还是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如果基辛格“病”了，怎能阻止大使馆的医生赶来照料基辛格呢？又怎能限制经过多年外交工作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一天二十四小时听候基辛格的指示呢？美国驻巴大使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叶海亚总统在招待宴会中开始执行基辛格的计划。基辛格的肚疼成了大家的话题。他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基辛格复原，他一定要基辛格到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去休养，这个别墅靠近总统的宾馆，位于穆里以北的群山中。当基辛格迟疑表示不同意时，他坚持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得恳切异常，以致基辛格手下一个特工人员听到之后，立即派了他一个同事前往该地，作为“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12点钟左右，这位特工人员打电话来，显得很狼狈，他已勘察过该处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基辛格无法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那蒂亚加利，直到他从北京回来。

在基辛格离开之前，从圣克利门蒂收到的最后的电报之一告诉基辛格，尼克松终于在7月8日把基辛格的中国之行告诉了国务卿，说这次访问是基辛格到巴基斯坦的时候接到邀请临时决定的。在基辛格起飞去北京之前几小时，才通过秘密渠道告诉他，要他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7月15日华盛顿时间下午10点30分是他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

7月9日凌晨4点钟，基辛格和随员们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由外交秘书苏勒坦·汗陪同驶往查克拉拉机场。基辛格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过路的行人把他认出来，其实在伊斯兰堡那样早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而且在这里基辛格的名字也决非家喻户晓。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波音707飞机停在机场的军用区等候。这架飞机7月6日、7日两天曾飞往北京，作为试验飞行，回程带来了几名中国领航员，他们要在7月9日的飞行中共同操作；他们一直耽在机舱中，不让人见到，直到基辛格一行到来。飞机由叶海亚总统的私人驾驶员驾驶，这位驾驶员早已得到指示，要他注意有窃听无线电联系的危险，因而要特别小心。基辛格自己那架飞机则停在查克拉拉机场的民航区，刚好遮住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但如果有什么记者或外国大使馆人员偶尔路过这里，一眼就可看到它。

基辛格登上飞机，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他是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周恩来派他来护送基辛格到北京，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

和他一起的有翻译唐闻生。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章文晋一行的第三位成员是王海蓉，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像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第四个人是礼宾

司的唐龙彬。

基辛格以前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派来的特工人员也不曾见过；基辛格去什么地方不曾告诉过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一切时几乎惊呆了。他们的指责不仅指的是基辛格乘坐了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违反他们平日训练的所有原则的——而且指责是一伙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带到一个没有“先遣人员”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完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危险。杰克·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严格执行任务，基辛格无论到哪里，都紧贴着基辛格身边，如临大敌。他们甚至在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的时候也要在场。他们看管两个装满了机密材料的沉重的文件包，走到哪里提到哪里，包括吃饭的时候和游览的时候都不释手。

7月9日上午8时，基辛格离北京已经不远，开始执行掩护计划。一队没有基辛格本人在内的伪装车队，花了三个小时，行驶50英里开到纳蒂亚加利。这个车队的乘客有法国大使、基辛格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两个特工人员，还有一位巴基斯坦副官M·M·艾哈迈德。哈尔·桑德斯（他了解这个计划）留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们讨论双边问题，并处理紧急事件。第二天上午9时（那时基辛格在北京差不多已有24小时了），基辛格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伊斯兰堡，说基辛格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基辛格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他还命令大使馆发电报到其余各站——德黑兰（短时间停留加油）、巴黎、圣克利门蒂，还有华盛顿——告诉他们基辛格修改的日程表。

一个成年人很难得有机会回到童年时的那种情景，那时时间仿佛是静止不动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神秘、新奇；每一件经历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后来长大了一些，对周围的事物熟悉起来了，也就感到平淡无奇了。再往后，对周围世界更加习以为常了，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生活像万花筒一样，各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多大差别。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时候，人们才回到童年时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当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基辛格的心情正是如此。那时旭日东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与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壮丽。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温斯顿·洛德站在飞机的最前端，他颇以此自豪，因为严格地说，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

飞机上，中美两国的官员围着一张桌子闲谈，好像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中美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

7月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飞机在北京郊外的军用机场降落。叶剑英元帅、黄华、韩叙、此外还有一位译员冀朝铸，前往迎接。

叶剑英元帅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基辛格一行接进城去，车窗用帷布遮起来。基辛格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最后到了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城的西部。周恩来于4时半来到。他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呢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

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基辛格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基辛格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在基辛格与周恩来相遇之初的半小时内，周恩来就已定了这次会谈的基调。基辛格在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的时候，想露一露口才，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基辛格猛然一愣，暗中承认周恩来讲的确是真话。他们关心的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他们必须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消除那种神秘感。这是基辛格与周恩来的基本想法。

就这样，周恩来和基辛格之间的会谈，较之基辛格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或许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会谈是唯一例外。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他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在基辛格第一次访问中，他和周恩来会谈用了17个小时。基辛格对周总理的印象显然十分深刻，他在回忆录中说：“在他任总理期间我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每天会谈时间6至10小时，除吃饭时间之外没有中断过。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伟大人物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很难加以确定的。诚然，中美两国的接近是由于客观的必要所使然；不是由于抽象的善良愿望而是由于双方有共同利益才使我到北京来的；不是由于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而是由于共同认识到一种危险才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利益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却是领导人在起作用，是双方的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那种可供选择的余地。中国和美国在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7月9日下午，周恩来和基辛格就在所住的宾馆开始了第一次会谈。他们面对面地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旁坐下，坐在那种在旧式避暑山庄中见到的不太调和的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是叶剑英元帅、黄华和章文晋，基辛格的班子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他们全都在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的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他们不想把基辛格丢给这些不明底细的外国人不管，任其摆布。在基辛格面前是那本厚厚的情况汇编，但自从开场白被周恩来打断之后，基辛格就不再翻它了。周恩来面前只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那是他要讨论的发言大纲。

双方一致同意，这第一次会谈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根本目的。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末促使他们会晤的那些必要因素将决定他们未来关系的方向，如果双方都不要对方去做那些违背其价值观念或利益的事情的话。这样，会谈就开始了，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像两位教

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几乎掩盖了这场会谈的严重性质。在基辛格看来，如果会谈失败，一方将继续陷于孤立，而另一方将加剧其国际上的困难。如果这次使命流产，那会增加中国的危险。毫无疑问，苏联将受到鼓励。美国现任政府在国内将声誉扫地；从印度支那的撤退将很容易变成一场溃败。尽管双方都知道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尽管会晤的时间限制铁定为48小时——如果没有引起怀疑，基辛格要按时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但他们第一次会谈都不接触基辛格此行成败之所系的这个关键问题：他们能否就尼克松的访问取得一致意见。双方的表现都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他们双方都把对方逼到墙角，企图表明他们都另有选择。他们彬彬有礼，讲些颇有含义的题外话，间或开开玩笑，企图表明他们还可能向后转。然而他们始终都心里明白，事实上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

在会谈开始时，他们两人都曾简略提到尼克松访问中国一事，此后直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始终没再提到，那时大约再过18小时基辛格就要离开北京了。然而，在他们第一次会谈中（包括晚宴在内，历时约7个小时），周恩来却花了一些时间表明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

7月6日，尼克松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闻机构负责人讲话。

尼克松对那个集会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虽然有最近这些匆匆的活动，尼克松并不认为中美关系有迅速发展的很大希望。他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开了门——为旅行开了门，为贸易开了门。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方面会不会另外开一些门……大陆中国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这样对全世界将是一种危险，而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在对方作出响应的情况下，还必须很明确地、很审慎地采取其他的步骤。”

这件事以及演说的内容基辛格都一无所知；这证明，哪怕作了最周密的准备工作，碰上意外事件也会猝不及防。第二天早上，周恩来以他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英文演讲稿连同基辛格的早餐一起送来，不过请基辛格看完之后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份。

7月10日中午，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继续会谈，选择这个厅、基辛格没能明白其中的深刻含义。

这次会谈的气氛，和前一天晚上的气氛很不相同。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就声色俱厉地谈了一套中国的观点。周恩来不加掩饰地提出了他们经常提到的很多观点，这些观点是：“天下大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支持北越人的“正义斗争”；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还有军国主义的日本）；印度是侵略性的；苏联人贪得无厌，正在威胁全世界；中国不是大国，也决不想作美国和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处于困境，因为“手伸得太长”。周恩来把这些强硬的观点谈了一遍以后，最后提出了一个难题：既然中美的分歧如此巨大，尼克松访问是否还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则表示是北京首先提出总统访问的，他们不能接受任何条件。他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由中国领导人决定是否发出邀请。然后他故意粗暴地逐点反驳周恩来的观点。在基辛格说完了第一点后，周恩来说道：我们如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气氛变了，周恩来又恢复了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

下午大约又会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问，倒似乎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剩下的只不过需要讨论一下日程而已。基辛格指出，如果在夏天举行最高级会谈，和他们的选举太接近，可能引起误会。周恩来改为1972年春天，基辛格同意了。他们在下午6时暂停会谈，因为周恩来必须在一个宴会中做主人，招待北朝鲜的领袖金日成。周恩来喜欢从午后到凌晨工作。他建议晚饭后10点钟再会晤，起草基辛格这次访问的联合公告。较晚的时候，黄华带来了一个公报的草稿，这个草稿立即引起争论。草稿认为是尼克松要求中国邀请他来访问的。草稿说，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以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奏，基辛格对这两点都拒绝了。

黄华作了一个明智、实际而又显示他个人风格的姿态，建议双方暂不讨论公报草稿，而互相坦率说明自己的目标。很明显，双方都不愿显得是屈居下风而不得不恳求对方；双方都盼望得到积极的结果；如果暗示会谈议程只对单方面有利，那对谁都是不利的。他们花了两小时摆自己的情况。基辛格说明了他们所关心的原则和国内的要求；他们不愿表现得像是在恳求这次邀请；台湾不能作为唯一的议程。黄华指出，这个公告对中国群众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像这样坦率的谈判是很少有的，与潜在的敌人这样谈判几乎是没见过的。约在凌晨1点40分，黄华提议休息30分钟，好让他去考虑适合双方的文字，于是离开了会议室。基辛格他们又在那院子里走了一会儿，回来等候黄华到来；凌晨3时基辛格得知，他们已经离开，要到上午9时才能回来。

在星期天，7月11日，9时40分又重新会谈，在不可更改的必须启程的最后时刻之间，谈了三个半小时。那天上午9时40分黄华提出的草案和基辛格的要求异常接近，只须改一个字就可全部接受。起草工作完成之后，周恩来立即出现，他原来就在附近房间等候。周恩来与基辛格讨论了建立今后联系地点的问题，结果选定了巴黎——由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黄镇接头。双方初步交换了尼克松来华的想法。这些事情都完了以后，周恩来花了点时间告诉基辛格在他断绝联系的这两天北京新收到的国际消息，这也是他特有的姿态。

7月13日星期二晨9时基辛格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这次环球旅行共历时12天。艾尔·黑格前来迎接基辛格。然后乘直升飞机飞回圣克利门蒂。理查德·尼克松早已迫不及待地机场等候。他已知道基辛格此行获得成功，基辛格在飞往德黑兰的途中就用约好的代号告诉了他。代号是“尤雷卡”（意即想出来了）。他收到这个信号后异常激动，一反原先的约定，要求立即用电报报告。基辛格从飞机上向他发了电报。他回电再三向基辛格表示感谢，并试图跟基辛格开玩笑，告诉他回来之后他可以休假一天。尼克松还对他们的保密工作大加赞扬。回想那些电报联系，基辛格得说那纯粹是由于好运气；再有，那就是掌管通讯联系的中央情报局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7月15日，太平洋时间下午两点45分（东部时间是5点45分），西部白宫发出了一个闪烁其词的通知，说5个小时之后总统要对全国的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大约过了20分钟，美联社就发了号外：“尼克松总统将于今晚10时30分对全国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题目保密，西部白宫拒绝事先透露。”

太平洋时间下午 5 点 45 分，基辛格和总统坐直升飞机飞往洛杉矶。尼克松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出现在全国的照相机和麦克风的前面，他发表了 7 分钟的一篇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

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这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尼克松一念完他这篇惊人的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了东场的评论员们，让观众听取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全都怔住了，萤光屏上出现一位编辑，他目瞪口呆、直愣愣地面对着全国电视观众，一句话也说不出。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也是如此。

此后几天是群情激动、也是颇为可笑的几天。世界各地纷纷打来贺电。新闻界几乎是一片赞扬声。也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评论，这类评论不仅来自保守派人士，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也来自极少数美国自由派的批评家，他们担心尼克松是在毫无必要地跟苏联对抗。但是这一抓住全世界心灵的大事件把那些声音淹没了。献计献策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要总统在一次出访中既访问北京也访问莫斯科；每一类人都有自己最得意的方案要总统去执行，如结束越南战争，扩大贸易，等等。这个问题说明了一种好现象：志愿支持尼克松的政策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踊跃，令人简直应接不暇。

以前，内阁要员们很喜欢到台湾去旅游，但顷刻之间，他们说有重要公务，迫不及待地要去访问北京了。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的建议像洪水般地提了出来，要到北京去，要求基辛格利用新的联系同周恩来商定时间。甚至还有一位夜总会的歌星，也请他的代理人想办法提出申请，要到中国各地的夜总

会去巡回演出。当有人告诉那位代理人中国没有夜总会时，此人嘟哝了一番，不相信这是真的，竟然写信来把这说成是难以置信的借口，为白宫的盛气凌人打掩护。

对尼克松来说，宣布访华是一大快事，他一下子就成了世界新闻中心人物，夺得了政治上外交上的主动权。

而基辛格原来只是小有名气，如今一跃而成为全世界的大明星了。因此，他对于承担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是非常得意而又十分高兴的。

第十二章 巨人的握手

1971年10月16日,基辛格开始了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准备。

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飞机,比上次舒适多了。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间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基辛格于10月22日到。飞机在上海着陆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官员到机场迎接——还是7月间到伊斯兰堡去迎接基辛格的那四个人,加上上海外事处的两位代表。他们的态度是适当的,但是拘谨的。在北京,接待他们的也还是他们上次秘密抵达时的那些人,虽然这次访问是公开宣布过的。像上次一样,也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率领官员来欢迎他们,这次有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参加。

那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待美国访华全体人员。他们在会议室的门口合影后,周恩来照例让他们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总理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他对基辛格的随从人员的生平都很了解,提到他们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时夸奖他们,提到詹金斯时,说他在22年前曾在中国居住过。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只限于谈一般性问题和议程。会后周恩来设宴欢迎美国代表团。他发表了一篇非常热情的祝酒词: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们,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来中国临时访问的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其他美国朋友们。基辛格博士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政治讨论和技术性安排做准备工作。

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16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我提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提到前一次谈话,这使人感到好像会谈从没中断过。周恩来有一种特有的风格,一种非常巧妙的讨人喜欢的技能。使头脑迟钝的西方人要过一会儿才能理解。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周,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那些下级人员、秘书和飞机的机组人员。这就奠定了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基辛格没有料到,最戏剧化的遭遇是在讨论尼克松访问公报的时候。外界的观察家往往认为,而那些政府首脑也促使他们认为,这些联合公告是从他们原来打算加以归纳的讨论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事实常常相反。通

常是先拟好了公报，而政府首脑的讨论是在这个框框内进行的。如果等到真正访问的时候才起草公报，那是自找麻烦。礼节性的事务花费太多的时间；也有很大的危险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政府首脑应该抓紧时间进行最高级的外交活动，以深入观察对手的认识和想法，而不应该字斟句酌地去推敲文字。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对未来作出决定，那就可能在出现危机时起很大作用。

尼克松已经授权基辛格来谈判他访问的公报。基辛格可以用尼克松飞机上的电传打字机同他联系，但尼克松身边没有工作人员来审查基辛格的建议，因为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基辛格身边。他本人也不想审查；1971年以后的所有的谈判，尼克松都赋予基辛格以自行决定的权力。基辛格和他的工作人员起草的一份公报初稿，是尼克松已经看过并且批准了的。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老一套的格调起草的，它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它用这种办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10月22日晚基辛格把这份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对基辛格作了初步反应，说他们的公报初稿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第二天上午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将同基辛格一起开始重新起草这份公报。

出乎意料，在约定的时间周总理本人来了。他与往常的样子大不相同，发言尖锐，长达一小时。——他说，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他宣布美国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不是真实的反映”。美方的初稿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人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中国人并不怕面对现实的分歧。

通常基辛格进行谈判是采取一种谈笑的口气，使对方感到很自然，避免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成意志的考验，但当需要决定一项方针时，他的口气就转趋坚定。基辛格说：我尊重周总理的信念，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而背弃我们的老朋友，那末中国人就不会尊重我们。我们不会同台湾断交。我们之间的问题必须由历史去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单纯为了记下哲学上的不同观点，而是为了规划一条道路。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到总统访问的时候再草率地拟定一项公报，但这要由周总理决定。

稍事休息之后，周恩来说他将在下半天提出一个公报初稿。晚上，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公报初稿。这份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毫不妥协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而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来阐述料定是相反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寸步不让的。乍一看这个初稿，基辛格大吃一惊。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基辛格认为，这在国际上和国内也是无法接受的。当他进一步思考时，不由得深深地敬佩周恩来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他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双方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可靠的信念。就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释，而这往往是那种典型的公报的祸根。而且在公报发表之后，不致于冒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每一方也不会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愿接受他的基本做法。公报可以用很大篇幅阐述分歧，在这些方面他们随后提出美国的立场。但是表达不同观

点的文字必须同这个场合相适应。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这是在重复报纸上天天发表的典型的宣传立场，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他们不会接受那种好像是在审判他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即使是明白无误地标明为中国观点。此外，还必须要有共同立场，否则此行将被认为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表演。基辛格答应第二天早上提出自己的草案。

这变成了一场体力的竞赛。基辛格去睡了三个小时，由洛德重新起草公报。然后他去睡觉，下半夜由基辛格修改他起草的公报。他们尽量使表达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温和一些，也写出表达美国立场的那一部分，并且拟出某些双方同意的共同点。他们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词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向中国公众提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目的。

10月25日，美方提出公报草稿之后随即开会。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偶尔有几小时中断，中国人要把草案译成中文，进行研究，无疑地，他们的立场要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同意从阐明中国立场的那一部分中删掉最尖刻的几句话。双方概述了主要的共同立场，特别是关于两国都反对霸权的那一段。

不出所料，台湾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美方需要一个方案，承认台北和北京都同意的一点，即中国的统一，但又不支持它们各自的说法。最后基辛格提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如下：“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基辛格认为他所做过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10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中国人在晚上11时35分要求休会。次日凌晨4时45分中国人交来新的草案，5时30分周恩来回到会场。双方又花了几个小时修饰文字，至8时10分截止，会议连着开了几乎24小时。终于对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文件。也就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公报鲜明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严峻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霸权的关切，双方承诺使关系正常化。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未作决定，但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而双方同意的部分则需要加强。基辛格认为到2月份他同尼克松再来的时候，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基辛格已决定在上午9时离开。周恩来把他送到宾馆的门口，第一次用英语对他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当基辛格在中国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时，联合国大会正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呆一天，不要正巧赶在表决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时回到国内。

10月25日联合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开除台湾，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比尼克松原来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他们原来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仍旧呆在联合国里。

基辛格的飞机刚刚起飞，电传打字机就传来消息：美国在联合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周恩来后来告诉他，在他刚要离开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联大表决的结果，但他不愿意第一个告诉他，使他难为情。在基辛格访问期间，他并没有感到中国人期望在那届会议取胜。周恩来只有一次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没有多说。

基辛格回国后，加速了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工作。为了安排尼克松访华的

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美国派了以基辛格的助手黑格上校为首的 18 个先遣人员来华谈判解决尼克松访华的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保卫工作的谈判。美国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总统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按美国的保卫规定，所谓捣乱分子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那会得到一个使他们不安的答案：不会少于八亿人。中国方面还安排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坐中国飞机及红旗轿车，这些都不符合美国总统访问的安全规定，两方争执不休。最后由尼克松答应同意中国的安排。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国政府给予方便。关于此事的谈判由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与随黑格来华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进行。熊向晖按周恩来总理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 100 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说：不要一听 100 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叫熊向晖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 1972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 时至 2 月 28 日 24 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用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齐格勒完全同意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元月 6 日的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在此之前，元月 4 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的时候，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黑格跟周恩来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 6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要解决他这个思想，总理觉得黑格这种思想在美国有典型性，总理具有针对性地使尼克松来之前就不能抱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为此，周恩来事前找了几个英文翻译，要他们将这个“生存能力”

（Viability）的确切含义告诉他；然后，他自己也查了有关的外文资料。在 6 日晚上的谈判中，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一下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像 Viability 这样的字眼？”

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 50 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黑格这才有点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 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请看——”

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并没有生气。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乘车穿过西长安街驶往下榻的民族饭店的时候，他心悦诚服地对翻译章含之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元月7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飞往上海。他们要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路线，事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讲话祝酒。初次来中国的黑格不懂中国的礼节，不知道他作为客人也要站起来讲话。他没有致答词。其实这是美国人的粗疏，并不是有意的。当天晚上，徐景贤、冯国柱等上海要员大为恼火，觉得黑格瞧不起上海领导人，半夜三更将从北京陪同黑格来的章文晋、章含之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说要整黑格。北京去的同志作了解释，他们不相信，还是要整他。

第二天，在黑格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的途中，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一个关于“两个中国”的不大友好的讲话的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等人大惊小怪，说黑格昨晚的恶劣态度就是因为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不友好的讲话。他们将章含之叫了出去，说要跟黑格谈话，要指出这个问题。章含之要他们搞清楚黑格到底知道不知道华盛顿方面的讲话。他们凭想当然认为黑格一定知道。他们决定在参观途中把黑格叫出来，向黑格提出抗议。黑格出来后既吃惊，也惶惑，申辩说他实在不知道昨天在华盛顿有什么讲话。上海那帮人将黑格训了一顿，提了抗议。然后，这帮人又打电话到杭州，告诉杭州接待要“降温”，说黑格此人很坏，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黑格一行到了杭州，到处碰到冷面孔。因为尼克松要乘船游览西湖，尽管眼下是一月中旬，天气酷冷，黑格也要上船游西湖。黑格乘的游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就有一杯清茶。据说原来已经在船上准备了点心水果，也因为上海来的“降温”电话而撤了下来，浙江的领导人一个个板着脸孔不搭理黑格。黑格十分惊诧不安，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加上当时是数九寒天，气候也冷，湖面冷风横吹。黑格在北京被周总理批评了，也可能以为在北京得罪了中国总理，这样在上海、杭州就被报之以颜色了。很容易造成这种误会。但是，黑格知道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他不敢随便得罪中国人，只好忍气吞声。章文晋、章含之等几个同志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中央的方针及周总理维护中美刚刚开始的关系的一番苦心，稍微懂得多一点，看不惯杭州的做法，担心影响大局。章文晋就打电话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黑格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晚上，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在杭州饭店会议厅里开会，为对待黑格一行人的接待问题争执起来，北京来的同志说要按中央的方

针办事，杭州的同志说对帝国主义不能讲客气，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争执不下。

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叫北京带队的章文晋、于桑接电话。电话打了一个钟头。周恩来得知上海的情况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授权周总理批评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作法，说黑格到了上海，要给他“加温”。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关照美国人爱吃糖，每个人送十斤糖。

说起毛主席知道美国人爱吃糖是有来由的。基辛格一行第一次秘密访华的时候，有关会谈及美国人的各种情况都需每天向毛主席作汇报。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美国人客房里都摆了水果糖，第二天收拾房间时发现这些糖果都“不见”了，于是，不断添加。毛泽东得到了美国人爱吃糖的印象。

周总理打来电话以后，杭州饭店会议厅里的会议内容变了，从刚才争执不休变为讨论执行周总理指示，然后连夜打电话到上海要“加温”。

第二天，黑格一行从上海过境飞回美国，不再在上海市内停留。上海那帮人一听毛主席过问这件事，总理批评这件事，也紧张了。一直不露面的王洪文也亲自出动了。这帮人全跑到虹桥机场，举行盛宴。排着队逐次给黑格面带笑容地敬酒。这又把黑格搞得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又发生了变化。黑格请教当翻译的章含之：你可得告诉我，指点我，什么时候该讲话，我实在弄不懂中国的礼貌，不知什么时候把人得罪了。在上海简直把他搞糊涂了。最后临上飞机的时候，又送给他们每人一盒十斤重的糖。那个漂亮的缎面大糖盒，是连夜叫工厂赶做的。糖盒送到美国人手中的时候，粘缎面的浆糊都还没有干透。每个美国人走上舷梯的时候都乐呵呵地抱着一只大糖盒。

尼克松盼望已久的北京之行终于要付诸实施了。

没有哪一个总统本人对访问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收录了有关这次访问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上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基辛格在7月和10月同周恩来的各次谈话也都分类摘录了。还有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人的长篇分析，由中央情报局和基辛格的班子里的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H·索罗蒙编写，作为背景材料。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书籍中的长篇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丹尼思·布拉德沃思、费正清、C·P·菲茨杰拉德、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尼克松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这可以从他到处在重要语句下面划线一事上看出来。像惯常那样，他把论据一一铭记在脑子里，待到和周恩来会谈时小心背出来应对，同时又力求造成出口成章的印象。

基辛格从马尔罗的《反回忆录》中选出的段落，竟然促成尼克松在最后一分钟邀请这位法国伟人来白宫作客。当年法国把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借给美国展出时，约翰和杰奎琳·肯尼迪夫妇曾为马尔罗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那次盛会对尼克松的影响真不小，以致他想比他所嫉妒的前任更胜一筹。肯尼迪的晚会主要是个艺术集会，这在尼克松的眼光里无非是“花花絮絮”，而他和马尔罗的会见却纯粹为的正经事。他和这位法国作家的合作不是为了搞一场社交活动，而是为了准备一项历史性的使命。

马尔罗在30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

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他的《反回忆录》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描写，是尼克松在为访华进行准备时所读的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读物之一。

马尔罗那时已 70 岁。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他言词的敏捷。他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同他谈话时，问到他几年以前他会不会想到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

他回答说，“这个会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了越南战争？”尼克松问。

“啊，是的，即使这样。有一个时期，中苏之间的友谊曾是晴空无云，但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

尼克松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他说，“5 年前，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 50 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说，‘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那天晚上尼克松在住宅里为马尔罗设宴，在进餐时他就尼克松应该怎样同毛谈话提出了一些意见。

晚宴后，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尼克松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想到 16 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尼克松亲自出门送马尔罗上车。当他们站在北廊台阶上时，马尔罗转过身来对尼克松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1972 年 2 月 17 日 10 点 35 分，尼克松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他想到马尔罗讲的话。觉得自己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尼克松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快到北京的时候，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此时的北京机场，却有点冷冷清清。昨晚刚到的一小批美国记者，在中国北方清晨的刺骨严寒中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停机坪上几乎空无一人，气氛冷冰冰。一位记者打趣说：“这是尼克松参加劳联——产联大会以来受到的最高接待了。”不见有中国领导人到场。另一个记者问他的中国译员：“周恩来在哪儿？”译员神秘地说：“就在附近。”

15 分钟之后，总统的蓝白色喷气机冲开晨雾出现了。机舱里的卫士长跟地面上的保卫人员进行了例行的无线电联络。

“群众呢？”

“没有群众。”回答说。

“你是说‘没有群众’？”

“一点不错，没有群众。”

当“76年精神号”终于接近机场的时候，场面很快变了。一面美国国旗升上了旗杆，同中国的五星红旗迎风并列。一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组成的350人的仪仗队，身穿黄绿、草绿和蓝色咔叽军服，霎时间出现了。周恩来总理率领着为数不多的欢迎人员穿过停机坪，向座机走去。

当没有戴帽子的总统同穿着皮领红大衣的尼克松夫人走出飞机的时候，机场上听到了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你们一路上好吗？”周恩来用英语问。尼克松答：“非常好。”他的声音在整个停机坪都听得见。“我们在夏威夷和关岛歇了一下，适应时差。这样好一些。”尼克松首先伸出手去与周恩来握手。

在美国来客中，周恩来认出了基辛格。“啊，老朋友。”他笑着说，同亨利握了握手。基辛格这个老中国通，七个月中，是第三次来北京了。

尼克松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

机场上没有发表讲话，没有各国外交官，更没有“普通”中国人挥舞纸旗、花束的场面。这是一种简朴的欢迎仪式，它标志着这两个国家从敌对走向缓和的过程中的一个中途站。周恩来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然后隐入黑色轿车前往离机场半个小时路程的钓鱼台。在他们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透过车窗，尼克松看到的是一幅灰蒙蒙的隆冬景色。很少有中国人注意看这列急驶的车队，看到的人也只是漠然处之。车子经过的路旁竖立着许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大标语牌，刷着红底白字：“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邓颖超在美方官员下榻的地方等候他们，那是两座很大的政府宾馆楼。他们在起坐间喝了茶，然后周说，他相信大家为国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

尼克松想起罗杰斯说的话：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总统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总统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尼克松到达宾馆约一个小时，就来了一个意外的电话，问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现在去会见毛主席是否方便？电话里这样问。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前几次访问知道，他能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中国革命家，也许还不止一次，但他却没有料到这么快就安排会见。毛泽东通常要等到来访的外国要人离开中国的前一两天才会见他们。尼克松对这种破格的礼遇感到高兴，但并没有受宠若惊。他决定迟到几分钟。

毛泽东住在紫禁城西南角的一所平房里，四周是耀眼的黄琉璃瓦作顶的朱红围墙。尼克松从西门进去。大门口两名武装警卫立正行礼。轿车在通往毛泽东住所的通道前停下来，不带军衔和武器的军官迎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次明摆着没有邀请罗杰斯国务卿，周恩来后来曾经为这个怠慢设法加以补救。

毛泽东的书库是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尼克松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恩来后来告诉尼克松，他患了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

为了把毛泽东与尼克松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前头涌进会场。主人与客人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大家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泽东主席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恩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尼克松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泽东主席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叫骂。”

毛泽东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泽东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她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尼克松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泽东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尼克松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泽东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尼克松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恩来说，这时毛泽东同他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时，毛泽东说他必须老实告诉尼克松，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尼克松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尼克松回答说，“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泽东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尼克松补充了一句。

毛泽东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尼克松说。

谈话转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

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同毛泽东会见，主要谈到美中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尼克松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

尼克松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泽东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尼克松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尼克松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泽东露出了笑容。

尼克松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说，“还有匪帮。”

毛泽东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們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尼克松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泽东陪尼克松他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尼克松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了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中一半时间给翻译占了。毛泽东机敏，富于哲理而幽默。驾驭全局的显然是他。毛泽东领导着中国，就像控制同尼克松谈话的进程那么得心应手。

毛泽东讲话时不用稿子。他似乎从不单独强调哪一点。他根本不使他的思路受到谈话议题的约束。他的谈话给人以漫谈的印象，从一个思想转到另一个思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先后顺序——台湾、日本、印度支那、反对“霸权”（这是指俄国的另一种提法）的斗争、扩大中美交往的重要性等等。几周之后，当基辛格在他安静的白宫办公室里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当时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现在回头来看，基辛格觉得，同毛泽东的谈话只是“华格纳歌剧的一幕序曲。”

中国政府在几小时之内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官方把这次会见说成是“认真、坦率”的。这种作法显然是要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就赞许了尼克松的访问。机场上那种默默的欢迎场面，现在可以置之度外了。

在此后一星期里，毛泽东主席再也没有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了，他的指导可以感觉到，但看不见。于是周恩来总理便翩然登上了导演的座椅。只有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才开始发挥他那使基辛格为之倾倒的品格：他的幽默感，他对每一件事的细致了解，他的坦率，以及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哲学感。周恩来既是总统的向导，东道主，又是谈判对手。

由于会见毛泽东的缘故，订于星期一下午举行的会谈推迟了一个半小时才开始。首次会谈的内容是双方发表讲话，让记者摄影。气氛是良好的。周恩来注意到总统的许多助手和顾问都是年轻人。这位73岁的中国领导人客气地评论说：“我们的政府里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

尼克松和周恩来在随后的四天里举行了多次小范围会谈。基辛格坐在总统右手的座位上。陪同的人只有约翰·霍尔德里奇和温斯顿·洛德。在下边的大厅里，罗杰斯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同时在举行会谈。这种做法的用意是明显的。尼克松和周恩来讨论原则性问题；罗杰斯和姬鹏飞讨论落实旅行、贸易和旅游问题的具体协议。晚上，基辛格在参加宴会、出席音乐会、观看乒乓球表演之后，还得跟副外长乔冠华碰头，起草最后公报。谈判大致就是这样进行的。

星期一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总统。这个宴会厅宽敞极了，美中两国800名官员在里边显不出占多大地方。两面国旗给单调的背景增添了一点色彩。中国的军乐团演奏了《美丽的阿美利加》和《牧场之家》等美国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加》这支曲子，是尼克松就职典礼时选择的曲子。周恩来选定这首曲子时，江青表示反对，认为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周总理很不满，认为这不过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尼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幕后的斗争，但他听到这首曲子时却很激动。宴会没有设主宾席，但是尼克

松和周恩来坐的圆桌上共有 20 人，其他各桌均坐 10 个人。菜单上列着中国最美味的菜肴：冷盘（松花蛋、酥鲫鱼和其他佳品）、竹荪芙蓉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鲜蘑芥菜、椰子鸡、杏仁豆腐、各式点心和水果（大部分是华北产的桔子）。尼克松用筷子吃，基辛格也试用筷子。

周恩来的祝酒词充满乐观情绪。他称总统的访问是一个“积极行动”，并说“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总统兴致很高，几乎迫不及待了。他看来急于要为这样的场合说几句好话。他说：“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这样的场合都要多。”尼克松又说，“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 5 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尼克松举起一小杯茅台酒，同宴会厅里的中国官员挨桌碰杯，祝他们身体健康，最后还特意为毛主席祝酒。

周恩来和基辛格这两位主持打开关系的人，在宴会中走到一起，碰碰他们手中的茅台酒杯。他们知道他们干得不错。

2 月 22 日，星期二，尼克松、基辛格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了秘密讨论。这首次实质性的交换意见持续了将近四小时。到下午三、四点钟，北京街上的报亭掀起了一阵轰动，原来《人民日报》这天刊载了八条措词友善的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报道，还在头版登出了三张总统的照片（两张同毛泽东一起，一张同周恩来一起）。这个版面安排是由周恩来负责掌管的。他在星期一晚上的宴会中间曾离席五分钟，审定第二天见报的照片和版面。这足见周恩来对总统访问的每一件事都是紧紧掌握着的。基辛格把 2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视为收藏家的珍品。它使从西藏、新疆的小村落直到北京的各级共产党干部认为尼克松这次访问是件大好事，这一来，便加速了周恩来为了同美国和解所作的努力。这份报纸在中国老百姓当中产生了近于魔术般的效果。有了毛泽东的赞许，他们开始向美国人微笑了。

在讨论中，尼克松说：“现在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友谊。大部分相当天真的美国报纸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总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谊不能成为建立关系所必须依靠的基础，尽管我觉得我们个人之间是有友谊的。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度。”

周恩来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倾听，面部毫无表情。

“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迫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尼克松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平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

这番话引起桌子对面中方人士中间一点小小的骚动。

“让我现在作一个比喻，希望这不会引起反感，”尼克松接着说，“我是一个公谊会的教徒，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对庞大的军事机构，反对军事冒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总理是他那种哲学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国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国削减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任领导有怎样的动机，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来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我们落在后面，我们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同我们订有条约的各国所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把这种分析运用于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尼克松说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尼克松继续说道：“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

“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备，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只会是一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像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周听到这一句轻轻一笑。尼克松接着说，“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周完全意识到尼克松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尼克松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你先到这里来，”他说，“莫斯科气得要命！他们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来骂我们。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后来，当周恩来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尼克松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这事发生在1969年一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同苏联之间有一条热线，但由于克里姆林宫从来不用，这条热线已经变成了冷线。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柯西金拿起电话，要

同我们通话。我们的电话员答话时，他说，‘我是柯西金总理。我要同毛主席讲话。’电话员完全自发地答复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我不给你接电话。’于是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总理。’可是电话员还是用那句未经请示的话答复，把电话挂断了。”

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恩来吃了几粒白色的小药丸。尼克松对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尼克松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翻译低声他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打瞌睡，然而 73 岁高龄的周恩来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支那。全世界都在注意那里发生的事，”周恩来说：“民主党想给你制造困难，说你来中国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资格在会谈中解决这个问题。”

尼克松表示完全理解这次会谈的局限性，并且对于在北京能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不抱幻想。“这个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尼克松说，“他们要把我们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我们所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他们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周恩来明确表示，在他看来，美国从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会越困难，结果对美国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坚韧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说，“1922 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周恩来指出尼克松曾经承认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是明智的；他认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决定会使尼克松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遇到困难。他说，“只要你们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尼克松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说：“不谈那些八点、五点、十三点和其他什么点，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建议的实质。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领袖，不论他是谁，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我们就可以商谈停火和遣返我们的俘虏，从那天起 6 个月内把全部美国人撤出越南，可是他们拒绝了，并且坚持除军事解决以外同时必须由我们强制实行政治解决。”

“我知道人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处境，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作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

星期二晚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招待总统观看《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她跟总统亲切交谈，外表上并没有流露出那种在同她不喜欢的人物接近时的不自然神情。

星期三，会谈移到尼克松下榻的宾馆举行。下午两点正，周恩来的黑色红旗高级轿车开了进来。总统在那里迎候总理，还有一群记者。尼克松主动而彬彬有礼地帮周恩来脱下大衣。他们摆了姿势让记者拍照。周恩来问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你们都好吗？”尼克松故作幽默，插话说：“好到过份了。”当摄影记者咔嚓咔嚓拍照时，周恩来说：“多给你们的总统照几张。”这又引起了尼克松一番即兴的打趣话。尼克松说：“他们要是给我照了，也准会烧掉的。”尼克松和周恩来随即兴致勃勃地走进了楼下的会议室，靠着绿毡铺面的会议桌两边对坐下来。基辛格和尼克松在一起。会谈进行了四小时，比预计时间长了一倍。

晚上，总统一行观看体操和羽毛球表演，当然少不了还有乒乓球。尼克松指指点点，做着手势，显然是被中国运动员的技巧迷住了。基辛格坐在总统左边，凝视乒乓球比赛，毫无疑问是在琢磨着战略。

这时，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去参加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他后来说：“再没有比这次招待会更凄惨的了。”一个俄国外交官指出，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见周恩来时，中国人称之为“坦率”的交谈；但尼克松会见毛泽东时，中国人却说他们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交谈。这种区别使俄国人感到沮丧。克拉夫特会见苏联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时对他说，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有助于改善尼克松5月间莫斯科之行的气氛。托尔斯季科夫瞪着眼，以一种极端不信任的口气说：“这个，我们还得看一看。”

2月24日，星期四，尼克松和罗杰斯和陪同人员去参观中国的长城。基辛格则留在宾馆搞公报。长城位于北京的西北，车行40分钟。长城横亘中国北部，蜿蜒约2000哩，是观光这个国家的人所最向往的地方——对多数访问中国的人来说，游览长城是行程的高峰。尼克松在城墙上缓步走上去，后面跟随着几十名记者。一个记者问道：“总统先生对长城的观感如何？”“我想你们应该可以得出结论来了，”尼克松用结论的口吻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城墙。”前边高处还有重重的城堡。“我们今天不爬到顶峰了，”总统对他的东道主叶剑英元帅说，“我们已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了嘛。”

在返回首都的路上，总统和叶剑英元帅在著名的明代皇帝的陵墓那里停车参观。“走一万六千哩来看长城是值得的，”尼克松说，“走一万六千哩来看这个地方也是值得的。”某个记者打断总统的话，问他是否赞成美国人申请签证来华旅游。尼克松说：“我认为，不仅对美国人而且对所有国家的人来说，能有机会到中国来参观都是一件很可贵、很值得的事。”这番话引起了一阵猜测——猜测美中双方已经就旅游往来计划达成了协议。这种猜测是言之过早了。

当天下午，尼克松和基辛格同周恩来和乔冠华会谈，进行了四小时激烈的讨价还价。然后，他们体会吃了一顿北京烤鸭便餐。这时人人都面带倦容，就像基辛格所说的：“真累死人啊！”周恩来在向总统祝酒时，把杯子里的茅台一口干了，这还是本周以来的第一回。他讲了一个长征中的故事，说毛泽东率领的队伍在艰苦的行军途中走到长江时，毛泽东写了一首词，激励人们向长城挺进。毛泽东在词中提出：不到长城非好汉。周恩来又有意识地加了一句话说，今天上午总统也到了长城了。

饭后，谈判中的这四个主要人物继续进行会谈，一直谈到深夜。根据一个助手的说法是，“既没有故示谦让，也没有掩饰分歧”。虽然基辛格在先前同中国方面的多次会谈中已经找出了一些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般原则，但是现在却碰到了一些简直没法取得一致的具体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和乔冠华怎能草拟出一篇最后公报来呢？

基辛格觉得，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需要签署一项公报，原因有二：第一，向中国人民说明尼克松到中国来是对的；第二，给俄国人看看中美进行合作的一个具体例子。因此，他认为，要由中国方面来打破僵局。结果，还是由周恩来和尼克松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们同意在公报中各写各的部分，一段表达美国对某个具体问题（如越南问题）的观点，另一段表达中国的观点。

“这个公报十分独特，”尼克松后来说，“独特处在于忠实摆出了分歧所在而不用外交辞令来加以掩饰。”事实上，它虽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的

确极不寻常。

那天夜间，当尼克松和周恩来离去时，基辛格和乔冠华从总统的住所走过一座小木桥，到另外一栋两层的灰砖楼房里去草拟一份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报，直到天色将明。

在越南问题上，美国方面声明支持总统 1972 年 1 月 27 日的“八点建议”以及实现印度支那人民自决的这一长远目标；中国方面则声明支持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方面表示支持南朝鲜；中国方面则表示支持北朝鲜 1971 年 4 月 12 日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议。

在日本问题上，美国方面“最高度地珍视同这个亚洲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则“坚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

在印巴战争问题上，美国方面采取不偏不倚态度，表示支持停火和“南亚各国人民在不受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和平地建设自己的未来和权利”；中国方面则“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

这样的程序，让每一方各自表态，有其实际好处。它克服了谈判中的一个障碍，可以使那些本来会得罪对方的言语变得缓和一些。譬如，如果有一套对越南问题固定提法，在北京和河内打交道时就得这样说：中国人经常声明“我们两国唇齿相依”或“我们是兄弟的印度支那人民斗争的可靠后方”。但在华盛顿和北京的交往中，这样的言词就不能接受了。乔冠华在这方面见机行事，颇具风格。他同意，在最后公报中，只对河内的和平纲领表示一般的支持。

在台湾问题上，就没有那么高的风格和那么大的让步了。这个问题是基辛格最伤脑筋的。虽然双方可以阐述各自的观点，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太微妙、太复杂（特别对中国方面），所以双方同意让对方请示一下己方的提法——这个决定更加说明了整个工作中斗争的激烈程度。

2 月 25 日，星期五，一大早，基辛格和乔冠华已经完成了公报上有关台湾那一段的大部分内容。稍事休息后，他们重新进行起草工作，而总统和叶剑英元帅则又出去游览，这次是故宫。是下了一场小雪，这引起了叶元帅诗兴大发，他说：“雪舞大地披银装。”

当尼克松看到公元前 113 年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啊，穿上这玩意儿就不会到处去走动了”。陪同他的罗杰斯咯咯地笑了。当尼克松注意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批评意见而戴的耳塞时，他开玩笑说：“给我搞一副。”

总统和叶元帅都暗示正在酝酿着重大的事情。一个记者问：“总统先生，这次访问进行得怎样？”尼克松面带微笑地答道：“关于这个，我今天晚上有话要说。”叶元帅也补充说：“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能和睦共处。”关于谈判出现了重要突破的说法再一次通过记者团传播开来。是越南问题？是建立外交关系？谁也不知道，但是正像一个专门研究尼克松的人指出的，他们全都感到就要爆炸一枚“重磅炸弹”了。

尼克松和罗杰斯回到宾馆后，同基辛格商量的公报问题，特别是敏感的台湾部分。罗杰斯平时很少提反对意见，这次却提了。由于一个助手的怂恿，国务卿提出说，草稿上的某些字句应该作些变动，这样好使蒋介石政权较易接受些。譬如，他想把某句中的“强调”一词换成“声明”。基辛格感到罗杰斯是在挑刺儿，但是，也是律师出身的尼克松支持了他的同行的挑刺儿，

因此，基辛格不得不同乔冠华重开谈判。而对于最后一分钟还要变动，乔冠华显得颇不高兴。

星期五晚上，总统和周恩来又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但是还是解决不了台湾这个难题。现在轮到尼克松设宴招待周恩来了。地点仍然是人民大会堂那个宽敞的宴会厅，气氛却变了。星期一是满怀希望的，到了星期五却急转直下，近于低潮。酒菜是上等的，中国的军乐团还是演奏美国的乐曲。节目单上有《她将从山上来》和《小伙子比雷》两首曲子。但是有一种明显的泄气的感觉。祝酒词也是平平淡淡的。记者们注意到，尼克松和周恩来宴会后走出大厅时，彼此没有交谈。记者们感到出现了僵局。但齐格勒劝记者们不要这样说。

基辛格还是认为没有陷入僵局。一星期之后，他告诉一批记者说：“我向你们担保，那个星期五晚上同其他那几天晚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管怎样，突破这个“并非僵局”的努力，却一直持续到清晨5点钟。宴会后，尼克松、基辛格、周恩来和乔冠华回到宾馆时，已经是夜间10点多了。周恩来向总统道了晚安，然后同基辛格和乔冠华回到会议楼。他们又谈了几乎一小时。周恩来向基辛格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新措词。基辛格这个在谈判中两处奔走的人物，立即将中国方面的提议带到了总统住所。罗杰斯也来了。这三个美国人一直商议到午夜以后。最后，尼克松同意了，但条件是还需要作一些小的更动。罗杰斯睡觉去了，基辛格又回去跟周恩来、乔冠华两人再进行谈判。不一会，周恩来也走了，剩下基辛格和乔冠华逐个地解决了留下的问题。在这漫漫长夜中，基辛格给总统先后打了三、四次请示电话。这一夜，尼克松睡得很少，基辛格则根本没有睡。2月26日，星期六，天刚亮，基辛格和乔冠华人已倦而兴致甚高，他们决定先休息一下，然后把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提交给当天上午即将飞往杭州的上级。就他们两人来说，他们已经就有关台湾的两段文字达成了协议：

中国方面的这一段如下：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的这一段如下：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很清楚，公报最后的这两个关键段落搞得非常巧妙，谈判双方都可以用自己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而不使对方为难。

当天上午，尼克松和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会晤，审阅公报。他们有不少要讨论的，所以起飞时间推迟了一小时。然后他们决定在乘坐的俄制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上继续进行讨论。几分钟之后，总统自己的喷气机也跟着起飞。这样，等总统一行一到杭州，白宫的通讯系统就可以马上进行工作。

总统和周恩来检阅仪仗队，基辛格避开了欢送仪式走向飞机，在舷梯旁

同一些不陪同他们去杭州的中国官员热烈握手，其中有叶剑英元帅，他是中国方面最先接待基辛格的官方主人。基辛格和叶剑英紧紧握手，亲切交谈，直到基辛格登上飞机。记者团里的《新闻周刊》记者梅尔·埃尔芬过来向基辛格打招呼：“亨利，他向你提出了什么？”他装得一本正经地问道：“是想问清楚你是不是要当第一任驻华大使再到中国来吗？”

总统然后和周恩来上了飞机。玩笑结束了。

在两个半小时的飞行中，有一段时间总统把基辛格、周恩来和罗杰斯都抛在一边，独自到前舱情静一会，在他常用的那种黄纸本上写下他对公报最后措词的一些想法。在他们到达杭州时，尼克松和周恩来同意星期日在上海发表公报。

杭州是一个美丽的湖滨城市。13世纪时，是它启发了一个名叫马哥亨罗的意大利青年旅行者的灵感，他写道：“〔杭州〕有趣极了，使人有天堂之感。”基辛格一如马哥亨罗那样，对中国热情很高，他原以为在杭州的乐趣之一将是受到毛泽东的第二次接见，而且不像上次那私匆匆忙忙；但是，并没有这回事。基辛格感到失望，尼克松也是如此，但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

尼克松乘船游览了西湖，环湖有平堤、庙宇和一些有“柳浪闻莺”之类名称的公园。在这一周中第一次能得到充分休息的晚上到来之前，又吃了一顿精心安排的晚宴。然后，在星期日早上，尼克松和周恩来乘车前往杭州新机场，它是1971年10月间确知总统要参观这个城市后，由一万名工人在40天内建成的。

上海，这个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是尼克松的最后一站。尼克松趁着基辛格因为要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公报内容而正在进行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他依然不愿意谈实质性的东西。正像他在杭州向记者说的：“我必须尽一切可能保证不使在某些方面可能达成的协议受到影响。路还长着呢，每一步都要小心前进。”尼克松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他嘴里念着：“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主人回答。

“一共四个。”

“对。”

“四个。”

“对。”

“那是恩格斯。”

“对。”

“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恩格斯的照片。”

中国人知道基辛格将要向新闻界介绍情况，他们知道他会被问到美国对台湾所承担的防务义务，他们也知道基辛格会要重申这一点的，在中国的领土上重申这一点。尽管他们对这种安排感到不愉快，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基辛格的解释，即：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需要对台湾政权形式主义地表示保卫。

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在工业展览馆的宴会厅里会见美国以及中国记者时，已经是下午5点50分了。问答部分持续了36分钟，这对基辛格来说就好比36小时。他给记者的印象是既紧张又谨慎，说话慢条斯理。开头是叙述公报起草的过程，然后小心翼翼地说明，这次访问的目的在于：“两国都试图开始一个过程，……它们能……缓和〔它们〕之间的不和所产

生的后果。”格林插话说，谈判始终是友好的，开诚布公的；罗杰斯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他和周恩来在去杭州的飞行途中谈了“一个半小时”，当天下午又在国务卿的旅馆房间里谈了“将近40分钟”。（记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周恩来是想弥补一下早些时候对罗杰斯的冷落。）

在星期日晚上最后一次宴会上，尼克松心情舒畅。

他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他满怀信心地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16000哩和22年的敌对情绪的桥。”接着，总统向周总理祝酒，并说：“今天晚上，我们两国人民把世界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尼克松向毛泽东赠送了一件礼品，还有一件是赠给中国人民的。送给主席的是一套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是特伦顿地方的贝姆所制，重250磅，至少值25万美元。送给中国人民的是两头麝牛，名叫米尔顿和马蒂尔达。美国人民则得到一对稀有的黑白相间的熊猫——兴兴和玲玲，作为回礼。

总统在星期一早上离开上海直飞华盛顿，当晚9时准时到达。他受到了凯旋英雄式的欢迎。2月29日，詹姆斯·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标题是《尼克松先生极盛之时》。他写道：“他（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树立了一个遵从常识的典范，一个正确外交的典范。”赖斯顿的这个观点占了压倒优势，但是巴克利兄弟俩却不以为然。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说，这次访问是“美国外交上招致灾祸的一次冒险”。尽管他在3月7日同基辛格的一次私下会见中反批评的调子压低了一些，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

在台北，蒋介石政府保持着一种闷闷不乐的沉默。台北的报纸上出现了许多授意写出来的评论，谴责公报内容，并说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人对华盛顿作为一个盟国所作的保证已经丧失信任在莫斯科，苏联政府的评论是辛酸然而不是克制的。政府控制的新闻界对中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强烈地暗指尼克松的访问从根本上说是反苏行为。

在东京，佐藤政府垮了台。7个月之后，他的继任人田中角荣跟中国重建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西贡，对总统的访问作了一些言不由衷的好评。

在河内，是一片沉寂。几天之后，周恩来飞往北越，让他的盟国放心。

在曼谷，泰国政府开始有所动作——疏远美国而接近中国。一个官方发言人说，泰国希望得到邀请，派遣一个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在西欧，态度是赞成的，但也夹杂着忧虑——这个不可捉摸的人，下一步会干出什么来呢？

全世界都强烈地感到，这次访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外交局面。它象征了中美关系的突破，而面对这一变化，俄国将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它使中国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再次“受到尊重”。如果尼克松能去，谁都能去嘛。3月1日基辛格私下会见记者时，对这次访问下了结论，说它不仅打开了在当时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的一种历史进程，而且使每个人都有了“选择未来”的权利。

对中国的访问，给尼克松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特别忘不了与周恩来总理在一起的日子。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与周总理的愉快交谈和感想：

由于我们越来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们的谈话有时相当轻松，甚至富于幽默。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他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一天下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这时周说：“我等不了十年，你可以等十年。总统先生也许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

周说：“等四年，你可以再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太老了。”

“总理先生，”我回答说，“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我指的是卸了职的总统。”

周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而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知识渊博是惊人的。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不能再见面了。我觉得，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并且不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存有戒心，但我们之间却已经形成了相互尊敬的个人关系。

我们在北京宾馆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顶峰了。”我说。

“那是一首，”他接着说，“还有一首《咏梅》，我想挂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词里指的是，采取主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要消失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读了这首词。

“因此，”周接着说，“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的。”

基辛格用外交的语言指出：即使我再度当选，也不大可能再次前来访问。

“我只是举例说明中国人的想法，”周说，“这事反正不要紧。”

周提到这次访问前不久我把专机的名字从“空军一号”改为“76年精神号”的事情。“不管谁是下届总统，”他说，“76年精神将依然存在，并且会占上风。从政策的角度看，我希望我们的对手不变，以便继续我们的努力。我们不仅希望总统能继续任职，而且希望你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助理们能继续任职。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如果我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你就不得不同另一个对手打交道了。因此，我们让更多的人和你会见。希望你不会讨厌我讲话太长。”

我向他保证，情况正好相反，我对他讲的话很感兴趣。

他指着摊开在他膝盖上的那本诗词说：“这属于哲学范畴，但也是一种政治观点。例如，这首诗是在对敌人打了一次胜仗后写的。全篇没有一处提到敌人，写这首诗是很难的。”

“当然，我认为从哲学上考虑问题是很有益的，”我说，“在太多的情况下，我们用策略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问题。我们的目光短浅。如果写那首诗的人也目光短浅，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很重要的是，我们观察世界时不应该仅看到当前的外交战役和决定，而应该看到推动世界的是哪些巨大力量。也许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只要我们能找到共同点，我们两国人民一定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我想也是更安全的世界里生活。”

我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16000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22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

我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的确，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但首先是世界改变了尼克松。

第十三章 箭与橄榄枝

1972年又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经过幕前幕后的争吵和较量，经过三年多令人失望和毫无结果的谈判僵局。1972年7月19日上午10时，白宫与河内同时宣布，基辛格与黎德寿正在法国首都附近举引会晤，这两个对手第一次甩掉了笼罩着这种会晤的神秘气氛。美国国内各阶层人士对和平大都盼望已久，对大选之前结束越南战争充满了希望。纽约股票指数三小时内上涨了十八点。

8月1日，14日，基辛格又与黎德寿举行了两次会晤，河内在谈判中表现出一定的让步。尼克松与基辛格认为河内让步表明他们认为尼克松的竞选对手麦戈文没有当选总统的机会，在选举之前和尼克松谈判可以得到比选举之后较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他们决定充分利用这种可能性。此外，他们一定也为尼克松与莫斯科和北京的接触以及越南化措施的成功而感到忧虑；在尼克松看来5月8日的布雷和轰炸在军事上使越南深受重创。

在9月26、27日的两天会议上，北越人提出一个新的十点方案。它虽比过去的任何方案较为可行，尼克松表示在关键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上还是不能接受的。下一次预定10月8日举行的会议显然具有明确的意义，它将决定新的势头能否维持下去，在11月7日选举前获得解决。尼克松对此并不乐观，但决心尽可能对这次会议施加压力。

10月8日星期天，基辛格和黑格抵达巴黎，同北越人举行关键性的会谈。当天晚上，他们发给尼克松的电报作简短的汇报：“告总统，今日初次会谈获得某种确切进展，请相信我们会取得积极成果的。”

10月12日晚，基辛格和黑格回到白宫，立即到行政办公大楼向尼克松汇报。

从本届政府最初的几天起，基辛格和尼克松就谈到外交政策中的“三强”——中国、苏联和越南——以及美国的目标同他们都有关系。到这时为止，其中的两个目标已经达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路，同苏联开始有了新的关系。只有第三个目标——解决越南战争——还仍旧没有实现。在基辛格开始汇报巴黎和谈时，他眉飞色舞，露出开心的笑容。“嗯，总统先生，”他说，“看来我们是连中三元了！”

他极为详尽地叙述了和谈的经过。黎德寿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差不多都合乎我们的主要要求：停火，然后美军在66天之内从南越撤退，并由双方释放战俘。尚未解决的问题留待10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谈判解决。

基辛格提醒黎德寿，协议必须经尼克松审阅和批准。基辛格同意10月17日在巴黎最后一次会议后去西贡三天，把协议提交阮文绍并征求他同意。然后他将于10月22日前往河内，和北越领导人一起草签协定。之后他将返回华盛顿，于10月26日发表联合公告。停火将在10月30日开始，当天各方外长在巴黎签署协定。

听到这个好消息，尼克松关照从白宫食堂端来几盘牛排，还叫人拿来一瓶拉斐特—罗特希尔德堡出产的葡萄酒，以便举杯祝贺基辛格的成就。尼克松注意到黑格的情绪似乎有点低沉，不过只认为他是由于过去几天的劳累而感到疲倦罢了。最后尼克松正面问他：你觉得从阮文绍的观点来看这些条款怎样。黑格回答说，他确实觉得对阮文绍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协议。然而，阮文绍本人对此作何反应，他感到不能放心。

基辛格曾答应北越人,在他到华盛顿以后 48 小时内就让他们知道尼克松的反应。第二天,尼克松指示五角大楼把对北越的轰炸减到二百架次,并下令限制 B—52 的空袭活动。那天晚上又给巴黎拍了一封电报:“总统同意‘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和恢复和平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但尚有几项技术问题需待春水部长和基辛格博士于 10 月 17 日进行讨论,同时还应当作下列实质性的改动,否则美方就不能接受这一文件。”尼克松要求的一项改动是,删除一段关于把南越双方——西贡政府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的各种军事义务同协定的政治部分联系起来的文字。尼克松想把各种政治问题都包括在政治一章里面。另外两处改动是澄清文字上的含糊之处。

北越方面以正式照会答复说,他们认为美国要求改动的几点是双方已经谈妥的。目前只能考虑作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并且要求尼克松不要作所列出的那样的改动。美国大选的限期显然是一条双向道:双方都可以利用它来迫使对方来接受自己的条件。

因此,尼克松看了这个照会后对基辛格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考虑我们认为不能接受的条款。

当天,尼克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说,就大选来说,达成协议不会特别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只有在阮文绍或北越方面使协议成为泡影时,才会产生对我们不利的危险。但是,已经发生的事不可能造成致命的损害,倒反只会缩小彼此的分歧。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怎样正确就怎样干。正如我已经向他指出的那样,如果现在是结束战争的合适时机,如果这是合适的方案,我们就不应当把它拖到大选以后再加以考虑,因为那时敌人所受的压力可能比现在小。

根据我对以往一些协议的研究,每当协议可能达成时,就会出现可以施加压力的时刻,如果错过这种时机,战争就会拖延几个月,甚至拖延几年,然后才有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时机。也许目前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施加压力的时刻。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如果我们把机会错过,让大选过去而发现问题老是拖延不决,我们将永远不能宽恕我们自己。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具有可以利用机会的有利形势。我们一定要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不管它将对选举发生何等影响,而其结果倒很可能是对选举非常有利的。

基辛格向尼克松建议停止轰炸作为美方善意的表示。尼克松表示同意随即下令,从二百架次减到一百五十架次。尼克松认为如果全面停炸,那就是个引人注目的行动。尼克松对基辛格说:“我坚持反对大选前实行全面停炸。如果在巴黎和西贡都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你能够前往河内,那么,我就要地考虑在你逗留的少数几天里暂停轰炸,反正协定不签字,轰炸是不会停止的。我不会由于看到协定有一点指望就上当受骗,像约翰逊在 1968 年那样。”就在基辛格动身前往巴黎以前,尼克松又交给他一封头天晚上写的信。信中告诉他,要为争取实现体面的和平而做他认为应当做的事,不要考虑大选。

10 月 17 日,基辛格返回巴黎,与春水举行会晤,对协定草案进行审议。在释放南方政治犯问题上僵持住了。

春水要求全部释放,毫不让步,基辛格表示反对。因为这一条需要南越总统阮文绍的同意。基辛格飞到西贡去,却未能说服阮文绍。

不管怎样,基辛格同黎德寿郑重谈妥的那个时间表显然又必须修改了。基辛格借用总统的名义向河内发了一份表示歉意的电报,建议再次推延时间

表。他解释说，还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来解解决苦干问题。他说，他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因此他提出了第三张时间表：10月23日，美国停止轰炸和布雷；10月24日，在河内草签；10月31日，在巴黎正式签字。河内很快作出了同意的答复，这使基辛格大大松了一口气。北越方面接受了新的时间表，但是警告说：“美国方面不得提出任何借口再次改变时间表。”

基辛格在西贡的困境，尼克松十分明白。显然，南越伪政府已失去了自信心，眼看要切断依附于美国母体的脐带，他们正感受着心理上极大的痛苦。

在尼克松看来，在阮文绍的行为背后，也存在着各种个人、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实际因素。由于美国新闻界形容阮文绍的那种方式，许多美国人认为他是个镇压他的政治对手的小暴君。人们的不同政见在南越基本上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但是阮文绍仍然不得不对付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形形色色公开的国内政治反对派。除非他能使人民深信这项和平协议会对南越有好处，否则他能否继续掌权是很成问题的。他们打了那么多的仗，付出了那么多的牺牲，并且对敌人又是了解得那么清楚。因此，他们对越南政府是否真心诚意遵守协议的条款，是不相信的。在最后一批美国人撤走后，他们还必须留在自己的国家里，当然不愿接受任何可能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的协定。由于任何协定的条款必然有可以争议之处，阮文绍就不得不表明，他既没有放弃南越的任何重大利益，也没有接受华盛顿交代给他的条件。问题在于这样做需要时间，而如果美国要恪守已经商定的签字日程，时间是尼克松唯一缺少的东西。

阮文绍还会对立即签订协定的军事后果感到担忧。许多军事分析家认为，北越方面所以坚持要以10月31日作为签订停火协定的最后限期，是由于他们已经厉兵秣马，要在那一日期以前在南越抢占并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早在10月初，缴获的北越中央南方局的一项指示已经透露出这一计划，要把南越军队吸引到北部工地区，使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外围各省在最后一分钟的攻势下易被攻取；10月20日，尼克松下令开始执行“进一步加强行动计划”，用大批飞机向南越空运军事装备和补给品。如果协定在10月31日如期签订，美国就必须立即遵守关于限制物资替换的条款。因此，尼克松想在截止日期以前，尽量完成预定的越南化计划。

尼克松想再次弄清楚基辛格是否理解他的想法：不必赶在大选以前达成协议，不要对阮文绍逼得太紧，免得他同我们决裂。因此，那天夜里尼克松又给基辛格拍了一份电报：

在你同阮文绍继续商谈时，我想再次着重说明，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应受美国大选日期的影响。我已得出结论，如果在大选以前达成的协议会使我遭受指责，说我们所获得的解决办法还赶不上等到大选以后可能争取到的办法，那么，这种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场惨败的协议就很可能严重地损害美国国内的情况……

正如我昨天扼要地说明的那样，我们缔结任何协定都必须使阮文绍成为自愿的伙伴。切不可强迫结合。

其实，尼克松十分清楚阮文绍会拒绝协定，之所以让基辛格去和阮文绍进行艰难的谈判，不过是一种政治手腕而已。

10月21日，尼克松让黑格给基辛格拍了另一份电报，要求除了实际上使阮文绍同美国决裂以外，尽可能推动他前进。如果看来没有可能取得阮文绍的同意，基辛格就应当通知他，美国不得不考虑同敌人缔结一项单独的

协定。其实这时尼克松并没有考虑要这样做，也不认为将来有必要这样做，只是想使阮文绍深刻了解，一俟条件合适就达成协议的决心是认真的。

与此同时，尼克松又拒绝了基辛格的一个建议。

据基辛格判断，问题倒不在于阮文绍会干脆拒绝接受协定，惹得美国同他决裂，而在于他会不给任何答复，进行拖延，从而迫使美国错过签字的日期。因此他建议，在得不到阮文绍对协定的任何反应的情况下，或在他万一拒绝赞同协定时，他就应当如期前往河内。他恳切陈词，指出如果取消他所说的“最后一段航程”，那就会造成许多难题，其中最严重的是他仍然相信，一旦美国大选结束，共方就会觉得迫使他们达成协议的压力大力减少，很可能会决心恢复战斗。

然而，在尼克松看来，北越人将利用基辛格在河内露面的机会谋求宣传上的胜利，并利用它来使美国舆论转而反对阮文绍，所以，除非有关各方已经同意签订协定，尼克松决不考虑把最后一段航程当作可供选择的途径。

当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选日期已迫在眉睫，一般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认为，尼克松可能力图在大选以前达成协议，借以使这场战争变得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要由于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的极端主义，但也由于他的拙劣的竞选手法，政治压力的效果适得其反。民意测验证实了尼克松这样的直觉：就选民的支持来说，他处理战争的办法一般被看作可以对他肯定而对麦戈文加以否定的问题，因为人们认为他软弱，是个投降派。所以，赶在大选以前仓促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显得动机不纯，招致猜疑。鹰派将会不公平地指责尼克松为了不错过一个利己的限期而作了过多的让步，而鸽派则会错误地声称尼克松本来在1969年就能够取得同样的条件的。

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等到大选以后再去解决问题的风险是，共产党人可能决定要继续打下去。尼克松准备在大选以后加紧进行轰炸，但是尼克松无法知道，这样做是否能在美国公众的耐心丧失殆尽以前、在轰炸的举动使美国同中国人和苏联人产生严重问题以前或者国会干脆投票决定要摆脱战争以前，使共方采取较为通情达理的立场。

尼克松的这个想法对谁也没说，但他的日记记下了他当时的真实思想。日记中说：

当然，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是否有一个崩溃期限，或者如果有的话，这个期限何时来到。我们也不知道，从美国的政治观点来看，大选以后的局势是否会对我们十分不利，尽管我们可能会赢得选民的极其重要的信任。

我倾向于认为，对我们较为有利的讨价还价的时机是在紧跟大选以后而不是在大选以前。在大选以前敌人还会作出估计，相信他们的人有最大的机会取胜，或者至少是能够取胜。因此我们受到那种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压力。

我们希望，在大选刚结束以后，我们将获得大多数选民的信任，来把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那时敌人就不得不老实下来，否则就将面临我们可能对他们采取的行动的后果。

这是尼克松式的典型谈判手法，即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来迫使对方接受对已有利的条件。

对于究竟是在大选前还是在大选后比较容易取得和平解决的办法，尼克松的顾问们意见不一。基辛格坚决认为，北越人在大选前会受到要他们进行谈判的大得多的压力，因为当战争仍然是竞选中的一个争论问题时，他们将

指望从总统这里得到较好的条件。他担心一旦大选结束，他们可能又同原先那样拒不妥协，让战争在较低的水平上拖延下去，希望美国舆论最终将迫使撤走美军。

包括黑格在内的另一些人认为，大选以后尼克松将获得压倒多数的选民的信任，在行动上无论如何要比第一届任期少受一些约束，这时北越人大概更有可能作出让步。尼克松个人倾向于这种意见，但是，如果北越人同意美国要求的条件，而他们又能说服阮文绍同他们合作，那么总统完全准备在选举之前缔结协定。阮文绍显然是决心要尽量拖延达成协议的，这就给尼克松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虽然他知道北越人正在执行一种旨在离间美国和阮文绍的关系、使他们听从舆论支配的精心筹划的策略，这却并没有使那个问题容易处理一些。

10月22日基辛格与阮文绍的谈判失败了。基辛格在飞回华盛顿途中又给黎德寿去了一个电报。这次，他不论明里暗里根本没有提10月31日这个期限，而是强调必须在巴黎再举行一次谈判。

基辛格当晚回到华盛顿后，提请总统注意，由于实施步骤的时间表一拖再拖，河内对协定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卦。大选前是无法签订协定了。尼克松看来并不担心这个问题。民意测验预示他将取得大胜。大多数美国人看到过去几周外交活动极其频繁，都以为越南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了。基辛格明白了，如果赶在大选前签订协定的代价是华盛顿与西贡公开破裂，并可能因而带来严重后果，那么总统是不干的。

华盛顿时间10月25日下午5点47分，河内电台中断了正常的广播节目，宣布即将插发北越政府的“一项重要声明”。这个预告被外国电台收听处（中央情报局属下负责向政府官员提供参考消息的监听机构）收听到了。研究河内动向的人员并没有很重视。他们凭经验认为，所谓“重要声明”，可能是关于对外政策的，也有可能是关于农业政策的。但是过了几小时却还不见下文。

10月26日，凌晨1点16分，外国电台收听处终于听到了河内那颗宣传炸弹的爆炸声浪——河内发表了一项2500字的政府声明，公布了越南问题的九点协定以及秘密谈判的细节。河内的声明戏剧性地透露：“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在1972年10月8日的私下会晤中有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新倡议：提出‘关于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协定草案’。”“美国方面自己承认，协定草案”是“为迅速导致一项解决办法开辟道路的一个重要和十分基本的文件。”在综述了协定的九点内容后，河内还透露说，“根据美国方面的建议”，双方商定了签订协定的时间表——美国方面后来两次推迟了时间表——规定在10月31日签订已谈妥的文件。

河内指责尼克松政府缺乏诚意，并要求如期在10月31日签订协定。

北越这篇令人震动的广播一下子拉开了这场保密最彻底的谈判的帷幕。他们这次是用尼克松那个惯伎回敬尼克松。1972年1月，总统曾违反保密的诺言，透露了基辛格在巴黎同黎德寿秘密会晤的情况，希望以此来打破谈判僵局，并且可能的话，挽回自己在国内民意测验中越来越不得人心的趋势。现在河内可能是担心中了美国的计，作出了让步，而美国自己又毫无诚意在大选前签订协定，因此想在宣传上争取主动，逼尼克松签订基辛格和黎德寿两人在10月12日一致欢呼已经搞得万事俱备的那个文件。北越的一个发言人宣称：“大笔一挥，和平就实现了，一切就看美国拿不拿起这支笔了。”

上午7点半，尼克松和基辛格边进早餐边商讨对策。总统同意用记者招待会的方式向北越方面打招呼。

两人商定的结果，基辛格应强调美国对协定的基本内容维持原议，但不愿意被人硬逼着在10月31日之前签字。

11点35分，在白宫新闻发布室，基辛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他在开场白中说“和平就在眼前”，“只要再和北越代表举行一次谈判，就可以解决留下的问题，依我看来这次谈判顶多花三、四天就够了。”

这段话让尼克松大为吃惊。他马上意识到将损害美国同越南人讨价还价的谈判地位，甚至更难使阮文绍集团与美国站到一起来了。在国内，将引起人们过早地期望出现早日取得协议的前景。同时，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的支持者会攻击尼克松政府试图操纵选举。

下午6点过，黎德寿发来一份电报，建议早日恢复巴黎谈判。基辛格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但尼克松拒绝了。

有一些观察家认为，基辛格发表了“和平就在眼前”的谈话之后，尼克松已没有必要匆忙实现和平了。另一些观察家则怀疑，尼克松不仅耍了北越人，而且也耍了基辛格，让他为争取在选前完成这件大事而在世界各国首都之间跑断了腿。人们越是期待，对尼克松的竞选就越有利，因为尼克松明白，答应实现和平要比仓促签订和平协定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如果仓促签字，有人就可能会指责尼克松为大选而利用和平。而尼克松事前就说过，“合适的解决办法”比选票更重。

1972年11月7日，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参加总统竞选，也是他第一届总统任期的实际结束日。这一天，尼克松已没有了以前竞选总统时那种忐忑不安的焦急心情。因为他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计票的结果，让尼克松心满意足：尼克松获47169841票，民主党人麦戈文获29172767票。百分之六十点七对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就在11月的头三周里，尼克松认为要取得与越南的谈判成果，阮文绍的合作在目前是不可缺少的。为了使“越南化”战争获得成功，尼克松下令替阮文绍补充血液。

美国空军的巨型C—5运输机隆隆不息地飞往新山一机场，美国军运船只使西贡的码头工人昼夜忙碌——美国组织这次规模空前的海空运输，为的是要在11月份的头三个星期给南越运去整整一年所需的军事物资。与此同时，美国在南越各地的军事基地都已移交给西贡政权。这两方面的行动是五角大楼奉总统之命非常出色地完成的。为了赶运物资，不仅动用了空军，而且还租用了商用运输机。运交的军事物资当中，在坦克、装甲运兵车、大炮、喷气引擎、弹药和零件等1万多吨。此外，还从美国、南朝鲜、台湾和伊朗等地抽调120架F—5喷气战斗机，90架A—27轻型攻击轰炸机，30架A—1螺旋轰炸机，30架C—130赫克里士运输机，20艘AC—119炮艇和270架直升飞机。一夜之间，西贡简直就有了一支占世界第四位的空军力量，拥有2000多架飞机，尽管驾驶某些较先进飞机的飞行员还没有训练出来。

当北越人发觉美国空运的规模后，他们指责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在“加强阮文绍集团，准备新的侵略”。这个指责显然合乎逻辑。但这次紧急运输实际上是出于与“新侵略”无关的另外三个考虑。首先，把阮文绍的军火库装得满满的，是为了争取他听美国的话。其次是以此证明美国是一个可靠的盟

友，不会为了同敌人勾搭而出卖朋友。第三，从海、空两路赶运物资以及把美国基地移交给西贡，都是为了抢在基辛格 - 黎德寿协定草案生效之前，因为协定一经生效，军火供应就将限于损耗多少补充多少，而美国在南方的所有军事设施都必须于 60 天内全部拆除，所以要把基地在协定生效前移交给南越。一向相信在任何谈判中武器是真正有力量的基辛格，希望阮文绍得到足够的装备之后，对停火协定的态度能放灵活些。

11 月的第一周，尼克松在行政大楼他那间不对外的办公室里，长时间地与基辛格商讨，制订谈判“最后”阶段的政策，再过“三、四天”也好，或者再长一些也好，反正，两人都认为越南战争就要结束了。两人还一致认为，阮文绍如能同意协议，当然更好，但这一点不应看作是决定性因素。据基辛格说，他们将作出“真正巨大的努力”来完成一项阮文绍能够接受的协议，甚至准备把南越的某些主要反对意见提出来重新谈判，尽管他们预见到黎德寿是会予以拒绝的。但是，只要能谈成一项他们两人可以接受的协议，就签字。

11 月 9 日，尼克松对《华盛顿之星新闻报》记者加尼特·霍纳的谈话中说：“有完全的把握，我们即将解决越南问题。你们放心好了。”

11 月 27 日，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恢复谈判。

尼克松与基辛格都明白，12 月 8 日之前若达不成协议，复会后的国会很可能采取立法手段来结束战争，而不再允许他们的外交手段来结束战争。

然而这次谈判十分艰难。

11 月 25 日晚 10 点过，基辛格回到美国，立即驱车去向尼克松报告会谈情况。

12 月 4 日，美越代表继续在巴黎会晤。此后二周，是极为紧张的二周。由于双方的不妥协，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12 月 6 日星期三，基辛格和黎德寿会谈了六小时。然而没有结果。也就在这一天，尼克松给了多勃雷宁一个紧急口信，告诉他下次会议上基辛格准备提出最起码的要求，并说如果没有任何进展，那将导致谈判的终止。多勃雷宁很不安，再三说苏联一直在说服北越，要他们接受协议。几天以后，尼克松增加了压力，打电话对他说，现在结束谈判显然对苏联有利，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都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而为了使我们的相互关系继续得到改善，消除这个令人恼火的因素是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的。尼克松也通知中国驻法大使，说明情况危急，尼克松希望在采取“严重步骤”之前把问题提到周恩来面前，因为这样的行动显然会影响白宫按照两国政府的愿望发展中美关系的能力。

12 月 14 日，谈判中断。基辛格回到华盛顿，交给尼克松一份关于巴黎谈判的第一手报告。

尼克松决定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在尼克松看来，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有效地使河内相信：谈判一项公平的协议比起继续打仗来是一种更好的出路。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认为这就意味着加强轰炸。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多大程度的轰炸才能迫使河内就范。基辛格建议在海防港重新布雷，恢复对北纬二十度线以南地区的全面轰炸，加强在老挝南部的轰炸。尼克松立即感到需要采取比以上规模还要大得多的行动。尼克松查核一下，发现北纬二十度线以南地区大部分是稻田和丛林，因此尼克松对基辛格说，“无论大规模轰炸还是小规模轰炸，都同样要受到猛烈的抨击。如果我们恢复轰炸，采取的行动

必须与以往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作出用 B - 52 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这一重要的决定。任何较小的行动只会使敌人瞧不起我们。”

基辛格说：“河内和海防都是用苏联的地对空（萨姆）导弹严密防卫的城市。假如我们袭击这些地方，我们就必须准备遭受新的损失，有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被俘。”“这个我知道，”尼克松说，“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是该做的事，那么我们就必须立刻去做。”

当天中午，尼克松向河内发出一个措辞强硬的电报，警告必须在 72 小时内恢复“认真谈判。”

与此同时，尼克松发布一道三天后生效的命令，在海防港重新布雷，恢复空中侦察，用 B - 52 袭击河内 - 海防区域的军事目标。轰炸计划包括位于河内的 16 个关于运输、电力、河内广播电台发射台等等的主要目标，以及河内外围的 6 个通讯指挥和控制目标。在海防区有 13 个目标，包括船坞和码头。

12 月 17 日下午三、四点钟，这时总统限河内在 72 小时内开始“认真谈判”的最后时限已过。于是尼克松动用 B - 52，下令对北越恢复大规模密集轰炸，包括在河内和海防地区首次使用这种巨型轰炸机。第一轮轰炸于当天晚上（华盛顿时间）开始。

尼克松不仅想摧毁北越人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而且想把他们炸回到谈判桌上来。按照尼克松的逻辑，他是以炸求和。正是按照这种逻辑，在这场战争的早期，就曾有过一个美国陆军军官望着被炸成一片瓦砾的南越城市说：“因为我们要拯救它，所以不得不把它毁了。”

轰炸一开始，黑格带着总统的最后通牒来到西贡。如果阮文绍坚持阻挠签订协定，美国就单独同北越媾和，同时断绝对南越的一切军援和经援。黑格是星期一到达西贡的，呆了不到 48 小时就离开南越。这时，北越很大一部分中心地带已在遭到破坏。阮文绍虽然对恢复轰炸喜出望外，可是他自己在接到尼克松的勒令后，也觉得事情不好办了。

阮文绍在给尼克松的一封长信中，对若干关键问题作了让步。在以后的 12 天里，对北越的轰炸越来越凶。B - 52 机群三架一组，同时投弹。弹着点构成一个长一哩、宽半哩左右的长方形。每架飞机可携带 500 磅的炸弹 20 多枚，750 磅的炸弹 40 多枚。约有 100 架这种巨型战略轰炸机和 500 架小一点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轰炸机，不分昼夜对五角大楼称之为“世界上最严密的防空地区”进行了轰炸。

美国否认它搞“恐怖轰炸”的指责，硬说它轰炸的是河内、海防和清化地区的军事目标。

在轰炸的头四天里，美国损失了 8 架 B - 52 轰炸机和 4 架 F - 111 战斗轰炸机。到 12 月 30 日停炸时，美国承认损失了 15 架 B - 52 以及 11 架战斗轰炸机。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整个 12 天的轰炸期间，有 93 名美国飞行员失踪，其中 31 名据说被北越俘获。河内称，美国的损失远比这大得多。

尽管遭到国内外的严厉抨击，尼克松却坚持轰炸。他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在日记中，他是这样写的：

我记得邱吉尔在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中告诫说，人们可以采取一项大胆的政策，也可以奉行一项谨慎的政策，然而，想要同时奉行一项既大胆而又谨慎的政策却只能带来灾难。非此即彼。我们现在既已走上大胆的路，就必须继续走下去，直到我们碰上某种好运气为止。

在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的 12 天中，尼克松始终未向美国人民解释过为

何要使用 B - 52 轰炸机的战略，事实上，他勒令所有政府机构对轰炸保持沉默。据说，基辛格曾不止一次劝总统发表广播讲话，说明轰炸的理由，但尼克松未予接受。基辛格后来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解释说：“总统当时决定，如果这次行动得手，导致达成协议，那就无需多说了；要是达不成协议，他才有必要向美国人民说明……导致僵局继续存在的全部行动。”

后来，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作了解释，他说：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不‘公开宣布’12月进行轰炸的理由。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认为这个时候不像在11月3日和5月8日那样容易使美国人民振作起来。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我所发表的任何公开讲话都会直接妨碍恢复谈判的机会。如果我当时宣布我们恢复轰炸的目的是强迫北越人谈判，他们的自豪感和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决不会允许他们甘愿屈服于这样的最后通牒而在国际上丢脸。因此，我在恢复轰炸时尽量少发表言论和声张，其结果完全如愿以偿。我们短暂地但大规模地使用武力的行动把信息传给了河内，同时又允许他们放弃强硬的立场，而毋需承认他们是在我们的军事压力下那样做的。

12月22日，我们给北越人一封电报，要求在1月3日举行一次会谈。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自动在12月31日停止轰炸北纬二十度线以北地区，并在会议期间暂停轰炸。”

为了打破僵局，基辛格与黎德寿于1973年1月6日回到巴黎。1月8日上午，两人为实现停火作了最后的一次真正努力。

谈判一开始，黎德寿就痛斥了美国的轰炸，不过也没有关上“认真”谈判的大门。

第二天，1月9日，这两位外交家着手完成协定草案的工作。本来已解决后来又重新提出的那些问题再次解决了。事情有了进展。基辛格回到大使住所后，打电报给总统说，在他看来，终将会出现突破。基辛格的电文最后是：“总统先生，祝你生日愉快。”原来1月9日正是尼克松的60寿辰啊。

在以后的三天中，基辛格和黎德寿继续取得进展。临到周末，他们已经完成了基本文件。星期六这天，他们用了七个半小时逐条、逐句、逐字地进行了审查。虽然在各项议定书上仍有一些枝节问题，但基辛格相信，沙利文和阮基石两人能够加以解决。下午三、四点钟，基辛格请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摄影师把双方谈判代表围坐在谈判桌旁的情景拍了下来。黎德寿一听说基辛格要把协定草案呈送尼克松亲自过目，然后还要派黑格去西贡征求阮文绍同意，立刻跳了起来，但基辛格安慰他说，南越总统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正如他欣慰地看到黎德寿的态度有了变化一样；并说，估计这次在西贡不会遇到什么困难。黎德寿这才告诉基辛格说，他将留在巴黎，同他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在这最后六天的谈判中，两人共谈了27个小时。

当晚，基辛格快到9点抵达奥利机场。他谨慎地表示，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他字斟句酌地说：“黎德寿特别顾问和我刚刚完成了非常有益的谈判。我这就回去向总统汇报。然后由总统决定随后应采取什么步骤来取得公正和相互妥协的和平。”

基辛格的喷气机朝着大西洋的方向起飞后几分钟，北越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证实“谈判取得了进展”。这是河内方面三个月来第一次承认“取得了进展”。

临到最后几天，在那简直成了这幕戏的低潮的停火之前，事情是有条不

紊地进行的。

1月14日：基辛格午夜过后到达比斯坎岛，立即向尼克松汇报。中午两人又碰了一次头。齐格勒说，巴黎谈判是“认真”的。

1月15日：尼克松下令停止美国对北越的一切进攻性军事行动，包括轰炸、炮击和布雷。

1月16日：黑格抵西贡，随即与阮文绍会谈。

1月17日：阮文绍勉强地同意了基辛格和黎德寿达成的停火协定条款，但是对某些议定书表示保留。黑格答应说，沙利文将设法加以解决。

1月18日：北越和美国发表一项简短的联合声明。齐格勒宣布：“亨利·基辛格博士将于1973年1月23日恢复与黎德寿特别顾问和春水部长的秘密会谈，以完成协走文本。”

1月19日：沙利文和阮基石解决了阮文绍的某些（但不是全部）保留意见。尼克松通过在西贡的邦克告诉阮文绍说，协定已经不能再改动了，将于1月23日由基辛格草签。

1月20日：尼克松宣誓连任美国总统。他说，越南战争“行将结束”。

1月21日：白宫摄影师鲍勃·努森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去巴黎拍摄草签仪式。与此同时，白宫官员奉命动手汇集协定全文的各种文本，供本周晚些时候分发记者。

1月22日：基辛格回到巴黎。据宣布，他同黎德寿的会晤将在美琪饭店举行。1968年5月以来的半公开谈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这是两人第一次在中立场地会晤。在美琪饭店一连谈了四年的四方会谈，已在1月18日结束。

1月23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最后一次长达四小时的会谈中解决了最后几个具体问题。接着，他们在中午12点半，草签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历时最长、引起最严重的国内分裂的这场战争总算非正式地结束了。基辛格和黎德寿面带笑容从美琪饭店走出来。这一天是典型的巴黎冬季的阴天。两人一次又一次热烈握手，让每个摄影记者都能从各种不同的好角度照相。双方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也都相互握手。双方的首席代表都没有发表正式声明。当晚，尼克松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向美国人民介绍了协定的某些具体内容，并说：“诸位听众……由于你们对我们坚持要取得体面的和平予以坚决支持，才使体面的和平得以实现。”

“只有任何一方都不谋求达到自己的全部要求，持久和平才能实现；诚然，稳定取决于有关各方相对的满意，也就是相对的不满意。这一点始终是明确的。”

尼克松把战俘要回来了；黎德寿终于使美国撤军了；阮文绍得以保持政权；临时革命政府在南越取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政治地位。人人都有所收获，但谁都没有得到一切。

1月27日，罗杰斯代表美国在巴黎正式签署了越南和平协定。采访白宫新闻多年的合众国际社女记者海伦·托马斯想打听，罗杰斯在巴黎落笔签字的那一刻，基辛格在搞什么。由于时差，巴黎时间上午11点是华盛顿时间清晨6点。基辛格通过新闻发布单位作了回答。回答是“在搞爱情，不是搞战争。”

第十四章 谈判与威慑

1972年5月20日，星期六，“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途经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前往莫斯科。起飞以后，基辛格到尼克松的机舱来兴高采烈地说：“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外交成就！三个星期以前，谁都预言这次首脑会议要取消，可是今天我们却在赴会的路上。”

5月22日这一天，莫斯科整天都沐浴在春天淡淡的阳光里，教堂的葱头形圆顶在晴空里闪闪发亮。下午4点，总统那架发出蓝白光泽的喷气机在伏努科沃机场着陆滑入贵宾停机坪时，太阳已躲入低沉的云雾。俄国农民称之为“蘑菇雨”的那种绵绵细雨开始下起来了。然后，突然雨过天晴，阳光普照，正好赶上为俄国人简朴的欢迎仪式涂上了一点色彩。

苏联席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率领一队苏联高级官员到机场欢迎尼克松总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惹人注意地没有出场。外交使团在鹄立恭候，人们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没有来。莫斯科卫戍部队的一队仪仗队整队肃立，很有精神。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爬上临时搭的平台拍摄场面，把北京和莫斯科的欢迎情况进行对比。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向“空军一号”座机走去，机门一开，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出现在机舱门口。望远镜摄入了波德戈尔内和尼克松握手、检阅仪仗队和奏国歌的场面。当休伯特·汉弗莱和乔治·麦戈文正在加利福尼亚预选中争夺选票时，他们的共和党对手却在隆重地进行国事访问，把眼光放在全国选民身上。

多勃雷宁同基辛格热烈握手表示欢迎，就像一个得意的剧场经理欢迎同行一样。他们悄悄说些打趣话，然后哈哈大笑。基辛格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事皮包。

从伏努科沃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路上，一长串汽车，至少有50辆。尼克松、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乘坐一辆车身很长的黑色吉尔牌轿车（相当于美国林肯牌的苏联轿车）飞驰，一路只见一丛丛的白桦树，看不到尽头的一排排式样千篇一律的新住宅。车队到了莫斯科城郊后开始进入列宁大街。这是一条有八条车道宽的林荫大道，两旁排列着大约10万名表情呆板的俄国人，有好几哩长。少数人挥手致意，很多人拿着纸制的两国小国旗，但大多数只是瞪大眼睛瞧着。这很不像俄国人的表现；很怪，他们平日的亲美感情似乎受到了抑制。

列宁大街早已禁止其他车辆通行。总统乘坐的吉尔牌轿车以55哩的时速飞快奔驰。不到20分钟，锯齿状的红墙、金色圆顶的教堂和黄绿相映的克里姆林宫一一映入眼帘。车队驶过莫斯科河大桥，通过鲍罗维茨基大门进入了克里姆林宫，这里有70英亩地，山坡上这时正开遍五月的紫丁香。

尼克松、基辛格和几名心腹被接进克里姆林宫围墙内的华丽寓所。罗杰斯则被送到离克里姆林宫只有5分钟走路距离的新建的俄罗斯饭店。不到几分钟，电话响了，邀请总统到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办公室去，礼宾规格显然同北京一样，只是这次最高级领导的召见没有使人感到意外罢了。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事前已作了仔细安排。基辛格未被邀请参加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首次两小时会晤，不过已向总统很好地介绍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作风。

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就是13年前尼克松第一次会见赫鲁晓夫的那个房间。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和他的照片一模一样：脸部最突出

的是那双浓眉，嘴角露出一副呆板的、带几分警惕的微笑。13年前尼克松和他并肩站在美国展览会的那间厨房里的时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作为各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举行首脑会议。

他们握手后站着聊天，这时有人端来了茶。勃列日涅夫把尼克松让到屋子一边的一张长桌跟前，两人隔着桌子相对坐下，苏方的译员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坐在桌子的一头。有人曾经表示关心，认为尼克松应该带一名国务院的翻译在场。但是尼克松知道苏霍德列夫是位高明的语言学家，英语讲得和俄语一样好，并且尼克松觉得，如果只有另一个人在场，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也许会随便一些。

勃列日涅夫的语气友善，但用的字眼很直率。他说，他必须首先告诉尼克松，在美国最近在越南采取行动以后，他如期举行这次首脑会议可很不容易。只是完全由于改善苏美关系和两国间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十分重要，才有这种可能。

在作了这番几乎必不可少的表白以后，他明显地热情起来，开始谈到发展他和尼克松之间个人关系的必要性和好处。他说，苏联人民铭记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因为他是1934年给予苏联以外交承认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并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人。

尼克松说，我曾经研究过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以及斯大林与邱吉尔之间关系的历史，发现战争期间下级之间的分歧往往由于在最高一级达成协议而得到解决。“我希望和总书记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勃列日涅夫爽朗地回答说：“我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方面是完全准备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那些官僚去决定，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有什么进展了。”尼克松说。

“他们只会把我们埋在纸堆里！”勃列日涅夫开心地大笑，把掌心往桌面拍了一下。这个开端看来还不错。

勃列日涅夫4月间同基辛格会面时，显得很紧张，老是抚弄着他的烟嘴；但是这次同尼克松在一起，他却显得自在多了，信心十足，态度灵活。他自以为穿着出众，仪表不凡。有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西方高级人士说：“你看，有人说我的眉毛粗，我的眉毛粗吗？”这是一个故作姿态的问题，实际上他已经开始修剪眉毛了。他对另一位来宾说：“有人说我残酷。我残酷吗？”自从1968年8月俄国的坦克和军队把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的自由化政权摧毁以来，勃列日涅夫对西方漫画家把他画成有两根大棒似的粗眉毛的无赖形象，十分敏感。当他同西欧和美国的显贵谈话时，似乎特别留意自己的外表。他访法期间，好像一直在梳理他的头发；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俄国期间，他好像一直在他的老式西装上弹来弹去，弹那并不存在的灰尘。他希望把他看成是一位认真严肃的和平缔造者，一位受本国人民尊重的领袖。他几乎好像是在对蓬皮杜和尼克松说，他们三个人属于一个不准外人参加的高级俱乐部。据说他曾面有愠色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有着欧洲头脑的人，简直无法理解中国人啊。”意思一点也不深奥：中国人很怪，多少有些不可靠；我勃列日涅夫才是此道中人啊。

勃列日涅夫甚至想说一点自以为可以逗尼克松高兴的俏皮话，例如：“也许我们应当先派葛罗米柯和罗杰斯到火星上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如果他们不回来，我们就别去了。”过去，葛罗米柯总是被赫鲁晓夫作为玩笑的

对象。赫鲁晓夫常爱打诨说：“我可以叫葛罗米柯脱了裤子在一块冰上坐几年，你知道，这傻瓜，他真会那么干！”现在轮到勃列日涅夫拿外交部长和外交部来开心了。在尼克松的白宫里，有些部门很欣赏这种幽默。勃列日涅夫在同尼克松会谈时，看来不大依靠外交部的专业意见。但是他依靠苏联的一个基辛格，此人名叫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是个戴眼镜的清瘦而精神奕奕的外交家兼语言学家。

大约半个小时后，勃列日涅夫在葛拉诺维特大厅举行国宴欢迎尼克松。这是15世纪修建的美丽大厅，在克里姆林宫最古老部分的中心。镶木地板擦得锃亮，有拱顶的墙上挂着好几幅富于金黄色和褐色色彩的像圣像那样的巨幅油画。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并排坐在第一桌，直接面向对过墙上比真人大几倍的“耶稣和使徒最后晚餐”壁画。勃列日涅夫说，“那是当年的政治局，”尼克松搭话说，“那一定是意味着总书记和教皇有许多共同点罗。”勃列日涅夫放声大笑，伸过手来和尼克松握了一下。

勃列日涅夫指定波德戈尔内致祝酒词。这位过去在乌克兰做党工作的苏联主席，用“实际的”、“现实的”等词汇来形容克里姆林宫对最高级会谈的态度。波德戈尔内保证他的国家致力于“使目前存在的紧张局势从根本上转向缓和”，虽然说他并不“低估”世界“某些地方”的“严重复杂局势”。这显然是间接指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祝酒词中，以典型的基辛格方式提到战争。他强调说：“核大国有严肃的责任在任何危机中采取克制态度，并采取积极的行动避免直接对抗。”他还重申他在5月8日讲话中提出的要点说，这些核大国有责任“影响陷于冲突或危机的其他国家，使他们的行为放温和些”。

宴会结束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就星期二的会谈议程商谈了差不多一小时。星期二的议程将是集中谈欧洲安全问题。

第二天上午11时尼克松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尼克松决定一开始就定下他打算在这次首脑会议整个过程中使用的那种坦率的调子。

“我想讲一点苏联朋友们可能由于客气而不愿出口的话，”尼克松开始说，“我知道我是以非常强硬、注重冷战和反共出名的。”

柯西金冷冰冰地说：“不久以前，我也听到这种说法。”

“固然我们对我们的制度有坚定的信仰，”尼克松接着说，“不过同时我也尊重那些同样坚定地信仰他们自己的制度的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一定是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存和合作的。但是，靠脆弱的感情或者靠掩盖实际存在的分歧这种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都点了点头，尼克松心里却猜想，他们实际上都宁愿美国继续采取过去常常用以对待苏联的那种温情的态度。

当天下午，尼克松和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美苏事务顾问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了两小时会谈。勃列日涅夫虽然装出对细节和数字厌烦的样子，却显然事先对问题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他们讨论监督和限制的时限和技术的时候，他用一支红铅笔在面前的拍纸簿上画出几枚导弹。

尼克松说：“我们觉得具体规定查核双方履行义务的情况的办法可能给双方提供必要的保证。”这时勃列日涅夫朝着尼克松有点生气地说：“要是我们都打算欺骗对方，又何必这一纸协定呢？我们方面是不准备捣鬼的。”

那种‘互相抓辫子’的办法完全要不得。”

那天晚上，他们又举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会谈来讨论一个争执不下的重大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新型反弹道导弹系统应该部署在离莫斯科多远的地方。在他们开始讨论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就随便把他们几小时以前刚商妥的数字减掉 300 公里。“关于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他说，“看来已经解决了。1200 公里，我们同意。”

“是 1500 公里。”尼克松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中国去吗？”勃列日涅夫假装生气地说。

“可是，总书记总该觉得，我是从来不斤斤计较的。”尼克松回答。

“1500 公里，行啊，”勃列日涅夫不错过抢先表白的机会，说道，“你要我们东移，我们现在就同意这样办。1200 公里我们接受起来轻易一些，不过 1500 公里也行。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谈了吧。”

苏联的谈判代表惯用的一种手法是，就某一个在细节上已经商妥的问题提出一点似乎很理想但行不通的修改意见。本来双方早就同意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具体条款的有效期为 5 年，可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勃列日涅夫突然问道：“为什么不规定为 10 年呢？干吗只定五年？”基辛格冷静地指出，原先苏方自己提出的有效期甚至还只有一年半。

“我认为，这个暂时性的协定对我们和全世界说来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尼克松说，“我倒希望来个永久性的协定，不过我的任期有限——到不了 5 年。在那以后，我就离开了——到太平洋游泳去了。说不定还在那之前呢。”

“总统先生，可别在那之前离开。”勃列日涅夫说。

突然袭击是苏联谈判代表喜欢使用的另一种手法。星期三下午，在举行了美苏联合探索太空协定的签字仪式以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一起走出房间。勃列日涅夫开始谈起当天晚上打算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政府别墅里为美国代表团举行宴会。快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拉住尼克松的臂膀说，“我们何不现在就到乡下去，在白天看看那里的景色呢？”勃列日涅夫把尼克松推进了电梯，下到一楼，门外停着勃列日涅夫一辆大型高级轿车。

他们上了车很快就开走，这时特工人员和其他人员忙着找车子和司机来追赶他们。莫斯科所有主要街道中间的行车道都是专门留给党的高级官员使用的，所以他们的车开得很快。

一到别墅，勃列日涅夫就提议坐船游览一下莫斯科河。这和 13 年前赫鲁晓夫的做法一模一样。但是时代变了：勃列日涅夫带尼克松去乘坐的不是汽艇，而是在水上轻轻浮动的小水翼艇。驾驶员很熟练，小艇开得十分平稳。勃列日涅夫不断指着速度计，上面的指针表明速度是每小时 90 公里。

两人谈到工作习惯，勃列日涅夫告诉尼克松说，他不用口述录音机。尼克松说，记得邱吉尔有一回说过，他宁可口授给一位漂亮的年轻妇女。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并且勃列日涅夫还开玩笑说：“何况，当你夜里醒来想记下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女秘书可就尤其有用了。”他们都放声大笑。

他们回到别墅时心情都不错。晚宴的时间预定为 8 点钟，勃列日涅夫提议饭前再开一次会。

基辛格和尼克松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温斯顿·洛德和约翰·内格罗蓬特

坐在桌子的一边，对面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霍德列夫。一连三个小时，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非常激动地狠狠向尼克松进攻。

尼克松顿时想起《杰基尔大夫和海德先生》那本书中，描写一个白天为绅士、夜晚是恶棍的双重性格的人。因为勃列日涅夫刚才还笑着拍尼克松的肩膀，现在却愤怒地大声责骂他不是真心努力结束战争，而是想利用中国人作为工具来压苏联人干预北越人的事务。勃列日涅夫说，他们怀疑尼克松 5 月 8 日是不是气昏了才做出那样有欠考虑的行动，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尼克松真的希望和平，是不必借助外力就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全体美国人民肯定不会一致支持越南的战争，”他接着说，“我当然不相信那些在越南死伤或残废的人的家属会支持这场战争。”

当勃列日涅夫最后好像脾气已经发够的时候，柯西金接过大棒。他说：“总统先生，我认为你过高估计了在目前情况下从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北越人也许是不会拒绝其他国家的军队开进去和他们一道作战的。”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尼克松第一次开了口。“这种威胁一点也吓不倒我们。”“不过，你不妨再说下去，把话说得具体些。”

“不要错误地以为我们说的话是威胁，你们说的话就不是威胁，”柯西金冷冰冰地回答。他说：“刚才我们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作一番分析，这比威胁要严肃得多。”

柯西金似乎越说越来劲，他接着集中力量奚落阮文绍总统，把他叫做“受雇用的所谓总统”。由于尼克松对他这种激烈的长篇大论依然没有反应，柯西金开始沉不住气了。“难道你们还需要保留这个所谓的南越总统，保留一个未经任何人选举而你们却称之为总统的人吗？”

“北越的主席又是谁选举的呢？”尼克松问他。

“全体人民。”他答道。

“说得倒好听。”尼克松说。

柯西金讲完后，轮到波德戈尔内出击了。他的口气比较友好，但他的措辞一样厉害。当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对尼克松轮番敲打，试图压倒尼克松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离座踱起方步来。

大约 20 分钟后，波德戈尔内突然收住了话题；勃列日涅夫接上去说了几句。之后，室内一片静寂。这时已经将近 11 点钟。尼克松想在他能够让这次谈话结束之前，必须让他们明确知道他的立场。

尼克松指出：“美国已经从越南撤走了 50 多万人。当北越在 3 月间开始大规模军事集结时，我表现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首脑会议。但是，既然北越人确实入侵南越，我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作出强烈的反应。”

“总书记刚才说，有些人可能怀疑我上月采取的行动是出于恼怒。如果情况是那样，由我担任现在的职务就太危险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我是完全冷静而客观地作出决定的。那是我的一贯做法，因为要考虑到后果和风险。”

“我国人民希望和平。我也希望和平。但是，我想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我是多么认真地看待北越的这次战争新升级带来的危险。我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位伟大将领谢尔曼将军说过，‘战争是地狱。’对此，苏联人民比谁都清楚。自从这次新攻势开始以来，已经有 3 万名南越平民，其中包括男子、

妇女和儿童，死于使用着苏制装备的北越人之手。

“我这话丝毫不是说苏联领导人就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我们的目标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想把任何解决办法或任何政体强加于任何人。”

他们全神贯注地听了尼克松说的话，但是谁也没有试图回答。

在这以后他们就上楼了，那里有一席丰盛的酒菜在等待着他们。尼克松说了一句一般的开玩笑的话：别给基辛格灌酒，他回去还得和葛罗米柯会谈呢。他们好像对此很感兴趣，就开始闹着假装给基辛格灌伏特卡和白兰地。宴会上一片笑声，又是说笑话，又是讲故事，就好像刚才搂下那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吃饭当中，柯西金开腔说，我们刚结束了三小时那样激烈的讨论，还能在饭桌上轻松地亲切交谈，这是我们今后关系的一个好兆头。尼克松回答说，我们必须承认并开诚布公地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柯西金使劲地点点头，再次举杯祝酒。

他们回到克里姆林宫时，已经过了午夜。基辛格和葛罗米柯马上开始就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中悬而未决的几个关键问题举行会谈。

凌晨1点左右，当里兰大夫在尼克松房间里给他治背痛的时候，基辛格进来向尼克松报告说：“苏联人仍旧坚持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主张。他们很可能是希望我们国内那种要我带回一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的压力会迫使我接受他们的条件。”在尼克松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就预料到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尼克松已经做好和他们摊牌的准备。

但是，基辛格还有一些消息是尼克松没有预料到的。他汇报说，五角大楼几乎是在公开造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也正在从他们原来已经同意的立场后退。基辛格用紧张的口气提醒尼克松，要是这场分裂的消息传到新闻界，或者五角大楼拒绝支持从首脑会议上带回去的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国内的政治后果就不堪设想。其实这一点用不着他提醒，尼克松也是心中有数。

“什么政治后果，让它见鬼去吧！”尼克松说。“即使五角大楼不赞成，我们也顾不得什么政治后果，仍然要按照我们的条件达成协议。”尼克松决心不让五角大楼从右面、也不让苏联人从左面来动摇他认为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立场。

“你尽力而为吧，”尼克松说，“请记住，照我看来，我们并不一定要在本星期解决问题。”

当晚，基辛格又花了几个小时试图订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会议最后在清晨休会，问题还是处于僵持状态。

从5月23日星期二到5月26日星期五，最高级会谈是分级进行的。低一级的是罗杰斯、弗拉尼根和沃纳同柯西金、葛罗米柯和帕托利切夫商谈，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时也参加，但勃列日涅夫从不出席。这一级商谈是一些次要的问题，如贸易、环境、医药和公海行为。在这些问题上，每天至少有一项苏美协定签定。高一级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亚历山德罗夫会谈，有时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也参加。他们长时间秘密讨论限制战略武器和越南问题。5月26日，他们公布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谈判结果。而越南问题的谈判结果却是过了许多个月才公布的。

5月23日，星期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苏联卫生部长鲍里斯·彼得罗

夫斯基首先签订了医学和卫生合作协定。这个协定保证两国在研究心脏病、癌症方面和环境污染的新领域进行合作。协定规定了交流情报、组织科学会议和促进科学家个人之间和机构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

20 分钟后，尼克松总统和波德戈尔内主席签署了另一项双边协定——五年为期、可以延长的苏美保护环境合作协定，这是两大工业化国家第一次达成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面协定。

5 月 24 日，星期三。尼克松总统和柯西金总理签署了第三项双边协定，即 1970 年 10 月以来一直在进行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利用特别改造过的美国“阿彼罗”和苏联“联盟”宇宙飞船在 1975 年进行会合与停靠试验。要实现这项使命，必须有一队受过训练的兼会英俄两种语言的美苏宇宙飞行员和技术专家，还必须使两国的宇宙科学家先进行广泛的接触。

5 月 25 日，星期四。美国海军部长沃纳和苏联海军总司令谢尔盖·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又签署了一项双边协定，名称很累赘，叫做华盛顿—莫斯科防止公海及其上空事件海军协定，但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美反希特勒同盟以来两国军方达成的第一项意义重大的交易。这项协定为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海军规定了“行为准则”。这是为减少公海骚扰和避免在公海上碰撞而进行的一次不寻常的努力，这种骚扰和碰撞可能导致两大超级大国所不希望的紧张局势。

5 月 26 日，星期五。罗杰斯和柯西金签署了那一星期的倒数第二个双边协定：关于成立美苏联合商务委员会的协定。

所有这些协定都只是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序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才是最高级会谈的头彩。大家一直认为，星期五将是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字的日子。但是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这项协定上签字之前，有一段时期谈判是紧张的，艰难的，当时代表美方的基辛格和代表苏方的葛罗米柯这两个主要谈判对手一度认为，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这个头彩他们这次可能弄不到手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抵达莫斯科时，双方已接近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只剩下四、五个棘手问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是星期二傍晚在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里进行的。总统参加了这次会谈，一直谈到深夜，解决了两个棘手问题。

一个是反导弹问题。谈妥的条约草案规定，双方只能各有两个反导弹发射场（一个保卫首都，一个保卫洲际导弹发射场）和 200 枚截击导弹，但基辛格和多勃雷宁没有能解决雷达这个难题。这几乎是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但又必须解决，因为它对安全有重大意义。任问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系统都需要雷达，但空中追踪只需要小型雷达，而反导弹系统要有效能就得有大型雷达。大小型雷达的界限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从安全意义上来说，主要是两国担心对方可能存心欺骗，口头上说是为空中追踪建造雷达联合体，其实是为新的秘密反导弹发射场建造联合体。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硬性规定了一条划分大小雷达的杠杠，于是反导弹条约就这样以他们的外行决定作为基础了。最后，他们同意各方在一个洲际导弹场周围最多只能配置两个大型雷达和 18 个小型雷达，在两国首都周围 90 哩以内可以配置 6 个现代化反导弹雷达联合体。

第二个问题是陆上机动洲际导弹问题。这种导弹，实际上两国都还没有研制成功，但从技术上说可以制成，因而是战略上共同关心的问题。洲际导弹一般都是安置在加固的或至少是固定的发射场内的。两国的卫星侦察系统

都可以随时核查对方洲际导弹实力的规模和数量。这种对于对方实力的了解，是任何军备控制协定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洲际导弹可以搞成机动的，可以从重型卡车或火车上发射，两国就没有好办法测出对方洲际导弹实力的确切数量和位置。这个不牢靠的因素，在一个热核世界中是可以闹出大乱子来的。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他们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互相保证不建造陆上机动洲际导弹。但是勃列日涅夫拒绝将这项保证写进临时协定中。尼克松强调说，美国将单独发表声明阐述自己对禁止建筑机动导弹的理解，这项声明将提交国会；他还提出警告，如果美国发现俄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欺骗，它将立即废除整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勃列日涅夫说他明白这一点，表示同意。

不幸的是，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就反导弹雷达和机动导弹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并没有能使限制战略武器交易上的难题“迎刃而解”。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导弹潜艇这个关键问题上，双方仍然陷于僵局。各方究竟能拥有多少导弹潜艇呢？能拥有多少导弹发射架呢？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如果俄国或美国想“替换”老式的洲际导弹或老式的核动力潜艇，那么各方能拥有多少导弹发射架或新式的导弹潜艇呢？

认为外交家和政治家能够搞出一个老式洲际导弹和新式潜艇导弹折算的合理比例，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一枚新式导弹究竟能折合老式导弹 10 枚，15 枚，还是 5 枚？几乎可以肯定，作出的判断难免没有错。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库并不对等。怎么能恰当地判断安全的程度呢？俄国的百万吨级的弹头多，而美国的弹头总数多。俄国能生产爆炸力更大的弹头，而美国的武器可以达到更高的命中精度。双方的谈判家都在为本国的生存而讨价还价，然而，看来每个问题都变成了计算数字和考虑政治上的得失。

潜艇僵局交给了基辛格和葛罗米柯这两个善于熬夜的谈判家来处理。星期三近午夜时分，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在莫斯科市区苏联外交部开始谈判潜艇问题，这是一次成败在此一举的谈判。基辛格的助手是索南费尔特、洛德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问题专家威廉·海兰；协助葛罗米柯的是多勃雷宁、负责武器生产的副总理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和外交部美国政治问题专家格·科尔尼因科。双方谈了四个小时之后，分歧缩小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一个具体分歧到清晨 4 点钟看来还无法解决，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只好决定第二天晚上再谈。这个问题是给“正在建造”这个词下定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挺简单，其实是极为复杂的。因为他们要规定各方可以拥有的导弹潜艇限额，就要首先确定各方已经有多少，“正在建造”的有多少。潜艇的问题在于：一离开设计图板就算“正在建造”呢，还是开始铸造各部件时才算？是开始装置各部件就算，还是整个潜艇都装好只等试验才算呢？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

星期四，尼克松讨论了贸易问题并到大剧院看了《天鹅湖》演出——这是来访的贵宾必不可少的文章。除此之外，尼克松把那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同基辛格制订一个折衷方案，这个方案既能满足参谋长联席会议、巴里·戈德华特和亨利·杰克逊，又能同俄国人达成协议。克里姆林宫长期来坚持的论点是，美国方面的限额必须包括法国和英国的导弹潜艇，因为从理论上说，法、英导弹潜艇也都属于北约组织。尼克松断然拒绝了这种论点。俄国人还要求在潜艇和导弹的数目方面超过美国，而不是双方对等，因为他们在弹头

的实际配置方面和分导多弹头导弹的研制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在这次最高级会谈之前，尼克松就已决走，他可能不得不对这项要求作出让步，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他希望和需要搞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第二，他知道（因为勃列日涅夫曾强烈地强调这一点），如果不在这种基本问题上妥协，就达不成协议；第三，他了解，俄国人正在全力以赴执行建造洲际导弹和现代化导弹潜艇的计划，而美国几年来没有增加一枚洲际导弹，只是刚刚考虑一种叫做“三叉戟”的更为先进的潜艇。换句话说，尼克松认识到他没有极雄厚的讨价还价资本，他想在两国战略力量对比决定性地转向有利于俄国之前（近几年来这种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制止苏联正在执行的洲际导弹和潜艇计划。

尼克松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指示基辛格向俄国人提出了最后方案。这个方案事实上接近于最后达成的那个协议。按照协议中提出的条款，俄国人可以拥有的绝对限额是 62 艘现代化导弹潜艇和 950 个发射架。而美国接受的最高限额是 44 艘潜艇和 710 个发射架。但是总统坚持，如果俄国人想要达到那个限额，他们得“替换”或者淘汰大约 240 枚老式的 SS7、SS - 8 和 H 级潜艇导弹。

尼克松只好决定，如果俄国人拒绝他的妥协方案，他就在达不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情况下回国。显然，要是那样，他是会感到失望的，但是他估计，如果他希望继续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议的支持，他就不能再让步了。即使在选举年，他也总是能够拿国家安全作为挡箭牌，也能对付由于失败而引起的政治上的强烈反应。

星期四晚上芭蕾舞剧散场后，基辛格回到外交部同葛罗米柯继续谈判。照基辛格和多勃雷宁在最高级会谈前商定的日程，星期五应该是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字的日子。基辛格当即提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太重要，不能草率从事；如果谈判需要更多的时间，那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如果星期五结束不了，就改到星期六或星期日，再不行，就是拖到下星期日也可以嘛。葛罗米柯的主张则不同，他认为协定必须在星期五达成。基辛格不懂葛罗米柯为什么一定要在星期五达成协定。他不明白，是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政治问题（或许勃列日涅夫已经向他的同事们说定，星期五要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还是因为承担了拜占庭式的义务，拘泥于形式（一天一个协定就得一天一个协定）；不论哪种情况，葛罗米柯都有压力，而基辛格则得到了好处。

双方回顾了各自的立场，然后解决了“正在建造”这个难题，这是令人高兴的。后来基辛格解释说：“用不着多说，政府内部一些深谋远虑的人”决定，船身装配就绪就是潜艇建成的界限。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潜艇数目这个棘手问题。星期五凌晨 1 点，基辛格提出了总统的修改方案。他和葛罗米柯就方案的利弊辩论了两个小时，但是很快就弄清楚，原来葛罗米柯既不能，也不愿作出最后决定。这个方案还须提交勃列日涅夫。

一时之间失望的气氛浓起来了，但最后却出现了幽默的场面。

基辛格开玩笑说：“葛罗米柯，你听说没有，他们发射了一枚 SS—9 [俄国的巨型导弹] ，可是啥事也没有。”

葛罗米柯耸耸肩说：“这个国家里什么都不灵了嘛。”

桌上放着一盘水果。基辛格自言自语地说，他不知道讲话时该对着苹果还是对着橘子好，暗指有一种水果可能暗藏着微型窃听器。他笑了。葛罗米柯仰望着天花板上一个典型的苏联雕塑——一个丰满健美的女人雕像。他用

手指了指那个女雕像的一个乳房，装着一副戏谑的神情说：“不对，我在那儿呢。”

凌晨3点，这两位相互逗乐的人认为，这种漫无边际的玩笑已经离题太远，应当收场了。基辛格给葛罗米柯的明确印象是，尽管总统确实想要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但是他没法再前进了。

星期五上午，勃列日涅夫召开了政治局非常会议，大概是讨论尼克松的这个最新方案。会上显然没有什么争论。这位苏联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来说，尼克松已经作出了重大让步。从建议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条款来看，俄国拥有的导弹和潜艇要多于美国，而且对那些导弹的分导多弹头化或扩充海空军力量未加限制。

在政治局向勃列日涅夫开放绿灯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克里姆林宫的总统下榻处开会，准备承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失败的挫折。上午11点，葛罗米柯打电话来问基辛格和索南费尔特，可不可以到叶卡捷琳娜大厅同他和斯米尔诺夫会谈？会谈的地点看来是个好兆头。叶卡捷琳娜大厅是最高级会谈开始的地方，也该是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结束最高级会谈的地方。

上午11点半，会谈开始。葛罗米柯着重表示僵局已经打破，勃列日涅夫准备接受总统的妥协方案，但要作一些小的修改。中午，基辛格打电话给齐格勒，提醒他当天早些时候有可能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果。齐格勒马上问：“什么时候？”基辛格说：“过一会儿就告诉你。”下午1点，在这场交易确定下来以前，葛罗米柯请示勃列日涅夫，基辛格请示尼克松，进行最后的核定。几分钟后，两位谈判家握手了。限制战略武器的体制全搞成了。

但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怎样起草协定的最后文本？双方同意，由参加赫尔辛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两个代表团起草。基辛格认为这样太费事，也许要花一天时间，签字仪式要到星期日才能举行。葛罗米柯坚持必须当天晚上签字，他提出一个空前节省时间的办法。他们联名向美苏首席谈判代表史密斯和谢苗诺夫发出指示，以免发生误会。整个下午，赫尔辛基的两个代表团进行了从未有过的合作。到下午6点，草案起草完毕（后来才知道写得很草率），但是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已经商定晚上11点在克里姆林宫签字。谢苗诺夫同史密斯一起搭乘美国代表团飞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大典，他们赶到的时候还不到9点。

齐格勒安排9点半在美国大使馆的小吃间向白宫记者团介绍情况。当基辛格和史密斯在小吃间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正在斯帕索大厦共进晚餐，这里曾经是一位啤酒大王的宅第，现在成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官邸。象征苏美友谊的钢琴家范·克莱本演奏了肖邦、斯克里亚宾和德彪西的作品。勃列日涅夫盛赞阿拉斯加的烘烤冰淇淋。他对宴会厅另一边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喊道：“你吃上热冰淇淋了吧，美国真是创奇迹的国家。”两位领导人的心情都很开朗。他们过一会儿就要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了，这是向国际健全秩序迈出的一大步。

总统在祝酒辞中谈到他早先对三位苏联领导人发出的邀请时说：“我们期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中国欢迎你们。”尼克松继续说：“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往往都想知道日后的历史将怎样看待他们。我们希望载入史册的是我们的业绩，而不是我们给世界带来战争。我们希望载入史册的是，我们使世界成了对各国人民来说更加和平的世界。”

晚上11点零7分，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率领一大帮苏美高级官员进入克

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弗拉基米尔大厅，准备签署限制战略武器的一系列协议。在称得上庄严隆重的场面中，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在适当限制两国战略核力量的史无前例的协定上签了字。尼克松用随身的钢笔签字，勃列日涅夫则从笔架上挑了一支。他们在两套俄文和两套英文的协定文本上签了字，然后各自留下俄、英文本各一份。

当时没有报道的是，两人都知道那四份协定文本上都有严重错误，第二天改正后，还得在绝密的情况下重新来一次这样的签字仪式。星期五下午在赫尔辛基起草的最后文本太潦草了，连数字都有搞错的。星期六全天，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菲利益·法利和斯米尔诺夫把错误全部改正后，忙着准备四套新的最后文本。

勃列日涅夫邀请了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签字仪式，连反对最高级会谈的强硬派谢列斯特也请来了。这是他的作风。勃列日涅夫的最高一级同事出席仪式，便使得大家对重要决定在更大的程度上分担责任，总之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譬如，勃列日涅夫决定派遣红军进入布拉格之前，就曾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带到布拉迪斯拉发，同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举行关键性的会议。

晚上 11 点 13 分，进入限制核武器的新世纪 6 分钟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站起来高举香槟，互相祝贺了 5 分钟之久，然后散会。到 11 点 18 分，服务员已经在收拾残杯，空荡荡的弗拉基米尔大厅的灯光暗了下来。

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就研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限额达成了双边协议。由于他们都认识到使人造卫星能够清晰核查对方是否遵守协定的重要性，双方协议互不干扰卫星的运转。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同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签订了一系列重大的协定。此外，双方还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信号，表明核武器已经大大地使意识形态问题趋于过时，政治和经济理论上的分歧必须让位给生存这个当务之急了。至少，这是个希望。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陪同尼克松飞往列宁格勒。他们参观了皮斯卡尔叶夫公墓，在纳粹围城里牺牲的几十万人当中有许多就埋葬在这里。他们到得太晚，所以先遣人员建议尼克松取消原定到那里一个小纪念馆去参观的计划。年轻的女向导听说尼克松可能不按预定计划全部都参观到，显然不高兴了。尼克松说他当然还是要看看这个纪念馆的。当她把葬在公墓里的 12 岁姑娘丹娘的日记给尼克松看的时候，尼克松深受感动。她把叙述丹娘全家人如何相继牺牲的几段记载翻译给尼克松听；令人悲痛的最后一段写道：“都牺牲了。只剩下丹娘一个人了。”念这句话的时候，女向导激动得声音发抖。最后她抹着泪水说，“丹娘也牺牲了。”

在尼克松一行离开之前，他们要尼克松在来宾簿上留言。尼克松写道：“向丹娘和列宁格勒的所有英雄们致敬！”临走时尼克松说：“我希望这样的事永远不在全世界重演。”

第二天，星期日，尼克松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了电视广播演说，在演说的最后部分，尼克松说：

当我们为缔造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而努力的时候，让我们想想丹娘，想想全世界其他丹娘和他们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竭尽一切力量来保证使其他儿童不致遭受丹娘经历过的苦难，使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友好地和太平地生活在一起，度过他们的一生。

广播过后，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说，他的结束语使他热泪盈眶。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于星期一上午结束了正式会议。基辛格中午为记者

举行了一次情况介绍会，晚上又举行了最后一次。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俄美关系 12 点基本原则，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文件，象征着 20 年来基辛格所谓的“相当严峻的敌对”时期已经结束，一个“克制的”、“创造性的”新纪元正小心翼翼地开创出来。联合声明发表后，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圣格奥尔基大厅举行盛大招待会。虽然尼克松在一周前还嘲笑通常在最高级会谈中惯用的那一套“空谈”，而勃列日涅夫强调这次最高级会谈要“务实”，这两位领导人现在却都像啦啦队长那样兴高采烈了。勃列日涅夫反复练习新学会的美国字“OK”（“对”），尼克松则反复讲他学到的俄国字“哈罗绍”（“好”）。这时，克里姆林宫的乐队奏起了乐曲《啊！苏姗娜》。俄国人在政治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俄美平起平坐，在军事优势上还赢了一着；而美国人则认为苏联已经在越南问题上答应帮忙了。即使最后一分钟出现什么尴尬局面，也不会影响官方的热情。

尼克松预定要乘俄国飞机前往基辅。（这是仿效从北京飞往杭州的那次安排。）机场举行欢送仪式后，总统登上了一架闪闪发亮的苏联喷气式客机。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看到总统挥手和进入机舱的情景。然后——没有动静了。飞机没有起飞，引擎坏了。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打着黑布雨伞在雨中恼火地站着。电视记者在猜测延宕的原因。等了大约 30 分钟，电视屏上的飞机影象突然变成了一片空白；原来莫斯科电视台被延宕事故弄得狼狈不堪，干脆停止播送了。

在飞机里面，满脸通红的苏联官员在向美国总统解释说，有一个引擎没有发动起来。驾驶员花了差不多一小时设法发动引擎，但还是不行。于是决定改乘一架备用飞机。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登上飞机向总统道歉。尼克松苦笑了一下说，幸好在起飞之前发现引擎有毛病。

从苏联回到华盛顿后，尼克松的感触颇深，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向亨利着重谈了我对苏联领导人的评价。我说，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苏联领导人只有第三流的智力水平，这话根本说得不确切。我说，我们总是错误地估计俄国人，因为我们只根据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之类来作出判断，而不更深一层去观察他们实际的性格和力量。

谁要在苏联共产党的等级制度里爬到最高的地位并保持那个地位，他就一定要有高明的政治才能和坚强的毅力。这三位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肯定都有这样的条件。勃列日涅夫的口才可能不如他一些老练的欧洲或亚洲同事们那样漂亮，风度也不如他们潇洒，可是像美国的工会领袖一样，有他独到之处。我们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他看成一个傻瓜或头脑简单的粗人。周恩来是既文雅又刚毅的人，在当今世界上是罕见的。

毫无疑问，俄国现在的领导人不象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具有变态的自卑感。他们不需要吹牛说俄国的一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东西都好。但是，他们仍然渴望人家对他们平等相待，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给了他们很好的印象。

有趣的是，苏联领导人都讲究穿着。勃列日涅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追求时髦的人。他有一套显然非常贵重的金制烟嘴和打火机。

我注意到苏联三位领导人的衬衫袖口都用链扣。这使我想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以来已经有了多么微妙的变化，因为赫鲁晓夫当年曾经坚持要穿得比我们大家都朴素。

柯西金确实是一本正经，非常冷静，不轻易露出热情；用共产党的话来

说，他是个贵族。波德戈尔内更像美国中西部的一位参议员。勃列日涅夫有如爱尔兰人后裔的大工会头子，或许把他比作〔芝加哥的〕戴利市长更加贴切。当然，这些比喻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

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私人交情也不错。有一次，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一起交谈，我给基辛格写了一个条子说，这听起来就像我们房间里那架每当我们想要防止窃听时便打开的扰频器发出的干扰声一样。

勃列日涅夫非常热情友好。我们乘车去别墅的时候，他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他希望我们已经建立起亲密的私交。

〔奥地利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曾经分析过勃列日涅夫，认为他属于“熊的拥抱”那种类型的人，因为不论谁来见他，他都喜欢拍拍肩膀，搂搂抱抱。我不由得想起，如果当年在葛拉斯堡与约翰逊会晤的是勃列日涅夫而不是柯西金，这两个人倒真是一对。

有一次他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另一次他把我称为“现任的和未来的总统”。

他告诉我，在他刚开始从事党务工作时，有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向他强调过个人交情在政治活动以及党政工作中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老资格的党员究竟是谁，反正听起来有点像是指斯大林。

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的力量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比另外那两位年轻5岁。其次，他说话的声音深沉有力——不论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你都能感到他身上洋溢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和魄力。第三，他有时说话过多，并且不尽确切，但常常能够很有力地表达他的意思，同时也十分精明。他还善于在辩不过人家时转移话题。

他的手势富于表情。他有时站起来踱步，这是我们会谈时他常用的方法。亨利记得有一次勃列日涅夫说，“我每站起来一次，就作出一个新的让步。”当然，他这样做一定是受我的态度的影响，因为和他相比，我是十分克制的。有人也许会说，我这样对待他是错误的，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我对他的各种指责神色不动，反而比感情外露更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对我说：“我是个易动感情的人，特别是对于战争中有那么多人死亡的事情。”我回答说，尽管我是以缺乏感情出了名的，在他谈起的这个问题上我却和他一样感到激动。

他问起毛泽东的情况。我说，他虽然身体不好，从智力上说还是敏锐的。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毛是个哲学家，不讲实际，是个上帝般的人物。他说，要了解中国人是极其困难的，接着他又说，“我们欧洲人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非常强调“有些人”不希望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显然是指中国人。

有一个侧面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总是想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苏联领导人却不然，除了北越和有一次简单地提起北朝鲜以外，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谈到哪一个小国。我还颇感兴趣地发现，苏联领导人根本没有提古巴问题，他们对北朝鲜问题的态度是很温和的。

一年以后，当尼克松在华盛顿迎接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尼克松已遇上了“水门事件”的麻烦。但两位首脑都没料到日后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

6月16日下午，勃列日涅夫的飞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根据约定星期一才正式开始最高级会议，所以尼克松已去佛罗里达州度周末。勃列日涅夫到达戴维营不久，尼克松即从比斯坎岛打电话给他；他将在戴维营休息两天，适应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时差。尼克松从未听到过他的声音像那天

下午电话中那样友好和毫无拘束。尼克松说他很欢迎他到美国来。多勃雷宁在一个分机上当译员，但他还未来得及开口翻译，勃列日涅夫就用英语连声说“谢谢你！”

尼克松要他尽量休息好，因为尼克松深知，乘喷气机的疲劳不是一下子恢复得了的。勃列日涅夫说，感谢尼克松考虑得很周到，给他准备了戴维营这样幽静而舒适的地方；并对他的妻子未能与他同行感到遗憾。尼克松说他和帕特期望两年之内在美国举行美苏第四次最高级会议时，他的夫人能与他同来。至少就气氛而言，第二次最高级会议已有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开端。

星期一上午将近十一点，勃列日涅夫的汽车顺着弯曲的车道开到白宫的南门廊前停了下来。尼克松致欢迎词说：“目前全世界都寄希望于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议。”他的答词是热烈的：“我和随行的同志们准备努力工作，以保证我们与你们即将举行的会谈……不负我们两国人民的期望，并有益于全人类的和平前途。”

在双方简短致词后，两人走出去，到被雨淋湿的草地上检阅仪仗队。当两人检阅完前排仪仗队，正要回头检阅后一排时，勃列日涅夫再也抑制不住他兴高采烈的心情。他向正在鼓掌和挥动美、苏国旗的群众热情招手，然后阔步走到他们面前，好像一个美国政客在农村集市上争取群众一般。好几个人向他伸出字来，他满面笑容地和他们握手，一直到尼克松提醒他仪式尚未完毕，他才罢休。两人走回南门廊里，他用一只手臂搂着尼克松的肩说：“瞧，我们已取得进展了！”

两人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是秘密的，只有在1972年就曾是译员的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在场。勃列日涅夫一开始就向尼克松保证，他是代表整个政治局说话的，尼克松的回答是：尽管国内意见有分歧，但我是代表大多数美国人说话的。勃列日涅夫使劲地点头。

会谈时，勃列日涅夫越来越生气勃勃。他几次都紧紧抓住尼克松的手臂，以强调他所阐明的论点。使尼克松不由得想起上次在这个房间里林登·约翰逊在发挥他的论点时也使用了这种触觉外交。

到勃列日涅夫阐明有关美苏两国之间关系的看法时，神情变得极其严肃。他说：“我们知道就力量和影响来说，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真正管事。任何事情只要我们两国之间决定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使可能不同意也不得不跟着我们走。”虽然他没有提到中国，但他显然想使这次最高级会议表明美苏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重要；如果美国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时，美国同苏联的关系则会占优势。

尼克松回答道：“我承认，我们两个最突出的核超级大国，这是现实，但我们双方都有盟国。他们全是有自尊心的人民，我们做事绝不应显得漠视他们的利益。”

12点半秘密会议结束，这时双方其他参加会议的人进来了。勃列日涅夫引用了他后来在访问期间屡次引用的一句俄罗斯谚语。他对尼克松说道：“我们常说‘生活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生活已引导我们得出了结论：在我们两国之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然后他转向室内其他人宣布，他已邀请尼克松于1974年回访俄国，尼克松已接受了邀请。

尼克松回想起1959年。当时尼克松坐在这同一间办公室内参加了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第一次会见。赫鲁晓夫知道他是从软弱的地位出发讲话的，因此感到有必要采取咄咄逼人和自夸的态度。自那时以后，力量对比

业已平衡，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性的核发展和核能力方面，差距已经弥合。勃列日涅夫已有力量比较从容不迫地讲话了。1973年，总的说来美国仍占优势，但勃列日涅夫手中握有很好的牌，信心十足，所以他可以有说有笑，进行逗乐，严肃的神情中又掺杂着热情。

与勃列日涅夫进行的第一轮会谈，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对于未能给予最惠国待遇表示失望，但他明白责任在于国会，非尼克松力所能及。苏联人还不准备对他们本国多弹头导弹的发展加以限制，所以勃列日涅夫仍坚持反对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就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达成协议。然而，他还是勉强地默然同意了尼克松的要求：以1974年底而不是以1975年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永久性协议的最后限期。

在公开集会上，勃列日涅夫的举止依然热情洋溢。他显然欣赏他所受到的注意，他像一个熟练的演员，或是一个天生的政客，懂得如何占有舞台中心。在一次签字仪式上，他使劲举杯祝酒，结果把香槟酒溅到衣服上了，于是用手帕掩面，故作窘态。在另一次签字仪式上，他带头演出了一出哑剧，装作要同尼克松比赛，看谁先签完各种文本。

星期二夜晚尼克松邀勃列日涅夫乘“美洲杉号”游艇出游，然后坐直升飞机飞往戴维营，在那里继续讨论。尼克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件皮茄克，上面盖有总统的印玺，下方一端印有“戴维营”字样，另一端印着“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很高兴，在戴维营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穿着这件皮茄克，与新闻界合影时也如此。为了纪念他访问美国，尼克松还送给勃列日涅夫一件正式的礼物，一辆由〔福特〕汽车公司捐赠的林肯牌大陆型深蓝色小轿车，车内的座垫是黑丝绒面的，仪表板上刻有“特别良好的祝愿——向您致意”的字样。勃列日涅夫喜欢收藏各种类型的豪华汽车，见了这辆汽车眉开眼笑，毫不加以掩饰。勃列日涅夫坚持要当场试车。他坐在驾驶座，热情地向尼克松做手势，要尼克松也上车。当尼克松上车时，尼克松的特工队长吓得脸色刷白。两人的车开动了，沿着一条环绕戴维营的窄路而下。勃列日涅夫是在莫斯科的中心车道上畅行无阻地开惯了车的，如果有辆特工队或海军的吉普车急转弯突然在这条单行道上出现，那会发生什么事，就只有天知道了。

路上有一处是个很陡的斜坡，坡顶上竖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慢行，前有险弯”。尼克松就是驾驶着高尔夫球车下坡，由于怕在城下急转弯的路上出事，也还得踩闸。但勃列日涅夫在快到斜坡时却以50多英里的时速开车。尼克松担心地倾身向前说：“慢点开，慢点开。”但勃列日涅夫毫不在意。汽车到达城下时，他猛然急煞车，使车拐了弯，汽车轮胎发出尖叫声。试车完毕，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说道：“这辆车好极了。走得真稳。”尼克松回答道：“你真是了不起的驾驶员。以我们刚才的速度拐那个弯，我恐怕永远也办不到。”

外交并不总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艺术。

在戴维营举行的会议上，长时间地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欧洲安全问题以及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共同均衡裁军谈判问题。

两国首脑在第二次最高级会议上进行谈判的问题中，最困难和最有意义的是有关拟议中的防止核战争协定问题。两国在未举行最高级会议前的来往中，勃列日涅夫曾强烈要求美国同意签订一项不使用核武器的条约。但是

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签订这种条约的实际后果必然是防范美国，至少也是不准美国使用核武器保卫他们的盟国或保卫美国本身的重大利益。事实上，尼克松感到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关心签订不使用核武器条约，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怀疑美国即将与北京签订军事协定。苏联人觉得禁止使用核武器将会大大削弱美国在中苏战争中对中国人起的作用。就美国同北京的关系而言，苏联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但如按苏联的意图签订这样一项条约，那就会在美国欧洲北约盟国中引起大混乱，并将严重破坏美国与以色列和日本等国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是依靠美国的核保护来防止苏联袭击的威胁的。

5月份，基辛格拟出一个方案，部分地满足了苏联的建议，但并没有削弱一旦受到苏联袭击指望美国给予援助的盟国和其他国家。基辛格所建议的不是签订一项在发生战争时不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而是美苏双方不仅在两国之间，而且在他们任何一国和第三国之间都不应使用武力，并同意在使用核武器的危险迫在眉睫时彼此进行磋商。尼克松知道勃列日涅夫对此方案并不会感到完全满意，因为它并不妨碍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但从勃列日涅夫的目的来说，有胜于无，于是勃列日涅夫便同意了该方案。6月22日星期五，两国首脑在白宫东厅举行了正式仪式，签订了这项协定。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飞往加利福尼亚州。途中越过科罗拉多大峡谷时，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作了低空飞行，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峡壁上明暗辉映的奇观。勃列日涅夫说道：“我在新闻片和美国西部牛仔影片里看过许多这样的画面。”

尼克松回答道：“是啊！约翰·韦恩。”（美国西部武打影片的著名男演员，在政治上是尼克松的支持者。）

勃列日涅夫突然从窗口边跳了回来，耸起双肩，将双手放在臀部，装作从枪套中取出六响手枪的样子。

乘短程直升飞机从埃尔托罗到圣克利门蒂去时，尼克松请勃列日涅夫坐在窗口旁好好地看一看飞机下面的超速公路网和郊外风景。尼克松感到他对这一切，特别是对马路上众多的小汽车和大批的私人住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告诉他海滨区的房子，一小部分为富人所有，但大部分属于在工厂和各种机关工作的人们；他若有时间到美国其他各地去访问的话，他也会看到大体上相同的情况。

那是圣克利门蒂一个美丽的夏晚，于是尼克松带勃列日涅夫坐他的高尔夫球车去兜风。尼克松曾建议他住在附近的海军陆战队彭德尔顿营基地长官的大房子里，但他硬要和尼克松同住。尼克松认为他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要强调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的房子尽管很漂亮，但按苏联领导人的标准，就未免太小了。他们习惯于沙皇贵族的乡间住宅和别墅，而尼克松这房子的设备根本不适于接待国宾。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特里西娅的卧室是仅有的空房。因为特里西娅最近重新装饰了她的卧室，所以尼克松就把勃列日涅夫安排在那里。整个房间大约只有10英尺宽15英尺长，特里西娅所选的墙纸上有柔和的淡紫色和蓝色相间的大花卉图案。尼克松事后想起竟然把勃列日涅夫那样巨熊般的人物安置在一间女性味十足的房间里，觉得十分有趣。

在华盛顿和戴维营进行的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在中国问题上极其克制。但星期六下午，在圣克利门蒂尼克松的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对中国问题讲了几分钟的话，就很少掩饰他的忧虑。他显然仍担心美国正在考虑与

中国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安排，可能要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尼克松向他保证：虽然我们同中国将继续交往，但我们绝不会同中国或日本作出任何违背我们在华盛顿刚签订的防止核战争协定精神的安排。尼克松知道他的意图并不在此，但尼克松不能同意与他建立一种将美国同中国打交道的情况向他通报的关系。

尼克松对勃列日涅夫说：“我确实认为你对中国人的忧虑是没有道理的。”勃列日涅夫问尼克松为什么没有道理。尼克松说他的判断并非根据他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过的谈话，而是根据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尼克松说，中国人要获得足以对苏联或其他主要核大国冒险采取侵略行动的核能力，至少需时 20 年。

勃列日涅夫说，在此问题上他不同意尼克松的意见。

尼克松问他：“你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大国需要多长时间？”

他举起双手摊开十指。起初尼克松以为他在做某种投降姿势，后来他挺直了手指说：“10 年，10 年之后，他们就会拥有我们现有的武器。”

尼克松把话题转到柬埔寨，这个问题尼克松在会谈中已提过几次。尼克松指出北越又在那里活动，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威胁。尼克松说：“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我国许多人会说这应归于苏联的武器。”勃列日涅夫听后非常激动，坚决否认苏联曾把任何新的军事装备运往印度支那。他说苏联完全赞成早日结束柬埔寨和老挝的战争，并答应向北越人严辞指出这一点。关于该地区出现新武器的事，勃列日涅夫说，他认为中国人要对此负责，中国人不仅应对武器本身负责，而且也应对散布武器是苏联人运去等消息负责。

会议结束时，勃列日涅夫尽管情绪显得很强烈，但他还是尽量用外交方式敦促美国不要同中国签订任何军事协定。他说 1972 年他未提这个问题，但现在他为未来担忧了，他宣称苏联人无意进攻中国。但是如果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军事协定，他说：“那就把问题搞乱了。”

两人中止了对中苏分裂这一意识形态上的严峻问题的讨论，去参加在游泳池旁举行的鸡尾酒会。来宾名单简直像是好莱坞的名人录。来宾排成一行来见他们，因此勃列日涅夫有机会会见每一位。当一个巡回演出的墨西哥流浪乐队在黄昏时分奏起欢快的音乐时，勃列日涅夫热情地向每位来宾致意。他有好几次显得对一些老影片颇为熟悉，这说明不是事先有人向他很详细地介绍过，就是他常在克里姆林宫内专设的电影室里看电影。

尼克松在欢迎词中特别提到客人中有许多美国西部的武打明星和其他电影明星，但尼克松又一次向勃列日涅夫保证，他们进来时已把手枪和枪套存放在入门处。勃列日涅夫致词极为彬彬有礼，他说：“我在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家里作客，感到幸运。”

欢迎会举行完毕，尼克松为他设了便宴。餐厅很小只坐得下 10 个人，尼克松有意安排了这个非正式宴会，这样勃列日涅夫可感到随便一些。尼克松在祝酒时说，勃列日涅夫曾告诉他，他通常在大型的国宴上吃得很少回家以后再同他的擅长烹饪的妻子一起吃夜宵。尼克松说认为家里举行的这次便宴，比双方都很习惯出席的正式官方宴会更有意义。尼克松指出他是住在尼克松家里的第一位外宾，他睡在特里西娅的卧室，多勃雷宁和葛罗米柯则合住在戴维和朱莉来探望尼克松时所住的那所待客的小屋里。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你可以看到，这房子不大，但它就是我们的家。在这种场合，我们的思想就离开政务，转向我们的家庭，转向可能远在他方

的亲人。我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成长，正如我确信你希望你的儿孙能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成长一样。你和我于去年和今年举行的会议皆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我只希望将来世世代代的俄国人和美国人会像我们一样，在彼此家里会晤，这是由于我们彼此的情谊而产生的朋友之间的会晤，而并不是由于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需要解决而举行的官员之间的会晤。因此我除了建议为你的健康，为其他来宾的健康干杯外，更要为勃列日涅夫夫人，为你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孩子干杯，因为我们相信，由于我们所做的工作，他们将有一个更加幸福、更为和平的未来。”

当尼克松的祝酒辞结束后，勃列日涅夫热泪盈眶。他感情冲动地离开他的座位，向尼克松走来。尼克松也站起来向他走去。他伸出两臂，给了尼克松一个真正熊式的拥抱，然后动人地建议为帕特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干杯。

宴后，勃列日涅夫向其他来宾表示歉意，说要离开片刻。然后他将帕特和尼克松拉到一旁说：“我们已经交换了正式的礼物，但我还专为你和尼克松夫人带了一样东西。”他送给帕特一条由他家乡手工艺工人手织的围巾，他说道：“这件礼物很轻，但这条围巾的每一针都体现了苏联全体人民对美国人民怀有的友好感情，体现了勃列日涅夫夫人和我对你和尼克松总统的友好感情。”他讲话时再一次热泪盈眶。

在这次感情相当激动的便宴后，勃列日涅夫说由于这里与华盛顿有三小时时差，他感到累了，打算早点睡觉。尼克松同他一起走到特里西娅的卧室门口，在那里互道了“晚安”。尼克松也决定这天晚上早点睡，10点半左右尼克松已换了睡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有人敲门，是特工人员给尼克松送来一封基辛格的信，说俄国人想要会谈。

尼克松刚穿好衣服，基辛格就进来了。

尼克松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基辛格答道：“他说他想要会谈。”

尼克松问：“这是由于他们睡不着觉的缘故呢，还是耍些什么花招？”

“谁知道他们搞的是什麼名堂？”基辛格耸耸肩回答道。

他们走到书房，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宁和葛罗米柯不久也来了。

“我睡不着，总统先生。”勃列日涅夫满面笑容地说道。

“这倒给我们一个毫不分心地进行会谈的好机会。”尼克松一面回答，一面坐在他的小沙发上。

接着双方会谈了三个小时，其情绪之紧张，几乎与在俄国人夏季别墅举行第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越南问题时不相上下。这一次讨论的是中东问题，勃列日涅夫试图逼尼克松把根据阿拉伯人的条件所拟定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以色列。他不断重复说，为了解决中东问题，苏美双方必须就一系列“原则”达成协议（即使是秘密协议也好）。关于这种原则，他举例如下：以色列军队从它所占领土撤走；承认国界；船只可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解决方案须有国际保证。

尼克松指出，他没有办法同意任何一条这样的“原则”而又不致损害以色列的权利。尼克松坚持说，重要的是要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开始谈判。尼克松还向他说明，如果我们事先定下将会引起争论的原则，双方就会拒绝谈判——这样一来，上述原则反而会适得其反。

勃列日涅夫态度直率强硬。他说至少也得根据这些原则签订一项非正式

协定，否则他就会空手离开这次最高级会议。他甚至暗示，如不签订一项原则协定，他就不敢担保战争不会重新爆发。

有一次，他装腔作势地看了看表，皱起了眉头。他说道：“我也许使你累了吧！但是我们必须取得某种谅解。”

他仍坚决要求双方对上述原则达成协议——实际上就是苏美共同强制执行对阿拉伯人非常有利的解决方案——尼克松则坚决加以拒绝，并重申重要的是使双方自己开始谈判。

勃列日涅夫知道在华盛顿和阿拉伯各国首都之间在重新开辟联络渠道方面，美国已取得缓慢而稳步的进展；他也知道，如果美国能有助于和平解决阿以分歧，美国将会给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及威望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从他的观点看来，在圣克利门蒂尼克松的书房所举行的显然是临时性的会议上，他使用了突击战术，这是一种有意的冒险。勃列日涅夫不可能真的认为尼克松会上他那代价少得可怜的钩，来换取美国在实际上放弃以色列。

在这个难题上，双方由于意见分歧，未能取得共同点。对此，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于次日签署的联合公报并未使用外交辞令加以掩饰。关于中东问题只写上了很短的一节：“双方在此问题上都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他房子旁边花园里的话筒前，分别致了告别词。勃列日涅夫说下一次他将在莫斯科会见尼克松。最后他用英语说“再见”。

这次最高级会议给尼克松一个机会，使他能更好地了解勃列日涅夫，对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和一个普通人作一番衡量。1972年和他一起度过42小时，现在1973年，又同他一起度过35小时。不管这种个人接触是如何地表面化，它还是使尼克松能够洞察到一些重要的东西。

尼克松发现勃列日涅夫比他们举行第一次会议更加令人感到兴趣和印象深刻。他能摆脱克里姆林宫的一些框框，发挥出他性格中更富有人情味和懂得政治策略的一些方面。有一次在签字仪式上，当他的一些滑稽姿态使他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时，尼克松开玩笑说：“他是这房间中最杰出的政客！”他仿佛把尼克松的话当成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在尼克松看来他在许多公开露面的场合的举止和脾气简直像个小丑。在这些场合，尼克松尽量扮演丑角助手角色，但对尼克松来说，有时很难做到既彬彬有礼而又严肃庄重。

勃列日涅夫表现出典型的俄国人性，有时律己颇严，有时却很放纵。这种矛盾性格的有趣象征就是他那新奇的内置定时器的香烟盒，这个烟盒每小时自动配给他一支香烟。这是他减少自己接连抽烟的方法。每过一小时，他就郑重其事地取出一支配给的烟，然后把烟盒关上。再过几分钟，他又将手伸入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另从他经常带在身上的普通烟盒里取出一支烟。因此他照样能一支接一支地抽，这样一直到烟盒定时器又开启，这时他又可从烟盒里取出一支有节烟之功的烟了。

在第一次最高级会议上，尼克松不由得暗自把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进行一番对比。但在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期间，尼克松则有机会更加深入细致地对他们的不同点进行了观察和分析。他们都是很强硬，难以对付和讲究实际的领导人，在这一点上是很相像的，在谈话中他们都爱夹杂些轶事。赫鲁晓夫粗鲁而爱吓唬人，勃列日涅夫则胸襟开朗，比较有点礼貌。两人皆富有幽默感，但赫鲁晓夫看来更为经常地用其幽默感来开周围的人的玩笑。

一年以后，当尼克松正面临因“水门事件”被弹劾的危机时刻，6月27

日，在莫斯科机场，苏联人似乎并没受到影响。尼克松刚走下飞机，勃列日涅夫就大步走过跑道来欢迎尼克松。相当多的一群人站在栅栏后面挥舞着纸制的旗子，他们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沿街也都是人群，这和 1972 年时大不相同了。

到达不久，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到他办公室去进行一次私下会谈。他告诉尼克松最近与美国两党领袖的会晤，他说他们两人都支持缓和。尼克松对他说，在从现在到 1976 年这段时间里，他能会晤两党的领袖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们需要他们都来支持缓和。尼克松说：“我们得让他们都稍稍清醒一些。”

勃列日涅夫表示他一直注视着美国的政治局势，并深信尼克松的总统职位一定可以延续到 1976 年。这使尼克松感到高兴。

7 月 3 日，尼克松离开莫斯科回国。

出乎尼克松意料之外，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全都上了尼克松的车驶往机场。勃列日涅夫坐在尼克松前面的折叠座上。一路上十分安静，大部分时间让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和尼克松交谈。这也是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与苏联领导人交谈。“水门事件”的狂涛巨浪已无情地向尼克松涌来了。

第十五章 高处不胜寒

1972年6月17日凌晨两点30分，当尼克松正在加勒比海边一所豪华的私人住宅中安睡时，坐落在华盛顿的水门公寓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有五个人被捕：其中三个是古巴人，一个大家都以为是古巴的美籍意大利人，还有一个名叫詹姆斯·麦科德的人。他们带着手套、电筒、复杂的偷窃工具和电子窃听器。

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起极为普通的“三流窃贼案”。没有人会想到，这起毫不起眼的案件，竟会发展成为震惊世界，导致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的政治大丑闻。

丑闻的序幕还得追溯到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不久的1969年春，尼克松下令秘密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共产党庇护所”。

但是，秘密并未保持多久。1969年5月，《纽约时报》记者威廉·比彻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根据尼克松政府某人士透露，最近几个星期美国B—52轰炸机首次轰炸了越共和北越人设在柬埔寨境内的若干军需品临时堆集处以及基地和营房。”

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早就对以前的一些新闻报道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报道损害了美国的谈判地位。例如4月1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正在积极地考虑单方面从越南撤退。现在尼克松与基辛格大怒了。他们想知道“尼克松政府某人士”究竟是谁。他们两人都感到，政府里面有一些官僚在同他们捣蛋。他们两人都决心找出向新闻界“泄密”的人。

于是，尼克松对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下令对所有有泄密嫌疑的官员进行电话窃听。随后，这个计划加以扩大，甚至把新闻记者也包括进去了。结果，联邦调查局一共窃听了17人的电话，其中7人是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3人是白宫的工作人员。但是，电话窃听从未收到任何效果。正如尼克松后来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所说的，“真笨，简直是一些饭桶。”

然而，有一次电话窃听水门在历史上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尼克松私下亲自通过白宫的助手而不是通过联邦调查局下令执行的。窃听对象是有影响的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历史学家把这次电话窃听归咎于约翰·埃利希曼，但是，这从头到尾都是尼克松自己的计划。克拉夫特以前是支持尼克松的，现在却在他的专栏中就战争问题和基辛格的和平谈判问题开始反对了。联邦调查局声称克拉夫特的电话“无法窃听”。为此，尼克松找了埃利希曼，而埃利希曼后来又找了他手下一个叫约翰·考尔菲尔德的侦探。

考尔菲尔德雇佣了一个过去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的人，名叫约翰·拉根；还雇佣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已无可考了。据说，这两个人用了一个梯子，把它放在克拉夫特在乔治城的住宅的墙上，然后爬上去，就这样给克拉夫特的电话安上了一个窃听器。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除了听到一个女佣人打电话之外啥也没有听到，而她说的又不是英语。看来克拉夫特一家人已去欧洲。尼克松并不气馁，他要联邦调查局去试试看可否在巴黎对克拉夫特进行窃听，他正在那里报道和平谈判的新闻。通过法国有关当局，终于在他所住旅馆房间里安装了一个窃听话筒。

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泄密的人一个也未发现。可是，却无意地、不知不觉地为“水门事件”开了先例：派秘密雇用的白宫人员去搞电话窃听。

1970年5月肯特州立大学事件标志着尼克松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他走下

坡路并滑向“水门事件”的开始。当时白宫班子中任何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家都过分地忙于设法把全国对入侵柬埔寨的忿怒平息下来。但是到后来，尼克松已不再指望诸如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情报和调查机构来帮助他从事斗争，以平息全国的忿怒并满意地结束战争了。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已失败了，它没有发现泄漏军事秘密的人，它没有发现共产党人对反战组织的支持，而他对存在这种支持是确信无疑的。总之，它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而且胡佛还切断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

自然，尼克松很清楚地知道，他不能依靠中央情报局。更糟糕的是，他不仅对来自中央情报局而且对来自华盛顿其他许多情报机构的军事情报，都不满意。他告诉霍尔德曼说，“这些家伙把他们的时间都用来勾心斗角。”的确，不同情报部门之间的猜忌经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华盛顿有一种很少人谈论的现象，那就是：在政府机构之间，而且也在特务与“坐探”之间，存在着不顾国家利益的大量敌视行动。这一点已在尼克松政府中得到了生动证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中的一个服务员已被发现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派来的一个坐探。这个服务员查尔斯·雷德福曾复制绝密文件，送给他在五角大楼的真正上司，好让他们知道基辛格和他的外交政策专家们在策划些什么。

1970年春天，一个名叫汤姆·休斯顿的青年——他作为国防部情报局的一名陆军军官去海外任职归来之后，参加了白宫的工作班子——概述了他认为整个情报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他特别提到这些人员之间完全缺乏合作与协调以及这种现象对下述所造成的损害：有必要搜集关于国内的骚乱和暴力行动可能受到外围影响和支持的足够情报。

他竭力主张立即行动起来，并建议召开一次有各情报机构的首脑参加的会议，而总统应在这次会议上好好地训斥这些首脑，并告诉他们去制订出可行的计划，以便收到效果，而不是引起辩解和争论。当这个建议送到总统手里时，他对这个建议给予了早就料到的欢迎。休斯顿所说的正是尼克松所想的。

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脑，于6月5日举行了会议。尼克松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于他们在协调国外和国内情报，特别是协调关于国内示威运动的情报方面的工作，他是不满意的。

他指令他们组成一个特别工作组，制订出一个能收到效果和解决问题的计划。他并指定汤姆·休斯顿作为白宫工作人员参加他们的工作。结果产生了众所周知的“休斯顿计划”，可是这个名称掩盖了以下这个事实，即提交总统并得到他批准的这些计划并不是汤姆·休斯顿制订的，而是由所有情报机构组成并由J·埃德加·胡佛任组长的特别工作组制定的。所有这些情报机构的代表都在这个报告上签了名。胡佛以组长身份签了名，但在一个脚注里说明他对其中许多项建议不能同意。

当尼克松批准这个计划时，他的亲信一点也未想到，他是在制造一个让约翰·迪安几年后使之爆炸的炸弹。迪安设法弄到了这个报告的抄本，把它放在保险箱里，到了恰好合适的时候，引人注目地公布了它，使检察官得到最深刻的印象。该报告由于建议进行许多非法活动，诸如偷拆信件、窃听电话和破门而入等，因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个报告遭到了歪曲，以致使它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仿佛尼克松力图把一个不见经传的白宫工作人员安插在指挥所有情报机构的地位，从而接管整

个情报系统，以达到他罪恶的政治目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接踵而来。当休斯顿报告关于非法活动部分被揭露时，看到它的专栏作家都感到不寒而栗。但是，这并非政府的一项新政策。其实，多年来这一直是官方的政策，直到林登·约翰逊于1966年停止了这一政策。

然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才知道——不过，当时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所进行的某些活动从未停止过，甚至在1966年时也还照干。事实上，甚至当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各情报机构的首脑见面开会时，这些活动也仍然在进行。只不过这些情报机构的首脑一点都没有让总统知道而已。这些首脑中之一的胡佛确曾宣称他对整个主张感到如此愤慨，以致他曾向约翰·米切尔抱怨了一通。米切尔把他的批评意见告诉了尼克松，尼克松在五天之后便放弃了这个主张。

休斯顿计划尽管没有执行，但它却给情报机构带来了明显的新的威胁。它们担心的是，白宫的“干预”会导致它们权力的丧失。

白宫究竟有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坐探”呢？1975年7月10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卡尔·尼齐公布了督察长的一个报告，从其中可以看到，中央情报局承认已“派遣过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到白宫和政府各个机构的做法”。督察长的报告揭露“总统办公室的亲信”中有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

政府内部有中央情报局的坐探已是够糟的了，何况“总统办公室的亲信”中竟然也有这种坐探呢？

但究竟谁是坐探呢？除了中央情报局的决策人之外，恐怕是没有人知道了。

休斯顿计划的未能执行，为围绕兰德公司“思想库”雇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公布五角大楼文件演出的一幕戏剧，布置了舞台。

在五角大楼文件公布以后，尼克松的直接反应，不像在秘密轰炸柬埔寨被泄漏以后那样感到紧张，而是默不作声。不管怎么说，这些文件涉及的重大事件，都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执政而不是他执政期间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些文件也不算太重要。

但是，基辛格却告诉总统公布五角大楼文件究竟会有多么危险。“总统先生，这表明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亨利的确知道如何才能触及尼克松的痛处。“一个蠢人居然可以任意公布这个国家的一切外交秘密，这件事的本身就会损害你在苏联人心目中的形象，破坏我们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如果其他国家感到我们无法控制内部的泄密，那么，它们永远也不会同意和我们进行秘密谈判。”

尼克松对刊登文件的报纸和埃尔斯伯格本人发动了反击，并向法院提出了对他们的刑事控告。

接着，他还发动他的“三员大将”采取行动：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尔森。从“水门事件”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饶有兴味地看到他究竟是如何利用他手下几员大将每一个人的特殊才能的。

为了采用迎头痛击的办法，尼克松很自然地挑选了霍尔德曼。他把叫他到他的办公室，命令霍尔德曼亲自去找每一个内阁成员和情报机构首脑面谈，无情地谴责他们一通，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今后堵不住所有泄密的漏洞，就把他们通通撤职。

尼克松对霍尔德曼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最高执法官”。霍尔德曼

点点头，尼克松又说，“鲍勃，那些该死的东西，我想要国务院每一个接触机密的人员都受到测谎的试验。”

国务院有数以千计的人员。霍尔德曼闭眼一想，等候接受测谎试验的人排成长达数个街区的队伍，而新闻记者则会兴高采烈地赶紧抓住这件事，大肆渲染说这是说明即将出现尼克松式的警察国家的又一例证。忠于尼克松的霍尔德曼说，“总统先生，不可能那样做。他们的人数太多了。国务院将会闹翻天，而我们将会受到报纸的严厉的批评。”

“我他妈才不在乎呢。我就要这样做。这个政府的泄密事件中有一多半都是这些混蛋在后面支持搞的。我要一劳永逸地制止他们再这样做。”

但结果，只对几个国务院高级官员进行了测谎试验。

为了采取一条比霍尔德曼这种做法更为迂回的途径，尼克松选择了约翰·埃利希曼。约翰既有敏锐的头脑，又擅长于搞阴谋诡计。埃利希曼有一次告诉霍尔德曼，他希望在这个政府中担任的职务，不是国内事务顾问，而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在“水门事件”后的写作生涯中，仍然流露了他向往中央情报局的感情。）

这时，在谋求从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找出泄密漏洞并堵塞这些漏洞方面，尼克松已不指望得到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真正帮助了。但他仍然决心非做一些事情不可。因此，他告诉埃利希曼，“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糟糕的政府中找到任何人为我们出点力来解决这个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那么，我的上帝啊，我们就得自己干了。我希望你就在白宫这里建立一个小组。让参加小组的人避开盯梢的密探，查明情况，想出如何堵塞泄密的办法。”

这正适合埃利希曼的胃口。经过一番考虑后，他指定他自己班子里的埃吉尔·克罗和基辛格班子里的戴维·扬格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去执行总统的命令。（约翰把基辛格的人包括在这个小组内，是一种玩弄权术的典型手法。他对亨利太了解了，亨利常常喜欢煽风点火引起事端，然后又远远避开，并发誓说自己毫无所知，甚至曾经持过反对意见。）

约翰指定的这两个人在行政办公大楼地下室的一间小办公室开始办公，因为他们的任务是设法堵漏洞，所以很快就获得了一个名叫“管子工”的绰号。为了不致于被别人占了上风，或者说，为了不致于在这样一件看来可能很有油水的事情上捞不到油水，查克·科尔森也连忙赶来插上一手，建议雇用霍华德·亨特来加强“管子工”的力量。

查克·科尔森早已成了为总统个人“表演精彩节目”的人物，或推行他的“强硬”政治的演出者。人们常常向鲍勃告状说，“野人”科尔森不是蛮横地闯进，就是偷偷地溜入了一些本来应该由像国内事务顾问约翰·埃利希曼这类白宫高级官员或由司法部长米切尔这类内阁阁员管辖的政治领域。不管是谁来告状，科尔森都不在乎。他说他只听尼克松一个人的。而尼克松也是全盘支持他的那些计划的，从他长时间梦想捉到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通奸的企图直到像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丑闻一类比较严肃的斗争。

科尔森说，总统在安排他的任务时讲过下述战斗性十足的话：“我们现在遇到了一股反政府的势力，而我们是非同它进行斗争不可的。为了堵塞这些泄漏洞并防止将来再发生未经许可的泄漏事件，你怎么去干我都不管，需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不希望你对我讲你为什么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理

由。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跑出来泄漏他想泄漏的文件，那么，这个政府就不能存在下去，就不能发挥作用……我希望知道究竟是谁在后面指使这种勾当的，我希望尽可能进行最全面的调查。我不要托辞，我要的是成果。我希望完成这个任务，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科尔森此后不久，给霍尔德曼写了一个便条，希望提醒总统注意。他说，控告埃尔斯伯格不大有搞头。

1971年9月4日清晨，科尔森手下的两员大将利迪和亨特闯入洛杉矶刘易斯·菲尔丁大夫的诊疗所。因为埃尔斯伯格最近在那里进行过精神分析。

“管子工”们深信，菲尔丁的私人档案可能对他们反击埃尔斯伯格的行动提供丰富的资料。但是，他们的这次偷窃作案，不仅没有偷到可以指控埃尔斯伯格的有效证据，反而给尼克松的政敌们提供了“倒尼克松”活动的炮弹。

这次事件发生后不久，“管子工”班子被解散，亨特在科尔森手下从事特别计划，利迪则成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兼负责竞选活动情报工作。

到“水门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看，尼克松对于大选的胜利已有十分把握，他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尼克松看来，他已没有必要再全力投入竞选运动，那会影响他作为现任总统的尊严。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渡过了竞选之河的急流险滩，正平稳地驶向连任总统的港口。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们船舱内部已日益破损腐烂。

事情还是回到本节的开头，1972年6月17日，尼克松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

第二天早晨，尼克松喝咖啡时，从《迈阿密先驱报》上看到水门窃案这条消息，很不在意地浏览过去。

尼克松的亲信、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也看到了这条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想笑。去窃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吗？干什么去窃听呀？这种想法真是可笑之至。因为华盛顿任何一个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只不过是外壳。有用的政治情报得到候选人的办事处去找，而不是到像全国委员会那样礼节性的“门面”单位里去找。既然如此，那么窃听又是为了什么呢？霍尔德曼的笑容还没收敛，就可笑地僵住了，他想起了查克·科尔森：“他们准是捉住了科尔森。”

这么一想，心里凉了一大截。如果牵涉到查克·科尔森，那他倒很可能是在为美国总统干着这档子事。

霍尔德曼回到尼克松的办公室，尼克松便问：

“鲍勃（霍尔德曼的昵称），那则关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荒唐消息是怎么回事？”鲍勃回答说还没有听到华盛顿方面的任何情况汇报。尼克松说：“这真是天晓得的怪事。为什么会有人去闯进全国委员会总部呢？那里什么也没有呀。真正的货在候选人总部，不在全国委员会。”他停顿了一下。“找找马格鲁德，看看他知道些什么。”

38岁的公共关系专家杰布·马格鲁德是白宫班子派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里去工作的人。他原来是在白宫工作。

鲍勃找到马格鲁德一了解，被捕的麦科德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保卫人贝。是给利迪干事的。

正在这时，埃利希曼给鲍勃打来电话。

“这次我们可是有点糟糕，鲍勃，”他说：“那几个古巴人其中的一个

身上带着霍华德·亨特签了字的支票。”

亨特是科尔森的人。如果通过亨特而牵涉到科尔森，那么也可以牵连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鲍勃担心地问：“他和科尔森谈了吗？”

“谈了，他把华盛顿的音量提高了一千分贝。关于水门的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着亨特了。”

“他觉得怎么样，约翰？”

“我不敢猜想。假如科尔森老兄和这场小纠纷有牵连，那我们可就多事了。”

因为民主党人的行动很快，撬门事件发生仅仅三天之后的那天早晨，他们就已经开展了一项对“连任委员会”的控告，要求赔偿数百万美元。也就在这一天，霍尔德曼走进尼克松的办公室，总统坐在有些刺眼的金色窗帷前面（尼克松夫人喜欢欢乐的颜色）仰靠着，安闲地把双脚放在书桌上，像往常一样喝着咖啡。

他们起先谈的是关于政府和竞选事务中的一些不太紧迫、不大重要的事，然后转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撬门事件。关于民主党的讨论只占用 18 分半钟，在那之后又谈起一些日常的琐碎事务，整个谈话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

然而，就因为那具体 18 分半钟在事后从那次会谈的录音带中被洗掉了，而且单单是那 18 分半钟，这就很自然引起人们对他们这短短的时间究竟是怎样度过的，都说了些什么话等等，产生了兴趣。后来经过法庭审讯、法律调查和技术分析等等各种努力想取得一个答案，但都没有结果。

1977 年尼克松在戴维·弗罗斯电视采访节目中讨论了那著名的 18 分半钟的空白。他说他们会谈时鲍勃一般都为将来存档作了比较详尽的笔记，既然鲍勃的笔记只提到了一些有关公关关系的策略，这说明那空白的 18 分半钟有关水门事件的谈话是无关紧要的。

霍尔德曼对此却有不同的说法。据他的回忆，当时的谈话可能是这样进行的。

尼克松：关于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事，你有没有听说牵涉到白宫的什么人？

霍尔德曼：没有牵涉到谁，马格鲁德说是“连任委员会”的利迪自己干的。而且亨特几个月前就离开这里了。

尼克松：可是我对科尔森不放心。

霍尔德曼：为什么呢？

尼克松：联邦调查局已开始进行调查，而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如果联邦调查局质问起科尔森，那我可吃不消。

霍尔德曼：科尔森告诉我他是清清白白的。亨特不拿他的钱已有好几个月了，而且科尔森甚至连看都没有去看过他。

尼克松：如果科尔森顶不住了就会谈到总统。你知道，几个月来我一直催促科尔森，要他在休斯顿那笔交易上把拉里·奥布赖恩抓住。科尔森告诉我他想尽办法也要把我要的材料搞到手。他们去窃听的不正是奥布赖恩的办公室吗？这后面又是谁呢？科尔森的人亨特，天哪！

霍尔德曼：但是，马格鲁德连提也没有提科尔森……

尼克松：他会提的。

霍尔德曼：他为什么会提呢？

尼克松：是科尔森给他打了电话才把整个行动搞起来的，而电话是从他妈的这个白宫打的，当时亨特和利迪就和他坐在一起，我真希望联邦调查局不来检查办公室的工作日记，别把这件事同亨特和利迪在科尔森办公室会面这件事联在一起。

霍尔曼：我得把科尔森找到这儿来。

尼克松：不用啦，我亲自和他谈过了。他说他是无辜的。科尔森说亨特和利迪在时他根本没有提奥布赖恩，（笑）根本没有提，只是笼统地谈了谈怎样让他们的情报计划得到上级批准。

霍尔特曼：我还是不信……

尼克松：所以我假装相信他，并说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发了疯要跑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你想科尔森有可能把实际情况都讲出去吗？

霍尔曼：有可能。我想马格鲁德是在把责任一古脑儿往科尔森身上推……

尼克松：如果科尔森以我的名义打的电话，他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不喜欢这类事。我们控制不了。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说谎……我看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得硬着头皮干。其实我们最好是采取攻势。

正是在这段日子，尼克松迈出了导致结束他的总统生涯的最初几步：他没有阻止人们编造各种解释水门闯入事件的说法，而是尽力促使中央情报局去干涉和限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在 1974 年夏天，国会认定尼克松阻挠了对“水门事件”的司法调查，要对尼克松提出弹劾。

但是，在“水门事件”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党派斗争以及其它复杂的政治背景。

1973 年 1 月 1 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了一篇连任总统尼克松改组美国政府的文章：《尼克松进行改组的意思》。

他们把总统调整政府职责范围的这种方式叫做“经营管理层的革命”。他的目的是：使政府按照他要求的方式工作。

接二连三地对政府各个最高级职位进行大调动的意图是：在他任总统的第二届任期里，理查德·尼克松下决心对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和政策指导。

总统采用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把受过四年尼克松工作方法训练的可靠的白宫助手安排在政府工作部门的关键职位上。

几个星期之后，虽然那时《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报道“水门事件”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是盖洛普民意测验仍报道说，尼克松的声望（或受到赞许的程度）达到了空前高的地步。

水门闯入事件没有能够煽起公众的情绪。当时的尼克松已经是本世纪以来最使民主党人和官僚机构感到害怕的一位总统，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把政府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如果尼克松的改组计划实现了，而且他继续当总统，局面会是怎样的呢？华盛顿知道内情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他不但会通过白宫的八位最高级官员牢牢地控制着政府，而且还会把他自己的“代理人”安插在每一个政府机构的关键职位上，害怕尼克松的人再也忍受不住了。突然之间，像一个熟透了的李子从树上掉下来一样，1973 年 1 月末“水门事件”来了一个大爆发。

改组计划暂缓执行了。尼克松可能被冲击到一边去，甚至可能一蹶不振。最起码他也会被逼得只有招架之功，再也不能推行那个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控

制政府的计划了。

华盛顿有四大权势集团，按其重要性的顺序排列，它们是：

- 一、新闻界。
- 二、官僚机构。
- 三、国会。
- 四、情报系统。

在 1973 年 1 月，所有这四大集团都受到当时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威信最高的那位总统的威胁。所有这些集团的反应来势都特别猛烈，因为那位总统是尼克松。在 1973 年的 1、2、3 月，它们对白宫宣战了。

各界人士都先后醒悟过来了，看到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处在一种易受攻击的地位。

某些方面，例如情报系统，醒悟得早些。其他方面，例如新闻界，除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少数例外，都醒悟得比较晚。

但是，当新闻界大规模转向“水门事件”时，所有其他的权势集团都相形见绌了。到最后，把尼克松搞倒出力最大的新闻界，它的力量超过了其他三个权势集团的总和。

十几年来，尼克松一直是新闻界的对头。

到了 1967 年，新闻界对他的看法改变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他们说，一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尼克松”。在内心，他的信念大大增强，在外表，他也显得有把握多了。这表现在他同新闻界打交道的方式上。新闻界对他也报以比往日客气得多的态度。但是，尼克松是不会上当的。他知道他们仍然是敌人，不可信赖。这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用不了多久事情就会恢复常态。当然，他的预言后来应验了。

在整个竞选运动中，甚至在他当政的最初几个月里，新闻界一般讲对尼克松还是相当公正的。

但是，越南战争，以及尼克松为了结束战争而采取的鹰派式的行动，使新闻界再次聚集起来反对他。尼克松出于本性，进行了反击，这次他利用了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

阿格纽发表了煽风点火的演说，攻击控制着全国的通讯系统、以纽约和华盛顿为总部的东部“权势集团”，他演说中的构思正是来自椭圆形办公室。大部分演说稿是由竭力主张强硬路线的尼克松演说撰稿人帕特里克·布坎南起草的。

当霍尔德曼看到阿格纽第一篇攻击报界的演说的预发稿时，阅后也禁不住大惊失色。霍尔德曼拿着稿子直奔尼克松的办公室，对他说：“我们不能发表这个，这太过分了。”

尼克松说，他还没有读到演说稿。于是，他们两人在一起读了一遍，删去了其中一些比较出格的词句。有人听过或读过阿格纽后来因而出名的第一篇攻击新闻界的演说之后，都认为是太强硬了。

当然，阿格纽说少数权势人物控制着全国的通讯系统是有道理的。不论对阿格纽的议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他们势力之大，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总统的一篇重要政策性演说是高级政府官员花费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进行讨论的结果，但演说在电视上刚播送完，电视新闻评论员不同任何人商量就开始嘲笑这篇演说。他们管这个叫做即席分析。不过这种“分析”似乎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好话。

在正常的电视新闻节目里，也同样会有一些评论员出来，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各种问题发表的文告进行“分析”。关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播音员丹尼尔·肖尔的著名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尼克松刚宣布了他对教区学校的政策，肖尔就在电台上广播说，他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种政策。

总统勃然大怒。他旧时的报复心理复发，又使自己受损失了。“我要联邦调查这个狗崽子。这次可不许拖拖拉拉了。”

霍尔德曼打电话给希格比，他说，肖尔没有问题。肖尔有白宫通行证，这说明他已经通过了联邦调查局的审查“认可”，因此他一定有档案。于是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要调肖尔的档案。

后来事态的发展是很奇特的，白宫班子的一些长于心计的人认为，这是联邦调查局在故意陷害尼克松。联邦调查局没有交出常规的背景档案，而是开始对肖尔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找他的邻居和老板谈话。几分钟后，肖尔就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白宫再次成了众矢之的：这次是被指控为动用了联邦调查局对一名记者进行骚扰。

白宫班子不得不杜撰一个近乎荒诞的说法，来为此辩解，说是白宫当时正在考虑要肖尔到联邦政府中任职。白宫班子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这时，白宫班子已经对尼克松同报界结仇而造成的磕磕碰碰的局面感到习惯了。

说不清尼克松曾多少次吩咐霍尔德曼用不同方法去“整”过多少个记者了。迈克·华莱士对白宫公主特里西娅说三道四了吗？“打个电话给他，要他道歉。”约翰·奥斯本，还是休·赛迪，还是一个别的什么人，写了一些尼克松不喜欢的东西吗？“不准他参加随行新闻记者团，不准他乘空军一号专机。”

霍尔德曼对大多数这类琐碎的报复性命令一概采取置之不理的办法。但是总有一些是不能不理的，其中有一个命令就特别使霍尔德曼为难的。

在一次约瑟夫·艾尔索普举行的星期日晚餐会上，在霍尔德曼旁边坐的是凯·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的业主，也是白宫的主要对头，霍尔德曼详细地对她谈了，设法让她明白，白宫都是些讲道理的人，因此她的《邮报》，对白宫也应该讲点道理嘛。霍尔德曼认为，这件事有些进展，至少是个开端。格雷厄姆夫人告诉霍尔德曼，随便什么时候霍尔德曼感到《邮报》对待他们不公平，一定要直接打电话告诉她。

平地一声雷！几个星期之后，尼克松把霍尔德曼叫进他的办公室。宣布特里西娅即将举行的婚礼，但是，尼克松“不准那个混蛋《邮报》派人参加特里西娅的婚礼。”

事情的经过好像是这样的。在前一天晚上讨论婚礼的家庭会议上，谈到了新闻界采访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话题。有人提到了一个可怕的不祥之兆，《邮报》可能要派它最狠毒的反尼克松的社会新闻记者来采访这次婚礼。这简直是大难临头。就是这个记者在朱莉·尼克松在纽约举行的婚礼上打乱了有关的程序，而且还写了一篇令人恼火的文章。

总统们似乎都有一种可以理解的通病，总要出于本能地对他们的儿女加以袒护。哈里·杜鲁门曾经写信给《邮报》的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告诉他如果再次对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的噪音发表不客气的评论的话，就要对他采取行动。

霍尔德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禁止《邮报》采访会引起各种反应，并会使公共关系陷于一片混乱，从而有损于婚礼。这会使婚礼本来会在公众中

造成的伟大形象受到破坏。尼克松说：“我不在乎。我不能让这些破坏我女儿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场面。就是不准《邮报》派人参加。”

霍尔德曼回到办公室去，思考这件事该怎么办。他想到了不久前同凯·格雷厄姆的谈话，以及她说的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找她商量的话。虽然，这件事并不就是她当时设想到的问题，但是这是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因此，霍尔德曼给她打了电话。

“凯，你曾经提议，要我在和《邮报》发生问题时给你打电话。虽然我一般地不会那样做，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独特的个人问题，希望你能帮我忙。”然后，霍尔德曼说明尼克松一家很担心如果某记者被派去采访婚礼的话，会出什么事。霍尔德曼问她能不能设法避免这一点。并设法从人情上打动她，说明家里人希望婚礼有个愉快的气氛是件很自然的事情。霍尔德曼没有提起总统已经命令他完全禁止《邮报》派人采访，因为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格雷厄姆夫人冷冷地回答说：“让我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但是我作为报纸的发行人，是不能干预派谁去采访的决定的，而且我们也不能让白宫来决定谁可以去采访。不过我理解这个问题。”

至于她采取了什么办法已不得而知，但是这个记者的问题总算解决了。霍尔德曼没有像尼克松要求的那样禁止《邮报》采访婚礼。从中可以看出报界同尼克松之间的僵硬关系。

不出所料，首先对尼克松连任造成威胁（公开地）作出反应的是新闻界。在《纽约时报》、《时代》和《新闻周刊》杂志以及偶然也包括电视网的参加下，《邮报》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接连好几个月反复揭露“水门事件”。

情报机构从一开始就在暗地里调查这个事件，动用了“坐探”和像贝内特那样从外面派进去的特工人员。

国会和官僚机构这两个权势集团的行动比较迟缓。由于国会组成的状况，它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不会很快的。而官僚机构因为饭碗太牢靠了，人们对威胁的反应不会很快的。他们知道，他们还来不及作出反应，威胁早就过去了。

但是，在1月，从政府的要害部门传出消息说，“白宫里在搞什么名堂”，要进行改组。于是，这两个权势集团国会和官僚机构为了救自己的命也作出反应了，一般人都不知道，华盛顿最大的权力中心是国会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他们对口的联邦官僚机构各部之间保持着联系的那伙人。

这些工作人员共事多年，彼此了解，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采取一致的行动。但这些共同的目标并不一定就是当选政府的目标。例如，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同五角大楼的军官和文职官员保持着日常的联络。他们共同拟定法案、预算、武器提案，使之成为有意义的立法行动。他们是这两大权势集团里的权力中心。

现在尼克松要把自己在白宫的人安插到所有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去，这就可能破坏这种长期存在的联盟。

过去对设立“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提案裹足不前的国会，现在任命参议员萨姆·欧文领导一个拟议中的委员会，对竞选中的违法舞弊行为进行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将由电视转播，因而另一个权势集团新闻界又起作用了。官僚机构这个名列第三的权势集团开始从各个方面泄露情况，从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一直到尼克松个人的报税单。到了1973年3月21日，白宫已经

陷于新闻界、情报系统、国会和官僚机构的重重包围之中，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

尼克松硬着头皮顶着。他仍然据有华盛顿最有权势的职位，总统职位，作为靠山。他可以运用行政特权进行反击，并利用公众对他的深切关心越过权势集团直接接触人民。尼克松的亲信们认为尽管权势集团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进攻，尼克松本来还是可以经受得住这场风暴而幸存下来的。但是，尼克松及其亲信们犯了一切可能犯下的错误，特别是尼克松早在“水门事件”之前，就在白宫安装了秘密录音系统，录音带成了尼克松脖子上的绞索。

录音带并不是为了便于历史学家研究史料，而是专门给总统自己使用的。也就是说，当来访的外国政治家乃至他自己的内阁官员或顾问所发表的言论同他们与总统私下谈话的内容有矛盾时，总统就参考录音带。当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安装录音系统时，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附带的一项好处是为他提供个人使用而并不供历史学家使用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当然，他的前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安装录音设备也不单纯是为了保存史料。约翰逊政府就是遗留下了许多位秘书，其中一些人曾把约翰逊的录音带笔录下来。他们中间的一位讲了下述激动人心的事件，这一事件足以说明总统们安装录音设备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林登·约翰逊像往常一样对罗伯特·肯尼迪很恼火。罗伯特和记者的谈话显然同他私下对总统说的话很有出入。林登·约翰逊决定利用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系统使罗伯特陷入圈套。

他把罗伯特叫到他的办公室，按了一下办公桌下面开动录音机的开关，开始录下他们谈话的内容。他非常之高兴，因为这个圈套的顺利进行超过了他的预料。罗伯特接连发表了一些自投罗网的言论。

总统情绪很高。他终于使罗伯特陷入了他巴望对方陷入的处境。还没有等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关上，林登·约翰逊就迫不及待地命令把录音带的内容笔录下来。但是当速记员戴上耳机时，除嗡嗡的杂音以外她什么也听不到。据讲述这事件的人说，录音设备失灵的消息气得林登·约翰逊用拳头使劲擂了一下桌子。只是到后来林登·约翰逊才发现罗伯特·肯尼迪是在口袋里带了一个扰频器来会面的。他带着一个微型无线电发报机，当他脸上露出他那著名的笑容对着猴急的约翰逊发表其“陷入罗网”的言论时，这个发报机彻底干扰了麦克风。

当然，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都录下了在白宫的谈话。就肯尼迪来说，这件事甚至连他最近的顾问特德·索伦森和麦克乔治·邦迪都不知道。毫无疑问，当年肯尼迪本来也会像尼克松一样，宣称完全是为了记录史实而搞录音的。林登·约翰逊的受托人似乎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目前收藏在约翰逊图书馆内“经过挑选的”录音带。但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恐怕研究这位总统的学者们不会捞到什么油水，或者像黑格将军在讨论“水门事件”的物证时曾经说过的那样，充其量只会捞到一点“稀粥”。毫无疑问，在允许学者们来分析的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录音带中，只有会议和电话上政治家式的言论，不会有肮脏的水门式的政治讨论，不会有经过删除或未经删除的骂人话，当然更不会有提到窃听或其他阴谋诡计的内容！

但是，当尼克松在1968年听说林登·约翰逊装有录音设备时，他感到很震惊。他第一批的决定之一就是命令拆除林登·约翰逊安装在各个衣帽间和办公室内的全部电子设备。

所有在尼克松椭圆形办公室内的谈话在 1971 年 2 月以前一直没有录音。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到 1976 年 11 月为止仍然没有录音，理查德·尼克松本来是会任职到他的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的，纵然后来出现了迪安，也不管这人是好是歹。那么为什么他决定仿效林登·约翰逊的做法，又要把他的谈话录下音来呢？

但是，导致尼克松批准使用录音系统的主要动力是他希望准确地录下他与外宾、政府官员和他自己的工作人会见时所谈的一切。他看出了存在着有意无意地歪曲或误解（谈话内容）的问题，并且对于缺少这样一种记录越来越感到放不下心来。

这是受挫的尼克松用来使亨利·基辛格和其他顾问们的意见不走样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些人在有争论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决策问题上，似乎总是以他们自己的说法来解释他们自己的和总统的主张。

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议的实际过程中有可能被歪曲这一点，使尼克松开始急于需要准确地记录下重要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但是如果没有录音设备，又怎能办得到呢？

除此之外，录音系统不仅完整地、准确地留下记录，而且别人还看不见，这样来访者和顾问们同总统谈话时就不会感到拘束。因此，在一次尼克松和霍尔德曼的会谈中，他决定安装录音系统。

安装录音系统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完成的。在总统的高级顾问中，只有霍尔德曼知道它的存在。并且霍尔德曼很快就了解到尼克松为什么坚持要采取这种绝对保密的措施。除了他自己外，尼克松根本不想让任何人听这些录音。甚至这些录音从来没有被笔录下来。

霍尔德曼清楚地记得尼克松对他表明对录音的态度的那一天。在 1972 年初“水门事件”前，负责保管录音带的白宫助理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走进霍尔德曼的办公室，他说：“录音带快要堆积成山了。很明显，谁也不会坐下来听听所有的录音。这要花几年的时间。所以我猜想你大概会要把它们打成文字吧。”

他问霍尔德曼，他是否应该找个班子开始把这些录音带整理笔录下来。他说，“否则，日积月累，就要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了！”那天霍尔德曼向总统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想不想着手把录音带笔录下来了？”

“绝对不要。”他那激烈的口吻使霍尔德曼大吃一惊。尼克松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把它们变成书面记录。除了他自己以外，他永远不会让任何人听那些录音。接着他补充说：“我甚至从来不愿让罗斯·玛丽·伍兹听这些录音。罗斯不知道我在搞录音。我眼下在这个办公室说的话甚至都不愿让罗斯听到。”

说到这里，尼克松抬起头来盯着霍尔德曼看，仿佛他才开始觉察到他在说些什么。“嗯……也许你也能听这些录音，不过再没有别人了。”

正是这个录音系统，使尼克松难以摆脱他在“水门事件”发生后曾经力图掩盖真相的嫌疑。

当尼克松在竞选总统连任大获全胜，庆酒祝贺之声不绝于耳之时，危机也开始向他悄悄地逼近。

1973 年 1 月 8 日，利迪、亨特、麦科德等七人因“水门事件”而被审讯。

1 月 11 日，参议员萨姆·欧文同意领导参议院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的委员会。

1月18日，审讯埃尔斯伯格。

2月28日，参议院就批准帕特里克·格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举行听证会。

3月14日，司法委员会得知尼克松的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在“水门事件”后到1972年9月间曾与格雷见过33次面，而且看了联邦调查局掌握的全部有“水门事件”的档案材料。于是要求迪安出席作证。迪安援引行政特权而拒绝出席作证。但他深知事态的严重性。

第二天，迪安抱了一本厚厚的法律书去找霍尔德曼，指着书里一条关于阻挠司法的法律对霍尔德曼说：“我们曾为那些进了监狱的人筹款，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他们闭口不作交待，这就是阻挠司法的行为。”

霍尔德曼听这一说，吓了一跳。替亨特与利迪筹款，正是尼克松总统吩咐自己去办的。他感到白宫严实的天地开始崩裂了。

3月21日，尼克松与迪安作了次“长在总统职位上的癌”的谈话。

谈话的目的各不相同，迪安是想要尼克松明白目前的危险处境，并给自己——这个了解“水门事件”最详细的人以豁免权。

尼克松则想弄明白亨特在交待他的活动时，有没有间接地涉及到尼克松。同时，尼克松要霍尔德曼为亨特筹款。

迪安与尼克松谈过话后，明白尼克松只是担心司法机关通过亨特的活动而追查到椭圆形办公室来。却决不会给迪安以豁免权。

会见的结果是要迪安起草一份报告，总统以此作为发言的基础，表明白宫并未牵连在内。尼克松对迪安说：“必须写得非常笼统概括，明白吗？别他妈的把那些事说得那么具体。”

3月23日，在审判席上公布了麦科德的一封信，信中说“被告们曾受到政治压力，要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缄默。……有一些与“水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在审讯过程中未被点出名来，其实那些在庭上作证的人是可以点出他们的名来的。”

这封信公布后，引起公众一片骚乱，对政府不信任的情绪迅速蔓延，新闻界也跟着起哄喧嚷不已。

但这一切并不可能给尼克松构成巨大的威胁，真正的炸弹来自迪安。

迪安在努力争取总统给予豁免权失败后，从致力于保卫尼克松转为致力于保护自己，自行决定投奔司法部，以他所掌握的大量的而且绰绰有余的情况来为自己争取到豁免权。

检查官们玩弄迪安于股掌之上，以豁免权为诱饵，引诱迪安上当。

4月15日，迪安加大了赌注，把休斯顿计划的绝密报告交给了检查官，接着，又交待了埃尔斯伯格的医生诊所事件。

这下把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都献了出去。

司法部首席刑事检查官彼得森建议尼克松应该撤消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的职务，以免“总统受累无穷”。

4月17日，尼克松发表声明说，他已重新下令调查“水门事件”的真相，并宣布不能给予现任或前政府的政府高级官员以豁免权，他们将出席欧文委员会的听证会。

在白宫内外，要求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辞职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但对尼克松的真正威胁仍然来自迪安，在一次会见中，埃利希曼坦率地对尼克松说：“我认为如果对迪安完全失去控制，如果事情处理不当，那就是完全有可能搞出一项弹劾你的决议。”

这话让尼克松大惊失色，目瞪口呆。这是尼克松与亲信的谈话中第一次出现“弹劾”的可怕字眼。

4月26日，尼克松对霍尔德里曼说：“鲍勃，我认为我们在这间办公室设置录音系统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万一传出去，那就要说我们只录了有关国家安全的材料，其它材料一律抹掉了，从来不作录音记录。听懂了吗？我要你记住这一点。”

几天后，霍尔德里曼与埃利希曼宣布辞职。

当时尼克松面临的第一大战役就是对付预计在6月开始的有电视转播的欧文委员会听证会，具体地说是对付约翰·迪安的出席作证。

尼克松最初的韬略是抢在迪安前面先发制人，于1973年5月22日发表声明，承认政府批准了那些窃听事件，企图以此来抵消迪安的证词所产生的冲击波。在声明中尼克松说让霍尔德里曼去找中央情报局寻求帮助并非出于政治原因。但一年后，尼克松与霍尔德里曼谈话录音带公开了，表明他们是有政治动机的。这个把柄立刻被报界揪住。当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总统在向他们撒谎时，他们的反应比知道总统实际上参与了掩盖活动更为强烈。但在当时，尼克松没有想到录音系统的事会败露。

6月25日，迪安出席“水门事件”委员会作证。迪安没有说3月21日与总统的谈话，却是说1972年9月15日与总统的一次谈话，从谈话中得出的印象是尼克松充分了解迪安的掩盖活动。

而尼克松一再说过，在1973年3月21日迪安告诉他出了大毛病以前，他对于掩盖活动毫无所知。因此，迪安的证词引起委员会的极大兴趣。

参议员霍华德·贝克的一句问话“总统了解些什么情况？他是什么时候了解到的？”后来成了听证会上的一句名言。

尼克松在7月10日让已是平民的霍尔德里曼重新听了一下9月15日的录音，以了解是否如迪安证词所说那样。

以后不久，管理录音带的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以犹豫、软弱的证词向公众公布了尼克松拥有白宫录音带，其中包括迪安证词中提到过的所有谈话。关于迪安是否在撒谎这一大争论，可以靠总统自己保存的录音带来解决。

这个消息的公布，举国震动。

调查的中心开始转到尼克松与“水门事件”有关人员的谈话录音带上。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小组与特别检查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

尼克松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允许民主党参议员斯坦尼斯听录音带。但遭到考克斯的反对。

尼克松意识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力量是想他从总统的宝座上赶下来，他决定采取严厉的行动，以总统的权力下令将考克斯撤职，同时，撤掉支持考克斯的司法部副部长拉克尔肖斯的职务。司法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随后也以辞职来抗议尼克松的行动。

然而，尼克松总统的行动更加激怒了政敌和群众。他任命了一个新的检查官，在国会的压力下，交出了一些录音带。但6月23日他与霍尔德里曼的谈话录音是否交出，则由最高法院裁决。尼克松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他认为，只要法院不是一致通过，他就有理由违抗法院的命令，他也就有可能过关。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1974年7月8日，最高法院却以8票对零票一致

通过了不利于尼克松的裁决。它不知不觉地避免了行政和司法两大权力部门可能发生的一次极其严重的对抗。尼克松不得不服从法院全体一致通过的决定。

当尼克松的律师和他在国会的支持者听了6月23日的录音带之后，一个个都晕倒过去，他们知道，尼克松这次是完蛋了。

录音带公布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其实，“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当它的真相逐步明朗的时候，新闻界对尼克松的抨击就没有停止过，说尼克松有精神病、吸毒、酗酒、任意驱车外出、天不亮就打电话等谣言不胫而走。对这些新闻报道，尼克松从来是不屑一顾的。

7月27日，当尼克松正在圣克利门蒂附近雷德海滩的海洋中游泳的时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弹劾案的第一款进行了投票，以27票对11票通过。这一款指控尼克松采取旨在阻挠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的“行动方针”。尼克松成了106年来第一个被建议应予弹劾的总统。

当天晚上，尼克松一直独坐到深夜，力图弄清他所面临的形势和应采取的最好行动方针。

面临的选择实际只有两种：辞职或不辞职。

如果不辞职，继续留任总统，最后失败的结局必是肯定的，尼克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并被判犯有刑事罪的总统。

7月29日，通过了第二款，控告尼克松滥用职权，犯下了足以进行弹劾的罪行。

7月30日，通过了第三款，控告总统抗拒委员会传票调用录音带和文件。公开辩论预定于8月9日举行。尼克松要么决定辞职，要么届时等候参议院裁决，这样的话，还得拖上6个月。

8月6日，尼克松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开完内阁会议之后，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基辛格。尼克松告诉他，对他过去几个月的支持及他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处理表示非常感谢。接着，尼克松对他说：“我认为我必须辞职。”基辛格回答说：“总统先生，作为你的一个朋友，我不得不同意这样做最好。如果你决定斗争下去一直斗到参院，你会被他们啄死，而且会在审判中进一步受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外交政策也无法执行下去。一个总统像你这样最近两年来在政治上受到的攻击，这是一回事，但一个总统接受半年的审讯而且留任机会充其量也没有什么把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基辛格走了以后，尼克松叫比尔·蒂蒙斯汇报国会中背叛他的票数的最新情况。情况完全和他预料的一样糟糕。两天以前，尼克松估计他差不多可以有把握得到在参院避免给他定罪所必需的34票，蒂蒙斯说，今天如果总统决定留任和战斗下去，参议院里总统只能指望有7个人支持他。蒂蒙斯说，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要求共和党前旗手戈德华特亲自把他们对情况无望的估计告诉总统。

蒂蒙斯走后，尼克松把黑格和齐格勒叫到行政办公室来。“现在局势发展得很快，”尼克松说，“所以我认为宁快勿慢。我已决定在星期四晚上辞职。我要毫无怨恨、不失尊严地辞职。我要体体面面地辞职。”黑格说：“这个出路将是值得尊敬的，就像咱们的对手们不值得尊敬一样。”

尼克松明白，他们对自己再当总统也持反对态度。在沉默中，尼克松难

过地说，“唉，我把事情搞糟了，搞得真糟，是不是？”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8月7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基辛格说，他决定于次日晚上辞职。他们简略地谈到通知外国政府以及专门打电报给中国、苏联、中东各国领导人的问题。需要对每个国家重新保证尼克松离开政治舞台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他们并不怎么了解杰里·福特，所以尼克松想让他们知道他在众议院和任副总统的时候就坚决支持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他们完全能指望他当总统将会继承这个政策。

一刹那间，尼克松试图想象对这些电报的不同反应。周恩来在北京他的办公室里会怎么想？毛主席坐在仅仅两年以前我们会谈过的到处是书的书房里，他对这个消息又会怎么想呢？

这个消息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正是午夜。那个值夜班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决定是马上叫醒勃列日涅夫，还是等他起床以后再告诉他这个消息。勃列日涅夫曾经十分强调与尼克松之间的个人关系作为缓和基础的重要性，所以尼克松设想他第一个本能反应是：估价尼克松辞职对他自己的地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据此计划作出他的反应。

在开罗和特拉维夫，在大马士革和安曼，这消息到达的时候，这些城市仍在沉睡。八个星期以前，他们的人民曾经把尼克松当作和平缔造者那样向他欢呼，给予他前所未见的赞扬。现在尼克松因为政治丑闻而辞掉总统职位，他们这样努力工作而取得的和平，结果怎么竟会是这样脆弱呢？

尼克松的思想很快又回到眼下冷酷无情的现实。“亨利，”尼克松说，“你知道，你必须留在这儿，为杰里继续执行我和你开始做的事情。全世界都需要我们释除他们的疑虑，我的辞职并不会改变我国的政策。你能消除他们的疑虑，杰里也需要你的帮助。正像我要走是没有疑问的一样，你一定得留下，那也是一点没有疑问的。”

8月8日9点差两分，尼克松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于是，出现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8月9日，尼克松在9点半来到白宫东厅，对官邸工作人员讲了一番发自内心的话。

尼克松来到东厅的时候，掌声响了好几分钟都不能平息。

在尼克松开始讲话以后，他环顾四周。许多人满面是泪。他知道，如果他继续这样环顾四周，他势将难以克制自己的感情。所以他转过头来不看群众发红的眼睛，只盯着摄影机上的红灯，向全国讲话。

现在尼克松打退了潮水般的感情。昨天晚上他是为历史而发表正式演讲，可是现在他有机会从个人角度亲切地向那些为他那么努力工作而他却令他们那么失望的人讲话。

这是一个长期幻梦的恶梦式的结尾。尼克松从远方的约巴林达的小屋来到华盛顿这幢大厦。尼克松想到他的父母，尼克松想把他父母的情况告诉这些人。

“我记得我的老爸爸。我想他们会说他是个人物、普通人。他可并不这样看待自己。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最初当过电车司机，又当农民，后来拥有了一个种植柠檬的农场。我向你们保证，那是加利福尼亚州最穷的柠檬农场之一。当人们在那儿发现石油以前，他就把农场卖掉了。

后来他当杂货商。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专心致志做自己的工

作，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把每件工作彻底完成。

也许不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母亲的书。是的，我猜你们也会这样说你们的母亲：我母亲是个圣洁的人。我想到她，两个孩子死于肺病。为了能在阿利桑那照料我的哥哥，她替别人护理过四个病孩子达三年之久，而且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个死去，当她们死去的时候，她都感到好像是她自己的孩子死去一样。

是的，不会有人写有关她的书。可是，她是个圣洁的人。”

接着，尼克松又说：

有时事情进行得并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当你第一次没有考上律师的时候——我倒碰巧考上了，可是我只是运气好，我是说，我写的东西太蹩脚，律师考官说，“我们只好录取此人”——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当我们某个亲爱的人去世的时候，当我们竞选失利的时候，当我们遭到失败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像西奥多·罗斯福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光明永远离开了他的生命。

事实并非如此。这常常只是一个开端。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个道理，老年人也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它必须常常支撑着我们，因为伟大的时刻并不是在你万事如意的时候来到，当你受到一些打击、一些失望，当悲哀来到的时候，伟大的时刻才来到，你才真正受到考验；因为只有在你到过最深的山谷，你才能知道爬上最高的山是多么壮丽的情景。

要永远尽你所能，永远不要气馁，就永远不要小看自己，永远要记住，别人可能恨你，可是那些恨你的人是不会胜利的，除非你也恨他们，而那样，你也毁了你自己。

这一天是尼克松任总统的第 2027 天！也是任总统的最后一天。

直升机载着尼克松及其家人与工作人员从白宫起飞，向安德鲁机场飞去，“空军一号”在那儿等着送他们回加利福尼亚老家去。

白宫渐渐远去，尼克松的眼里涌满了泪水。

第十六章 功罪任评说

这是辞职后的第一个周末，尼克松正在致力于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

星期六上午，来了两个老朋友——银行家查尔斯·雷博左和纽约的百万富翁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他们是前天晚上乘着后者的私人飞机从东部赶来的。三个人的谈话进行了很久。虽然这种交谈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尼克松确实得到了一些安慰。雷博左极力劝说尼克松搬到佛罗里达去，阿普拉纳尔普则敦促他去纽约。可尼克松晚上没有睡好，现在已是疲惫不堪。他哪儿也不想去，只想好好休息一下，以便放松那过份紧张的身心。

第二天下午，在尼克松住宅卡萨帕西菲卡门外等候了一夜的20几名记者被骗到拉古纳去参加一个毫无意义的记者招待会了，尼克松乘此机会和雷博左驱车同往北边的戴纳公园，那是39年前尼克松和帕特第一次约会的地方。然后，他们又沿着太平洋海岸公路到了欧申赛德。大约两点钟左右，两个人出现在红滩上。这是一段风景优美，不对外开放的沙质海滩，由海军陆战队管理，尼克松甩掉鞋子，披上一件印有总统纹章的蓝色风衣，一个人在海边漫步了很久很久。

后来，尼克松夫人、埃迪和特里西娅也买着食品来了。他们在海边铺上毯子后，就席地而坐共进午餐。尼克松漫不经心地嚼着一块三明治，眼睛久久地凝视着那滚滚而来的波涛。

第二天，尼克松给加利福尼亚的一些老朋友打电话。第一个接通的是曾当过加利福尼亚副州长的罗伯特·芬奇，芬奇也是尼克松1960年总统竞选的组织者之一，并在尼克松第一任内阁中担任过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后来被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挤下了台。自那以后，尼克松就很少和他联系了。所以，谈话开始时，气氛不免有点尴尬。尼克松大谈加州人欢迎他的情况，并告诉芬奇这一切使他非常感动。最后，他亲切他说：“鲍勃，这几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我也从中悟出了一条道理。”停顿了片刻之后，尼克松才继续说下去：“当人们最后弄清楚谁是他真正的朋友时，往往为时已晚了。”

几分钟后，尼克松又对赫布·克莱因重复了这些活。克莱因也是尼克松的老朋友，当过他的通讯部长，而且他的下场也和芬奇一样。尼克松对他说：“我很感谢你对那些录音的态度。”克莱因当然明白所谓录音是怎么一回事。想当年，有人告诉他尼克松在录音里说他“脑袋没安对地方”，克莱因只是一笑了之，现在，该尼克松表示歉意了。

“这没什么。”克莱因安慰他说。

“不，我真的很感激你，”尼克松再次强调，“对我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你对我辞职的评论也是对我的安慰，我从心底里感谢你。”

克莱因怕尼克松由此引出更多的伤感，所以赶快调转了话题。

他问尼克松身体如何，近期有什么打算。尼克松说他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得出他似乎是筋疲力尽了。

几百码之外，在那座原来被称为“西部白宫”的组合式建筑里，齐格勒正在等着从华盛顿来的比尔·格利。格利是一名职业军人，曾在海军当过军事长。从1967年以来，他就一直在白宫工作，任白宫军事办公室主任。这个不大引人注目的职位是非常重要的，总统的大部分后勤事务都由他管理，包括通讯和交通事务；他还负责照看前总统们，满足他们的需要。自从星期四早上以来，一切都还顺利。不过，尚有许多琐事需要处理：那连接圣克利门蒂和白宫的大通讯网需要拆除并运回华盛顿；几十名工作人员需要重新安

排；还有如何发放尼克松离任总统津贴的事情也得考虑。不过，最让格利担心的是和“这老头子”直接打交道。尼克松非常注意细节，而且往往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官僚作风大发雷霆。格利料到此行会碰到一些麻烦，所以他带来了一件十分重要的“礼物”以求和好。

在那个即将离开白宫的星期五早上，当尼克松在东厅和他的工作班子告别时，格利悄悄地溜进了白宫的总统官邸，搬走了11箱东西。当然，他只知道那里面装的是“尼克松自己的东西”，根据箱子的重量，格利猜测里面是些最敏感的文件和记录。他没有告诉白宫任何人，就把这些东西运到了安德鲁斯，然后装上了那架空军星座飞机。那天早上，他就是乘这架飞机来到加州的。现在，这几箱东西已堆在他的汽车后座上了。

进入卡萨帕西菲卡时，格利注意到门口的卫兵没有了，那以前经常是拥挤不堪的停车场现在也是空的了。整个地方使人联想一艘在急切之中被抛弃了的船。

格利被齐格勒挡了驾，没有见到尼克松，只好又匆匆地赶回华盛顿。

8月中旬，格利又飞往圣克利门蒂。这次他没有费什么事就见到了在办公室里等待他的尼克松。这位总统看上去很颓丧，他的眼窝深陷，眼球布满了血丝，就好像几天没合眼一样。他的行为举止也显得紧张。格利进来时，他正在向黑格抱怨他们停止了他们的运输。他怒气冲冲地嚷道：“这些杂种，到底想把我怎么样？”

“他们要叫你彻底完蛋！”格利说，“马什和哈特曼把你叫做骗子，不过，听说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要回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情况就会有所好转。拉姆斯菲尔德是支持你的。”

这话并没有使尼克松平静下来。他继续激动地嚷道：“我不愿和这帮该死的杂种们打任何交道。我有权享受其他前总统享有的一切。这些混蛋，你是知道我怎么安排约翰逊的，还有肯尼迪和杜鲁门。我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这些该死的，我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我旅行的时候要军用飞机。我对别人做了很多，我也指望福特给我同样的安排。我要有通讯设施和医务人员。总之，其他前总统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有。真见鬼，你告诉福特，我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一切。”

尼克松不停地嚷着，越来越激动。他坚持要知道他那些文件和录音带现在怎样了。格利回答说不知道。尼克松说：“好，你只需告诉那些狗杂种，我会保持沉默的。我不在报刊上发表任何言论，也不对福特和他的政权加以评论。但是，该死的，我要他们知道我还在这里，并指望他们为我做些事情，他要按时给我送政府工作简要，还有其他一些我应得的待遇。”

几天以后，8月20日，尼克松接到了福特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这是两个人权力交接以来的第一次通话。新总统对老总统还是尊敬的，甚至他仍然称尼克松为“总统先生”。他在询问了尼克松和帕特的健康后，向尼克松宣布了一条消息：他已考虑再三，并得到了共和党领导人的同意，将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

尼克松当即表示满意。他认为福特选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来担任一项重要的工作”，洛克菲勒的名望和经历都会在外交事务上对新总统有所帮助的。而且万一出了什么事，福特也完全可以相信洛克菲勒有能力接替他的工作。尼克松接着说，当然了，那些极右分子是不会喜欢这个决定的。不过福特也可不必为这些担心，因为不管他做什么决定，那些人都不会满意的。总而言

之，福特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很高兴。

充满友好气氛的电话挂了，尼克松却开始大发雷霆。这件事福特公然不和他事先商量，已使他生气，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满意这个所谓的“合适”人选。如果共和党内有什么人让尼克松讨厌的话，那就是洛克菲勒了，不管是在政治观点还是在为人方面，都是如此。洛氏曾任纽约州的州长，他代表的正是尼克松所憎恨的东部势力，何况他还两次阻挠尼克松的总统提名。至于尼克松住在纽约州的时候，洛克菲勒怠慢过他，藐视过他，这些当然都加深了相互的仇恨。

余怒难消，尼克松立即又给萨克拉门托的里根打去电话。所幸后者是同情他的人，而且里根对洛氏也没有什么好感。互诉愤意之后，电话挂上了。但是里根却将这一通话告诉了他的一位助手，助手又将此事捅给了某记者。几天之后，报纸上就披露了这一消息，而且它造成的唯一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大地增加了批准洛氏为副总统的可能性。

无情的事实还在接踵而来。尼克松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他的观点已不能再左右什么事情了。有一次，他给留在白宫的助手打电话，那时洛克菲勒的提名尚悬而未决，可是，他被告知要等一会儿，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次，一个原来忠实于他而现在是在福特部下的人通过电话告诉尼克松：“现在最恨你的人恰恰是那些当年最为你卖力的人。”

事情还不仅止于此，原来属他专用的卡萨帕西菲卡崖下的海滩也对外开放了，人们来来往往，尼克松想要找个清静地方散步的话，就得开车到 30 英里外的彭德尔顿营去。有一次，雷博左开车送他去这个地方，途中有一辆坐满了年轻人的汽车追上来和他们并行，而且有一个人对尼克松相当无礼。在他们从彭德尔顿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注意到了写有“西部白宫所在地”的牌子不见了，这些牌子原来是竖在圣克利门蒂的市界上的。在尼克松从华盛顿回来的第一个周末，这牌子就落入破坏公物者之手了。

发生在 8 月 26 日的一件事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这天，尼克松想给查里斯·林德伯格的遗孀写封吊唁信，因为她的丈夫新近去世了，那是一位一直受尼克松崇敬的人。但他却没有纸来写这封吊唁信，因为办公室里所有的纸张都印有总统纹章。尼克松叫布尔去找些只印有他本人名字的纸来，没想到找遍了所有的办公室一无所获。布尔回来了，他从尼克松的书桌上拿起一张记事纸，并当着前总统的面用剪刀剪去了印有总统纹章的部分，嘴里还说着：“喏，这就是新的现实。”

尼克松虽然被迫辞职了，但去看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这种情况是会改变的。他们坚持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认识到尼克松不仅是一位称职的总统，而且是一位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总统；和他在任期间所完成的事业相比，“水门事件”只不过是一般的过失，用不着过分的大惊小怪。至于基辛格先生，早在尼克松辞职之前就对他说过类似的话了，并且他还向尼克松保证说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稳固的。尼克松对此并不十分乐观，他说：“那要看历史是由谁来写了。”

眼下的尼克松并没有多少心思去想美国人民或是历史怎样评价他了，他着急的是要尽早开始工作，哪怕只是为了经济也应如此。因为在付给国内税务署几十万拖欠款后，尼克松家的银行户头几乎是空的了。好在那些机灵的出版商们已来建议尼克松写作了。不过尼克松只对欧文·保罗·拉扎尔感兴趣，后者还没有像其他出版商们一样许诺大量的金钱，只是答应尽力而已。

“快手拉扎尔”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作为经纪人几乎和他的委托人一样有名。他个子不高，厚颜无耻。（他卖过并不存在的产品，而且从来不看那些使他赚了大钱的书。）这位秃顶、尖耳、戴着厚厚黑边眼镜的小人有一种“神奇的本领”，他能“在你后边进入转门，但能在你之前出来”，一位和他打过交道的人这样评价说。拉扎尔的委托人都是些有名气的，从小说家杜鲁门·卡波尔、作曲家科尔·波特，到剧作家莫斯·哈特等等，而且他们都欣赏拉扎尔的这些本领。不管他的外表多么离奇古怪，他的做法多么不合常理，他为委托人争取预付款的本领是无可比拟的。现在，拉扎尔又来向尼克松提供这些本领了，但他对能争取多少或如何争取都没有详细的说明。

齐格勒查看了这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建议，最后和拉扎尔取得了联系。8月31日，拉扎尔来到卡萨帕西菲卡。

拉扎尔许诺的数目是可观的——200万美元。不过不许讨价还价，而且还有一个严格的条件：使出版商充分的相信尼克松对“水门事件”的描写是坦率的，实事求是的。如果尼克松要在这一点上耍滑头的话，那双方就趁早罢手，拉扎尔可不干这种事。尼克松当时微微笑了笑，有些深沉地对拉扎尔说：“你放心，我不会那样做的。”

他们又讨论了书的内容和销售情况。按照拉扎尔的意思，尼克松最好把当总统的每一天都写出来。尼克松也同意了。“整个的经过，所有的一切，毫不歪曲。”他喃喃地说。接着又问：“这本书会畅销吗？”“那就要看你的了。只要你认真写，肯定畅销。你毕竟是自林肯以来最有争议的总统啊！”尼克松笑了。

3小时后，协议达成了，两个人起身握了握手。经纪人甚至被感动了，他原想尼克松会怨气冲天的。没想到他毫无这方面的表示，而且外表和精神都很好。在过去，拉扎尔从来没有喜欢过作为总统的尼克松，可眼下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硬汉子。“告诉你，有一种办法可以使你挣到比写书还多得多的钱。”

“什么办法？”尼克松问。

“把你的身体捐给哈佛医学院。”

在以后的日子里，拉扎尔曾告诉记者说：“尼克松完全能控制他自己，控制他的处境和他想做的事。”很多在总统辞职的最初几周内去看过他的人也有同感。他们也承认，尼克松不但没有被摧垮，而且还很有力量。当然，他们认为，尼克松确实很疲乏了，有时还心烦意乱，悲观失望，但总的来说，他的情绪毕竟是好的。考虑到前两年的严酷现实，可以说他的情绪好得出奇。如果看看尼克松和拉扎尔打交道的情况，你会认为人们说得确实不错。那时的尼克松反应很快，思路敏捷，表达清楚，精神处于最佳状态。“告诉你吧，”尼克松的一名情绪低落的助手在浪沙酒吧喝酒时对一名记者说，“我们有他的一半信心就好了。”

可私下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尼克松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不仅没有人们所看到的开初的欢快，而且反应迟钝，筋疲力尽。他无法在较长的时间内集中自己的精力，也不愿和人交往。办公室的门紧紧地关着，电话铃爱响多久就响多久。在这里坐着的，是一个孤独、疲惫，与世隔绝，神情沮丧的尼克松。

再次来到圣克利门蒂讨论人事问题的格利很快注意到了尼克松这些明显

的变化。上次看到的尼克松的好斗精神不见了，他显得无精打采，似乎被彻底推垮了。为让他高兴高兴，格利撒了个小谎，说福特夫妇托他向尼克松致意，接着又撒谎说，他私自往圣克利门蒂送材料的事是福特知道并同意的。

听了这些谎话，尼克松好像振作了一点。他请格利坐下，并告诉格利，他最近和几个南方国会议员交谈的情况。那些议员都说他的辞职并不意味着事情就了结了，人们还在穷追不舍，还在想法惩罚他。

“我知道有人想整我，这是意料中的，可我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具体的办法。什么时候能拿回我的文件？什么时候能取回我个人的东西？他们想怎样处理我妻女的东西？还有罗斯的。这些都是私人物品，和我的总统职务毫不相干。”

格利告诉尼克松：这一切还没成定局，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决定了。经福特批准，他将每两个星期送一份政府工作简要、报告和情报资料给尼克松。但其他的信息就不太好了。格利并不相信政府会按尼克松要求的那样为他提供旅行用的军用飞机。事实上，白宫已有人在嘀咕说，尼克松应负担一部分乘空军一号回加利福尼亚的费用。

格利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发作，可尼克松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是谁策划要他付钱的？是福特还是他的助手？格利向他保证福特没有参与此事，是那些助手们提出来的。

“唉，如果那些杂种想要，我就付好了。”

尼克松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以后感谢格利带来的消息。他还对他以前没有多和格利交谈感到遗憾。他说以前霍尔德曼总是阻止他这样做，“如果我能再干一次的话，我就要多和你这样的人交谈。”

说完，尼克松拉开抽屉，在里面摸索着，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想送你一件纪念品。”他不大自然地笑了笑。但抽屉是空的，无物可送。他按铃叫布尔来，并让布尔马上去取一块总统手表。

手表拿来了，尼克松亲手递给了格利：“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现在不会再有什么事情可以进一步伤害我了。但和我来往的人都是会因此受到伤害的，你应该牢记这一点。新闻界还不会善罢甘休，虽然我已辞职了，但他们的目标是我送进监狱。我希望你明白。”

在离开白宫的前一天深夜，尼克松就对一位助手说过以下的話了：“进监狱并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监狱里没有电话，但取而代之的是宁静，写字的桌子也不缺。本世纪里最好的政治作品都是在监狱里写成的。”他提到了列宁和甘地，还说他的出路也可能如此。

不过那时尼克松的语气是听天由命的，几乎是随便说说的。现在可不同了，他对格利提到他的敌人要送他进监狱的企图时，已不是随便说说了，也不是什么假设了。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尼克松已经有点不寒而栗了。如果把他带回华盛顿审讯的话，他是活不出来的。尼克松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原订的对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尔的审判是在9月份进行，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要求尼克松到华盛顿和他们一起受审的呼声越来越高。尼克松陷入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前途未卜，琢磨不透的境地之中，这种境地似乎比监狱还要无情地折磨着他，使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下，他已是痛苦万分，度日如年了。8月底，他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参议院的一位老朋友。在开始的时候，尼克松情绪很好，甚至双方还开了一会儿政治上的玩笑。可一转眼，尼克松的情绪急转直下，他又提起贾沃斯基和监狱来。他把他的敌人称做“豺

狼”，他不停地诉说着“豺狼”们要把他怎样怎样，尼克松越说越激动，以至于发展到不能自持的地步，到最后，这位前总统竟然失声痛哭。

什么时候才能从“豺狼”的手中得到安宁啊？理查德·尼克松绝望地问，什么时候？

尼克松从来都不喜欢那个唯一可以救他，使他免于起诉的人——福特。这对他来说将永远是一种嘲弄。

尼克松认为杰拉尔德·福特不是副总统的最佳人选，甚至连第二、第三人选都不是，如果万一需要有人来接替他的总统职务的话，他会选择罗德·里根，或者约翰·康纳利。因为里根在电视上的形象是“第一流的”，康纳利则是既圆滑又强硬。尼克松从1970年起，就在设法为康纳利安排一个高级职务了。而福特呢，他既没有里根的形象，也没有康纳利的顽强。他反应迟钝。在理解他周围的人的行为动机方面尤其糟糕。《华尔街日报》称他是“忙忙碌碌的人，是共和党的老黄牛。他言谈中常用些陈词滥调，可见他的思想也不会有多新鲜。”这家报纸甚至不客气地说，他“连嚼口香糖和放屁这两件事都不能同时进行。”

福特当副总统也出于偶然。由于原来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辞职，福特才坐上了这个国家的第二把交椅。这已足够了。当初尼克松是很不情愿这样决定的。他曾笑着对纳尔逊·洛克菲勒说：“你能想象杰里·福特坐在这把椅子上吗？”他甚至不愿亲口告诉福特他就是副总统的候选人。尼克松的气恼持续了很久，他曾把那支在提名福特为副总统的文件上签名的钢笔给了他的白宫法律顾问雷德·布兹哈特，并附了张条子说：“这就是那支在福特提名书上签字的该死的笔。”

不过，这位副总统对尼克松的忠诚是无可挑剔的，他的忠诚以至于到了让人有点可怜的地步。

“我们是25年的朋友了。他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他是清白的。”福特走了几十万里路，在40个州的500多次集会上反复他说着这些有利于尼克松的话。他不听劝告，甚至不顾这种作法将给他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利影响，一直到最后他都在为尼克松辩护。1974年7月25日晚上，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在全国电视上解释他们为什么要第二天投票弹劾尼克松。与此同时，福特正在印第安纳州的慕尼黑集会上大讲：“我从心底里相信美国总统是清白的……，正确的！”

可事与愿违，尼克松既不清白，也不正确。现在，能在法律上宽恕他的只有福特了。

9月8日，福特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公告：

“同胞们，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已经肯定我这样做在理智上和道义上都是正确的，我认为有必要马上把这个决定告诉你们。”

5分钟后，他念到了最关键的一段。

“……现在，我，杰拉尔德·福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根据宪法第二条第二款授予我的特赦权力，给予查里德·尼克松全面的、无条件的、绝对的特赦。赦免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到1974年8月9日期间所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或参与的一切有损于国家的罪行。”

为了获得特赦，尼克松十分不情愿地写了一个悔过声明。声明说：

“我被告之，福特总统将给我一个全面的特赦机会：对我在任美国总统期间所做的一切可能引起指控的行为都给予赦免。我接受特赦是希望他这富

有同情心的举动有助于我们的国家从“水门事件”的困扰中摆脱出来。

现在，在加利福尼亚，我对“水门事件”的看法和以前大不一样了。那时，我处于此项事件的中心，对此戒备重重。同时还得应付总统职务所要管的那些无穷无尽的日常事务。

现在来回顾一下那些在我头脑中仍是一团乱麻的事件、决定、压力、人事等问题，有一件事情我是看得比以前清楚了，那就是在处理“水门事件”上，我没能拿出快刀斩乱麻的决心。

我在“水门事件”上犯的错误给我深深热爱的国家和我最崇拜的总统职位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我因此而产生的遗憾和痛苦是无法诉诸笔墨的。

我知道很多公正的人们都相信我在“水门事件”上的动机和行为是有意自的自私，是违法的。我现在懂得了是我自己的错误和判断上的失误促成了这种看法，而且事实似乎还在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我处理“水门事件”的方法是错误的，这一点将在我的有生之年永远地折磨着我。”

经过一段痛苦的隐居生活，尼克松又渴望与外界的接触。

不言而喻，尼克松总统在外交方面最辉煌的成就就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即使他的下台也不能阻碍他重访中国，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了。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时间和方式来进行这次访问。

尼克松、毛泽东、周恩来三人合影的巨幅照片正悬挂在前总统的办公室里，而且根据帕特的意见，这些照片被添上了越来越浓的东方色彩。对中国，尼克松是那样的一往情深，几乎从他辞去总统职务的那一天起，他就为再次的中国之行作准备了，他阅读了中国历史，潜心学习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自1972年他首次访华至今，中美关系的进程十分缓慢，这使尼克松耿耿于怀，大伤脑筋。

已经打下的“根基毕竟太浅了”他有一次对一位客人这样说。当时他俩正站在峭壁上俯视着浩瀚的太平洋。尼克松面对中国的方向眺望着，继续说道：“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可是，没有时间……”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没有时间去做。”

对此最清楚的莫过于中国人了，他们对尼克松的感情一如既往；尼克松辞职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才几天，就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电报表达了这位总理对尼克松的始终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时总理还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两个月后，当尼克松因患静脉炎住院时，毛泽东主席亲自打来了电话。毛泽东通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还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

自那以后，尼克松与这两位中国领导人的联系就一直未断。有时是通信，更多的时候是请圣克利门蒂的常客——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先生充当他们的私人信使。这一次黄镇又带来了毛泽东语气更为迫切的邀请。因为7月份福特旨在签署赫尔辛基协议的芬兰之行使中国人十分恼火，他们需要和尼克松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尽早见到他。

此邀请可谓正中尼克松的下怀，他马上给基辛格打了电话，声言只要福特不反对，他就准备于9月份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基辛格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他认为，如果辞职不满一年的前总统在福特本人访华之前再度访华的话，只会使新政府感到难堪。不能否认对方说得很有道理，尼克松当即同意

了再等一段时间，而且还同意了在确定新的计划前与基辛格商量，不过他又向对方暗示说，这种等待不会太久。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心思是再清楚不过了，他很快就福特访华一事说服了中国人，于是，就有了11月29日福特一行前往北京为期一周的观光和会谈。

福特此行黯淡无光，他的东道主还在恼火着他不久前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紧紧拥抱。而且，中美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度很慢，这也导致了美国对福特政府的不满。很明显，福特受到了冷淡，新上任的副总理邓小平还警告他不要相信苏联人。（邓小平说：“关于缓和的花言巧语掩盖不了战争危险不断增长的严酷现实。”）在同美国记者进行个人谈话中，中国官员也毫不掩饰他们对罗纳德·里根强硬路线的赞赏。至于福特本人是怎样评价他的中国之行呢？“没有什么消极作用，起了许多积极作用”——如此而已。

与此同时，中国人与尼克松的接触还在保持着。他们邀请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朱莉和戴维访华。这对夫妇当然同意访华并且自9月初就在准备到中国的旅行了，尼克松也曾帮他们办理过签证等事宜。计划出发的日子是12月底，当然还未最后确定。福特访华返回美国几天之后，中国来了电话，询问朱莉夫妇是否愿意“和我们的领导人单独会见，”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没有福特政府官员的场合下会见他们，很明显，这不是一次寻常的会见，朱莉夫妇马上就同意了。

12月29日凌晨，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遗憾的是，周恩来当时正因癌症住院，并且生命垂危。到北京后46小时，即1976年新年来临前不到1小时之际，朱莉和戴维被召进了紫禁城中毛泽东的书斋里。当他们进门时，两名助手扶起了毛泽东主席，毛站在那里有点颤颤巍巍。后来朱莉是这样回忆她所见到的毛泽东的：“他的下颚下垂，——显然是中风留下的后遗症——这使他显得有点痴呆。他的黄皮肤有一种腊质的半透明感，几乎没有皱纹。一尘不染的灰色中山装宽松地下坠着，硕长的手臂和宽大的手掌也了无生息地垂在身体两侧。他说话很慢，又有些吃力，发出了一种简单的粗糙的咕啾声。”但是毛泽东主席的头脑依然是清楚的，他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并询问了尼克松的健康。不过他有些厌倦戴维对尼克松身体状况的过于详尽的描述，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的缘故。翻译把尼克松的信译给毛泽东主席听，他边听边点头，表示赞许。听完以后，他加重语气他说：“中国欢迎尼克松先生访华。”

毛泽东和年轻的美国客人交谈了近一个小时，这位身体已经虚弱的主席显然还没有失去他的革命朝气。他低声说道：“年轻人比较软弱，要提醒他们斗争是需要的。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这一点是肯定的。”然后，似乎是在模仿尼克松的动作，毛突然俯身向前，问道：“你们认为呢？”

当艾森豪威尔夫妇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主席重复了他对尼克松的邀请。他说，我等待着你们父亲的来访，他的手还沉重地往沙发旁边一挥以示强调。

在华期间，朱莉和戴维都受到了——用一家当地报纸的话来说——“破格的待遇。……这对不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甚至为他们举行了新年午宴。席间邓小平对他们说，我们从来不把“水门事件”看得很严重。与朱莉夫妇的告别宴会则是由黄镇主持的，他在祝酒辞中引用了尼克松的一句话：“离任以后，我才发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并且黄还说：“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老朋友的。”这一点在托他们转交尼克松

的礼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这个礼物是一只装在精美丝盒里的生日蛋糕。

蛋糕出现在圣克利门蒂的时候早已不新鲜了，这却没有影响接受者的情绪，尼克松欣喜若狂。访问中国的障碍都已消除，他又一次接到了中国的邀请——这是一年中的第四次——况且福特已经访华归来，没有什么再耽搁的理由了。

不过尼克松在披露自己的计划时还是审慎的。当时的福特正在忙于竞选以便连任总统。尼克松选择这样的时机访华必将使他成为报纸上的头号新闻人物并引起一阵轰动。故此他决走在中国正式宣布以前绝口不提这件指日可待的事情。

1月中旬，正和夫人在安南伯格的庄园度过周末的尼克松邀请“将军”——他这样称呼格利——前来做客，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主客落座后，先聊了一会儿华盛顿的大小事件，然后尼克松并非郑重地宣布了他的计划：“我不日即去中国。一切都安排好了，中国将派飞机来接我。不过对此事你要绝对地保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不啻定身法，格利一下子愣在那里了。因为他也和白宫的其他人一样，确信尼克松要把访问中国或苏联的计划推迟到选举以后进行。看着对方一脸狐疑的表情，尼克松耸了耸肩膀。他坚持说中国之行只会对福特的竞选有帮助，“而且，杰里在新罕布什尔州已稳操胜券了，再说，我现在去显然比临近大选时再去更好。”

看来大局已定，格利又憋不住，就将此事告诉了在白宫的斯考克罗夫特——福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你听了准会大吃一惊，不过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猜猜老头子要去哪儿啊？去中国！”

“啊？上哪儿？”斯考克罗夫特叫了起来。

“去中国，”格利重复了一遍，“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

斯考克罗夫特也承认此消息实在出人意外，不过他将秘密保守得很好。2月2日基辛格在卡萨帕西菲卡访问尼克松时，他连此事的味儿都没有闻着。趁讨论到外交政策的机会，尼克松含糊其辞地说了他重访中国的打算。这根本没引起基辛格的注意，因为这是个谈论了好几个月的话题了，而且他现在的语气也不使人感到这是什么迫在眉睫的旅行。尼克松给基辛格的印象是此行最早也要到1977年才有可能，而那时，大选早已过去了。

三天以后，也就是2月5日的下午，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按照事先的约定出现在斯考克罗夫特的办公室里。开了几句玩笑后，韩叙拿出一份北京即将发表的公告的副本。公告说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尼克松已“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将于2月21——尼克松首次访华四周年之际——乘坐中国专机到达北京。什么都清清楚楚，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再过三天，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人就要去投票站选举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了。

韩叙前脚刚走，斯考克罗夫特后脚就通知了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先生，几分钟后他们已出现在福特的办公室里了。总统满腹怀疑地听着这个消息，因为就在不到两星期前，他还接到过尼克松的电话。尼克松明明许诺说不做任何有损于总统竞选的事情，而眼下他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情。一个电话打到了圣克利门蒂——有请尼克松先生。

福特用一种装出来的亲切热诚的语调首先祝贺尼克松的身体康复，同

时，还祝他在即将进行的旅行中也照样健康。随即他又请尼克松代转自己对毛泽东的敬意，不知不觉经过了 16 分钟，通话才告结束。电话使福特的愤怒达到了高潮，他受不了对方一贯以恩人自居的态度，何况又刚刚领教了一番美中友好如何重要，如何迫切，等等的教导。当然，福特最恼火的还是尼克松此行的时间安排，后者显然漠视其必然产生的政治后果。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中，由于特赦尼克松一事，福特已经落后于里根了，如果这时再与尼克松公开闹翻的话，对总统来说只会是一种潜在的灾难。

基辛格从国务院匆匆赶来，他的盛怒比起福特的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刚刚接到尼克松的电话，对方解释说中国方面将通知他的时间仅仅提前了 36 小时。基辛格对此根本不信，他告诉福特，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办事的先例，结论只能是尼克松在撒谎，其意图当然是让他们出丑。斯考克罗夫特很同意这一说法，他狠狠地咒骂着尼克松，福特倒反转来平息二位的怒气了。有什么办法呢？为时已晚，或许他们对尼克松此行将产生的政治后果估计得过于严重？不过，事情很快就会清楚的，因为次日一早，福特和贝蒂就要到新州去做本周末的竞选露面了。

当晚，在负责总统竞选活动日程安排的特里·奥唐奈的办公室里，聚集着福特的好几位顾问。他们一边估计着这场灾难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一边设想着种种报复尼克松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通知中国，他们派来的接尼克松的专机可能会被联邦警察扣押，这些警察所代表的是那些财产被中国没收了的美国公民的利益。正当这个办法在深入讨论的时候，总统年轻的摄影师戴维·肯纳利冲了进来，嘴里骂着：“混帐！坏蛋！他存心毁掉总统！”

事实却与肯纳利等人的担心相反。福特的新州之行很顺利，只是随行的记者提到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福特尽量把话题岔开，他说尼克松只是一个平民，其旅行纯属个人问题，也没有让他回国后向总统汇报的计划。有一个记者问道，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会对现总统的竞选产生不利影响吗？福特淡然一笑，答道：“可能会的。”

然而，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克制。巴里·戈德华特在参议院发言，他建议司法部根据洛根法案中关于禁止公民个人与外国进行谈判的条款对尼克松进行起诉。新闻界把尼克松的访问描述为“一种卑劣的行为”。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说这一行为使人们更加清楚尼克松为什么会得到“‘诡计多端的迪克’这一绰号”。玛丽·麦格罗里则在《华盛顿明星报》上撰文写道：“要是换成任何人都会把这件卑鄙肮脏的事推迟到杰拉尔德·福特在新英格兰的初选获胜后进行，因为在那里福特正面临着罗纳德·里根的强有力挑战。问题在于，是让中国人失望还是让杰拉尔德·福特失望。理查德·尼克松的抉择准确无误地偏向了中国。对他来说，中国人能为他做的更多。毫无疑问，正是杰拉尔德·福特使他免于被起诉，免于受审判，免于可能的监禁生活，免于受到比‘判断失误’更严厉的指责。然而，尼克松又对福特做了些什么呢？”就连一向举止温和的戴维·布罗德也违背了自己曾经许过的决不再写

中国人没有被轻易唬住。得知他们派来接尼克松的专机可能被扣押的消息后，中国方面通知美国国务院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机组人员将拒绝返回中国。白宫不得下放弃这个打算。但是，此间关于扣押飞机的设想已经传到一些中国债权人那里了，他们立即把联邦法院关于扣押飞机的命令弄到手。当飞机到达洛杉矶时，州行政司法长官的代理人已在那里迎接飞机了。仅仅是由于尼克松的特工人员出面干预，一次潜在的外交冲突才得以避免。这些特工人员强行制止了那些代理人送交扣机命令的企图。

尼克松的诺言，他在《华盛顿邮报》上评论说：“此人真是无耻之极，他惯于利用并且败坏他曾经是其中一分子的每一个机构和各种关系，他的种种臭名昭著的行径已经昭然若揭，无须评论了。但是，尼克松如此轻率地一意孤行，他以其不可思议的北京之行再一次向人们表明，此人在人生战场上为了给自己捞到哪怕是一丁点好处，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比克拉夫特，麦格罗里、布罗德等一些自由派人士更激烈的批评来自威廉·巴克利。他在《全国评论》杂志上写道：“中国人显然并不清楚现在的尼克松已经不是哪一方面的领袖了。他对共和党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甚至不如霍华德·科塞尔了。……他唯一可用的伎俩就是：谄媚阿谀。”

这一切最终使尼克松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了。他在给《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的一封信中声明道：“1972年我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我认为，要想有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就必须在美中之间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建设性的关系。我相信在今天，这样一种关系比四年前更为重要了。我期待着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为了暗示这是他最后一次打搅总统的竞选活动，尼克松补充道：“我回来以后，将把全部时间花在回忆录的写作上。”

此后，他再没有和白宫接触了。13天以后，尼克松在帕特·布沦南，两名通讯联络专家，15名特工人员以及他的海军看护兵罗伯特·邓恩的陪同下，离开圣克利门蒂乘车前往50英里外的拉克斯。在泛美航空公司服务大楼的外面，有为数约一百来人的记者和摄影师在等候着他。当尼克松的黑色轿车开进停车场时，记者们便围上前来并七嘴八舌地大声提问。尼克松没有理睬他们，他走下汽车和几个中国官员握了握手，便挽起帕特的胳膊，不慌不忙地并肩登上了那架蓝白相间的中国民航707飞机，在机舱门口，他停了一下，和中国人站在一起再次亮了亮相，然后就进了机舱。

连同在安克雷奇和东京机场加油的停留，整个飞行持续了18个小时，飞行途中尼克松只是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当飞机在当地时间下午10点16分到达北京时，他的眼圈因疲劳而显得发红。不过，飞机的降落又使他振奋起来。尼克松面带微笑走出飞机，挥手站立着，向迎候他的人群致意，对于使机场照明灯发出一种奇异光辉的细细寒雾显然并不在意。

机场上没有了四年前迎接他的军乐队，没有挥动的彩旗，也没有威武的仪仗队。迎接他们的只有挥动着塑料花束的300名“群众代表”。但是红地毯还是铺开了，上面站着包括黄镇和外交部长乔冠华在内的一群高级官员。周恩来总理不能来接他了，因为周已于1月9日死于癌症；邓小平也不能来，他在周逝世后的动乱中被谴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当时正在被软禁。在他们的位置上，现在站着面目和蔼，身材魁梧的华国锋——新任命的代总理。这是他第一次在重要的场合公开露面。

由于时间关系，机场的欢迎仪式很简短，不一会儿，一列红旗牌轿车已经来到了1972年尼克松下榻的13号国宾馆（钓鱼台）。“哇，旧地重游，这一景一物能引起多少回忆啊！”尼克松不由得感慨良多。他在一间屋子慢慢踱到另一间屋子，四年前的往事都涌入脑海。见此情景，华国锋在一旁请他就寝，“飞了这么长时间，您一定累了。”这位总理催促道。还在兴致勃勃地谈着他的第一次访问，赞扬着中国飞行员高超技术的尼克松终于领会了华的暗示。

中国人把整个访问日程排得很满，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次日早晨，尼

克松拜访了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向她表示慰问。中午，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来到宾馆告诉尼克松先生毛泽东将在第二天会见他。午餐和短暂的午休后，尼克松与华国锋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会谈完休息片刻，客人又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华为他举行的国宴。

国宴上的热烈气氛使尼克松处于断断续续的回忆和幻想之中。他又以贵宾的身份在这里就座了，一切都和当年他是总统的时候一模一样：一样的布置，一样的尊敬，一样的礼仪，就连餐桌上的十道菜也和当年一模一样。军乐队演奏的“草堆里的火鸡”和“美丽的阿美利加”与1972年的毫无二致，茅台酒还是那样火辣辣地使人嗓子发热。宴会临近结束时，尼克松起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话时的姿态神情就像他依然是美国总统，就像“水门事件”和辞职从来没有发生过。他的语调是抑扬起伏的：“全世界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两国为世界各地的安全稳定，以及为人类的和平事业而作出的通力合作。而这种合作必须是可靠的，可能的，并且是富有决心的。”然后，显然是指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尼克松继续说：“当然，或许有人以为单凭签署一个原则性的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这一看法未免过于天真。”

到第二天早上，尼克松的这一讲话就惹出麻烦来了。不管他当时指的是什么，白宫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指责。（后来，尼克松通过布伦南坚持说，他什么都没指。他说：“天哪，这样的讲话我已经作过十多次了……那对联合国宪章也同样适用啊。”就在那天晚些时候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秘书内森宣布说尼克松只是一个以个人身份进行访问的“平民”，他的声明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的更有份量。不过内森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马上使正在新罕布什尔州作竞选巡回旅行的福特陷入了窘境。当福特在一所中学作竞选露面时，一个学生站起来问道：如果尼克松真的只是一个平民，那福特“为什么不像对待其他美国公民那样让他受到控告，而要特赦他呢？”，福特一下子面红耳赤。“前总统很不光彩地辞职了，”他冷冷地答道，“这对他来说，是个很严厉的惩罚。”

与此同时，尼克松的访问正在继续进行。宴会后的第二天上午，他参加了一个农业展览会。他随手拍了拍那些猪的模型，对梯田模型也很赞赏。然后，他诙谐地对陪同的主人说，“我们可以做笔公平交易：我们送给你们现代化的技术，不过你们得把今天领我们参观的那些漂亮姑娘送给我们。”离开展览会后，尼克松直接去拜访毛泽东。他们的会谈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熊猫。看上去消瘦虚弱的毛泽东则以绿茶代酒为他干杯。随后，尼克松把采访他的五六名记者请到那间俯瞰着玉渊潭的房间里，进行了一次不予发表的谈话。

首先，他对记者们没能为他与毛泽东的会谈拍照片而表示歉意。然后，他开始漫不经心地谈起日本来。他问一位摄影记者：“你去过有15000家酒吧的那个地方吗？知道那家有名的‘戈登’酒吧吗？去过那儿吗？”还没等对方回答，尼克松又说：“可别去那个地方。”看来尼克松显然是去过那儿的，因为过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我们曾到有艺妓的那些酒吧去。我们坐下来玩游戏——可不是你们平常玩的那种游戏。”他对自己的笑话哈哈一笑。“你可千万别带太太到那儿去，”他又笑了，“那就像把汉堡包带到宴会上一样。”尼克松继续说着，若有所思地谈起将来再去一趟日本的愿望。“我有许多日本朋友，他们都让我再去日本。”他叹了口气：“所有的朋友都在

政府工作。比如岸信介，不知他还在政府吗？”有人告诉他，这位日本前首相现在是日美友好协会的会长。尼克松开玩笑他说：“但愿他没有洛克希德公司的股票。”

当晚，尼克松夫妇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文艺演出。

以后的两天里，尼克松主要是与华国锋继续会谈。华和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一样，不满意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展缓慢。在会谈的间隙，中国方面安排了许多观光旅行。在历史博物馆，陪同让尼克松看了一些五千年前的中国字。陪同指着那些字对他说，您注意到了没有，这些字里有些很像你们的英文字母。

“对，”尼克松说，“我看出来了，这个是‘O’，‘A’，‘C’，还有这个是‘S’。”

“这儿还有个‘K’。”陪同指着那个最大的字说。尼克松诙谐他说：“噢，看来基辛格的字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呢。”（基辛格名字的英文为 Kissinger，首字母即“K”。）这引起了当时在场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哈哈大笑。在参观的过程中，尼克松不时地开着这样的玩笑。在古代武器展厅，陪同告诉尼克松，这些武器在古代边界战争中曾用来抵御北方的入侵者。

“你们用这些武器来抵抗俄国人？”尼克松取笑道。

乔笑着反问：“您指的是1969年那次？”

“是谁挑起的？”尼克松又问。

“那当然是他们。”乔回答说。

“那么谁打赢了呢？”尼克松进一步问道。

乔的笑容消失了：“我们只是把他们赶出去而已。”

当尼克松穿过天安门广场时，他与中国民众进行了更多的思想交流。上百个中国人围上前来。尼克松问一个抱着孩子的男人，他是否还想再要个孩子？

“只想再要一个，”那人说，“我们响应政府关于计划生育的号召。”

“等他长大了，你想让他干什么？”尼克松又问。

“党叫干啥就干啥呗。”这位父亲回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尼克松不太自在地“噢”了一声，“你是说党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吗？”那人庄重地点了点头。

尼克松在北京逗留的最后一个夜晚是颇为愉快的。按照中国的习惯，尼克松为东道主举行了答谢宴会。他一边品尝着精美的菜肴，一边谈着政治，谈着美国和中国。谈到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时，尼克松说：“我们还没有把桥架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们决心完成它。为了我们今天在大学里看到的那些青年，为了像他们一样的美国青年以及全世界的青年，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而不能失败。”

基辛格显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还在生气，不过他已确信白宫和国务院发表的新闻公告只会强调尼克松的个人作用了。同时，不管他在北京的进展如何，尼克松回国后肯定不会向政府汇报的。然而，他的巴西之行却使他产生了新的想法。由于其他美国人没有会见过华国锋，因此自从华在机场迎接了尼克松，并花了近九个小时与他会谈之后，尼克松的行踪愈来愈引人注目了。最后，基辛格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当然希望了解尼克松此行的性质与结果。”这与他福特在过去两周里所说的调子显然不同了。福特本人则兴高采烈，因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和初选中意外地取得了

胜利。尽管他仅以不到 1400 票的微弱多数战胜里根，然而毕竟是胜利了。处在胜利喜悦中的福特也开始以更加温和的口吻谈论尼克松了。

然而此时，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却感到疲倦了。桂林是他中国之行的第二站，这里的天气比北京的好不了多少。而且，在政治性会谈结束之后，旅游观光的日程还是那样紧张。最使人筋疲力尽的莫过于芦笛岩的那一段 300 码长的石级了。到达山顶时，尼克松已经气喘吁吁，步履艰难了。当陪同指着这个以其蔚为奇观的石笋和钟乳石闻名于世的溶洞向他介绍时，他因无心欣赏那些美好的洞景而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尼克松的脚也跛得越来越厉害了，这使陪同参观的中国人甚为担忧。尽管已经有了一位心血管专家不离左右，中国方面还是派了一辆救护车尾随其后。

第二天的情况也同样不妙。在游漓江的游艇上，尼克松裹在厚厚的大衣里，很少与中国陪同人员谈话。他不时用忧郁的眼光瞥一眼他的看护兵。那位看护兵从药箱里取出一瓶抗凝血剂，尼克松接过药瓶，好不容易才用他冻僵的手指取出一片，可是一不留神，那药又滚到甲板上去了。

第三天早晨，飞机即将飞往广州，这是他旅行的最后一站。尼克松这时的情绪低落。在机上就座以后，他看了一眼过道对面的《新闻周刊》记者乔治·林塞并对他说：“还是记者好当。你们只需提出问题，而不用回答问题。”没有等林塞答话，尼克松已经转过身去，在随后的整个飞行途中，他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飞机抵达广州时，尼克松的精神又愉快起来。在他参观这座城市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市民涌上街头对他表示欢迎。他们高呼着：“尼克松，尼克松！”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盛况。尼克松感到精神焕发，脚顿时不跛了，步履轻快有力，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由于心绪极佳，他坚持要在机场与记者们合影留念。记者们乱哄哄地挤成一堆，还是尼克松把他们排成一行，并让他们“笑一点。”大家都笑了，笑得最开心的首先是尼克松本人。

回到圣克利门蒂寓所几天以后，尼克松接到了基辛格打来的电话。基辛格当时正在陪着刚作过胃部手术的妻子在棕榈泉疗养。他首先为不能亲自拜访尼克松表示歉意，因为在竞选尚未结束时他这样做只会使福特难堪。尼克松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扯来扯去，基辛格终于说到了正题上：白宫希望得到一份尼克松对其中国之行的全面汇报。福特总经已派弗农·沃尔特陆军中将前来圣克利门蒂作记录。

“那不行，亨利。”尼克松当即打断了。他表明，他不是不愿意向白宫汇报，甚至很乐意这样做；但不能通过什么沃尔特中将，也不是国务院办公厅。他只能与福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面谈。——这才是适当的，有足够尊严的渠道，也是一位前任总统所应得到的安排。对此，亨利·基辛格除了同意以外，已别无选择。

1978 年 11 月中旬，尼克松又应邀到英国去访问。这次英国之行尼克松遇到了麻烦。

尼克松在英国并不是没有盟友，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前官员乔纳森·艾特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还多次去过克利门蒂拜访尼克松。这次，艾特肯为尼克松安排了在英国下议院作演讲的机会，还为他安排了同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以及保守党哲学学会会员的会谈。在演讲和会谈中，尼克松的话既有分寸又诙谐幽默。他在评论世界局势时言谈很有见地，显示出他对国

际事务的了然如指掌。一位曾和他共进午餐的勋爵称他是“一位非常讨人喜爱的家伙。”

与此同时，牛津的一个名为“抵制前总统行动委员会”正在准备着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乱哄哄的示威。对于这一消息，尼克松就像全然无事一般。他笑着告诉记者们，“示威对本人来说，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尼克松准备在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作演讲的那晚，天气很冷并下着蒙蒙细雨，但这并没有打消他的敌人们准备举行示威的劲头。他们来了好几百人，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还有一些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中坚分子。起先，这次抗议示威显得有点滑稽：一个学生身上披挂着录音磁带，另一个则举着标语牌在那儿走来走去。

但是，当尼克松乘坐的黑色戴姆勒高级轿车驶过来时，四周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喊叫声。示威者们蜂拥而来，他们冲破了警察设置的警戒线，挥舞着拳头，在轿车后面疾跑着、追逐着。司机赶紧把车子拐进一条小巷，谁知进了条死胡同。轿车一下子撞在胡同的尽头停住了。还没等警察作出反应，示威人群已把轿车围了起来。他们嘴里不停地咒骂着，向轿车吐口水，还用拳头猛烈地击着车窗玻璃和车盖。轿车内的尼克松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毫无惊慌之色。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他1958年访问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时所遇情况的重演。一位美国记者爬上了附近的墙头，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这位前总统镇定自若地坐在车里，脸上还带着微笑。

最后，警察挥舞着警棍，从示威的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当尼克松从轿车里出来时，示威者们谩骂连声地又向前拥挤过来。尼克松的外衣上沾满了唾沫，他停了一下，朝那些呐喊着的示威者看了一眼，脸上闪过一丝奇怪而又满意的神色，然后尾随着警察走进了俱乐部。

看见他的到来，等候在俱乐部内的800名牛津学生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强大的声浪淹没了来自俱乐部外面的叫喊声。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上了舞台中央并开始发表他的演讲。

他先用了十来分钟的时间以回顾世界局势。他说世界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声称自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一位实用主义者”。然后他欢迎听众提出问题。遵照着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方式，在场的听众提问时都非常彬彬有礼，而尼克松就像他在巴黎自然节目上所表现的那样，回答这些问题时既机敏又有风度。他为美国入侵柬埔寨的行动辩护，说当时“要是我早一些作出这个决定就好了”；他还把美国的这一行动比作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4年指挥盟军在法国登陆的行动”。同时，他又为自己任总统时批准进行电话窃听的行为辩护。在谈到苏联时，他说，“我喜欢苏联人民……我不喜欢的仅仅是共产主义。”他的话音刚落，外面的示威者们立即发出了一阵表示不赞成的嘘叫声和嘲笑声，使得他的演讲无法下去，因为他们也在从英国广播公司转播的实况中监听着尼克松的讲话。尼克松耸了耸肩想继续往下讲，然而外面的喧闹声还是那样的嘈杂。最后，当这些骚扰的声音平静下来后，尼克松用手指了指外面的示威者说：“也许他们喜欢共产主义。”

只有一次，有人问到了“水门事件”，然而周围的人马上朝提问者发出了一阵嘘嘘的反对声。尼克松见状立即做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他镇定自若他说，“一些人说我在“水门事件”上处理不当，他们言之有理。是我把事情弄糟了，为此我付出了代价。

我不是不承认我的过失，但是让我们来看看我任职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吧。当你们活到 2000 年的时候，你们就能看到那时的人们是怎样评价我了。”似乎是对他的回答，在俱乐部的外面，示威者们正高喊着，“我们要你的脑袋！”

在演讲快结束时，有人问起尼克松有什么打算。“我虽然离开了政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此就永不参与社会生活了，现在让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些。我并没有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并没有在圣克利门蒂过着悠闲的生活，只是听听大海的波涛声，打打高尔夫球等等。”接着又说，要那样做是很容易的，实际上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但对他来说，他不能这样选择。“要是我那么做的话，不出一年的精神和肉体就会死去了。”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然后他的话音沉重起来，充满了感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谈论那些影响世界局势的大问题。我不准备紧紧地闭上自己的嘴，对政治事务不闻不问，我要为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发表的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尼克松静静地站立台上，合了双眼，一动也不动。

从英国回来后，尼克松发现记者们还是像以往那样等候着他。然而记者提的问题跟以前的不同了，同时尼克松回答的方式也不已 397 同了。现在，记者们已不再追问他过去干了些什么，而是在问他在做些什么了，而回答这类问题对尼克松来说真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了。在尼克松下榻的纽约市最豪华的华尔道夫饭店。当曾做过他的政治助手并且为多家报纸撰稿的专栏作家尼克·蒂迈施打来电话时，他立刻对蒂迈施发出了邀请。

相见以后，蒂迈施十分惊奇于尼克松的变化。他上次见到尼克松时，正当尼克松辞职之后没几个月之际。当时的前总统看上去筋疲力尽，精神压抑，全无当年敢做敢为的劲儿了。而现在的尼克松，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滔滔不绝谈论着国际事务，谈论着卡特，谈论着自己，这最后一点对他来说，实属罕见。

“一个人被人打败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完蛋了”，尼克松说，“当然，如果他认输并退出的话，那么，他是完蛋了。然而我的哲学是——不管你被打倒在地多少次，你都要从地上爬起来。即使你血流满面，遍体鳞伤，倘若你还想活下去的话，你就站起来继续搏斗。如果你还有所信仰、有所追求，如果在生活和事业中还有什么值得你为之拼搏的话，那么对你来说最大的考验不是你风顺之时，而是你遭受挫折，身处逆境之际。再说一遍，当你被人打倒在地时，你必须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奋击。”

尼克松握着拳头在蒂迈施面前虚晃了一下，然后说：“站起来，重新开始战斗！”

1978 年 1 月 29 日，卡特总统设宴招待第一次到美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特意邀请尼克松参加。

当尼克松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时，两人用力地握着手。第二天上午，两人又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私下会谈，人们已知尼克松将再次访问中国。

1979 年 9 月 12 日，尼克松在埃迪·考克斯、布伦南以及特工人员分遣队的陪同下，启程前往中国进行第三次访问。这次访问的时间不长，总共尚不满一周时间；北京机场上的欢迎仪式也没有前两次那么隆重热烈。此外，除了到附近的炼油厂参观以外，其他的观光活动似乎都免了。尼克松告诉记者，这是一次工作访问，他来北京是与华国锋和邓小平讨论政治事务的。然

而中国方面还是设法为他举行了两次宴会，不过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官员——包括驻华大使伦纳德·伍德科克，没有出席。尼克松在北京期间，他的照片占据了当地报纸的第一版版面。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被盛宴招待时，中国的一位发言人微笑着说：“有一句中国的成语很适于今天的场合：饮水不忘挖井人。”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尼克松又说道：“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的。”

就在尼克松被盛情款待于北京之时，他的夫人正在家中监督家具财物的打包装箱工作。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尼克松积累起非常可观的一大堆财物。仅就家具一项而言，其数量之多不仅足以布置他们在纽约的新居，而且足以布置戴维和朱莉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那所大房子，即使这样剩下的家具还会有满满的6房子。此外，还有各国领导人送给他的数十件精美礼品，以及两百多瓶珍贵的名酒和香槟，其中包括苏联领导人列尼奥·勃列日涅夫送给他一箱12瓶酒中剩下的8瓶，这些酒都贮藏在地窖里。所有这些财物要合起来估价保险的话，可值33.5万美元。

打包装箱的工作从1979年秋天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80年1月才告完毕。1980年2月9日，尼克松夫妇乘飞机从洛杉矶飞往迈阿密——按照原先安排的计划，他们要在那儿同雷博左一起度上几天假，然后再会纽约。在飞机的货舱里，有一样东西令人注目地不见了。那就是在离开圣克利门蒂之前被尼克松送人的高尔夫球棍，因为按照他今后的生活计划，他不会再有什么时间来打高尔夫球了。

搬到纽约以后，尼克松更加活跃，但对于“水门事件”，更不愿意提起。有一天，尼克松又在他二楼的书房里招待了一位名叫玛乔里·达克尔斯的杂志记者，此人以前是一名修女。

“您喝点咖啡吗？”尼克松问。他不自然地微笑着，似乎是因为和一名有魅力的年轻妇女单独在一起而感到不大自在。“佣人回家了，我来煮点咖啡。”

尼克松走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了书房，但是其紧张的情绪并没有放松下来，看得出他出去一会儿以稳情绪并没有放松下来，这回没有奏效，他还是显得紧张而且不自然。只是在迈克尔斯开始问起外交事务方面的问题时，尼克松的紧张情绪才慢慢地消失了。当尼克松谈起国际局势时，他的表情自然了，讲起话来也不再吞吞吐吐了，他表述得清楚流畅，有条有理。滔滔不绝他讲了30来分钟后，这位前总统的神色突然紧张起来。

“咖啡！”他叫道，“我忘记添水了！”随即他又笑了，“你看我昏头不昏头？”

从厨房出来后，尼克松又继续说下去。他认为，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它再次和苏联结成联盟，那就意味着我们输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美国不应该忘记那些小国家。他说，自他离开白宫后，“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南也门，莫桑比克，老挝，柬埔寨，南越等等一系列小国，不是处于苏联人的直接控制之下，就是处于苏联人的间接控制之下。而与此同时的美国又干了些什么呢？它放弃了B-1型轰炸机的生产计划，推迟了巡航导弹的生产，关闭了民兵式导弹生产线，还停止了制造中子弹。”尼克松把椅子朝迈克尔斯挪了挪后总结说，有时是需要世界的领袖人物“以奸诈对奸诈，以残暴对残暴”的。

一个多小时悄悄地过去了，去商店买东西的尼克松夫人和朱莉也快回来了。明明到了该走的时间，可迈克尔斯还在犹豫着。她曾答应过不问尼克松

关于“水门事件”的，还曾保证过不问他是如何挺过来的；可是现在，尼克松坐得离她那么近，他又显得那么轻松，很明显这个机会十分难得。于是，迈克尔斯的问题脱口而出：您是怎样挺过来的？为什么您没有垮掉？

就像被挨了一巴掌，尼克松的身子向后一缩。他站起身在书房里踱起步来。当他回转身看着迈克尔斯时，他的脸已涨得通红。迈克尔斯担心他是否会大叫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尼克松嘶哑着嗓门低声他说话了，“生活并不仅仅意味着轻松愉快。对人们来说，处于社会的顶层，或处于社会的底层都不是件快事。我想我可能是个宿命论者，”他停了一下，在寻找着恰当的字眼，“我认为，你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眼光你才从这些事情中摆脱出来……生活中的危机是一个接一个的，有些人无法正确地处理好这些危机，他们作出了不同的回答。有的开始酗酒，有的开始吸毒，还有的则垮掉了。总而言之，他们的精神崩溃了……然而，一旦一个人意识到他在生活中负有一定的使命，而且这项使命不付出许多的艰难困苦是无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他已下定决心，即使他最终得到的报偿抵消不了他所付出的艰辛，他也义无反顾——假如你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话，那么，不管你遭受多大的挫折，你都能顽强地挺过来。”

尼克松停止了踱步，他低着头看着迈克尔斯。“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几经沉浮。每次竞选都是一场战斗——在每次战斗中你被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击败时，就意味着你已准备好了下一次的战斗。你很清楚在战斗中可能会流很多的血——包括你的血——但是你还得活着，为了将来某一天的战斗你必须活着。”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然后轻轻他说，“要在烈火中锤炼，百炼成钢。”

迈克尔斯的采访报道后没几天就收到了尼克松的一封感谢函，他对她客观公正的报道表示谢意。在感谢函的下面尼克松又加了句：“现在要准备躲避。”

但是，记者是无法躲避的。既然理查德·尼克松再次变成了新闻人物，那么对新闻人物就不能不加以报导。新闻界对尼克松的报导就像是他在竞选政府公职一般。无论是他被人看见在街上行走，还是在商店停下来为孙子买了玩具，或者在“魔术世界”停留时发表点诸如“没有见过迪斯尼乐园就不算见过世面”的议论，统统这些都会出现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同时，采访要求之多，可达一星期 20 个。其中有一个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

那是来自《芝加哥太阳时报》的青年专栏作家鲍勃·格林的采访要求。格林在信中说，他想与尼克松谈谈，这差不多是出于和“一个 8 岁的孩子想去迪斯尼乐园”相同的原因。尼克松回信他觉得受到了恭维，正在考虑。格林在下一次的信中更为正式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最后，尼克松同意了。

格林本来只希望能够和尼克松单独地谈上半小时的，而实际上，尼克松留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谈了近两个小时。尼克松什么都谈，从雪果的价格到他对纽约的印象，到对沃尔特·克朗凯特这样的“宽厚仁慈”之士有可能进入白宫的预测。他谈到了林登·约翰逊，谈到了他将不再打高尔夫球，谈到了汤姆·杜威。然而，尼克松谈得最多的还是他自己。

开始他比较谨慎。我“从来不是个善于搞心理分析的人”，他承认道，“我不试图分析别人，当然也不善于分析我自己。我认为，坦率地说，从事这项活动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多是表面的、牵强的，而且大部分是无用的。”不过，他又说，如果格林坚持的话，他也可以试试。

尼克松开始说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认识了许多非常能干，非常聪明的人，很多人身怀绝技，很多人具有领袖的气质。然而，他们只作到议员便止步不前了，他们从来没有进过参议院，也从来没有干过州长。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仅仅在于他们不愿意失去一个安稳的位子的风险，这样他们便在那个水平上止步了。从人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安全那一刻起，你就再也无需指望他们还会向最高峰挺进了。如果不想陷入这样的悲剧的话，你就必须敢于冒大险，如果必要，你还要经得起失败。而且，很可能在失败了两次以后至三次以后一切还要从头开始。这就是秘诀。”

尼克松顿了顿。“我的公共生活是颇为不易的——其原因无需深究。这对家庭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总之，一言难尽。然而我要说，即使我事先已经知道了以后将会发生的事情，我也不会拒绝一试的。”

也许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尼克松承认道。他的确不同常人：他为人冷淡，性格孤独，不易接近。别的人或许可以“直抒胸臆”，而他不能。

“你必须保留一层帷幕，”尼克松解释道，“一个总统必须不同于普通的老百姓。他应该保持某种形象。人民需要他那样做，人民不希望他与他们平起平坐，并说‘瞧，我和你们一样。’”

“杜鲁门被认为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尼克松接着说，“但是，相信我，除了最亲密的朋友，他从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不拘礼节的亲密举动。”

“艾森豪威尔以其笑容可掬而闻名——但是他不让别人碰他。当然，他可以和你握手并进行其他一般的接触，然而他绝不能容忍别人走过来搂住他说：‘喂，艾克。’”

“肯尼迪也是一样。尽管享有富于魅力的美名，他也有自己的某种秘密，某种尊严。”

“那么约翰逊怎么样呢？……约翰逊相信情感交流中的肉体接触一类的说法。”

“我，当然罗，更像肯尼迪。”

尼克松说他自己是个拘礼的人。他的朋友们，包括雷博左这样的好朋友，都对他以礼相待。他们总是称他“总统先生”而从不叫他“理查德”或“迪克”。

“您是说，”格林问道，“当您和雷博左穿着便服外出，坐在一条大渔船上，当他想请您喝啤酒时，他当真要说‘您要喝点啤酒吗，总统先生？’”

“正是，”尼克松回答，“对极了，就是这样。”他耸了耸肩说：“这正是我的方式。我工作时总是穿着外衣打着领带的，信不信由你，这在一般人是难以了解的。我在写讲稿，看书，口授文件和做其他事情时都是外衣领带样样不缺。即便是独自一人时也是如此。如果脱掉外衣我很可能会感冒，就是这样。”

“我从不和谁过分亲密，甚至对最要好的朋友也不例外，”尼克松继续说着，“我不要什么事都对别人讲——比如‘天哪，我睡不着觉，因为我为这样那样的事担心’，等等。我认为自己的烦恼应该藏在心里。我就是这样的。有些人则不同，他们认为和知心朋友坐在一起把一切都讲出来是很好的精神疗法。我可不，指望我那样做算是没门儿。”

“我不让我的感情受伤，”尼克松总结道，“如果我有感情，我就很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他的很多朋友都没有活下去。“你看看报纸上的讣告栏，有 69, 70, 73,

74岁死的，——都是我的同代人。他们死了，死于心脏病，癌症，还有别的什么病。我从不操那份心，更不会为此感到恐怖，我只想每一天都可能是末日。”

格林被感动了，他想说几句表示同情的话。尼克松似乎觉察到了他的这一意图，便突然终止了采访。当那位记者起身告辞时，尼克松问起他的年龄。“你几岁？”

“33。”

“33，”尼克松点点头，“我第一次当选众议员时也是33岁，那可是一生中的好时光。”

几星期后，11月6日，在里根于总统竞选中击败卡特的第3天，尼克松出现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这天是苏联十月革命63周年的纪念日，苏联人举行晚会。上千位宾客出席了晚会，伏特加散发出芳香。在等待与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握手的行列中，基辛格向一名记者否认有关他的一些传闻：不，他并不准备出任新总统的国务卿或驻北京大使，他简直不知道这类议论是自动流传起来的。

基辛格正要回答记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时，尼克松威风堂堂地走进了大厅，他用臂弯将基辛格带过来，推着他向队列之首走去，嘴里说着：“亨利，你跟我来。”多勃雷宁满面笑容地迎接了他们。尼克松也报以微笑并摆好姿势让记者们照相。看到记者们纷纷围上前来，他便开始讲话了。他预言华盛顿将会欢迎新政府。“将会出现崭新的风格——我没有批评现任政府的意思——不过的确不一样。”里根是一位“理智、可靠、并且强有力的人物。”对苏联来说，只要过上一段时间，苏联人最终是会喜欢里根的。正如苏联人过去也不喜欢他尼克松一样。“但是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

当尼克松离开晚会时，关于尼克松将会东山再起的谣传比任何时候都盛行了。

人们在传说着，尼克松不但是卷土重来，还简直是捭阖纵横，为所欲为。甚至有报道说尼克松已经在收拾行装，准备赴北京任大使了。然而这一切全不是真的。

但有一点是真的，在尼克松前次访华10周年时，他将再次访问伟大的中国。

“水门事件”使尼克松从政治的顶峰跌落下来，勇气使他从屈辱中挺了过来。

以前他曾对自己的助手说过，“10年以后‘水门事件’在历史书中还会占几段，50年以后它就只是个小小的脚注了。”

让我们永远憧憬着未来，永远不要向后看。

1994年，美国新泽西州的萨德尔湖畔，一个垂暮的老人斜倚在林荫中的靠椅上，他的膝头上摊开着一本书，那是他前几年心血的结晶——《领袖们》。他想起了自己的一生。

他是绝不下跪的。“水门事件”令他十分屈辱地从总统宝座上跌落。他经历了沙漠一般的枯寂之后，终于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的眼光落在了下面这一段话上：

领导人的活动始终是多方面的。他有公开的一面，也有私下的一面，有千百万人看到的面孔，也有辅佐他治国的一小批人看到的面孔。……所有领导人都希望由历史证明他们的正确。有些人的声望在离职以后反而更高了，

有些人则江河日下。历史的判决有时使巨人变成侏儒，有时候原来的侏儒则变成了巨人。

历史将如何来判断自己呢？尼克松无边际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

他太疲倦了。奋斗了一生，应该好好地休息。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他的灵魂慢慢地飘出了躯壳……

